CHONGQING CHUBANS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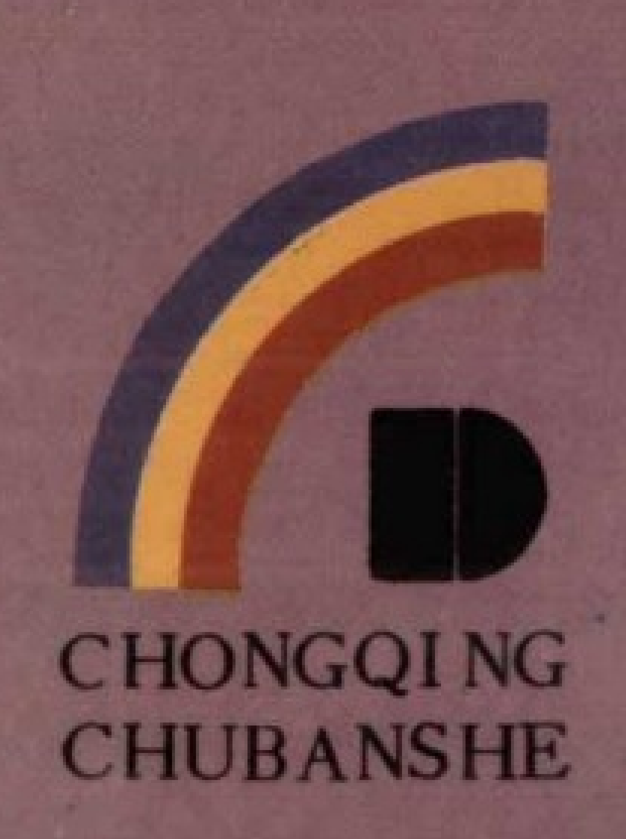
东欧文学丛书

# 黄昏情思

[罗] 特拉扬·利维乌·比勒耶斯库 著

次 农 王敏生 译




CHONGQING
CHUBANSHE

[罗] 特

CHONGQING CHUBANSHE

# 黄昏情思

POMUL CUNOASTERII

TRAIAN LIVIU BIRĂESCU

EDITURA FACLA, TIMISOARA 1983

责任编辑 佘 琳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罗〕特拉扬·利维乌·比勒耶斯库著

汝 农 王敏生 译

**黄 昏 情 思**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2.375 插页4 字数205千

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00

*

ISBN 7-5366-1132-3/I·202

定价：4.50元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罗马尼亚的广阔社会为背景，通过三个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展示了人的命运和价值。

电机厂是先进生产单位，厂长贝尔巴闻名遐迩。他工作一帆风顺，生活的道路却坎坷不平。自从他的爱妻病故后，鳏居了10余年，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在他与比自己小20多岁的女律师邂逅后，长期被压抑的情欲爆发了，他以为找回了失去的幸福，结果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妇产科医生沃什蒂纳尔在城里小有名气，生活十分阔绰。他的妻子是个年轻美丽的工程师。他终日忙于工作和应酬，不关心、不理解妻子。久而久之，她那少妇的心头萌动了朦胧的爱情，蕴存着对厂长贝尔巴难以言语的情爱，致使她同丈夫过着貌合神离的生活。

兽医特列塔不求名利，只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他是个独身主义者，对女人有偏见，因此多次错过娶妻的良机，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

全书通过心理回忆的方法，使多条线索交叉演进，情节真实，主题深刻，生活气息浓郁。

#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受到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占，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又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东欧各国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和曲折。现在这些国家又在为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改革。

文学是社会与时代的产物和反映。东欧各国

文学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其突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十九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作家和诗人，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和显克维奇，捷克的聂姆曹娃，匈牙利的裴多菲，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保加利亚的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等。二十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彩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米沃什、捷克的塞费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斗争精神，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五十年代前后，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外)曾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作家们的思想也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革，文学不再是图解某些政治口号或政策的工具，而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

展。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敢于突破人为的禁区，大大扩大了创作的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政党内部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小说、诗歌，也有对社会上的种种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也打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文坛的局面，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妍、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去反映当代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任人物的思想感情纵横驰骋，宣扬“反小说”，“反戏剧”的文艺纲领。有的作品以故事情节取胜，有的则以抒发情感见长；有的采用荒诞魔幻的方法，有的则以象征、隐喻或影射的手段去揭示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巨大关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许多作家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在欧美各国广泛流传，并以独特的艺术成就受到好评。

早在本世纪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

国来，二、三十年代，鲁迅、茅盾等无产阶级文学先驱，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亲笔翻译东欧作家的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我国和东欧各国走过相似的道路，目前也在进行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我们的文学和东欧各国的文学也有过相似的发展历程，因此东欧作家的探索和创新，他们创作的经验与教训，都很值得我们借鉴。前几年，在我国召开的一次国际汉学家会议上，一些外国文学家建议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将注意力转向东欧文学和拉美文学，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使我国读者了解东欧各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概况和人民的生活及思想面貌，并从中得到艺术上的享受，也为了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借鉴，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特选编了这套《东欧当代文学丛书》，将分期分批出版。本丛书着重介绍东欧各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名篇佳作，特别是八十年代的近作，选材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和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欢迎与指教。

# 第一章

## 一

他悄悄地走出半开半闭的大门，门房毕恭毕敬地向他致意：

“大夫先生，您好！”

他微微点一下头，作为回答。他不在这家医院里工作，但是门房仍然认出了他。门房都有这种惊人的本能，他们懂得应该问候什么样的人，应该对什么样的人不留情面，这样的绝情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不必多说了。门房若没有这种本领，就只有另谋出路了。

那是9月底的一个下午，时近黄昏。他一向是匆匆忙忙的。这次，他却意外地在门廊下站住了。天空密布的乌云急剧翻滚，天昏地暗，云层是那么低，仿佛一伸手便可够着它。他从来不曾产生非分的想法。他的思维清晰、准确和明朗，就像笛卡儿①所主张的一样。他知道笛卡儿的主张吗？不过，这怎么可能呢？他对哲学虽然没有

---

① 笛卡儿(Descartes Rene，1596—1650)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

好感，但并不想坦露这一内心感受。他不无遗憾地发觉，在门口停留是一个错误。真是失误！他要不在这儿留步的话，会一直往前走去的。这样一来，另一个人只能从后面追赶他了。他始终弄不明白，一个平庸的或类似水平的兽医怎么会和贝尔巴结成莫逆之交的。不久前，贝尔巴还是个厂长，而且是什么样的工厂！人应该择友而交。至少这是他的主张。

他用眼瞟了一下，发 现 那 个 人就站在他身边。他心里说："他形影不离地跟着我！"他从病房一出来，就没有能甩掉这个跟踪者。他瞧瞧面前的大街。闪电划破了黑压压的密云，宛如刺穿一张透明的薄纸。刹那间，大街上亮堂堂的，使你犹如置身于五彩缤纷的焰火大会。在短暂，但耀眼的闪光中，他看到几个行人在门廊下逗留，暴风雨近在眼前，不敢再延误了。一声闷雷首先在人们头顶上炸响，接着就是豆大的冰雹，劈劈啪啪地落在人行道和屋顶的瓦上，就像是一阵阵的打鼓声。

他身旁的人惊讶地说：

"9月就下冰雹？"

他装作没有听到这一议论，不动声色，为的是保持距离。空气一下子变得凉爽了。他凝视着在柏油路上跳跃的冰雹，活像一颗颗滚动的小冰球。"我还真有先见之明。"他满意地想。早晨，他

按照习惯听了电台的天气预报。他的车停在附近十来步远的地方，只要冰雹一停……当然，假如推迟这次访问岂不更好了。可是，奥尔坦莎一直坚持……现在，他不得不在门廊下藏身。

他没有来得及想完，只见两个人从冰雹中跑过来。一对男女青年毫无顾忌地挤进人群，他感到热呼呼、硬邦邦的臀部碰了他一下。他偷看一眼，心里想，她一定非常年轻，陪她的那个大个子约摸有20岁。他看不太清，只见他留着胡子，如今时兴年轻人留胡子。那个特列塔兽医被挤到角落里去了，他感到小小的满足。

“你湿透了吗，约内拉?”胡子问道。

姑娘放声笑起来，好像是一个想引起人注意的傻丫头。她比想象的还要年轻，可能只有16岁，至多17岁。她长有一张孩子脸，或许觉察到有人在注视她，于是取出画眉笔，整起容来了。她穿着一件不太干净的白上衣，湿淋淋地紧贴在身上，突出的两个乳头令人注目。她穿的裤子满是污垢，湿透的薄裤子映出她那异常丰满的臀部，看上去不像个毛丫头。她的大腿很美，圆鼓鼓的像古希腊的酒壶。姑娘感到有人端详她，于是猛然转过身看了他一眼那是一种饶有兴趣的眼神，但随即就消失了。接着，她又以完全漠然的目光越过他朝前看。“她对我不感兴趣。”沃什蒂纳尔医生不无醋意地想。其实，他并不在乎姑娘的脸

色，只不过习惯了别人处处尊重他，甚至怕他，这是他的职业所决定的。而这个……当然，对这种年龄的姑娘来说，超过25岁或27岁的男人已经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了。她只是想知道谁在看她。她转身投入那个高个子的怀抱。

“我呆在这儿干吗？浪费时间。”沃什蒂纳尔医生不高兴地想，姑娘的冷淡态度使他不快。他不能容忍人家冷冰冰的样子。在医院里，女护士们对他恭恭敬敬。早晨，没有人敢不按时上班，至少他主管的部门是这样的。他又望望大街。冰雹已经停止，但密密麻麻的大雨点斜着落下来，他刚要伸手去试试，马上又缩回来。他想，何必多此一举，特列塔准会这样做。他有自己的理由，也可以说是……原则。他从不走回头路。要说他有座右铭的话，那就是勇往直前。现在想回头的话，他只能回到贝尔巴那儿去。那样一来，看病人的时间将会大大拖长。他最不喜欢干出格的事。雨下得小了。他得冒雨走几米路，才能到停车的地方。他低下头看看精制的浅灰色薄裤子。他想，在雨中走有点冒险，但是可以摆脱兽医。因此，他当机立断，这是人的宝贵素质，也是他的职业所要求的。不管怎么说，他在这儿呆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了，还等什么？他冲出门廊，急匆匆地朝自己的汽车奔去。

“等一等，先生，你上哪儿去？”从背后传来

特列塔吃惊的声音。

"这么说，我们已经成为至交了。"他心里想，"他甚至还会拍拍我的肩膀。"

他没有回头，只做了个模棱两可的手势，随他怎么理解都行。他跑到汽车跟前，用早已准备好的钥匙打开车门，舒了一口气就钻进车里。顿时，他产生了安全感。因为，他已经与车外的那些人隔离开了。他开动汽车马达，立即响起熟悉悦耳的声音。当车子刚要启动时，他又有点歉意地想，"再容忍一下吧，我不能让兽医淋雨。"他不无遗憾地又打开车门说：

"你也上来吧！"

兽医听到他召唤，瘦小的身躯连忙从门廊下走出来。

这是一辆拉达牌小轿车，他刚买来几个月，现在还是崭新的。当兽医钻进车子的时候，他忍不住好奇地透过凸起的挡风玻璃向外看，门廊下的一对年轻人已经不再拥抱了。虽说相距不远，但视线差，看不清他们的动作。汽车开动了，距离愈来愈小，他从他们面前慢慢驶过，他打开雨刷，透过挡风玻璃看清了姑娘的面孔。她的眼睛很大，目光令人捉摸不定，既带有贪婪，又含着妒忌。"各个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欢乐，小丫头"。他这样想着，加大了油门。他在返光镜里看到特列塔兽医愁眉苦脸的，他把目光很快移到他的衬

衣上，领子敞开着，露出多皱的细脖子。他蛮有把握地想："我敢打赌，他是自己洗的衬衣。"同时，他记起兽医尚未成家。他下意识地瞧一眼自己的衬衣，洁白，平整，每天都换洗。

"能就近撂下他，算我运气。5分钟，顶多10分钟，非甩下他不可。"他边想边转过头去问兽医："你上哪儿去？"他问得很冷淡，坐在后排的人一定听得出来，他，沃什蒂纳尔，只是出于礼貌才送他的。万幸，特列塔就住在附近，他将车掉头朝大街的另一个方向开去。他全神贯注地开车，因为这里不是聊天的好地方。

拉达车轮轧在湿柏油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他吃惊地发现，他们居然也有相同之处。他无法抗拒这突如其来的念头。他们只不过在心脏病医院的候诊室里见过一面。雨又下大了，应该小心点，减点速度。"就多耽误几分钟吧。"他打定了主意。他听到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急促的呼吸声。他心里想："兽医有些激动。"恰在这时，后面的人问了他一句什么。他无所回答，因为没有听清对方的问话。兽医的声音微微发颤，就像一个小孩在招认自己的过失。

"贝尔巴怎么啦？教授说了些什么？"

当然，他应该想到会遇上这样的盘问。他，沃什蒂纳尔有资格同阿格利切鲁教授谈话。众所周知，这位心脏病专家是不屑跟无名之辈对话的。

显然，他是例外，可是特列塔兽医呢？如果他是病人的近亲则当别论。可是……他不悦地想，“他怎么会知道我与教授谈过话？”不管怎么说，既然人家问起，就不能不回答，这也是礼貌。但是，他没有立刻回答。他们来到小广场的旁边，他的眼睛正在寻找一个较开阔的地方。这儿是草地，几排长椅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也许，在阳光宜人的午后，老奶奶们常领着小孙儿到这儿来，享受所谓的田园乐趣。现在，滂沱大雨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他的回答不会令人满意。说实在的，教授的话少得可怜，但从礼貌上挑不出任何毛病。他完全理解，因为这是他们共同的职业习惯。不过，他很少遇到这种场面。当然，有时难免出现复杂的情况。是的，阿格利切鲁是心脏病专家……该如何对特列塔说呢？阿格利切鲁泛泛地谈了一些症状，他还没有给病人做完全部检查和化验，因此不能确诊。病人的心电图欠佳，他不满意。在谈话中，教授一度陷入沉思，他谨慎地搜寻合适的词句，这说明情况不妙。他对同行可以说实话。贝尔巴的“病情”严重——人一进医院就都有了“病情”——可以说很严重，他说完很严重这个词后，立刻补充说：“但愿不出现并发症……他的心脏已经十分脆弱了”。这些话足已说明问题，还需要对特列塔添油加醋吗？如果对他重复说一遍教授的话，他准会再缠我一个小时，

让我解释一大堆问题。他回过头去，十分庄严地望望兽医，只见他心神不定，一双疲乏的眼睛执著地看着他。他们一走出病房，沃什蒂纳尔就意识到很难摆脱这个人。现在他想，还不如把他该知道的快点告诉他，省得他纠缠不休。

“我同教授谈过了。”沃什蒂纳尔 以他十 分熟练的职业腔严肃地说，“情况不妙。”他想笑笑，但是没有成功。他接着说：“还不明朗，没有确诊。不过，估计情况不太理想。”特列塔不信任地看着他、怀疑他的话里含有虚伪的成份。因此，他感到需要加上一句：“但愿一切如意。阿格利切鲁教授可是尽人皆知的著名专家。”

“是啊。”兽医嘟囔了一声。他不是不佩服阿格利切鲁的名望，只是对听到的介绍不怎么满意。他的面部表情说明，他不相信对方吐露了全部实情。

沃什蒂纳尔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尽了义务，还有什么需要向他说的呢？难道向他描述一番心脏病医生的礼貌如何周到吗？他知道，特列塔对这些毫无兴趣。他深信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为了不给特列塔提问题的机会，他不再说话了。小汽车徐徐前进，将小广场抛在后面。

这只能算是一条胡同。前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小广场，实际上是不规则的四边形，这是全城寥寥无几多少还残存着古老时代痕迹的地方。胡同

口的斜对面矗立着两座教堂，教堂的尖顶直插灰暗的天空。他并不喜爱这古色古香的广场，对胡同两侧的巴乐克式建筑也不感兴趣。因为广场四周的房子十分破旧和简陋。他认为住宅首先应讲究舒适，而这儿……

“在哪儿?”他问兽医。

车子来到广场的另一头的一座房子前面。他轻松地想，特列塔这种人只配在这里做窝。天开始黑下来，他打开前车灯，看见房子呈现出乌七八糟的黄颜色，不知多长时间没有粉刷了，墙皮也脱落了不少。他觉得不可理解，“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不管怎么说，特列塔毕竟是兽医，总该有点积蓄，完全可以找一处像样子的住所。也许，他不乐意换地方，喜欢住潮湿的房子。我敢打赌，这房子的地下室跟城里其它旧房子的地下室一样，一定是老鼠成群。“管他呢，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他暗自决定后，就踩了一下刹车。这辆车的刹车真灵。他没有关马达，也没有熄灯。兽医伸手去开门，但笨手笨脚没有打开。于是，他彬彬有礼地转过身，轻轻搬动车门闩，然后缩回手，让兽医下车，外面的清新空气吹进来了。特列塔准备下车，身子已经钻出车门，忽然像忘掉什么东西又回过头自言自语地说：

“谢谢。”

沃什蒂纳尔愣了一会儿，觉得该说句什么话，

但又有点不知所措。“算了。”他满不在乎地想。后来，他意识到很快就能摆脱这个同伴，于是鼓励他说：“别失望。贝尔巴是坚强的男子汉，顶得住。”他自己并不相信这些话，只是出于礼貌说说而已。他知道这些话的来历，但认为出处无关紧要。透过雨水织成的薄薄帷幕，他看见特列塔从车灯的黄光中一晃而过，急匆匆地走进黑洞洞的拱形大门。

## 二

他随即把特列塔兽医置之脑后。他的优点正是能够很快地摆脱不愉快的事情。他加大油门，马达神经质的轰鸣声压住了沉重的脚步声。雨停了。挡风玻璃上的雨水正在慢慢蒸发。他放慢速度，用一只手扶方向盘，另一只手摇下车窗玻璃。一股清新凉爽的空气吹进车里，使他打了一个寒噤。雨后的新鲜空气足以使他忘却一天的忙乱所造成的疲倦。他心里想着“贝尔巴落得这样的下场”，眼前出现了奥尔坦莎忧愁的形象。她正在家里等着他，她可不像兽医好打发。这不是很自然吗？几个月前，贝尔巴还是她的厂长。

他来到十字路口，习惯地向右转入一条胡同，然后又向左拐弯。他高兴地发现走错了路，离家愈来愈远了。他让汽车在开始干燥的路上慢

慢地平稳滑行。他酷似没有做作业而逃学的小学生，产生一阵莫名其妙的兴奋心情。他曾经是一个勤奋认真的学生，也许如今想回过头去重新体味一下孩提时代的贪玩生活。“把车开到城外去转转不好吗?”他一边问自己，一边意识到这是他与同伴分手时就模模糊糊产生的愿望。如何向奥尔坦莎交待呢？不要紧，他有的是想像力，不难找到托词。让她等等没有什么坏处。她早晚会知道贝尔巴的病情。现在，他，一个劳累过度的人享受一下有益无害的小小乐趣，完全合情合理。他可以撒谎说医院里有事，她无从核对。每个家庭都可能出现需要撒谎的时候。同别人比较，他撒谎的事不多，况且并非是见不得人的事。不过，奥尔坦莎在对待贝尔巴的问题上爱追根究底。他对她说，特列塔住得很远，在郊区……即使这样说，他能耽误多长时间呢？只到野外去转一转，半小时，至多40分钟。这突如其来的愿望正在增长。他从未有过完整的空闲时间。医生都是自己职业的奴隶。并且，由于他的关系，他的名声……某人的妻子……指定要沃什蒂纳尔医生助产。有时，半夜也有人来叫门，他不得不起床，立刻跳上车，回家后，只能合一合眼，过一两小时就得去医院上班。他上班从来不迟到。他几乎已经不习惯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每年去海滨度假，住的是高级旅馆。可是最初几天，他都不能

适应，怎么能整个上午都肚子朝天地躺着晒太阳?!

现在，他下了决心。他掌握着几分钟的空闲时间，谁也休想夺走。他不是在家里，身边没有电话，没有人催他。拉达在黑暗中轻快地奔跑，仿佛它的体内蕴藏着无尽的力量。它很驯服，只要轻轻按着——几乎可以说是抚摸——方向盘，它就永往直前。他开车时小心翼翼，即使兴致勃勃，也能保持谨慎、稳重。也许是为了弥补过失吧，他抱愧地想："一出城，我就让它飞起来。"

汽车急速驶过一个加油站。从前，这里就是城边。现在楼房林立，新住宅区不断把城区往外推，挖土机贪婪地吞噬着温顺的泥土。他像往常一样赶路，尽管此刻毫无必要这样做。他认为，回家前必须进行认真思考。车前面的公路笔直，呈白色，像是用白石灰划出的一道线。眨眼间，拉达越过了一公里又一公里，把城市抛在后面了。他从返光镜中看见暗淡的黄色灯光一闪一闪。拐弯后，他走上一段高低不平的路面，眼前只有发白的公路，其它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打开车前灯，看到公路两边竖立着白杨树，好似直冲天穹的长矛。"还继续往前开吗?"他问自己。经过一阵子犹豫，他减慢了车速。矮小的洋槐取代了白杨树，它们蜷曲着，仿佛是羞于挺立在如此重要的地方。"开得够远了，我得停车。"他这样强迫

自己。其实，他离开城仅走了十一、二分钟的路。

公路拐了一个大弯，他老远就能看见来往的车辆。从公路上岔出一条乡村小道，他让车在雨后的土路上滑行了几米。然后，他推开车门，谨慎地用脚踩踩湿土路，正如他原先估计的，小路泥泞难行。不过，路面已经开始风干。虽然入了秋，但天气仍然热。若不是天空布满乌云的话，你会完全忘记下午的那阵暴风雨。他走出汽车，关好车门，迈步回到公路上。他刚刚走出几米，就来到与柏油公路平行的小道，于是决定在这里散步。

起初，他不习惯田野上漆黑一团，十分小心地踱方步。他边不急不忙地走，边回忆白天发生的事。当然，他首先想到的是贝尔巴的病房。他不喜欢病人的那副模样。如果只看表面现象，那么贝尔巴丝毫或几乎是丝毫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床上躺着的那个人根本不像“重”病人，他身穿薄睡衣，上面的两个扣子没有扣上，他的胸肌发达，结实，呼吸稳定正常。引起他不快的不是这些，而是病人那呆板、疲倦、甚至是冷漠的眼神，尽管他在尽力遮掩。他看上去像个心灰意懒的人。他过去从未见过贝尔巴有这种神态，因此使他大为失望。往常，尽管他不愿承认，但他最佩服贝尔巴的正是那用之不竭的充沛精力，不愧

是“斗士型”的人。也许，贝尔巴就是靠这种气质赢得别人的敬重和奥尔坦莎的钦佩。

他不愿意深想下去，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维，马上抛开这件事。他想起上午拜访阿格利切鲁的经过。教授满面笑容，伸出手欢迎他。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老同行！”他满意地感到，教授是一个礼貌周全的人。他的女秘书没有让沃什蒂纳尔久等，很快引见了他。他的专业……女人都熟悉他。即使不认识他，她们也会下意识地明白他是做什么的。女秘书们都像门卫一样，她们一眼就能分辨不能让谁久等，应该立即去通报，或者相反，一点也不必着急。心脏病专家对进入他办公室的人先机敏地打量一番，沃什蒂纳尔心里想，“显然，他在猜我来干什么。”同时，妇产医生又暗暗欣赏对方的举止。他安详端庄，使人觉得他欢迎客人，接待来访者是他一天中最重要的事之一。

“沃什蒂纳尔大夫，见到您真高兴！”他笑着对客人说。他的脸上长有粉刺，带着倦容，可是眼睛充满活力和快乐。教授的身材矮小，动作敏捷，有些神经质。要是不看他的面孔，你一定会认为他是个年轻人。沃什蒂纳尔想，“他还有几年到退休？”教授身上披着一件旧白大褂，里面是柠檬色衬衣，他系的领带，嘿！在妇产医生看来颜色都太鲜艳，不太合身份。但是他认可了。因

为。阿格利切鲁是一位权威，这种人，只有这种人，是可以出点格的。即使他将来离开教授讲台，医院也少不了他，像阿格利切鲁这样的人，不是轻易可以离开的。听说，教授穿着十分讲究，按他的年龄来说，不免有点过份。这个城市不算小，但是医生，尤其是有名的医生都相互认识，好像他们组成了一个大家族，生活在同一间玻璃房里。心脏病医生的这一弱点，即所谓"衣冠楚楚"，引起过议论，受到过嘲笑，但最终还是被大家接受了。

"老同行，来杯咖啡好吗?"主人这样问道，并不等他回答，就站起来走到门口去通知女秘书："卢契，请来两杯咖啡!"

公路拐了小弯后成上坡路。他沿着小路继续往前走。他提醒自己，"别离汽车太远了。"因为，小路不直，偏离了柏油公路，看不见公路两边的夜光标志。他不安地决定，"还是回去吧。"随即，他迈开大步往回走，他对刚才产生的胆怯心理可能感到难为情。慢慢地，他又看到小路挨近公路，以及蜿蜒在庄稼地里的条条小道。接着，他看见了汽车，从汽车旁边走过，朝相反的方向行进。远处的黑暗里出现了车灯的亮光，他猜想那是卡车的灯。他为自己有好视力而感到高兴。摇曳的灯光离得越来越近。无庸置疑，他从沉重的马达轰鸣声中分辨出前来的是卡车。卡车飞驰而

去，耀眼的车灯冲破了前方的黑暗。

心脏病医院坐落在一座庄严的灰色大楼里。过去，它是本城仅有的几个“特殊”疗养所之一。所长曾在维也纳或德国的什么大学求过学，学的是减肥学。他善于招徕有名气的顾客，特别是贩卖生猪和小麦的商人。阿格利切鲁保留了所长的办公室，他在这儿会见了沃什蒂纳尔。他的办公室十分宽敞亮堂，经过了精心装饰，地板全被一块厚地毯盖住了。地毯织得精致，可惜已经陈旧，中间部分显得稀疏。这间院长办公室的门隔音，外面的声音传不进来。心脏病医生笑着迎接他，彬彬有礼地请他在又大又舒适的红皮面扶手椅上坐下。沃什蒂纳尔记得，他当时很羡慕这间办公室，更令人喜爱的是那儿把皮椅和隔音门。他自己的办公室门普普通通，漆成了白色，是医院门的标准色。他的办公室里没有扶手椅，只有几把寻常见惯的椅子，就是那种在几根铝棍上安一块三合板的椅子。教授办公室用的是皮面椅子，尽管有的地方已经磨损。皮面是用花形黄色钉固定的，椅面平整，不起皱纹。还有那隔音门……在他那儿，门外病人的说话声音传进来，像一群蜜蜂在嗡嗡叫。是的，条件不一样。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阿格利切鲁静静地等着。他很有耐心，好像在等他先开口。

他心里想，得把这次会面向奥尔坦莎详细叙

述一番。不知怎么回事，他忽然记起自己来郊外散步完全是偶然事件。他踩到一块小石子，用皮鞋尖轻轻地踢开。他感到该回家了。这一次，他走得不远，汽车停在黑影里，离他不过十二三米。

当阿格利切鲁听到贝尔巴的名字时，那张一直是笑容可掬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亲爱的同行，您也……"他停顿一会儿后说，"其实，我早应该猜到您会来。据病人说，是您劝他来找我的。"他又停住不说了，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他早该住院了。"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女秘书出现在门口。他清楚记得她那有弹性的脚步轻盈地走进格外大的房间。当她走到阳光映照的地方时，透过她身上薄薄的白大褂，看见里面只穿了一件背心，丰满的臀部十分突出。他喜欢有刺激性的柔软腰身和丰盈臀部。他看见教授的鼻子两翼颤动，眼睛隐隐约约闪着贪婪的光。他暗暗地想，"难道教授……"不过，他随即打消了此念头。因为，他认为那种想法有失身份。此外，咖啡煮得很出色，教授正在专心喝咖啡，仿佛已经自顾不暇了。他揣猜这是教授的策略，其实头脑里正在斟酌词句。教授沉着脸，大声重复道：

"他早该住院了。"这次，他用了生气的或至少是不满的口气。片刻后，他改用冷冰冰的口气说，

"您的朋友，心脏很弱，非常衰弱……"

当然，他不会把这句话告诉奥尔坦莎的。他必须换一个说法，找合适的词代替"衰弱"，并且不要离心脏病医生的意思太远。他将逐渐向她透露实际情况，以便让她心理上有准备。他会说，贝尔巴累了，身体虚弱，需要休息，静静休息，著名的心脏病医生也这样反复要求过。

教授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窗前，凝望了一会街景。沃什蒂纳尔心里想，"他也许要从那儿，从玻璃窗前说出诊断结论。"但是，他马上便否定了这一奇怪的想法。心脏病医生又回到办公桌后面，并盯着他的眼睛说：

"我无法担保，病情严重。"

"我可以看看他吗？"他问道。

教授点点头，表示了同意。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您不要呆得太长，不要累着他。他需要休息，非常需要休息。"然后，他感到需要明确什么，直率地说，"如果仅仅这样就好了。"

"还有什么？"他不无吃惊地问。这样做倒不是为了应付奥尔坦莎提出来的一连串问题，而是他也真正关心起这个病人了。

"我对您说过了，同行，"阿格利切鲁接下去说，"就心脏病来说，很遗憾，我们很没有把握。

您知道，有时这种病的发展很出人意料。”对方将怎样理解“出人意料”，那是不难猜到的。教授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沃什蒂纳尔明白，谈话该结束了，阿格利切鲁还有其它事。他忙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教授搉起他的胳膊热情送他到办公室门口。女秘书的工作似乎只是煮煮咖啡，因为，她已经不坐在那里，不知上哪儿去了。教授继续挽着他的胳膊，把他送至门口。他在门口站住，用力握一握沃什蒂纳尔的手，匆匆讲了几句话，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客套话会产生什么效果。他说：

“我们不要失望。有时，情况会出现戏剧性的好转。不管怎么说，我们有责任尽力而为。”他又热情地握握对方的手，然后以他的年龄所难以想象的速度转过身，走过女秘书的房间，很快消失在隔音门的后面。

## 三

往病房去得穿过走廊。走廊里的大窗户全部朝西，这时都敞开着，窗外也许是花园，只听见潺潺流水注入水池的轻微响声。晚霞的余辉透过很高的窗子射进室内。有几间病房的门是开着的，可能是病人想欣赏日落。他坚定有力的脚步声传得很远，一听就知道是从外面来的人。病人经过

长期的住院生活，能很快辨别每个医生和护士的脚步。他遇到了病人审视健康人的独特目光。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当然，其中不乏嫉妒。疾病可以把人们自己不知道的缺陷从心灵深处翻腾出来。一点点嫉妒，有时也会是非常强烈的嫉妒。不过，这种嫉妒往往被掩盖着，因为病人的呆板目光中含有笼中困兽的哀怨情绪，正常人对此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当然，他什么也不会看见。医院里的医生对人的苦难几乎都变得麻木不仁了。下班时，随着门房的问候声，他们把一切都留了下来。就留在医院里。他们有自己的解释，要是想不开的话，怎么能工作？他在一间病房的门口看见几个病人躺在床上，他们面对夕阳的余辉，另外的人正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小声说话。沃什蒂纳尔一跨进病房，他们都闭口不语，只用眼睛审视他。他们也许纳闷，这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他一走出门，他们马上又打开话匣子，谈得更加起劲儿。这些细节没有逃出他的注意，但他并未予以重视，好奇心促使他去关心别的事。在阿格利切鲁教授及其同事们的努力下，这所医院已小有名气，甚至还名扬国外，也就是说举世闻名。他想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医院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同小异。若不是建筑方面各具特色或者其它细节上存在差别的话，那么医院的相似之处几乎达到了雷同的程度。长长的走廊，身披白大褂

的年轻女护士穿梭似地来来去去，严肃的医生迈着稳重的步伐。这种步态早已成为习惯，从当学生去医院实习时起就逐渐形成了。病房里的床全是统一的规格，连床头柜也是一个模式。在外行人看来，连病人也都非常相似。红色或蓝色的条纹花睡衣成为病人的制服，并且均因无数次的洗涤而褪了颜色，变得很薄。没有人统计过一件睡衣经多少人穿才能报废。当然，他不会去干这种蠢事。至于病人……他也没有看见他们干过。

他终于走到了走廊的尽头。尽头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因为他面前的墙壁上有个洞，好像是后来挖开的。实际情况果然是这样。在国有化前的几年，那位握有镶金边文凭的所长买下了隔壁的房子。看来他的事业顺利，想继续扩大。那所房子不大，比较低矮。因此，沃什蒂纳尔跨过门槛后，不得不向下走几级台阶，才来到心脏病医院的一个侧翼。他像所有珍惜时间的人一样，正要急急忙忙往前赶路时，却忽然止住脚步。他走进一条窄小的过道，两边只有几个门，窗户同样开得很高，显然也是经过改装的房子。使他滞步不前的是附近传出来的笑声，他侧耳细听，断定笑声来自左边第二个薄木门里。笑声刺耳，像是老鼠叫，他能从各种笑声中辨别出它来。紧接着，仿佛是为了证实他猜得正确，又传出一阵较低沉的男中音笑声。他不必用很多想像力——他沃什蒂

纳尔缺少的正是想像力——就能猜到笑的人是个强壮的男子汉。笑声充满力量，表明人对生活的热爱。这就是说，贝尔巴不是一个人。沃什蒂纳尔陷入沉思，心里稍微有点不悦。当事情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发展时，人们常常会感到不快。黄昏临近，探视病人的时间已过。他原以为阿格利切鲁只给他这种特权，结果……他决定下次再来。他转过身，脚踏上第一个台阶。可是，他又停下来，心想，奥尔坦莎怎么办？该怎么对她说呢？再说，他好不容易才挤出几个钟头的时间，岂能白白浪费。近几天来，他把每个下午排满了事，实在抽不出身。于是，他又下了决心。他做事不习惯半途而废，尽管希望他与贝尔巴见面时，不要有第三者在场。其实，他早就听到了特列塔的尖笑声，只是不愿承认，不想看见特列塔。

又一次响起尖笑声，并且像上次一样，紧接着是另一个人的笑声。沃什蒂纳尔心里问："他们在那儿干什么？"他是矜持的人，不爱开玩笑，简单说，他缺乏幽默感。他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他们的笑声中，他估计两个人正在说粗野的笑话。兽医擅长讲各种难登大雅之堂的笑话，尽管特列塔回到城里工作好几年了，但这一点似乎对他并不重要。他不能不承认，兽医也应该是得到人们敬重的职业，但是心里却藐视它。特列塔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抛弃了自己的专

业，当上卫生检查员，整天在车站的饭店里转来转去，尝遍各种香肠和烤肉，有时还把鼻子伸进餐车厨房里。沃什蒂纳尔想，特列塔也许会下决心放弃这种生活。他的确瞧不起这个兽医。他想，也许兽医该走了。这是去医院探视病人的惯例。先来的人将病人转给后面一个人，然后依次传下去，床上躺着的人被当作邮件传来传去。当时，他不自觉地产生了这种想法，但随即就打消了它。因为，他认为它带有侮辱性，或者自己不喜欢任何出格的想法。谁知道特列塔何时来的，呆了多长时间，教授却向他强调看病人的时间不宜长，免得病人劳累。教授知道兽医的到来吗？抑或他买通了门房？他决定进屋。他走到2号病房门前，轻轻敲了门。

“进来。”贝尔巴粗壮宏亮的声音从门里传出来。

“你不会想到他是病人。”沃什蒂纳尔边想边用力按门把。

过道里黑洞洞的。他一走进病房不得不停一会儿，才能看清楚里面的情况。开头，他只看到一个大窗户几乎开到地板。迎门放着一张床。贝尔巴躺在床上，背下垫两个枕头。

“稀客，稀客，瞧，喂，看护，瞧谁来看我们了！”贝尔巴欢迎沃什蒂纳尔说。显然，病人很高兴有人来看他。他把特列塔叫做“看护”是不合

适的，因为卫生检查员毕竟是兽医。

“又见到您很高兴。”沃什蒂纳尔走近病人，握住他的手说。他看到特列塔坐在靠墙的凳子上，便淡淡地点一下头。他接着问道：“您感觉如何？”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问候多么不合时宜。

“非常好。差一点给报销了。”他笑着说：“我是叫特列塔来写遗嘱的。你好吗，大夫？你干吗把大肚子产妇和娃娃们丢下，跑来看一个可怜的病号？”

沃什蒂纳尔皱一皱眉头，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他不喜欢开这类玩笑。他不能容忍别人嘲笑他的职业。什么大肚子？什么娃娃？首先，他根本不管娃娃。至于说大肚子……太过份了，他是什么人，一个普通的助产士吗？

“对您来说，我是不吝啬时间的。”他几乎是冷冰冰地回答说。不过，他马上就改变了语气。他经过努力，总能做到彬彬有礼。这种本领曾对他成名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说，医生，特别是妇产科医生爱嚼舌头。他们说长道短，甚至连女病人也不放过：“哼，美其名曰来治病！”沃什蒂纳尔一贯温文尔雅。他的同事们造谣说：“沃什蒂纳尔在把产妇抬上手术台前，要吻她们的手表示致意。然后就说，可敬的太太，会有点痛，不过，一切都会称心如意的。”当然，事情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他很有礼貌，考虑得周到。妇女们是十

分看重这一点的。

房间里还有一张凳子，沃什蒂纳尔拉过来，坐在病床旁边。病人的脸色苍白，这在医院里是极其常见的，可以说是住院病人的特征。贝尔巴的症状很清楚，眼睛四周有明显的黑圈，眼里不时闪过奇异的光。你很难相信眼前躺在床上的人居然是病人。贝尔巴的睡衣上面两个扣子没有扣上，结实的胸脯随着呼吸有节奏地起伏。他想："他根本不像垂危病人。如果奥尔坦莎看到他，准会放心。"但是，在精力充沛的人的结实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有病的心脏。阿格利切鲁教授说，他的"心脏非常衰弱"。教授的话可能是敲敲警钟……"我该回去了。"他此时正好走到汽车跟前，决定不往前走了，就打开车门，钻进车里，坐到驾驶座上。他提醒自己，上公路时要小心。尽管公路上仅有两辆卡车驶过，他也不敢掉以轻心。

"您脸色不错。"他说完就发觉这种安慰话实在愚蠢。

床上的人许是装做没有听见，故意讥讽地瞅了他一眼，让他明白自己根本不把这种过于乐观的评论放在心上。他的眼睛又放射出恍惚奇异的光芒。沃什蒂纳尔意识到，病人完全了解自己的处境。他不禁为自己刚才说的错话而感到难堪。显而易见，贝尔巴不是那种喜欢听谎言的病人，尽管有人面带笑容，把谎言说得有声有色，充满

信心。比如，“您看上去非常好。看不出您有什么病，为什么把您留在这儿……说真的，您完全同我一样”。虚伪的安慰话里含有不自觉的自我吹嘘，即把自己看作是健康人的标准。去探望病人的人最容易犯这种毛病。

病房里的空气令人窒息，我们进去5分钟便会偷偷瞧一下表。我们用一只耳朵漫不经心地听病人诉苦，另一只耳朵专听街上的动静。我们属于那个刚刚离开的世界，马上又要回到那里去……再看一次表，呆20分钟吧，至多25分钟。我们同他的世界有什么关系，他也是被迫地、违心地留在那儿的。假若病房不在这儿，窗外是花园，窗户朝着大街，那么另一个世界的喧哗声有如蜂群的嗡嗡声传进来。两个世界相距不远，只隔一堵墙和几级台阶，但对某些卧床不起的人来说，仿佛相隔千里，永远不能越过它。街上的嘈杂声不能穿过花园传进病房，但流水倾注入池的声音清晰入耳。保持安静是医院里特立的规矩。这个位于侧翼的特殊病房尤为宁静。住在这儿的人不可能过得舒坦。他边想，边看了一眼病人。他仍然没有理睬兽医，他们只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偶然相遇的，这种机遇并不意味他们之间必须发生亲密关系。

“奥尔坦莎向您问好。她也想来看您，可是教授不同意。”他对贝尔巴说。

“奥尔坦莎太太吗?”贝尔巴兴奋起来。“我很高兴她没有忘记我。我也乐意见到她。告诉她,我惦记着她。”

“我一定转告。”他有点尴尬地回答说,心里觉得贝尔巴的话暧昧。什么惦记她?“幸亏她没有来。”他边想边记起与阿格利切鲁谈话的情景。教授十分坚决地说:“不行,我很抱歉,请转告尊夫人,病人需要安静,而女人……”他脸上的表情意味深长。

沃什蒂纳尔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有一种模糊的不安感,说不上妒忌,他还不至于这样,况且奥尔坦莎的品行是无可指摘的。她已是快40岁的人了,但还颇有魅力。他经常发现,街上的男人偷眼看她,他们的目光贪婪,暴露出那些人的心地不善,他们在许多场合甚至忘记羞耻。不,当然不是妒忌,可以说是警报,是他的自尊心发出的警报。他心灵深处的毒蛇不时探出头来。本能使他回避,不去想贝尔巴对他妻子感兴趣的问题;但是,同样的本能又隐约告诫他,奥尔坦莎缺少自制的能力,事情极为复杂,不如任其自然发展。何必追根究底?有什么益处?

至于说到变化,他倒是早已经注意到奥尔坦莎身上发生的微妙变化了。她到贝尔巴的工厂去工作以前就出现了异常现象。工厂不是他贝尔巴的,尽管也许是工厂把他送进了医院。是的,工

厂并不属于他本人，但是人们一般都这么说。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过去，奥尔坦莎并不太想出去工作，她不喜欢工作，总是三天两头地调换工作，她说是“换换空气”。她满足于在某个合作社或什么小厂担任不起眼的职务。有时，她还戴上套袖，当一名小职员，还真的喜欢上这种工作，说“不需要负什么责任”。直到……她怎么会丢下如此舒适的工作？一年里，她总偷偷弄两三次病假条……我们都是人，谁能不讨好沃什蒂纳尔医生呢……她到底为什么离开合作社或小厂，进了电机厂？奥尔坦莎去电机厂上班后，他曾经问过：“你的厂长是怎么一回事，会魔术？”

“谁知道！”她奇怪地笑笑，回答道。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种笑容。他疑惑地看看她。如今，他重新回忆这一场面时，记起了当时自己内心的感受。奥尔坦莎对他隐瞒了什么？在那以前，她从不把工作放在心上，每逢想换工作，总是撒娇地说：“他们那儿有个工程师的空缺。薪金不多。不过，你会帮我对付的，不是吗？”其实，他对她说过，何必要出去工作呢，他一个人挣的钱还不够两个人用？“算了，算了，”她不耐烦地说，“我不想成为你的包袱。我也有文凭，怎么，把它挂起来当装饰？”有时，她不反对留在家里。他们没有孩子，作为一个女人，她也有令人难以想像的创造力，能找到五花八门的事打发日子。总而言之，

她从来不把工作当一回事儿。但是，这一切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也就是说，是在她进入电机厂以前的事。那时，忽然出现了奇迹。她申请这个工作，不仅是申请，并且得到了它。“小心”，他告诫过她，“我听说，他们要求很严。”他不了解奥尔坦莎能否称职，更没有想过她是个工程师。她曾兴冲冲地对他说：“可以算是考核。厂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时，他心底的毒蛇第一次探出头。“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什么意思？他能吞剑？”他烦躁地想来想去，不得其解。

他的脑海里像演电影准确地呈现出当时的情景。奥尔坦莎哼着小曲走进家门，他好久不曾听到她哼歌曲了，她进门后，没有关门。

“把门关上！”他提醒道，并接着问：“你的新厂长怎么了不起？”

“你瞧。”她说着脱下大衣，顺手扔在扶手椅上。“瞧。”她重复说着坐在另一把椅子的扶手上。“他还真考了我，怎么说呢，跟大学里一样，老实说，他问我的问题算不了什么。”

“你是说，他有教学天才？”他嘲讽地打断她的话。

“别瞎说。”奥尔坦莎宽容地说。“听我说呀！他发现我懂点书本知识，就带着到厂里去转，从这个车间走到那个车间，一句话，让我看了整个生产过程。他问这，问那，还拿起一个零件，问

它的用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刁难我，可是，他没有达到目的。”

“结果呢？”他好奇地问。

“他让我去人事科办手续。他对我说，沃什蒂纳尔同志，您申请调离吧。你从下个月起来我们厂上班。当时的情况就这些。”

当前，她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躺在医院里。如果相信教授的话——可不是信口开河——贝尔巴已经没有“指望”了。当然，关键问题是让奥尔坦莎知道真相。

他拿定主意回家去。他细心瞅瞅夜幕笼罩下的静悄悄的公路，把车子慢慢倒到几米外的公路上。后轮一碰上坚实的柏油路，车子轻轻跳跃一下，如同遇见老朋友。然后，前轮也同样跳了一下。车子已经全部上了公路。他在这儿呆了半个多小时。他想，即使对奥尔坦莎掩盖真相，也十分遗憾带回去的消息足以使她担心。再说，她还可能听到更坏的消息。

上班后，她对“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热情有增无减。这是她过了一段时间才说出来的。她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一个有罪的女人或轻浮的女人，从来不会公开，特别是当着她丈夫的面，夸奖自己所倾心的男人。因此，对他来说，必然另有原因，且是十分复杂的原因。他不善于察言观色，追根究底。她对别人介绍说：“我丈夫是个求

实派，讲实际，脚踏实地。”他不计较细小事，但是无法摆脱一件事，即厂长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他，当然是一般化，只不过是“脚踏实地”而已。他的自尊心开始作祟了。我们自己很少承认这一点，对别人就更少了。这是极敏感的问题，人人像怕触痛伤疤谨慎地回避着它。奥尔坦莎找到了值得她敬佩的人。如果她是一个年轻姑娘，迷上了电视上的轻音乐歌手……她开电视机只为了听新闻和天气预报。谁能想到她迷上了厂长。

他第一次见到贝尔巴时，也认为他是个引人注目的男子汉。贝尔巴勉强接受了邀请到他们家来做客，那是在她去工厂上班一年后的事。奥尔坦莎向他解释说：“别计较，贝尔巴就是那样的人，有点不合群，自从他妻子死后，多年来一直鳏居。”沃什蒂纳尔过去不知道妻子是那样好奇、敏感、能了解到许多轶闻趣事。贝尔巴的确是个随和、性格开朗的人，他们相处得融洽，这也许是他想了解妻子喜欢厂长的原因。他不能不承认，贝尔巴给他的印象不错。他呆得时间不长。他抱歉地说，自己住的窝离得太远。窝是指工厂附近的一所旧住宅。奥尔坦莎悄悄对他说：“工厂的历史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他住得相当远，沃什蒂纳尔主动提出用车送他。于是，客人就多坐了一会儿。

贝尔巴仿佛觉察到沃什蒂纳尔正回忆与他有

关的事，边听特列塔讲笑话，边笑着望了他一眼。他想，我得打断他们，谁知道兽医什么时候才能讲完。

“贝尔巴先生，奥尔坦莎要我告诉您，厂里的人都向您问好，他们很关心您的健康。”

特列塔的凳子嘎吱嘎吱响起来，他问贝尔巴：

“您知道那两个神父的故事吗？是个笑话……要不要我说说？”

“算了，特列塔。”贝尔巴说完就向沃什蒂纳尔解释：“他想让我忘掉工厂。刚开始真不容易，现在熬过来了。”他有点烦躁，似乎急于要人相信他做到这一步何等困难。

沃什蒂纳尔问自己：“是不是不该提工厂的事？”可是奥尔坦莎非要他转告不可。贝尔巴听了当然不高兴，因为他过早地病退了。疾病使人的许多计划落空。“他真退休了吗？”沃什蒂纳尔立刻否定了自己的疑问。远处传来一声闷雷。这时，他才发觉暮色苍苍，天怎么黑得这么快，入秋仅只几天，白天应该长着呢。他偷看一下表，心想还不到告辞的时候。三个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特列塔带头打破室内的郁闷气氛，但他并不善于辞令，只不过健谈，目的在于消磨时间。他环顾四周，室内没有什么观赏品，医院的小病房基本相同，无非是让人默默忍受痛苦的场所，有

时，也是让人悄悄死亡的地方……贝尔巴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书，尽管他离得不远，可以看清楚书名，但没有认真查看，因为，他认为那是窥视别人的隐私。贝尔巴在医院里有看书的时间，而他则只能读专业杂志。他指指书说：

“您这儿很安静，可以看看书。我没有时间，只能偶而看点专业杂志。”

“大夫，我们换换吧。”贝尔巴装出一板正经的样子说，“你来住院，我去替你接生，只一个星期。”

三个人同时笑起来。他觉得兽医的尖笑不顺耳，有点装腔作势。他想，特列塔肯定了解事情的真相。

近处响起闷雷，仿佛是被激怒的狗为了壮胆而狂吠。贝尔巴说：

“你们得挨雨淋了。”他轻轻叹一口气，意思是让他们明白：可以走了。他粗略地估计，呆的时间确实不少了，阿格利切鲁教授的要求又在耳边萦回：“别累着他，探视的时间要短。”他又偷看一下表，发现呆的时间并不算长，若不是雨威胁……不过，他的车就停在外面。假若不在这儿遇见特列塔，那么他还会再坐一会儿。

“我以后再来吧。”他说。他可以通过电话要求院长准许他探视贝尔巴。今天，他已经拜访过院长。他得尽力遵守规定，因为它们不是凭空编

造的。尽管他的时间很少，但仍满怀情谊说："我还会再来的。"

近处又响起雷声，震得窗玻璃哗啦响。他从敞开的窗子往外看，只见树枝颤动，好像是催他离开。他站起身，想说几句不落俗套的告别话，但觉得特列塔正在讥讽地盯着他。门几乎是无声地开了。他高兴地想，"门轴上了油"，而他那个妇产医院的所有门都会发出刺耳的唧扭声，他得采取点措施。门口出现一个年轻女护士，她的手里拿着一个装针的金属盒子。

"晚安！"她满面笑容地说。她笑时露出了略嫌发黄的大牙齿，不认真刷牙的人通常有这样的牙。事实上，还没有到黄昏，但呆在医院里的人往往认为天黑得早，下午一晃而过，黄昏拖得很长，有时几乎得拖到午夜，仿佛时间也因为害怕而延宕着，磨蹭着不肯往前走，这尤其是对失眠病人而言。可是住在医院里谁能不失眠呢？他回头望望护士，她从容不迫地走到床头柜跟前，放下白色的金属盒。金属碰到床头柜发出轻轻的响声。护士的动作迅速、利落，但表情呆板。他断定，她的思想早已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她打开盒子，拿出针管，又从突出的前胸口袋里取出一只针剂。她一手拿针管，一手拿针剂，轻快地走向洗脸盆，敏捷地敲掉小玻璃瓶的尖端，插进针头，取出药水。"打针吧？"她像哄小孩一样问病人。对医院

里的医生和护士来说，病人就是孩子，一群大孩子，有时这些孩子还相当淘气，可是不能责骂，不能罚他们站墙角。

“好吧，伊丽娜，打就打。”贝尔巴无可奈何地同意说。

沃什蒂纳尔明白该走了。他连忙道别一声，便走出病房。他没有走几步，背后传来一个人的脚步声，他不回头就能猜到是特列塔紧跟着走出了病房。

# 第 二 章

## 一

我在黑暗中听见汽车声消失了。接着，四周恢复了宁静，这是我惧怕的寂静，因为它意味着我将孤苦伶仃地呆着。即使有沃什蒂纳尔作伴不见得好，但总比孤单一个人好。不难看出，他并不欢迎我去看贝尔巴。我相信，自从我们相识以后，他心里就纳闷我和贝尔巴有什么可交往的？坦率地说，当我看见他从门外探进头来，小心翼翼走进病房时，着实感到奇怪。贝尔巴几个月前就已经离职，不再是他妻子工厂的厂长了，他为什么还来看贝尔巴？我这是从他的角度看问题。也许，我带有偏见，看问题过激，甚至有错误……不过，我敢发誓，绝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他妻子奥尔坦莎委派他来的。尽管是不速之客也罢，有人来探视总是好事。我感到辛酸，不能再继续装模作样了，不是因为我把笑话说完了，而是贝尔巴已经有所发觉。我们二人相对而笑，但如果他对我说，"喂，特列塔，别装蒜了，难道我不了解……"我不会为之震惊的。他知道什么？他

了解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吗？病房值班医生的答复含含糊糊，要想问问阿格利切鲁教授简直难上加难，因为医院里的人在他周围筑起了不可逾越的墙。

沃什蒂纳尔来得正好。我们已经玩腻了捉迷藏，无法再玩下去了。妇产科医生的表情严肃，一本正经，活似吞下了一根棍子。他的到来改变了一下气氛。他说了些蠢话。你说说看，能对一个心脏病刚发作过的人说，看上去不错吗？与其这样，不如不说为好。总之，不能尽拣好听的说。沃什蒂纳尔提出的问题和说的话，都不合时宜，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了。他踌躇满志，缺乏当今所说的自我批评精神。他和奥尔坦莎之间产生了裂痕。我想不通，他怎么那么有福气，居然找到奥尔坦莎做妻子。不过，他可能把她看作是自己的私有物。

"奥尔坦莎吗？很能干，大有前途。"贝尔巴对我这样说过。他很了解她在工厂的表现。一提起工厂，妇产医生就把事情弄糟了，简直像是在吊死鬼家里说绳子！贝尔巴退休了，可他念念不忘工厂。如不是这场该死的病，他能提前退休吗？……我想，不一定是工厂累坏了他，更可能是他妻子玛拉引起的。他的婚姻是不幸的。至于沃什蒂纳尔嘛，他有自己的优点，单那周到的礼节就无可挑剔。他蛮有绅士风度，用车送我回家，使

我免受雨淋之苦。遗憾的是，我并没有从他的嘴里掏出多少情况。我知道，他找阿格利切鲁谈过。他有意用这种方法表示对贝尔巴的爱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一定像我一样仍惦记着病房里的那个人。病人正在那间陋室里同病魔进行生死搏斗，他孤军作战，尽管在维奥丽卡去世后，他一度经历了孤独的痛苦生活，后来才与玛拉结婚的。在汽车里，我欲言又止，真想问问沃什蒂纳尔，究竟阿格利切鲁是怎么说的，贝尔巴的病情重不重……奇怪，他走后，我感到需要有人作伴，哪怕是沃什蒂纳尔医生呢。我们二人有一些共同之处，都在贝尔巴的病房里呆过。我们坐在车里还想着他。现在，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担忧。

大门口的灯像往日一样是黑的。天一黑下来，我的房东波拉切克太太就像鸡一样 回 屋 睡 觉去了。她的屋在后院，没有一丝灯光。她在漆黑的过道里设了防，整整齐齐排放着几个垃圾箱，我不得不小心地摸索着前行。波拉切克太太酷爱整洁。我扶着墙走，垃圾箱散发出的陈腐臭气令人窒息。清洁工已有好几天不来清理垃圾了，炎热的天气使它臭气熏天。如果过道里有灯，那就方便多了。我说服不了波拉切克太太。她坚持说，门口装上灯会招来小偷，就像夏天的灯光招蚊子一样。

我终于摸到了“西门子牌”的开关，谁知道是

什么年代装上的，一直延用到今天。打开灯，微弱的光线驱散了黑暗。谁也说不清，多长时间没有擦灯泡了。我不能要求波拉切克太太爬上沉甸甸的高梯子去擦灯泡。她的丈夫在世时当门房，他用铁链把梯子拴在自己窗前的墙上，还上了锁。他死得很蹊跷，确切地说，是很愚蠢。我刚刚从贝尔巴那儿来，不愿回想这件事。我不大了解他，因为我搬来不久，他就辞世了。人各有自己的死法，不能选择。不过，我总认为，这个大腹便便的小老头死得称心，非同寻常。有些人喜欢开玩笑……荒诞不经。他们说门房小老头进了天堂，但愿有天堂，都是神乎其神的笑话。简单地说，他是在一次足球赛中丧命的。关于他的死众说纷纭。我听到了斯卡尔拉特的说法。他当过财政局的职员，像我一样是个单身汉，一个人住在楼下。我之所以相信他的说法，不是由于他的这种身份，而是因为他和波拉切克一起看球赛时出的事。球赛票是波拉切克买的，他哪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足球赛。

“我们的人以0:2落后。”斯卡尔拉特先生对我说。他像[illegible]的那个人一样，也是一个足球迷。“裁判判给对方罚球权是不公平的……打成平局时整个看台都轰动了，可是，波拉切克瘫倒在我的身边。我问他：‘你怎么了？我们不是踢平了吗？’我忙扶他，你知道，他是个小个子，那时却

重得像一袋土豆。我把他翻过身来，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上楼时，我提醒过自己，最不应该想的就是波拉切克的死。楼房破旧，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全城最老的房子之一。也许，有朝一日，有人会往大门口钉上一块镶着金字的黑色大理石，城里有这样的房子，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着:“巴乐克式古建筑，建于17世纪”。不过，到那时以前。这儿只能是一所旧房。当年建造时，人们会想到自己在干一件大事吗？楼房高大，两个门分别朝着两条大街，我刚才走进来的是正门，对着当年城里的主要广场。传说，在上个世纪，比如帝王生日，这是举行阅兵典礼的地方。我把注意力集中于住房，是为了忘去波拉切克，他的悲剧之所以浮现在我的脑海，正是那可诅咒的联想作怪。楼梯的嘎吱响声使我一下子摆脱了对死者的追忆。我想，楼梯总有一天会断掉，压坏下面的人和物，甚至把我也砸在里面。我住在三楼，一想到楼梯塌断，就禁不住停下来喘一口气。我被种种幻觉吸引，“来点小地震”，我一面往楼上爬，一面想着地震。“怎么不来个美国人？美国人爱异想天开，乘飞机上天，从空中拍照……出奇的景色……眨眼间，房子变成废墟，就像纸牌搭的城堡倒塌了。人呢？人就不用说了。我们的想像力难以预见自己在那种情况下的遭遇。”我爬上 3 楼，沿着走廊往前走，

这条走廊用铁架支撑着，搭在房子的外面。我明白，自己是在自欺欺人，聊以自慰。其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贝尔巴在病房里干什么？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在转动钥匙之际，我恍惚看见波拉切克幽灵般地走过来，贴近我的耳边悄悄说：“我们不能选择死的方法。你瞧……”我骂了一声，吓得他转身就跑。我开门后，走进屋里去，形单影只，但我早已习惯孤寂的生活了。而这一夜将会十分难熬。我有两间屋，里间是卧室，堆放着书籍和唱片，外间是会客室。我的客人不多。走进里屋，我把脱下的衣服随手扔到——不是放到——椅背上，我像瘫痪了一样倒在扶手椅里。时至今日，我对买红色皮包扶手椅的事记忆犹新。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父亲趁破产的商人拍卖财产的机会买来的。我们住在车站街，是吉卜赛人用车子运来的。付钱时，他跟父亲争吵起来，我听见他用吉卜赛话骂人，后来骂骂咧咧地走了。我怀疑父亲又犯老毛病，每逢付钱都要尽量压价。父亲把椅子搬进屋，一一摆放好，自己兴致勃勃地欣赏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不亏是帝王家的东西。”父亲提到“帝王家”带有几分悲伤，我不明白其中的奥秘。至于说到椅子，一有人坐下，便咯吱咯吱响。我想，它们有过光辉的岁月，现在被贬到这种地方能不抗议吗？后来，它们慢慢习惯了。人都能习惯新环

境，何止家具呢！

终于，我完全自由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回顾一下白天发生的事。我曾想推迟这种自由的到来，因此，当我从沃什蒂纳尔的汽车里下来时，不免有点后悔。我走到窗前，推开窗子，凉爽的新鲜空气迎面扑过来。我看见广场上有零零星星的行人，可能都是遇雨而来不及回家。后来，我转回身，又坐进扶手椅。我的思想又飞回医院。贝尔巴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一个人有了“病情”，住进心脏病医院，还能想什么？他被迫住进了医院，竟然有人——到处都不乏自作聪明的人——认为。他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在工作中太逞强。

“他总想使自己和工厂名列榜首，当先进生产者。这怎么行，先生，事情得有个限度。”一个夸夸其谈的人郑重其事地说。其他人也这样对我说，不过，我坚信，导致他心绞痛的不是工作，而是同他妻子玛拉的口角。贝尔巴退休半个月，她便抛弃了他。自从见到玛拉以后，我就怀疑这种婚姻能白头到老。记得，当我得知他与维奥丽卡结婚的消息时，心里忐忑不安，直至看见了她，才承认他们是一对幸福夫妻，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是，很不幸，她死了。自那以后，在漫长的13年里，他孑然一身，他可不像我安于过独身生活。因此，我对他再婚的消息感到高兴。我只希望他不要选错人，过后又骂自己杞人忧天。

玛拉比他年轻得多。当然，年龄上的差别不一定成为障碍。贝尔巴尽管现在病得骨瘦如柴，但仍可以称得上是个“壮汉”。他们从布拉索夫结婚回来后，我立刻前去祝贺。我当时不无感伤地想，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我走下电车，慢慢向树林走去。林荫道两边建有几幢别墅，早些年，工厂的办公室占用了其中的一栋房子。贝尔巴住在楼上，用了三间屋子。房间不大，他搬来前女秘书为他布置了一下。他从过去同维奥丽卡在城里住的地方运来一个五屉柜，柜子的样式古朴雅观。“这是亡妻最喜欢的，”他对我说，“我舍不得丢掉它。”他让人把其余的东西全部卖掉了。别墅离城远点，不过也有优越性。它坐落在树林里，夏天可以听黄莺的歌声。我有时上他那儿去，尤其是周末总要带上一两瓶好酒，在那儿过夜。他的屋外有一个阳台，我们晚上边喝酒，边聊天，直坐到次日凌晨。别墅的院子十分宽大，与工厂仅一墙之隔，我们坐在阳台上，便可对工厂的概貌一目了然。我预感到，“我们很快就不能聚在一起了”。这种预感在我认识了玛拉后更为强烈。自那以后，只过了两年零几个月。他们的婚姻仅维持了那么长的时间。

“喂，你认识一下玛拉吧！”他打电话叫我去，免得我突然去造访。她长得秀丽，那是没说的。她就是那种走在街上能招引男人们回头看的标致

女人。她的头发是褐红色的。一看到她，我就想起少年时代同院住的女人们常说的话："红头发女人都是狐狸精。"她的头发不能说是纯红，只能算金黄色转向褐红色。她的头发不红，但是个地地道道的狐狸精。我的这个看法后来得到了证实。她用力握住我的手，作为女人，她的手略微嫌大。如果真要吹毛求疵的话，你准会认为这是个缺陷，可是，我不相信贝尔巴会有这种看法。"是个有主见的人。"我当时这样想。她的眼珠呈灰颜色，一般说，灰眼睛是污浊的，而玛拉的眼睛很美，依我看，它过于冷漠。冷冰冰的目光里含着刚毅。她好似把我当作该宰的牲口，十分细心地打量我，估价我。她的眼睛在问："这个小医生值几个子儿？"我不记得自己被女人那样看过，尽管我也可以毫不羞愧地承认，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

"贝尔巴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她说。但她的目光却流露出另外的意思。她笑了，我发现她的嘴不大，嘴唇很薄。当然，不能说面相决定一切，但我相信从人的相貌可以看出许多问题。一句话，我看出玛拉是个有思想，有主见的女人，而结婚……我认为，她并没有迷上贝尔巴。她喜欢孤芳自赏，不大关心人。我责怪自己偏激，看破红尘，否定一切。但遗憾的是，事情恰恰依我的判断发展了。我寻思，贝尔巴需要多长的时间

才能认清妻子的真面目。

回到家里，我又想起她的笑声。她笑得露出了牙齿，旁若无人。不能不承认，她长有一口好牙齿。可我觉得它跟猛兽的牙齿相差无几。唯一重要的区别在于她不必再夜以继日地狩猎了。我评价她是“漂亮，有主见的危险女人”，但说不准她何时将同贝尔巴发生冲突。当然，不会在最近发生，因为他完全沉醉在梦境里，他们最初的共同生活过得不错，可称得上是延长了的蜜月。我以独身者的偏僻脾气问：什么时候甜尽苦来？暂时不可能发生，因为贝尔巴能满足她的愿望。首先，他们搬出了别墅。

“你独身一个人时，可以住在这个狗窝里。你是厂长，而且不是一般的厂长，是先进工作者，让他们给你找个像样的住处！”我看到贝尔巴面有难色。他从不向人提任何个人要求。

“可是，玛拉，”我傻呵呵地插嘴说，“这可不是狗窝，工厂刚给修理过，房顶换了新瓦。对贝尔巴来说，这儿具有历史纪念意义。他对它有感情。起初，工厂是在这栋楼里办公的。那时，他对我说过，他朝窗外望一下，就知道厂房正在建设中。”

她咬着薄嘴唇，漂亮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哼，不是狗窝。”她沉着脸说：“可是，我们早上怎么到工厂去？到法院去？”看来，她不喜欢

别人反驳自己，她强词夺理，极力要压倒对方。我伤心地闭口不言了。他们结了婚，他必须考虑她的意见。我何必多管闲事，惹他生气？与此同时，我意识到同贝尔巴一起坐在阳台上迎日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她的初次胜利，一次较大的胜利，以后还能得到一些胜利。我没有统计过。我后来很少上他们家去，贝尔巴常到我这儿来。他在初婚后有过的欢乐神色渐渐消失。我猜想他们吵过嘴，但不便过问。也许，他迷恋女人那丰满的，富有性感的身躯，这是联系他们的纽带。不过，这一根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松弛了。我不能贸然探问他们的私生活。贝尔巴似乎并不十分担忧，但我认为他们的冲突将是一触即发，仿佛两块巨石碰撞能爆发出火星来。玛拉这种女人最大的失策莫过于太相信自己的力量，她们错误地把男人看成傻瓜，岂不知漂亮女人的腰带是不能永远拴住男人的。

我觉得口干舌燥，便从扶手椅里站起来，在漆黑的屋里摸索，很快就摸到了落地灯。我搬来多年了，对室内的一切了如指掌，可以闭着眼睛走动。母亲去世后，我卖掉了老家的房产，虽说只有一座房子，但是对我这个单身汉来说，未免太大了。此外，还有一个花园，那是父亲的骄傲，可是谁来经管呢？街上路灯的微弱光线照进屋里，它和落地灯的神秘黄光仍不够亮，于是我又

打开壁灯。我走进厨房，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冷饮，倒出一杯，一口气喝了下去，好像冰冷的饮料可以使我摆脱愁思。我不禁又一次回忆起他送我离开病房时的眼神，问自己："他现在在干什么?"

我回到屋里，走到窗前，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听见位于广场另一端的教堂里响起了庄严的钟声。这是报时钟，已经十点钟了。奇怪，时光流逝得何等快！我俯视广场，进入视线的六七十步远的地方，有1幢2层楼房被薄雾笼罩着。我知道楼房的大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但没有留意上面的字。后来，我从那拱形的窗户传出来的孩子们的喧哗声，判断它是一所学校。房子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多次变迁。有人对我说过，从前那里是全城闻名的客店，我记不得什么名字，仿佛是"金野牛"或"金喇叭"，城里的点心店也多以花命名，那时的生意人比现在的富有想像力。我上大学的那几年，每逢接到家里寄来的钱，便去光顾"多嘴多舌的猴子"点心店。它算不上什么上等场所，不能同我住处附近的客店相比。据说，列纳乌的父亲就是在客店里玩牌把钱输光的。再往前，玛丽亚·特莱西娅①的御车在客店门前停

---

① 玛丽亚·特莱西娅(Maria Teresia, 1717—1780) 查理六世的女儿，奥地利女皇。其丈夫托斯卡纳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兰西斯一世。弗兰西斯一世及其后裔属哈布斯堡—洛林王室。

过。我努力想象当时的情景。女皇的个子不高，有点发胖……据说怕苍蝇……生过一群孩子……其中的一个，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叫玛丽一安托瓦内塔①，被法国人砍了头……

我离开窗前，不再去想那野心勃勃、不可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人，她来这里的目的无非是搜掠财物。我酷爱历史，尤其爱本地区的历史，但是，现在不是宣讲历史的时候，我不得不割爱。我的思想又飞回了贝尔巴的病房，人住在医院里度日如年，我带去一本书让他消遣，当然不能手不释卷。病人也有心思，悲观情绪使他难安心读书，谁都要考虑自己的命运。我去看他，讲笑话给他解愁……我不是不明白自己的做法多么蠢！他笑笑，或确切地说，出于礼貌勉强笑笑。如果他对我说："喂，特列塔，算了吧！我现在是听笑话的时候吗？"我听了一点也不会吃惊。阿格利切鲁教授到底对沃什蒂纳尔说了些什么？妇产医生透露出来的片言只语，不是好兆头。"不要丧失信心。"废话，难道取决于我们的信心？难道是信心带动他的心脏，一会儿慢跳，一会儿快跳吗？

我又走到窗前，眺望远方。一阵冷飕飕的风吹来，天气反复无常，刚才云消雾散，眼看月亮

---

① 玛丽一安托瓦内塔(Marie—Antonette, 1755—1793)弗兰西斯一世的第11个女儿。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之妻，1793年10月被革命法庭送上断头台。

要露脸，不料又忽然乌云布满天空。我心里想，又快下雨了，便关上窗子，上床睡觉。明天，我一早就得外出。但愿能够入睡，我边说，边钻进被里。

## 二

但是，我没有马上睡着。我又开始想贝尔巴，回忆最早同他有关的事情，当时的事并不令人高兴。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却十分有趣。由于他的缘故，我挨了父亲一顿打，尽管我的朋友——那时还算不上是朋友——没有什么过错。因此，我从不为这件事怪罪他。有一次，我对他说起挨打的事，他捧腹大笑说："瞧，你为我遭了多大的罪！"父亲为什么打我？因为，我明知故犯违背他的规定，即"别让我逮住你跟院里的那群野孩子玩，小心挨揍！"可怜的父亲！他一辈子都想成"人物"。他自认为是上等人。我不知道他想什么，他有强烈的社会等级观，自诩为圣西门《回忆录》里的人物后代。贵族时代早已经成为过去，可是父亲仍然看重那个时代的等级。他最后混了个可怜的兽医技师，这在我们的院里算是体面了。我出生在车站街上那所住宅里。只有我家和帐房先生各占有三间屋，其中有两间的窗户朝着大街。按父亲的说法，我们跟同院人相比，属于

"绅士"阶层。过了几年，我奇怪地发现，父亲的价值标准不仅是扭曲的，而且也是相对的。另外的人，就像我们看同院人，也把我们看成是低贱的人。我过了多年以后才得出这个结论来。院里的住户几乎全是城里工厂的工人，铁路班道工和信号工等。他们的女人在附近的烟厂里干活，于是，她们自然而然成了烟草工。父亲不是本地人，他从遥远的阿尔迪亚尔地区来。他闯出来也不容易。我不了解母亲的经历，尽管我认识她的亲戚，跟姥姥很熟，有时夏天到她家去住，她住的村子离城不远。父母亲一直瞒着我他们是在什么地方遇上的，是怎么认识的。我猜想，母亲年轻时来城里当过几年工人，父亲可能正是要隐瞒这一点，连我也不让知道。这样，母亲嫁到他家自然成了"太太"。

我想，父亲的自命不凡思想害得他潦倒终身。他认为我们住的那条街不适于他安身，早在我出生前就想搬到离市中心近的地方去，但因支付不起昂贵的房租，不得不抛弃这个念头。车站附近的街道往往是肮脏不堪，人声鼎沸。我们家与机车编组场仅隔一条马路，路这边是一座座房子，那边是一堵灰色的墙。我小的时候总觉得它长得没有尽头。隔一定时间就从墙那边传过来车厢相撞的声音和车头的汽笛声，夜深人静的时候，那震天响的声音常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你让他跟谁家的孩子玩呢?”母亲不解地问。她毕竟是个普通妇女，父亲的落落寡合禀性没有感染她。

他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也许没有料到会遇上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母亲有些过份。因为，妻子的天职是顺从丈夫，丈夫需要妻子唯命是从。不过，父亲很快就理解了母亲的意思，很有把握地说：

“我带他去找里秋医生的孩子玩。我想，他们的年龄差不多。”

“是吗!”母亲不无疑惑地说。父亲没有再搭腔，谈话到此结束。

我从未见过里秋医生，在我当时的想象中，他一定非常魁梧。父亲对母亲悄悄说过：“是个大骗子。”他口气里的钦佩和妒忌多于谴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兽医是一种不光彩的职业，里秋医生是这伙坏人的“大头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了解到父亲并不是一尘不染的人。他也见钱眼开，千方百计捞钱，玩“小把戏”。里秋医生拿到大头后，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里秋医生的形象就这样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高中毕业后，我反对父亲让我学兽医的主张。他嘲讽地问：“是吗?那您想学什么?”我没有理会他称“您”的用意，只说想学哲学。他一听，差一点气晕了。他好不容易缓过气来，厉声对我说：

“只要你愿意，去学神学也行。可是，你休想从我手里拿到一个子儿。”

我有什么法子呢？那时，有一个兽医系设在离我们不远的阿拉德。我只好任他安排。

但是，幼小的我究竟为了贝尔巴什么挨父亲一顿打呢？迄今记忆犹新，那不是一般的吓唬小孩，而是实实在在的毒打。我违抗了父亲的严厉禁令：“别让我抓住你同贝尔巴家的人玩，我会敲断你的骨头。我现在就缺人家说特列塔家的孩子和无赖混在一起”。

贝尔巴家是新近搬进我们院里的住户。房东努米安在后院又盖了几间房子，它们可能给他添不少收入。努米安是个传奇性人物，他身上笼罩一层神秘色彩。除了最老的房客托瓦德尔老爹外，没有人看见过他。帐房先生是努米安的代表，大权在握，他代收房租。我们和帐房先生住在新建的房子里，门前有三级台阶，院里的其它屋子的位置都比较低。房子的主人十分吝啬，不肯浪费地皮。主房左右的屋子实际上只是小棚子，帐房先生格什帕尔给这些简陋的棚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公寓”，这不愧是他罕见的想象力的结晶。什么“公寓”？小厨房里只勉强放下一个碗柜和搪瓷炉灶。这种带烤箱的炉灶是“奢侈品”，不知努米安先生是从哪儿弄来的。屋里可以放两张床，一张小桌和一个衣柜。房两边的空地上种着几行花。

我想，花也与搪瓷灶一样，在努米安先生的长远计划里有作用。主妇们最关心的是炉灶，而男男女女的住户是从乡下来的，他们希望有一块菜地。草木怎能在机车喷出的滚滚黑烟中生长?公园，全城出名的公园不在这儿，设在市中心。他，努米安倒慷慨，赐给每户一个小花园。花园很小，甚至可以包在手帕里。不过，哪怕小，也算个花园。住户们知足，自认为享受着特殊待遇。努米安懂得如何笼络人心。我没有去别处看过花，只觉得我们院里的花是世界上最美的。我们种了艳红的大牡丹花，鸡冠花和狮子嘴，初夏的晚上，你一打开窗户，就可以闻到晚香玉的浓郁香味。

我一直不明白，这些花怎么能经受住火车头的烟熏和漫天飞扬的尘土的折磨。车站街没有铺柏油，每天运货的大车来来往往，掀起了灰尘。我们院里还有一棵树，好坏也算是一种点缀。我生来第一次爬的，就是这棵满身疙疙瘩瘩的老核桃树。有一天，房东努米安派人来砍除它，这在大院里的孩子们眼里简直是一场掠夺性的灾难。事情确实是那样的。幸亏，人们第二天就在原来长核桃树的地方堆起了砖、石子及其它建筑材料。晚上，建筑工人走后，我们就爬上去玩，忘掉了核桃树。工程进展很快，看来努米安为了使新房赶在入冬前完工，答应给工人奖金。冬天搬家的人不多，但是入冬前总有人急于找窝的。努米安

先生来过几次，视察工程的进展情况。过去，我们谁也没有见过他，不知道是他光临，可是从帐房先生格什帕尔同他说话时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不难明白来人是努米安。格什帕尔手里拿着帽子，尾随着他，同时还保持一定的距离。努米安的相貌令人失望。他是个瘦老头，满头蓬乱的白发，身穿浅灰色的丝光衣服。他的衣服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大院里没有人穿这种衣服。说到包工头，他可大出人们的意料，他不仅很快造起2层楼，而且把房间改得更小了。从这个角度说，老住户可算是占了便宜。2楼的房间不高，底层的就更矮了，可是阳台上的铁栏杆格外美观，可能是努米安先生从什么地方廉价买来的。阳台很宽敞，狭窄的楼梯呈螺旋形。2楼的房客搬家时，不得不用绳子把家具吊上去。

在那像灯塔或轮船的窄小楼梯上——到底像什么，全凭我们这群孩子的想象——我认识了贝尔巴。孩子们把楼梯变成游戏的理想场所。我前面说过，它像灯塔或轮船上的楼梯。其实，那时我只从电影上看见过灯塔，不知道真正的灯塔是什么样子。轮船吗，我倒见过不少，因为我们的城市有码头。战争期间，水上运输相当繁忙，轮船把我们的粮食运往德国或奥地利。我觉得，港口的驳船远比不上我小时候想象中的海盗船神气。几年后，我开始上“竖琴”影院去了，它设在编组场的贫民区

里。我们从楼梯的铁扶手上滑下去，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在“竖琴”影院里。不过，这件事是后来发生的。那时，父亲已经后悔不让我与贝尔巴玩。再往后，也就是过了两年，小时候总嫌日子过得慢，贝尔巴带领我们从一个墙洞钻进编组场。贝尔巴已经被同院和邻居的孩子推举为头领。

在楼房完工前，大院里的孩子们就把曲曲弯弯的楼梯看成是理想的游戏场所，恰巧新房客比努米安预计的，或比格什帕尔先生早先保证的来得要晚。贝尔巴家是入冬后才搬来的。我没有看他们搬家。因为，我那天患了感冒，被大人关在屋，不让出门。“太太有意把他捂在屋里”，这是父亲的看法，他并不干预母亲的做法。看来，他们之间有默契，我归母亲看管。其实，我并没有生什么大病，只不过发点烧，母亲的护理使我很快康复了。终于，我如父亲所说，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得以去院里玩了。我一出屋门就朝新楼奔去，仿佛母亲为我作了去北极的准备，我穿得厚墩墩地钻进了楼梯间。我刚爬了几个台阶，一个比我略大的壮实小孩挡住了我的路。我说过，楼梯很窄，两人无法并排走。如果两个人在楼梯上相遇，其中一人必须紧贴墙壁或铁栏杆。我看出来，陌生人根本不想挪动。他站在上面的台阶上，讪笑着看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来这儿干吗？”我瞪着两只眼睛发愣，还没有考虑他是谁，从什

么地方来，当然也来不及回答他的问话。不料，他又重复问了一遍，并补充说：

"你们瞧这小子，他妈把他包成这个样子！"

楼梯上爆发出哄笑声，我定睛一看，他身后还站着几个人。他又一次问道：

"你来这儿干吗？滚开，找你的人玩去，去找资产小子玩。你就是个资产小子。"

"我不是。"我愤怒地抗议说。其实，我根本不懂这个词儿的含义，仅意识到是骂人的话。"我不是资产小子，我是这院里的孩子。"

"让他去吧，贝尔巴。他叫特列塔，是自己人。"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厌恶的口气说。

"是吗？好吧！"他说着让开路，让我上楼去。我就是这样认识了贝尔巴。

我没有问母亲什么叫"资产小子"，当然更不敢问父亲，因为本能告诉我，不能把在楼梯上发生的事说出去。至于父亲禁止我同贝尔巴玩的规定是过了很久以后的事。我们都是孩子，在幼小的年龄能很快交上朋友，但是也常常转眼就翻脸。我和贝尔巴的友谊却不同一般。几天后，他主动找我说：

"我听说你叫特列塔，我叫贝尔巴。"他作过自我介绍后，拉住我的手，用力握了握。我很感动，但不习惯这样隆重的礼节。"孩子们告诉我，"他接着说，"你有书，你喜欢看书，能借几本给我

吗？"我一时弄不明白他的用意，没有马上回答。他误认为我信不过他，马上劝说道："别怕我不还你。我也有不少书，你要看吗？"我点点头。他拉着我一起上了楼。

我已经完全忘记贝尔巴家的情景了。只记得贝尔巴有个用白松木制做的书架，分3层，为了省地方，他们把它安放在窗台下。我扫了一眼，看到他的书至少比我多一倍。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屋里还有一个书架。他解释说是他父亲的书架。我不明白，他父亲的书怎会比我父亲多？一个火车司机能比兽医技师的书多？我感到父亲辛辛苦苦塞进我脑袋里的等级观一下子破灭了。我们家里只有少量书，一本皇历，《世界年鉴》，菜谱和几期《兽医药公报》。而他们，贝尔巴家却有一个小图书馆。

"你们订报纸了吗？"我问贝尔巴，心想至少在这方面可以压倒他们。

"是的，"他回答道，"我们订了报，还有一份杂志《自由论坛》"。

我不得不认输了。我们家只订了《世界报》，母亲光看其中的两个栏目：讣告和结婚启事。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她没有去过布加勒斯特。我坐在书架前面，有如阿拉丁置身于宝库。我很晚才腋下夹着《三剑客》，离开贝尔巴家。我对母亲说，这书是从学校借的。我想，那是第一次撒

谎。

父亲不是因为我从贝尔巴家借书才打我的。他没有空检查我看什么书。即使他想起来问，我也准备用对母亲说的谎话去对付他。我把书藏起来，只在他离家后才取出来看。他们的书上都盖着印章，贝尔巴说那是一个印刷工人给刻的。他是瓦西里大叔的朋友。我不自觉地称贝尔巴的父亲为大叔了。小心谨慎使我变得聪明起来，我找到了掩人耳目的方法，即用蓝纸把书包起来。父亲一旦偶然看到，会认为是学校的教科书。早在父亲威胁说要揍我以前，我就感到必须隐瞒我和贝尔巴的友谊。父亲瞧不起新房客。他认为邻居都不如他，常常怨气十足。老邻居们了解他，尊重他，都称他为特列塔先生。来了新房客，谁知道他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依我看，父亲是故作清高，他的想法多出自无能。我听说大院里流传着关于我父亲的闲话，说什么“兽医翘尾巴”。我不愿意，也不能同意人们的诽谤，因为，父亲总归是父亲。我们的生活并不比别人富裕，只不过懂得节省，会精打细算，积下钱备急用。在艰苦的日子里，父亲靠梦想宽慰自己。里秋医生揶揄他时，自己也不在意。父亲向母亲诉苦说，里秋医生一拿不到钱就要翻脸不认人。他只有忍耐着，默不作声。“你爸知道该怎么办。”母亲总是这样说。她的生活哲学是盲从，做起来比较容易。她知道自

己男人的想法。我从她那儿了解到，父亲认为还没有到向我交底儿的时候，他只说让我"远离这帮无赖"。母亲说，我们从嘴里抠钱是为了买房子，现在还没有攒够钱，至于什么时候能凑足数，她也说不清。"那是你爸的事。"她盲目相信她男人将把一切安排好。

其实，大院里的人都和父亲做同样的梦，区别在于他们仅仅是梦想而已，而父亲却有实现的可能性。他极力想摆脱房客的地位，变成房主。每到月底，格什帕尔去各户收房租。他肯赏面子在我家里坐一会儿。父亲请他喝白酒，母亲忙准备饭菜，他和父亲边喝边聊。他们正襟危坐，表情严肃，如同参加宗教仪式。

"冬天来了，特列塔先生，"他对父亲抱怨说，"冬天来了，可是我还有几套房子没有租出去。我怎么向努米安先生交代呢？你们应该理解……"

父亲应该理解什么呢？我怕被他们发现我在偷听，不敢在半开的房门口久留。我隐约听见，"那个贝尔巴，不要国家，也不信教……"我不明白，他是说瓦西里大叔吗？我看，瓦西里大叔是个正经人，他们为什么同他过不去？

几年之后，我们终于弄到了自己的房子，实现了父母亲梦寐以求的愿望。说来很巧，可以说是战争帮了忙。父亲用贱价买下的房子比造新房合算，不妨说捡了个便宜。尽管那个时期的房价

疟惊人地猛涨，有人却急于卖房。同盟国的飞机已经开始轰炸，目标是车站、编组场、铁路，这所房子坐落在栈桥那边，离得不远，相当危险。父亲宁愿担风险，也不肯放弃当房主的强烈愿望。他有远见，认为“炸弹不会正好掉到我们头上”。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说得对，炸弹没有砸下来。这些是后来发生的事，先前他不得不“忍受”像贝尔巴这样的新房客，他们心目中没有国家，不信上帝。

在父亲和格什帕尔谈话的那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对母亲说：

“我早告诫过格什帕尔，要用心挑选住户。他总怕房子租不出去，不听我的话，着急地往楼里塞人。要是出什么事的话，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说得清……”

会出什么事呢？我心里疑惑不解。我对那天晚上的事记得清清楚楚。炉灶里燃烧的木头噼噼啪啪响，母亲的脸上流露出赞佩的神色。也许，他就是为这才娶她的，她从来不违背他的意志，总是竭力从丈夫的眼神里猜出他的想法。我们全家围坐在饭桌边，天花板上吊挂的电灯照亮母亲温顺的面孔，从她那略高的颧骨上看出对“男人”的盲从。

“是的，太太，”父亲气愤地说，“我们不得不同无赖们住在一起。”

当听到父亲称她“太太”时，母亲吓得心惊胆战，因为父亲往往在气头上这样称呼她。她做了错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不过，她随即镇静下来。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她形成了一些准确无误的条件反射，她很快明白，他不是生“太太”的气。

“要是只是这些也就算了，”父亲继续说，母亲的顺从没有惹他生气，而恰恰相反。“要是只这些也就算了……”他气冲冲地重复了一遍。“你瞧，现在倒好，我们院里多了个瓦西里·贝尔巴这样的共产党。我早怀疑他有不合适的地方，刚才，帐房先生对我说了。”

“他怎么会知道？”母亲壮着胆问。

“哼，他哪能不知道？！”他不耐烦地说，“也许是从派出所知道的，他去那儿登记过新房客。听说贝尔巴家有个小男孩，”父亲从凳子上转过头来看着我，问道，“你认识他吗？”

“我们在一个学校念书。”我尽量沉着地回答，心却怦怦跳。

“别让我看见你和那个小子在一块儿，”他警告说，“小心我揍扁你。”

“是的，爸爸。”我一面慌乱地答应，一面琢磨该把从贝尔巴家借来的书藏到哪儿去。

“哼！真是，”父亲厌恶地说，“郊区学校就这个德行，让你跟一群无赖同学。”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隐忧：“我要有钱的话，就把你送到教会学

校去上学。那儿的中学有附小，里秋医生的小孩在那儿读书。”在我的教育问题上，兽医也成了榜样。我认识教会学校的学生，他们戴着蓝色的帽子，黑色小帽檐呈半圆形，他们的打扮像一群火鸡或孔雀。我心里也愿意有这种打扮。可是得跟贝尔巴分手……我们是同桌同学。我不怕父亲发现，他白天没有空去学校，只要晚上我们一起回家时不让他看见就行了。当然，我不好意思对朋友说明发生的事情。

可怜的父亲……我早就忘了那次挨打的事。他想送我进教会学校念书。我认为，他的这一美梦实现不成。因为，修士要钱，而这所郊区学校不收学费。可是，他仍然希望看见我也戴上有两条红白飘带的蓝帽子。那样，我一回家，邻居准会背地夸赞说：“特列塔家就是行，没说的。人家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去念书了。”父亲听了，心里乐滋滋的，多少忘掉一点卑贱感。前几天，他还对母亲抱怨说：“我上里秋家去了一趟，把该归他的打针费送去了。真不是个玩意儿。我跑遍7个村子去打针。他连看都不看，就把钱扔进了抽屉，只对我说：‘好吧，特列塔，没错儿！’就这么一句话。我给他送了钱，连谢都不谢一声！”我明白，如果我也去教会学校上学，他便可以向兽医问起孩子的学习情况，并自然而然地加上一句：“您知道，我的孩子也在教会学校念书。”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讨厌瓦西里大叔，我尽量躲着，不让他看见我和贝尔巴在一起。可是，有一次，我们在街上碰到了帐房先生。我确信父亲一定得到了消息，晚上，我提心吊胆地等着惩罚。但是，当天晚上平安无事。我猜想，帐房先生大概是无意间看了我们一眼，他有自己的事，何必去对父亲说三道四呢。翌日黄昏，父亲紧锁双眉，急匆匆走进家门，我当即明白自己得为贝尔巴的友谊付出代价。他走过来，一把抓住我，吼叫道：

“我不是对你说过，不要同无赖来往吗？”

不等我回答，他就左右开弓朝我的脸上各扇一记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耳光。

“你会把孩子打死的！”母亲魂不附体地嚷嚷说。

父亲恶狠狠地瞪了母亲一眼。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邪恶、陌生的目光，他的脸也气得变了形。

“滚开，太太！”他大吼一声，把我拉进厨房，随身关上门。然后，他解下腰上的皮带，劈里啪啦抽打下来，我顿感疼痛难忍，吓得躲来躲去，他就打我的背。

“别动！”他厉声命令我。等到我明白过来，他又打了起来。后来，我麻木了，不知疼痛。尽管皮肉还在受苦，也就是说深入了骨髓。

我禁不住问自己："难道这是我的爸爸吗?"我无法相信事实。过了好一阵子，我才听到疲累和憎恶的声音："滚!"他拉开厨房门。我往外面走时，望了他一眼，只见他满眼含泪。母亲站在门外，我一看见她，便一头扑进她的怀里。

父亲与瓦西里大叔有什么仇?跟贝尔巴有什么过不去的?我一点也弄不清楚。看上去格什帕尔是个正派人，他同我们两个小孩有什么过不去?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绕，得不到答案。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毒打我。过去，他揪过我几次耳朵，可是从来没有用皮带抽打过我。当然，我对贝尔巴只字未提这件事。我只对母亲讲了挨打的原因和帐房先生告发我的事。

"上帝不会饶恕他的!"她气急败坏地喊道："难道害了鲁克西查还不够，又来找无罪的孩子们!"

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她这些话的含义。我早知道，鲁克西查是格什帕尔先生的妻子，可是并不知道她是房东努米安的亲妹妹。格什帕尔先生的长相不能说丑陋，鲁克西查却像老太婆，她未老先衰，没有头发，这在女人中实属罕见。她每天戴假发，当时假发的价钱相当可观，看来只有她哥哥赠送。虽说鲁克西查成了格什帕尔的太太，但毕竟是努米安家的人，让她光着脑袋成何体统，岂不损坏了家族的名声。

大院里的女人们传说，她和格什帕尔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格什帕尔年轻时很不规矩，还上过法庭呢。他当过小职员、文书或档案员什么的。不知为了什么，他偷过档案或什么文件，被抓住了。他被开除公职后，通过媒人介绍，认识了鲁克西查。他和努米安先生有过一桩交易。有一次，他在车站饭店喝酒，举着酒杯大骂，说上了努米安的当。大院的人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努米安早先答应把车站街的房子作为妹妹的嫁妆给格什帕尔，但要等结婚以后再办手续。结婚后吗？格什帕尔没有敢反对。因为，他怕老头生起气来，自己眼巴巴失去这笔财产。婚礼在艾利特饭店举行，排场阔气。努米安大大方方打开了钱袋，爱嚼舌头的人说，他巴不得甩掉个包袱。结婚后，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

“我说过把房子写在鲁克西查的名下了吗？”努米安装作惊愕地问。“你没有听明白。我是说，给你们找个住处，你总不能让我家的人去你现在住的地方安身。我给你们一座住宅，也就是说一套住房，还给配上家具，因为我知道，你买不起。就是这些话。”老头儿开始说话的口气温和友好，后来突然厉声厉色，好像是发最后通牒。

大院里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些细节的？是从格什帕尔透露的片言只语中拼凑起来的。他在车站饭店里举着酒杯，滔滔不绝地讲这桩“婚事”。后

来，他至少表面上认命了。老头儿让他管理房子。努米安已是70多岁的人了，体弱多病。鲁克西查年轻，是努米安家唯一继承人。因此，他等待着，心急火燎、满腔怨恨地等待着。因为，他明白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我在几年后才了解到这一切情况。当时，我年幼无知，哪能弄清楚一个人为猎取嫁妆得经历种种冒险？我不明白的是，格什帕尔为什么向父亲告我？他气什么，孩子间的友谊碍他什么事？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夸口说算得上聪明。瓦西里大叔拒绝支付帐房先生提出的额外开支，他连一个子儿也不肯多出。格什帕尔原打算靠这一手段增加个人收入。

"你得说清楚，修了什么。"瓦西里大叔严厉地说，"我没有看见修缮任何地方！你在法院呆过，懂得法律。修理外墙的开支要由房东出，对吧？"

格什帕尔没有过分坚持。他明白，这个人了解他的历史。不管他知道多少，还是小心为妙。他闷闷不乐地离开了贝尔巴的家门。但是，他不甘心吃败仗，伺机进行报复。由于他的揭发使父亲解下皮带打我。我想，父亲打过我以后，已经感到后悔了。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他忽然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

"痛得厉害吗？"我听出他的话中含有歉意。

“不，爸爸。”我回答一声，便后退两步，走出门去。

## 三

当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念高中。头一年，我几乎没有感觉到它，因为战场离得远，战报提到的陌生地名都远在高加索。我在学校里学到过高加索山脉，不明白我们的军队到那儿去干吗？

“德国佬吃败仗，我们将要同他们一起完蛋。”贝尔巴对我说。我没有反驳，因为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后来，我们带着香烟和糖果去医院慰问伤员。我心里想，既然来了伤员，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报上登的德国战报提到，“从事先计划好的阵地上，实现了弹性撤退”，什么大规模的坦克战发生在乌克兰一带，离我们不太远，但也不算近。我们从伤员的口中得知，战场转移了。在医院里也不准随意谈论战争。

大约在那个时候，准确说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飞机轰炸之间，我们从车站街搬走了。父亲衰老了，过几年就到退休的年龄。他说：“我不能等了”。我感觉到，飞机来轰炸，父亲高兴。当时，美国人和英国人仿佛分了工，昼夜不停地轮流来轰炸。是的，他有充分理由欢迎轰炸，因为他不关心别的事，心里只朝思暮想当房主。说来也算

走运。飞机轰炸吓坏了原来的房主，我想，他们一定都是年迈体弱的老人，决心降低房子的售价，再说他们在乡下有房子，急于离开城市迁到乡下去。在同盟国的飞机首次“光临”后的次日早晨，只见那些阔佬们遗弃的城市变成了浓烟滚滚的废墟，消防队的力量远远不能扑灭那熊熊燃烧的大火。

我们的新居不算阔气，它坐落在栈桥那边，离铁路不远。老人们先听见了炸弹的轰隆声，接着看见燃烧弹放出的火舌，吞噬车站附近的建筑，大火直烧到深夜。我想，事实促使老房主下决心卖房。也许他做得对，谁知道炸弹会不会落到这座房顶上？父亲一定也考虑过，可是当房主的想法占了上风。他改变过去谨小慎微的处世哲学，甘冒风险。我们把全部家当装上马车，路过车站时，看见废墟还在不断冒烟。父亲回头望望，狠咬着胡须。他高高端坐在马车夫的座位上，手微微发抖。不过，他很快将那一切置之脑后。到了晚上，他安然地坐在阳台上。“阳台”是他起的名字，实际上只是前廊。房子更像是农舍。我相信父亲不会这样看。他眉开眼笑，神采奕奕。我想，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他放眼望着不算小的院子，目光停在一棵樱桃树上。他用少有的温和口气对我母亲说：

“你可以用自家的樱桃做果酱了，孩子的妈。”

他说完，就小心翼翼地在旧木栏杆上捻灭烟头，慢悠悠走进屋去，如同农民经过一天的辛勤劳动，需要回屋休息。

说心里话，我一点也不愿意从车站街搬到这儿来住。我好几天没见到贝尔巴，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乡下去了。我寻思，瓦西里大叔预感到轰炸或别的什么了。第一颗炸弹落下来时，我正坐在屋里。炸弹的热气浪先震得窗玻璃咯啷啷颤动，接着碎了。父亲喊了一声“轰炸了！”我们赶忙跑进地下室。第二颗炸弹落在车站里，我们躲在地下室什么也看不到，只觉得墙壁摇晃。爆炸声震天动地，我觉得炸弹就落在我们的院里，炸中了牡丹花和晚香玉。警报一解除，我们想钻出地下室，但是走到门口就吓呆了。只见天空亮堂堂，发出深红色的亮光，不是通常看见的奶油色。我听见有人说：“他们扔了磷弹。”我们来到大街上，只见车站方向的火势很盛，烟雾弥漫，消防车的喇叭声划破夜空。不知是谁说：“他们难扑灭大火。磷很害人，不容易对付。”后来，我发现情况确实是那样。从我家的窗子里可以看到深红色的大火一直烧到次日上午，白天的阳光多少抵消了它逞凶的强度。

瓦西里大叔那天晚上值班，家里人以为他被炸死在机车库里了。不料，他竟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了。他命中注定是另一种死法。拉警报时，他

恰巧在机车上，他及时逃出了车站。清晨，等危险过后，他才回家。机车库剩下一堆废墟，断墙残垣和尚未熄灭的火。由于他通宵劳累，回到家里，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我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尽管我呆在院里，那门吱吱嘎嘎响的声音，能够把死人从坟墓里惊醒。可是，帐房先生格什帕尔并不在意。后来，来了两个人，他们身穿皱里八几的旧衣服。我从来没有在院里见过他们，是干什么来的？他们自己的心里清楚。他们匆匆穿过院子，朝后面走去，登上了2楼。片刻后，那两个人在瓦西里大叔家门口站住了。他们先是轻轻敲门，接着愈敲愈重。我也不知道，怎么会闪过"要出事"的念头。我以孩子的好奇心紧张地往楼上看。正在那时，母亲喊我回家去。我装作没有听到，这是孩子惯用的伎俩，我远远看见楼上那扇门打开了，两个人冲了进去。

"孩子快回来！"母亲又叫了声。她的惊慌声音吓了我一跳。我相信，她一定也看见了那两个人。我只有回屋去了。

"你听说格什帕尔死的消息吗？"贝尔巴问我。

我耸耸肩。我对车站街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岁月流逝，童年远远留在后面了。格什帕尔吗？是什么人？幸亏是记忆帮了忙，我很快就想起了我们的帐房先生。我常把他与我挨的那场责打联

在一起，于是就容易想起来。但是，那个时代已成为过去，他死了，他的死对我毫无意义。我对童年时代住过的地方的印象也淡忘了。我早就不去车站街玩了，跟贝尔巴见面也只是在学校里。有时，我乘火车旅行，凭窗眺望，火车很快驶过栈桥，来不及看清编组场墙上的洞。火车一过栈桥就加快速度。我对遥远的过去没有什么留恋。因此，我对格什帕尔的死讯无动于衷。人老了，就得死。这是自然规律。那时，我年轻，认为自己远未到那个时候。

“怎么死的？”我这样问了贝尔巴一句。

“咳，看来你把他忘了。”他挖苦说，“给你说了有什么用？”

“我没有忘记他。真的，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我追问了一句，并尽力为自己辩解说，“一会儿就能记起他来。”

“你想不起来了。”他说后，发出一阵恶意的笑声。我很长时间没有听见他这样笑了。“你需要时间。因为，你早就离开了车站街，而我们，我……他们。你是我的朋友，可以对你说，你会理解我的。他死后第二天晚上，我偷偷跑到墓地去，我先扒开几块砖，又刨土。”

“你干什么？”

“别着急，你别笑。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还在那儿。他对我们干了许多坏事……”他停顿了一

会儿，才又接着说："爸爸失踪后，我们要是少付一个子儿的房租，他就吵着轰我们走，……他不想要'这种'房客。"

"怎么?他是什么意思?"

"算了吧，你心里明白，别装蒜了。后来，他的态度变了。口口声声称我妈'同志'，说我们什么时候付房租都行，他能理解我们的难处，并让我们也理解他，他没有责任，只不过是努米安先生的雇员，跟房东的其他雇员一样。他的意思是，努米安逼他来压我们，他是为房主收房租的，他没有责任，只是一个工具。他想推卸责任。"

"好吧。那你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像所有人一样，早晚都有这一天。"

招待员终于来了，问我们：

"先生们要点什么?"

他长得相当肥实，瘦人干这行的不多，也许肥胖被看作是优点，甚至是高贵的标志。那一次，我们坐在穆列什河畔一家饭店的庭院里。我正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在阿拉德兽医系学习。贝尔巴是来看我的。他凝视着汹涌混浊的穆列什河水，陷入沉思。我没有打扰他，过了一会儿才把他从恶梦中唤醒。

"告诉我，"我继续追问他，"他是怎么死的?"

"好吧。"他说，"你知道，他对我们的态度变

了。过去，我妈要是晚一天交房租，他就威胁要把我们赶出门。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妈总能弄到钱。他总是不无遗憾地接过钱去，一直没有达到威胁的目的。后来，他开始转变态度。”

“怎么个转变法？”

“咳，战线转移了，愈来愈靠近边界。格什帕尔这个人，怎么说呢，有他的机灵劲儿。他对我说，‘贝尔巴先生，要是情况变了的话，别记我的仇。你知道，我那样愚蠢地威胁你们，是为了执行房东努米安先生的命令。’”

“你相信是那么一回事？”

“不知道，但我不那么认为。许多房子被炸坏，房租涨了。也许，他有他的打算。我想你对这些不感兴趣。我记得，自从爸爸被捕以后，他对我们凶极了，简直像一只疯狗。”

我不再打断他的话，任他说下去。过去，尤其是从瓦西里大叔失踪后，他从不提自己的父亲，现在却主动提到他。

“显然，他有预感，提前送我去乡下，不让我看到他遭不幸。我还是从你那儿知道消息的。”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便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愣着干吗？我来找你，是请你喝酒的。叫招待员来。”

我把招待员叫来，要了两杯啤酒。我想了起来，不仅格什帕尔后悔了，连我父亲也懊悔。当然，他不会对我说，是我观察出来的。他的看法

变了，最令人奇怪的变化，是他对里秋医生不那么敬畏了。

“小气鬼。”有一天，他对我说；“你不要学他的样子。”停了一会儿，他压低声音问我：“你说，你同贝尔巴家那个小孩子还见不见面？”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想，事情过去好几年了，我也长大了，他不会再用皮带抽打我了。于是，我回答说：

“还见面，爸。”

他深深叹一口气，没有说什么，接着又叹了一口气。我摸不透叹气意味着什么。也许是愧疚吧，但愿是这样，我不禁怜悯起他来。

我记得，我们在夏天公园里见面时，谈到了瓦西里大叔的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党里的人帮助过贝尔巴，替他请了律师，查遍了军事法庭的档案，因为铁路在战时归军队管，如果军方找个借口审判瓦西里大叔，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那么会找到起诉材料，总得留下痕迹吧。结果一无所获。也许，保安队去逮捕他的人知道内情，可是，他们早就离开当地。是的，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穆列什河畔的夏天公园里见面的情景。那大约是在5月底吧，头几天城里突然刮起一股热风。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空桌子。招待员汗流浃背，端着满满的啤酒杯，往返穿梭在熙熙攘攘找座位的人群中。

在广场的那头，教堂钟楼上的庄严钟声透过玻璃窗，响彻云霄。午夜已过，我还未能入睡。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摸黑打开床头灯，又立即回到了现实世界里。阿拉德的夏天公园消失了，它属于逝去的青年时代。我走进厨房，又从冰箱里取出一杯凉水，一饮而尽。然后，我返回卧室，重新倒在床上，关掉灯。我不断提醒自己："快睡吧，睡不了几个小时就得起床。"我拨好闹钟，至少不必在时间问题上操心。这只旧铁路钟是父亲的遗物，钟面上画着一辆全速行进的火车头，虽说是廉价物，但走得准，闹铃一响，能把死人从坟墓里惊醒。小时候，每天早晨在睡梦中听到隔壁屋里的闹钟声，接着是父亲去浴室盥漱，母亲去厨房准备早点用的咖啡或茶。这只钟看上去一钱不值，可我知道它忠于职守，有了它，就可以安心睡觉，不必担心误事。它在静静的黑夜里发出清脆的滴答声，我习惯这种有节奏的声音，不怕它干扰我。因此，使我心烦意乱不能入眠的不是钟声，而是医院的那间小病房。贝尔巴现在干什么？也许睡着了，要不然也像我一样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他说过自己失眠。我愿他睡得香。睡眠可以摆脱烦恼，他可以做梦走出医院，自由自在。如果他真在做梦的话，能梦见什么呢？也许会梦到维奥丽卡以及他们共同度过的幸福日子，可惜他们的幸福被不公正地剥夺了。他一定不会

梦见玛拉。我真想睡着，可是，你知道，人愈急着睡，就愈睡不着。我对自己说："你明天要办很多事。"时间悄悄地流逝，只剩下几个小时可以睡了。我明天要去的地方不远，先乘快车走一小时左右，然后换车，走支线。头等车厢往往是空空荡荡的。我习惯在车上睡一两个小时，列车员会按时叫醒我的。对了，不成问题，我们州里的列车员都认识我。

说来也怪，尽管过了那么久，我还记得当年在阿拉德给我们端菜的招待员。他满脸流汗，脸色发青，可能是因为过度劳累引起的。我们先点了菜。他边走边喊："来了……"我这才发觉，我们谈话已经进行了好长时间，可是我还没有了解到老帐房是如何死的。

"格什帕尔是怎么死的?"我问道。我再说一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帐房先生的结局不感兴趣了，我追问这件事只不过是为了转移朋友的注意力，谁知道他正在想什么。

"唉，"他说，"人都有这么一天。有些人死是罪有应得，格什帕尔就属于这类人。你知道，格什帕尔的内兄就是房主努米安，他先死了。"

"我隐约记得他。"我说，"是个老头儿，到时候了。但我不明白，格什帕尔的死与努米安有什么关系。他总不至于为这位内兄过度伤心死吧，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

"哼，伤心，他哪会伤心死呢？他天天迫不急待地等着努米安快死。老头儿没有妻室，也没有别的亲人，只有一个妹妹，就是鲁克西查……"

"我明白。她继承了房子和财产。"

"咳，问题就出在这里。根据他的遗嘱，把财产，当然包括车站街的房子，赠给一个慈善团体。他临终发了善心！他给鲁克西查留了点钱。"

"格什帕尔呢？"

"他想推翻遗嘱。他去找律师。律师告诉他：'先生，你无法胜诉。老头精明得很，早想到了这一点。他去公证所立的遗嘱。他对公证所的人说，我有个妹夫，他会上诉的，你们看看，我是不是神经错乱？'结果，格什帕尔败诉了。他没有请律师，慈善团体请了律师。他败了。"

"他为这事死的？"

"是的，先生。格什帕尔在判决后没几天就死了。因为遗嘱是无懈可击的，努米安早把一切安排好了。"

"格什帕尔呢？"

"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鲁克西查再三央求，他也不肯开门。第二天，她起了疑心，去找邻居，求他们帮助撬开门。他们冲进屋后，发现他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口。他们派人叫来医生，确定了死亡时间。人已经死了，也许是头天晚上断的气。喂，你说呢？"贝尔巴问我。

我没有回答。招待员又送来了啤酒，我们举起杯，一口气喝干。凉啤酒沁人心脾。

# 第 三 章

## 一

住院楼只有四级台阶，不算窄，边有点磨光了。他用鞋尖探清了台阶的全部特征，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自从他住进来，已经上上下下走过无数次。上了台阶，再走十一二米，过道便拐了弯。沃什蒂纳尔的沉重脚步声渐渐远去。特列塔的走路声不大明显，只不过是轻轻的踢踏声。屋里剩下了他一个人，孤独感突然向他袭来。刚离开的那两个人，可能正一前一后走过一个个病房门口。他也是通过这条过道到这儿来的。可是，根本的区别是，他们往反方向走去，目的地不一样，他们朝健康人那里去，走向自由。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区别。他来医院后，别人告诉他先去2楼院长室。

"您先到他那儿去一下。"有人这样对他说，"他得到了通知，正在等您。他是个有名的教授，他的医院……"说话人停顿了一下，想寻找合适的字眼，但没有找到，只好补充了这么一句："总之，您运气好。"

“运气？”不如没有这种运气，最好是不到这儿来。他们接到了通知，正在等他。他第一次见到了阿格利切鲁教授。他是个动作敏捷的老头儿，看上去招人喜欢，他从眼镜后面瞧了他一眼。

“贝尔巴工程师同志？对，我们了解您，接到了通知，请跟我来。”他们走下2楼，通过一道弹簧门，很快就来到“他的”病房门口。那时，他并不知道这儿将归他所有。院长打开屋门，做手势请他进屋。他不喜欢这种手势。他无意间把它比作是旅馆招待员的动作。招待员把顾客的行李搬进屋，帮忙整理东西，等着领小费。他承认，这种对比不恰当，因为阿格利切鲁院长并不想留下等小费。

“您先把东西归置归置，”他说，“我们过一会儿再来照看您。”他笑笑，便匆匆走出病房。

这会儿，那两个人正朝大门走去。门房给他们开门，可能还行了个礼，医院的门房懂得该对谁敬礼，对谁使白眼。大门是用硬木做的，门上开一个小窗眼，装着铁棍，看来医院的大门都是一个模样。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出了大门，沃什蒂纳尔正忙着向特列塔告别，应应付付握握手，好像是让对方明白，自己高人一等。他握完手，就匆促离去，忙人大都是这样，他们珍惜时间。他很熟悉这种人的脚步，可是不得不努力忘掉这种步态。虽然在这里仅度过了几个星期，也足以

使他习惯另一种时间概念。那是8月底的一个早晨。强烈的阳光照进病房。一个直开到地板的大窗户敞开着，窗外茂盛的树枝间传出小鸟的快乐歌声。他定睛一看，认出那是一棵板栗树。他环顾病房，它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很小，没有什么可看的。医院病房的门、窗和家具几乎都一样，唯有外面的景色存在差别。因此，他穿过房间，走到窗前去。他看到院里有一个经过精心管理的花园，从附近什么地方传来水滴答滴答落入水池的声音。这些是他最初的印象。不，大约过了半小时，现在耐心等着他的护士伊丽娜来了，带他去做第一次心电图。第二天，他得到了外交辞令般的通知："不太好。"

"准备好了吗，先生？"

他蓦地一惊。他几乎把站在面前的护士忘了。姑娘的右手拿着针管，站在他的床前。她面带微笑，那是疲乏、厌倦、值夜班护士常有的笑容。他发现，护士稍嫌大的牙齿发黄，也许是抽烟造成的。他感到奇怪，平时自己不大注意这类琐事，现在也能看出来了。护士的牙齿长得不齐，嘴唇较厚，但不算难看。伊丽娜的眼角略向上，酷似蒙古人，尽管她笑眯眯的，但态度冷淡。对这个姑娘来说，他不再是男子汉，而是一个病人，病人是特殊的类别，无法定型，伊丽娜护士也没有潜心研究它。

“马上就好，伊丽娜。”他说着把手伸进毛毯，稍稍往下拉拉睡裤。起初，他很难为情，怎么能在一个陌生女人的面前脱裤子，哪怕是脱一半呢？后来他习以为常了，病人会慢慢习惯医院里的一切。她在床边坐下，他感到女人热乎乎的臀部。她掀开毯子。她感到热，平整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并慢慢往下流。难道伊丽娜护士也有思想？他暗暗问自己，随即又否定了这个问题。无庸置疑，她有思想，有自己的问题，各人有各人的问题。他趴在床上，看不见她，只觉得姑娘的小胖手在他的臀部上拍了一下，接着针刺进肉里。

“痛吗？”他翻过身，看见姑娘站在床前，正笑容可掬地望着他。

“不痛，伊丽娜，一点也不觉得痛。”他若无其事地答道。

护士嫣然一笑，仿佛赢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阿格利切鲁教授当面介绍伊丽娜说：“瞧，工程师同志，伊丽娜护士的手很轻，你打针觉不出来痛。”姑娘听到夸奖话羞得脸上泛起红晕。不错，伊丽娜是个好姑娘，她有可爱的地方，十分吸引人，她的同龄人会看上她的。天空中的闷雷声打断了他的思路，紧接着，窗前划过一道耀眼的白光。

“快下雨了。我想，得把窗子关上。”她说。

她转过身，把装针头的金属盒放在窗台右面

的小桌上。然后，她关好窗子，临出门时对他说："祝您夜间睡得好。"她的嘴角挂着"职业性"的笑容。他目送她走出门去，她的脚步轻盈，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夜间？黄昏不是刚刚降临，退一步，也只能说时候不算早了。漆黑的天故意骗人，他可不愿意上当。他不想看放在床头柜上的手表。大雨倾盆而下，雨点斜打在玻璃窗上，又密又急。他心里想，特列塔来不及赶回家了，除非沃什蒂纳尔用车送他。这两个差别如此大的男子汉挤在一辆车的狭小空间里的情景，使他想起来就想笑。确实，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不是凭空猜想，因为沃什蒂纳尔长期以来都把特列塔看成是游手好闲之徒。他自己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他生病之前，他和沃什蒂纳尔在不浪费时间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致。他珍惜和利用每一分钟。特列塔喜欢白白耗费时间，仿佛这是他的最大乐趣。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因此，他能够原谅兽医的行为。但是，他们的友谊并不能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强风劲吹，窗外的板栗树枝猛烈地摇摆。最靠近窗子的树枝敲打着玻璃，使它轻轻颤动。病房里的空气变得闷热。他决定等雨下得小一点，就打开窗子，尽管伊丽娜护士反对这样做。"我不喜欢他。"有一次，他们谈到沃什蒂纳尔时，特列塔坦率地说："他精通业务，这很好，无可非议。

可是一见到他，总给我一种绝对权威的感觉。”“绝对权威？瞧，真有你的。”他纵声大笑，心想得把特列塔对沃什蒂纳尔的看法告诉奥尔坦莎。他没有那样做，因为是开玩笑时说的话。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想起这些事的。

不知不觉大雨转成了冰雹，尽管伸手不见五指的天和偶尔出现的白色闪电早已预示着要下冰雹。贝尔巴早就盼着护士离开，自己好下床走动。叮铃当啷不绝的敲打声，表明用一团团水冻成的冰雹很大。他想，只要把窗子开一点缝，冷空气就可以驱散室内的闷热。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前，好不容易才打开了窗子。狂风呼啸。冷空气钻过半开着的窗户，眨眼间更新了室内的空气。为了不被人发觉，他小心翼翼地又关上窗户，然后舒舒坦坦钻进毛毯里。外面继续下着冰雹，一会儿像鞭子抽打声，一会儿像阵阵急促的敲鼓声。后来，冰雹停止了，淅沥淅沥下起小雨。“是一场秋雨。”他心里想，不过很快就意识到时光飞逝。他几个星期前来这儿的时候，还是仲夏呢。入院前，他终日里忙忙碌碌，沉重的年度和季度计划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很少注意到季节的变换。眼前的绵绵细雨使他联想起秋季，不免感到惆怅。每逢他试图了解自己的病情和住院的时间，阿格利切鲁教授就打马虎眼。开始时，他只开玩笑地说：“您干吗急于甩掉我们？”过了一些天后，教授

用奇异的目光看看他，或许这是他的臆测。他暗地责怪自己说："我犯了疑心病。"教授只不过无意间瞅了我一眼。一般说，他对自己的本能感受从不怀疑，那一眼肯定说明什么问题。同时，他又自我解释，在长期的行医过程中，院长对这类问题习以为常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病人就像焦急等着放假的小学生。几乎所有的住院病人都想及早——最好是在几天之内——知道什 么 时 候 出院。他遗憾地发现，他在这方面与其他病人毫无差别。他相当早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心脏病专家的心里早已有数，但他没有马上回答，只勉强笑笑说："工程师同志，您可是才到我们这儿来。"他的笑声突然终止，这使贝尔巴认为那笑中另有含意，也许他故意回避问题。阿格利切鲁教授有当演员的才能。他记得做学生时，有一个在音乐学院学习的朋友，具有演话剧的本领，说笑就笑，说哭就哭。阿格利切鲁学的是医学。笑有另外的作用，想让病人的精神振作起来，好告诉他严肃的事。如果他坚持了解情况的话，教授就阴沉着脸，说话铿锵有力。

"对您来说，工程师同志，"阿格利切鲁郑重其事地说，"我想还是开诚布公地说说，您的心脏十分衰弱。你不可能很快离开我们。您需要休息，安静，松心。"

他住院后几天，院长同他进行了上述的谈话。

他开的名药方是：安静、松心和休息。据说，这个人是治心脏病的“卓越”专家。冰雹转成雨后，风又开始肆虐了。板栗树枝疯狂地摇动，仿佛准备孤身迎接危险的敌人。风吹得窗玻璃哗啦响。“伊丽娜护士还祝我夜安……这种天气哪能安睡？”从板栗树发出的不安分的沙沙声表明，树叶即将凋谢，忧伤多雨的秋天快要来临。他要住很长时间的医院。很奇怪，他却没有想过另外的可能性。他听说，心脏病患者都有先见之明，但是也有例外，他就是其中之一。对，他发现秋天来了，昨天他用鞋尖踢过一片落叶。那是一种机械动作，是正常人惯有的动作。落叶是头天晚上从树上掉下来的，又黄又绿，没有枯萎，保留着生命的最后液汁，在此之前，生命的液汁还在它细小的脉胳里自由流动。他说不清为什么讨厌这片落叶，莫非它自信能在红砖砌成的小道上显示光彩。“那是因为我当工程师养成整齐、准确的习惯造成的。”他想解释自己的这种本能反应。在深红色的地面上，有一个稍发黄的绿色斑点，叶子的颜色仍然以绿为主，叶绿素的作用还没有消失。他下意识地把叶子踢到路边，那片叶子仿佛又回到他的面前。如果停止下雨，那么明天早晨就会出太阳，小路上落满树叶子。由于教授的吩咐，花园管理得很好，在他看来，花园与碧波粼粼的池水都有治疗作用。医院有个勤快的花工，他热

爱自己的工作，整天在花园里忙来忙去。明天早上，一旦雨过天晴，他准会扫树叶。在这之前，他得早早去窗前观赏飘落的树叶。

昨天，他在外面散步时，骄阳当空照，并没有天气起变化的预兆。也许天气变化对他也有意义。“我向教授提的笨问题使他 讨厌。”他 后 悔 地想。他心里明白，这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最后才能看出谁胜利。至于说到花园……是的，它在教授的“理论”中，肯定有特殊作用。当第一次听到要他安静和松心的劝告时，真想回敬教授一句：“您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得何等轻巧！”但是，他想应该讲礼貌，便控制了自己。其实，这些医生虽是专家，也难创造出奇迹来。不管怎么说，有个漂亮的花园毕竟是好事，因为并不是各家医院都能有的。花园中央有个小喷水池。他笑着想，那悦耳的流水声一定属于教授设计的治疗术之一。

你若不怀有成见的话，不难发现花园确是很美的。现在，天空黑暗，清新的空气从半掩的窗子吹进来。明天，他要早起床，去外面瞧瞧雨后的树木花草。自从他住院后，学会的第一件事或第一批中的一件事就是：观赏自然景色。过去他不大注意大自然的变化。孩提时代找小草、钻树丛，尤其是树林的喜悦心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消失了。爬上一棵树，难道不是孩子最早的英

勇行为吗？可是车站街的树少得可怜。也许，它在历史上有过许多树，经过机车喷出的浓烟熏烤，如今所剩寥寥无几。树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叶子，谁去爬这种树？不管怎么说，童年时代的生活是多彩的。他要是生在其它地方，比如说公园附近，乡村，树林或护林人的家里，那么就会懂得爱护树木。他对树木的抽象知识是从学校的植物课上学到的，什么松树，山毛榉，槐树，柏树以及热带树……他来到医院里，看见板栗树枝敲打窗玻璃时，才理解树的含义。

## 二

按理说，记忆应该像一张精美的明信片，留下值得记念的事，如一场大雪或几棵树。但他对过去的事情记不清楚了，也许他不是有意识地去发掘往事。把一切暴露出来有什么用处？他模模糊糊想起来，曾经看到过树，那是被撒上一层雪粉的松林。天空飘着雪花，零零星星落在松树枝上。他是在什么地方看松树林的？一定是在11月初的一天，天空万里无云，阳光宜人。人们穿着夹大衣散步，这在11月的布拉索夫城是少见的。这里的冬天来得早。我们走在一条新开辟的盘山公路上，那个陪同的工程师仿佛叫亚历克萨或亚历山德雷斯库，他介绍说，您若是最近没有来过

布拉索夫的话，就不会知道这条路，现在去索罗门石用不着绕道走了。他记不得工程师的确切名字了，但对他的相貌略有一点印象。他想尽量客观地回忆有关亚历克萨或亚历山德雷斯库，尽管已时过境迁。工程师正值壮年，喜欢打网球，保持着运动员的良好体型。他留着古罗马人的发型，这种发型是3年前兴起来的，目前还在流行。瞧，想些什么？工程师的发型根本无关紧要。

他记忆中的松林是在车子急转弯后出现的。工程师刹住车，说："从这儿可以俯视城市的全景。"于是，3个人都下车了。最先下车的是工程师，他的动作敏捷，大抵想显示自己还年轻的人都是这样子，他拉开玛拉身边的车门，让她下车。贝尔巴是自己从车子另一边钻出来的。迎面吹来新鲜凉爽的山风。如果按他们面前的松林计算，他们的车子已经不知不觉地爬到1000多米的高度。工程师用手指指群山环绕的城市。他们的脚下就是布拉索夫。本来，这一回忆可以像植物标本默默保存起来。可是，正当工程师兴致勃勃介绍情况时，玛拉像孩子一般撒起娇来：

"我们呆在这儿干什么？挨冻吗？我已经冻坏了。"

"走吧。"工程师说，他走近汽车，彬彬有礼地打开车门。

贝尔巴不喜欢那种娇滴滴的声音，有些女人

偏偏爱娇声娇气，故意装成小女孩子。他认为这种做法实在太愚蠢，不合身份。因此，玛拉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可以说是不好的。工程师把车子开得飞快，急转弯一个接一个，也许想抢时间或者有意炫耀自己“年青力壮”。车子又来个急转弯，玛拉没有坐稳，一个年轻女人的热乎乎的身体猛然倒入他的怀里。也许，那就是开始。

她慢腾腾地，甚至是依依不舍地挣脱了那无可奈何的、下意识的拥抱，然后快活地笑起来，这是发自心底的自然的笑。贝尔巴被女人的笑脸迷住了。她张着嘴笑，露出了整齐的牙齿，头微微向后仰，有节奏地摇动着金黄色头发。她又娇声娇气地解释说，头发剪得短，“可以显得更年轻”。

“笑话！你还用显得年轻?”工程师奇怪地问，同时回头看了一眼玛拉。

她还在笑。他们的车子已经越过第一座松树林，工程师提醒说，再往上就能看见积雪。他加大油门，可能担心后轮打滑。玛拉的笑？那儿的女人仿佛喜欢无缘无故地傻笑，是为了“造气氛”。他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年轻女人的笑，笑得自然，健康，并无娇气，这种笑声给人们增添了欢乐气氛。他想，有什么必要故作正经，遮遮掩掩呢?

现在，必须对过去发生的事加以整理，因为

时间并不是以年、月计算，而是取决于我们的看法，取决于我们能否真实对待它们，尤其是能否超脱地看它们。一句话，事情的开始不在那初雪装点的松树林里，也不在那次不由自主的偶然拥抱，而在他的工厂里，始于他向工厂的律师顾问斯塔玛特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身是没有倾向性的，谁能想到它能引起什么结果。

“布拉索夫的官司是怎么一回事，斯塔玛特同志?”

律师是高个子，年龄已近花甲，头秃得活似僧人。他感到需要明确说一下。

“说不上是官司，只不过是意见分歧，律师们正在咬文嚼字，还未就供货时间达成一致意见，对方想拖延。我们要求他们那儿的仲裁法庭17号，即11月17号裁决。”他不用核对记录。有人说，他的头脑好得像计算机，装满了法令、法律、部长会议决议和各主管部门的决定。他仿佛是吸墨纸吸进种种资料，需要用时再分类取出来。从他的工作来说是无懈可击的。

“好吧，先生，”他表示同意地说．“就照你的说法是意见分歧。你认为能赢吗？我们望眼欲穿地等着他们该供应的零件，什么时候能拿到手?事关大局，我想你能理解的，不是吗?”

斯塔玛特皱起了眉头。他很少有这种表情。从他的职业来说，他好斗，自信，不止一次胜诉，

当然也有败诉的时候。现在，他似乎心事重重，拉长了脸。

“我将尽力而为。”他这样说了一句。过一会儿，他补充道：“您知道意见分歧是怎么一回事。那帮仲裁员总模仿所罗门：你让一点，他让一点，有时山羊和白菜能言和。我担心的倒不是仲裁员，而是布拉索夫的那个人。几个月前，他们的律师顾问退休了，现在请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律师，野心勃勃，精明过人。就是这样的。我不能不承认她聪明。”

“哎呀，斯塔玛特同志，你总不至于害怕一个女人吧？”他笑着说。他们当时是在律师顾问的办公室里谈话。现在，他贝尔巴应该承认，自己在女人问题上有不少陈腐的观念。

“问题不在这里，厂长同志。”斯塔玛特狡黠地笑着辩解道。他也是一只老狐狸，惯于出入法院，通晓诉讼。“问题不在这里。您应该知道，我对您说，这个女人鬼得很。现在已经是11月了，零件应该在10月发货，她会为每一天奋力争辩的。现在临近年底，您知道，有些人，不是我们，”他用圆珠笔排除自己一方，“是怎么干活儿的？他们搞突击生产。可能，他们也欠别的货主。争取几个星期的喘息时间，对他们至关重要。”

“你看行不行，斯塔玛特，”他最后建议说，“我们去走一趟，下午出发，晚上就可以到那儿，我

们只呆两天时间，你说呢？”

“我说行。”斯塔玛特回答说。两人相对而笑，如同两个孩子商量好要玩什么把戏。

雨终于停住了，风还在板栗树枝间肆虐。“该关上窗子了。”他心里想着，可是并没有离开床。他把自己紧紧裹在毯子里，暖暖和和，十分舒服。他怕一动弹打断回忆，有如秋风扫落叶吹散它们。不要回避往事，应该承认它们同过去的生活一样，生活只能经历一次，不能像人在学校念书，可以从头开始。

波亚纳铺上了一层薄薄的新雪。神秘的大雪在空中纷纷扬扬。在他们的右边，通向克里斯蒂安-玛雷的电缆车隐没在浓雾里，只能看到第7或第8座支架塔，天上的云层很低，云彩随风上下飘游。松树枝低垂，仿佛经受不住雪的重压。工程师亚历山德鲁或亚历克萨或亚历山德雷斯库忽然在一家旅馆前面停住车，旅馆建在山顶上，离电缆车不远。贝尔巴已经好久没有来过波亚纳了，过去来没有见过这家旅馆。维奥丽卡在世的时候，夏天，他们都是去康斯坦萨岳父家度假。“让我也看看我的女儿。”岳母奇雷斯库太太总是半开玩笑地说。确切些说，他从上大学以后，再也不曾到过波亚纳了。

3个人下了汽车。工程师兴趣盎然地走来走去，看来他喜欢游山玩水，要不然就只有呆在山

下的工厂里。玛拉慢慢下车后，才发现“下雪了”。她一面天真地拍着手，一面高兴地重复说“下雪了”。她一只脚站地，转了个小圈，慢悠悠飘落的雪花，给她披上了一件白外衣。她那种快活劲儿酷似一个顽童。因为，孩子们在初雪天总是这样欢腾。他呆愣地看着她无忧无虑拍手大笑。她这时的笑声天真无邪，不同于刚才那种笑，那是年轻美貌女人，尤其是迷人的女人发出的诱人笑声。在山下的城里时，玛拉小姐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因为他心目中的女人是另外的形象。工程师说了一声“我到柜台去看看”，就大步流星地进了旅馆。贝尔巴站在旅馆门前的汽车旁边，看着玛拉想：“女人是多么变化无常！”他想起了上午，也只不过是两个多小时前，在仲裁法庭上的情景。她沉着冷静，机敏地进行着辩护，不漏掉任何有利的论据，斯塔玛特的说法得到了完全证实：“这个女人鬼得很。”当然，斯塔玛特律师的表现也很出色。他只说了几句话，没有长篇大论，因为那是法官的事。

“我们是全国的先进企业，”他说，“我们需要这些零件。我们还有外国货主。供货方有责任向我方按时交货，而且，我认为，应该依法执行合同。”

她惊慌地看了斯塔玛特一眼，轻轻咬一下嘴唇，后来他发现，这是她的习惯动作，每逢她紧

张时都是这样。裁决不是斯塔玛特所预见的那种所罗门式的，没有平摊责任，但是，布拉索夫方面也得到了小小的方便。

“行了，是个可以接受的裁决，厂长同志。”斯塔玛特贴近他的耳朵说：“说不定还会更糟糕。”

其他两个人也表示满意。亚历克萨或亚历山德雷斯库负责供货。他坦率地承认：“请相信我，厂长同志，我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帮帮我们吧，等我们缓过气来，一定信守合同，及时供货，请放心好了。”他还提议：“干一杯，吃点东西。你们晚上才有车，有的是时间。”工程师说得有理，他只好接受建议。斯塔玛特律师忽然说扁桃腺发炎，要回旅馆去休息。于是，他便只身跟他们上了亚历克萨或亚历山德雷斯库工程师的汽车，他到底叫什么？开车的人加大了油门，说：“我们到波亚纳去，2个半小时，最多3个小时就可以回来。请您相信我，您有足够的时间，上火车前，您要愿意的话，还可以睡一会儿。”贝尔巴不大喜欢工程师的提议，认为完全是突然袭击，不过，既然交涉已经圆满结束，或者说几乎圆满结束，不能让对方扫兴。

至于说身边的女律师贝尔莱亚·玛拉小姐，他对她毫无兴趣。从维奥丽卡去世后，他就不再对女人有兴趣了。他有过逢场做戏的事，但不值得一提，反正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给他留下什

么印象，问心无愧，就像人抽完烟，把烟头扔进垃圾桶里。不，他没有理由对玛拉小姐发生兴趣。不错，车子转弯时她突然倒在他身上，他一接触到年轻女人发育良好的丰满身体，不禁一惊。此时，他又惊讶地看她用手捧起雪，好奇地观察着雪在她温暖的手里融化。她真的为徐徐飞舞的雪花陶醉，天真地喊着："下雪了，太好了。"她那金黄色的头发上落满了雪，像是戴上了花冠。当然，他不会拿她比维奥丽卡，因为维奥丽卡不仅是他唯一爱过的女人，而且也是他唯一信任的人，他们是天生的伉俪，亲密无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维奥丽卡的记忆渐渐淡薄了，但是她仍旧是他心目中真正爱情的象征。如今，近在咫尺、在雪地里疯玩的女人属于另一个世界。不过，这不是问题的症结，关键在于他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震动，即世界上还有别的女人存在。

他很快认识到，接受邀请来波亚纳，听任工程师的摆布是个错误。世界各地的食客有同样的习惯，正餐开始前总得喝一点烧酒、白兰地或别的什么。走进冷冷清清的旅馆餐厅，招待员迎上来说："欢迎您光临，亚历克萨先生。"他终于想起工程师就叫亚历克萨。他后来了解到，冬季尚未到来，雪还太软。"好啊，特奥菲尔！"亚历克萨满意地回了一句。酒鬼一坐到饭桌前就笑逐颜开。"瞧，"亚历克萨继续说，"我有贵客，给我们吃些什

么?"这么说，他认识招待员。他们用白酒打头，亚历克萨喝酒如同喝水，饮完一杯又要一杯，第3杯、4杯，接着换上尼科雷什蒂的"老太婆酒"，他高兴地说："好酒，够年头了。"他已经到了嬉笑无常的地步。贝尔巴问玛拉："怎么回去呢?"玛拉笑笑，她有什么法子。现在是下午，外面狂风暴雪，没有办法下山，他们被困在波亚纳了。

贝尔巴感到需要摆脱回忆带来的沉重压力，决定离开温暖的被窝。他苦恼地想，他承认与玛拉结婚是犯了错误，已经把她从心灵深处赶走了，但他们毕竟过了3年的夫妻生活，这是血肉般的紧密联结，要从感情上彻底断绝关系可不容易。医院里统统是白粉墙和标准家具。在这四面墙里，是什么勾起了对她的回忆?他带来了一件咖啡色的高级"驼毛"晨衣。"非常难得，我是在科瓦奇买的。"她对他说。她去布加勒斯特办了一件案子刚回来，她喜欢出差，挥霍无度，花钱似流水。晨衣既漂亮，又保暖，可以当披风裹在身上。她搬走后，他把它送到洗衣店去干洗。柜台里面的妇女说："行，可一点不脏。"她说着用手抚摸给人舒服感的毛绒绒的晨衣。晨衣的确不脏，他不想向她解释。他不是嫌脏才送去洗的，而是因为它和玛拉的晨衣都挂在浴室里，使他的晨衣染上了玛拉的香水味。洗衣店的洗涤剂经过化学变化，可以除掉香水味，留下一种说不清的化学

药剂味。

是的，晨衣的香味问题迎刃而解了，难办的是留在记忆中的印象，没有什么化学药剂能够除掉它们。还有自尊心，每个男人都有自尊心，平日它安分守己，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像蜗牛慢慢伸出触角来。他知道，这是被年轻妻子抛弃的上了年纪的男子的自尊心。

又开始下起雨来了，劲风猛烈吹动板栗树，树叶像遇见强敌沙沙发抖。左下方，一缕微弱的光线从小玻璃罩的灯泡中射进来。他披上晨衣，走到窗前观赏外面的景色。板栗树叶一落地，随即被风卷走了。雨渐渐下小了。雨点打在屋顶的瓦上，发出淅沥淅沥声，雨还无情地拍打着树上的叶子。他关上窗子。隔着玻璃窗听，他觉得雨声小多了，像情人们的低声细语。他常听人说，下雨天睡得香。他心里想，雨也许能催我入眠。午夜已过，去睡觉吧。他这一走动，中断了回忆，重新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病房这块小天地。小天地使他想起婴儿的学步圈。小婴孩抓住学步圈上的横杆，踉踉跄跄站起来，从更高的角度看世界，而他从这个病房里能够看见什么呢？

一场滂沱大雨慢慢停住了。他上次是什么时候遇见这种大雨的？关于雨声催人眠的说法，看来不可信。他毫无睡意。也许临到黎明他才能沉睡得像木头，直到值班女工来清扫过道吵醒他。

她们知道怎样用桶声，特别是嚷叫声把你吵醒。这就是说，有过一场瓢泼大雨，他记得很清楚，那是在春暖花开的初春季节。他怎能忘记那个夜晚？难道那不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漫漫长夜吗？一想到维奥丽卡，他就感到胸口沉甸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减轻抑或是习以为常了。春来秋去，有时他可以十分准确地算出往事的时间，比如说，自那场春雨迄今已经过了19年，19年多，安卡现在已年满19岁了。维奥丽卡……想到她，贝尔巴的心里就隐隐作痛。有时，他心地平静地回忆他们共同经历的往事，并竭力想记住它们，理顺次序，贮存起来。可是，他惊慌地发现，问题不在于记住那些事，而是记忆断了线。他痛心地想：维奥丽卡早已离开了人世。

年复一年，记忆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了，不仅事情发生的地点和日期会错乱，而且也不再连贯了，犹如旧电影常常出现的断片现象。他对某些人的印象很浅，就像郊区电影院里放的电影，连片名都模模糊糊，没有人能辨认出来。他原认为海绵抹去了记忆，不料还留下了痕迹。比如初春的那一场雨。深夜，她的肚子突然痛起来，他心急火燎地跑了出去，将要做父亲的人大抵都是这样。他的家里没有电话，他跑去找公用电话。他们住在工业区，是在那儿邂逅的。天下着雨，他根本感觉不到雨水淋在身上，有一滴雨钻进大衣

领，像一只冰冷壁虎顺着脊梁骨往下爬。这一来，他才想起不太远的地方，在第2个街口，有一家药房昼夜营业。老药剂师显然正在打瞌睡，过了好一阵子才出现在小窗口后面。

“有电话吗?”他问。开头，老头儿不明白对方的意思。电话?问这干什么?这是药店，卖药的。他说明情况后，老头儿紧绷着的脸才松弛下来，露出一丝笑意。在涉及人类的繁衍问题上，人们往往不谋而合地联合起来。

“当然，有电话。”他边回答，边拉开门上的插销，让他进去，给他指指放电话的地方。电话放在墙角摆满瓶子的柜橱上面。他感到奇怪的是，时至今日还记得从急救站传来的那种疲乏和厌烦的声音。是不是某些职业会造成人们精神上的早衰?当时，他顾不上想。

维奥丽卡在山区的乡村小学教书，安卡出生后才调到城里工作。出人意料的是，妇产医院的人来得神速，他一听见刹车声，便忙从窗口探出头喊，“在这儿，在这儿。”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去接他们。担架员沉重的脚步压得楼梯摇摇欲坠。他们来到维奥丽卡的床前，有个人说：“轻一点。”他记不清说话者的面貌，只记得两只有力的大手伸到她的身下，仿佛拿羽毛一下子把她举起来，放在担架上。一个小小的身躯鼓着大肚子，正在忍受着产前的阵痛。

“不用担心，工程师同志。”他们怎么知道他是工程师的?“她很快就可以生下来。”他们抬起担架，小心翼翼地起步，尽力不震动她。他们的动作准确，麻利，恰到好处。他们把担架放进汽车里，关上门，开动马达。他披着大衣，光着脑袋，呆若木鸡地站在街上。司机急忙赶路，到了拐弯的地方也没有减速。那天晚上的情景历历在目。他穿上衣服，拿上一把伞，其实根本没有用上，直奔市中心的妇产医院。人家当然不让他进去。

“等明天早上查完病房，您再来。”他们对他说，“那时，您有可能了解到一些情况。”

“这是他们的规矩，工程师同志。”一个宽肩膀的炼钢工人说。“我有了两个孩子。您知道，她们以为我们在这儿，会好受些，这是一种支持。”炼钢工人转到楼房一角，指指灯光照亮的大窗户说:“过来！那是产房。”两个男人都呆在微弱的亮光下。天又开始下雨了，但是他们谁也不想找地方避雨，都全神贯注地盯着大窗户，新的生命正连续不断地在窗那边诞生。“您也来一点，工程师同志？这是我的习惯。”他一面解释，一面取出一个方瓶放在他的手上，瓶子里原先装的可能是甜酒或白兰地，盛情难却，他喝了一口白酒。然后，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凝视着明亮的大窗户。

黎明时，雨停止了，刺骨的寒风骤起，冻得

他发抖。这里靠近山，冬天长，春天来得晚。风吹散了乌云，霞光渐渐出现在地平线上，后来太阳也露出了脸，天空晴朗，没有一朵云彩。那个通宵是很不容易熬过来的，产房里一直是灯火通明。

“有什么法子，工程师同志，他们也是流水作业。”炼钢工人想开玩笑。他的身材魁梧，可是声音发颤，当你想到自己的妻子在楼上什么地方……“快了，快了……”炼钢工人是内行，过去不止一次来过这儿。“瞧，工程师同志，他们来上班了。”他说着用手指指陆陆续续走过来的人。不错，护士和医生来了，他们昂头挺胸，步履匆匆。后来的事情同炼钢工人所说的一样。不过，除他们外，又来了好多人，还有从附近村庄来的农民，他们乘坐山区常见的两匹马拉的车子赶来了。8点钟左右，门房从一个小窗口伸出了头，他记得那个人是红头发，留着络腮胡。随即，他露出来一本婴儿姓名和重量的登记册。伊昂，亚历山德拉，安娜……这是一座工业城市，普通老百姓不给孩子起怪名字。起怪名的作法是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又是一个伊昂，接着是格奥尔基，两个男孩名，往后是一串女孩名，在这些名字中，对，是这样的，他不可能听错，出现了安卡·贝尔巴的名字，3.6公斤，对，安卡·贝尔巴重3.6公斤。

# 三

婚后几个星期，他们搬到了罗马人大街。在那以前，他们临时住在维奥丽卡的房东家，现在他们才算有了自己的家，好好坏坏总是个“窝”。罗马人大街……很窄，谈不上是街，倒更像是条胡同，一头紧临山坡。他们住在另一头，门牌是9号。罗马人大街的这一段还看得过去。从那一头也可以穿过杂草丛生的荒凉大院，进入他们的院子。院门呈拱形，向着自由街，它是该城的主要街道。后来，工厂发展了，住宅区扩大，城市也被记者称为“火的城堡”，自由街变成了自由大街。自由大街的高贵称号不是凭空得来的，它横贯全城；同时又像所有的山区城市一样，穿过河谷，其它的街道都是从它的左右两侧分出的支路。罗马人大街有点与众不同。它与自由大街平行。罗马人大街的出口处有个镶着铁框的小门，要想出入这门可不容易，因为它长年锁着，并且锁已经生锈，如果需要开锁，就得去桥那头一个叫做“罗马尼亚”区的地方，找来锁匠。现在，人们还沿用历史留下来的地名。工厂前面的河谷狭窄，仿佛两边的山要在这里相逢。奥地利人管这块地方叫“山区”，因为18世纪末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发现了铁矿和煤矿，便造起最早的工厂

围墙。他们从外地招来挖煤工和冶铁工，这些工人来自奥匈帝国统治的辽阔疆域，诸如波希米亚、斯提里亚和卡林提亚。再往上，不知什么原因，山峰下居然还有两个巴伐利亚人的村庄。他们带来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民歌，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同当地人杂居了。

后来，铁匠做了一件好事，拆下锈坏的门锁，换上一把新锁，这样进出罗马人大街就方便了，到工厂去的路仅一箭之远。

“房子不错，工程师先生，难得的机会，千万别错过。”销售科的巴比安劝他说，他过去当过房产经纪人。

他们没有放过机会，迁入了新居。出了小门，往前走40余米，右边是种着板栗树的林荫道，地上铺着长方形的石条。春天，小草得意洋洋地从石缝中钻出来。秋天，他们可以听到板栗掉下来的噼啪声。季节就是这样轮番变化着。老实说，他从来不注意这些事，总是急匆匆地从板栗树下走过，冬天穿一件棉衣，春秋天穿风雨衣。他像所有的青年工程师日以继夜地赶路，满脑袋装着生产计划。林荫道不长。他习惯低着头走路，若是抬头望望，便会发现用耐火砖砌成的3座大烟囱矗立在面前。烟囱上面含硫铁矿石的黄红色烟云缭绕。他进的是2号门，这个门恰巧位于第2和第3烟囱间，他对它了如指掌，即使闭上眼走路

也不会出错。林荫道只通到广场边。广场中心有一尊粗糙的圣母石膏像，这是天主教堂前众多的塑像之一，教堂的塔楼挡住了工厂墙上的铁丝网。

他们是10月底搬家的。

“我跟女房东斯拉霍特卡太太说好了，她等着你们。”巴比安说。

贝尔巴和维奥丽卡手拉着手第一次穿过拱形门。这个门同附近村庄里财主家的门一模一样。院子格外大，只有乡村或人烟稀少的小城镇可以见到这么大的院子。后来，他们得知，当年并没有让大院闲置起来。扩建工厂和用推土机夷平旧房时，它也被派上了用场。不过，这一切都是在他搬走后发生的。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天气相当热，使人觉得时间停止不动了。他们走进大院，疑虑不安地相互看了一眼。找谁呢？女房东在哪儿？没有一个人影。一只牧羊狗从墙后面走出来，怀着恶意打量他们，随即便愤怒地狂吠起来。维奥丽卡吓得紧紧贴着他。狗倒不一定咬人，只不过表示自己忠于职守罢了。

“呆着别动，普拉特！”随着呵斥声，狗立刻停止吠叫，一个矮小的中年女人走到他们的面前。她身穿黑色衣服，戴着黑头巾，几绺头发露在外面，原先可能是金黄色的头发，现在变成了肮脏的灰色。她是女房东弗拉乌·斯拉霍特卡，巴比

安事先通知过她，工程师先生要来看房子。她长时间审视手拉手站在院里的两个青年人，瞪着混浊的蓝眼睛盯着维奥丽卡。“是的，是的。”她叹口气说，她有房子出租，听话音像是被迫出租的。

“太太用不着害怕。”她给维奥丽卡壮胆说，“普拉特不咬人，爱叫的狗不咬人。”她罗马尼亚语说得不错，甚至掌握了当地人惯用的软化音。在城里，也包括周围的乡村，几乎所有的人都能讲两种语言，有的甚至会说3种话。工厂和矿山的劳动生活促使人们交往，他们祖祖辈辈并肩劳动，按当地话说，大家都是朋友。他们说罗语和德语，是一种奇怪的德语，语音软化，夹带着不少土语和连老殖民者的家乡都已经不再使用的古词汇。没有人说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因为日耳曼族居民已经同化了那些讲捷克话或斯洛伐克话的人，只能从几家人的名字中看出根由。斯拉霍特卡太太的姓名便是例证。他们进了拱形门，来到屋前的长廊下，街上的嘈杂声在这儿变成了蜂窝里的嗡嗡声。

“工程师先生要是想看看房间的话，我去拿钥匙。”女房东说完就跟来时一样快地消失了。

普拉特安静下来了。它明白，既然女主人同陌生人谈上了话，它就可以悠悠忽忽的，卧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晒太阳。斯拉霍特卡太太不大

工夫就出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串用铁丝串起来的钥匙。

“并不全是后屋的钥匙。”她感到有必要解释一下。“这是这儿的习惯，把钥匙全串在一起。工程师先生不用担心。”她的态度和气，说完话又露出了笑容，也许她看上了这对未来的房客，有意留他们住下来，也许她急需把房子租出去。经过仔细观察，他们发现她并不老，初见面时的印象是不对的，她至多有50岁，或许到不了50岁。痛苦和不幸会让人一夜之间变得须发皆白。从她身上的黑衣服判断，女房东是不久前才开始守寡的，巴比安似乎对他们说过这件事。

“要是先生和太太愿意的话，请跟我来。”她说完就径直往前走。他们发现草丛里有一条小路，直通后院。普拉特跟在他们的后面。杂草不高，显然是新近才长起来的。

“先生和太太是刚结婚的吧?”斯拉霍特卡太太边走边问。

“才几个星期。”维奥丽卡回答，好像这个问题是专向她提出来的。弗拉乌·斯拉霍特卡听后回过头来，用感伤的目光瞧瞧她。那是饱经风霜的人注视青年人的目光，不完全是妒忌，可能含有悔恨和痛苦。但是，这种复杂的感情很快就消失了。斯拉霍特卡太太咯咯笑起来，这是少女特有的天真、诚挚的笑。当年，她就用这种笑征服了

她的约翰。这是她故去的丈夫的名字。

“祝你们幸福，子女满堂。”她说完话，连忙回过身往前面走。

其实，这个院并不像他们起初想的那么大。遍地丛生的野草使他们产生了错觉。走了一小段路，草没有了，地面平平整整，他们来到一座小屋前面。说它是小屋也许不太恰当，因为是楼房，底层是空的，屋门上了锁。从前，这里一定是作坊或别的什么场所。

“约翰在这儿干过活，”斯拉霍特卡太太指指关着的门说，“约翰是我丈夫，他是铁匠。”在当地，铁匠就是钉马掌的人。她神色自若地解释着，但在冰冷的话说完后，她的声音顿时颤抖起来。“约翰十分结实，从不上医院， 可以活 上100岁的。”女房东觉得应该作这些补充，他的头脑里始终有个“要不”，这个“要不”发生了，否则同他们谈话的女人就不穿黑色衣服了。斯拉霍特卡是钉马掌的，她说，他是干活儿时死的。她停顿一会儿。他们耐心等着。寡妇都是这样子，特别是开头的时候，有的人是在最初几个月里，有的人在最初几年里，会情不自禁地对别人诉说丈夫的死因。斯拉霍特卡死得很冤枉。许多人往往是胡里胡涂死的，尤 其 是 早 守寡的女人 都 说丈 夫 是冤死的。他也是这样，结结实实的壮汉子，据他的妻子说，可以活上100岁。而他没有活那么久。烈性

马踢一下足以要人命，一直没有弄清楚悲剧是怎样发生的。也许是把钉子钉歪了，马受了惊，扬起前蹄踢中了约翰的胸部。“血从他的嘴和鼻孔里冒出来。”她的感情平静下来，说话的声调如同给人念晚报上的新闻。“来了救护车，那是上午出的事，等我穿好衣服，赶到医院里，他们告诉我，人已经断了气。”她没有哭泣，女人一般在这种场合免不了哭哭啼啼。她认为，在先生和太太搬来前，应该让他们知道楼下发生的事，约翰的血染红过那里面的地板。

3 个人都没有说话，因为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说：“他很能挣钱，本想开一间铺子修理自行车和摩托车。”她的约翰什么都懂。她苦笑着说：“是啊，我们本来用不着出租房子，可是出了意外。”她耸耸肩膀，带着同样的苦笑说：“是不是请太太和先生跟我来……”他们走到一个小门前站住，那个门很小，他每次进出都得低头。斯拉霍特卡太太不用眼睛找，一下子从大串钥匙中拿出有用的，把它轻轻插进锁眼，门就开了。先走进一间小过厅，后来，他们就在那儿堆放一部分劈柴。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过厅，也许仅仅是为了保护通往 2 楼的木楼梯。

“房子不错。”斯拉霍特卡太太洋洋得意地夸口说。不，他们不曾想过要出租，约翰和她想的是利斯尔。对了，她还没有对他们说起过利斯尔

呢。利斯尔是他们的女儿，刚满9岁，他们是为她的未来打算，为她的婚事做准备。什么事都应该及早安排。她说着又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利斯尔还是个小孩子,有时间……"她没有往下说。但是，他们明白自己将要租用的房子，原是为别人准备的，好在正如斯拉霍特卡太太说的，还有时间，他们眼前正急需一个安身处。她补充说："利斯尔还是个小姑娘，离她长成小姐还早着呢，她得去上舞蹈学校。"

"舞蹈学校？"维奥丽卡悄悄地问他。斯拉霍特卡太太刚迈上楼梯的第一级。"舞蹈学校？"维奥丽卡不理解地又问了他一次。他听见了她的问题，抓住她的手腕，感到她的手发烫，他紧捏了一下，意思是等以后再解释，这位未来的房东所说的舞蹈学校是怎么回事。

"好了，我以后告诉你。"他小声对她说。他们跟着斯拉霍特卡太太登上楼梯。梯子在他们的重压下变弯了，但很快恢复了原状,因为它很短，没有多少级。后来，他们甚至为它感到自豪呢。

"有什么法子，我们屋里有楼梯！"维奥丽卡不慌不忙地说。他们结识了同自己差不多的青年夫妇。她装腔作势地重复说着"有楼梯的房子"。回到家里，两人常常笑得前仰后合。

关于舞蹈学校，他在搬入新居的当天晚上就对她解释清楚了。舞蹈学校是一所真正的学校，

不知是从波希米亚，还是奥地利传进来的，总之，是外来的，扎下了根。青年人渴望交朋友，对吗？他大模大样地高谈阔论起来。开办舞蹈学校的目的就是为这个，至于谁起的头，无从查证，也不重要。青年们可以在波尔卡舞、情人舞或华尔兹舞的旋律中相识，现在还增加了探戈、贡卡等连他也不懂的舞蹈。

“你也上过这种学校吧？”维奥丽卡问道，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

“嗯，对，我去过。”他回答说。

“可能你也想去那儿找个姑娘，但是人家不要你。我知道你是怎样跳舞的，总踩姑娘的脚，她们哪能要你这种丈夫？”

“不，”他反驳说，“我是出于好奇才去的。”

“是吗？”她不相信他的话。

最后，他不得不一五一十地全部讲出来。姑娘都不是单独来的。那里有一个方形大厅，四周摆着凳子，给陪伴女儿来的母亲们坐，她们坐着监视自己的宝贝女儿，特别注意观察“骑士们”。是谁？做什么的？可靠不可靠？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对这些母亲们来说，真心实意是男孩子们是否准备结婚。如果你仅看表面，认为她们坐在舞厅周围的凳子上，是为了观赏年轻人跳舞，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她们坚守在观察所里，年轻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她们的视线。正在专心跳

舞的青年根本不会想到有人暗中考察他，对他品头论足，有关他的材料很快被收集齐全。那时的城市不大，城里有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和消息灵通的情报网。几周之内，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了解到全部情况。当然，男孩子首先要表示自己的“意思”，连续几天邀请同一个姑娘跳舞。这是先决条件，也是“真心实意”的最初证明。在这之后，他将会得到送姑娘回家的机会。做母亲的紧跟在后面。稍后，她们允许青年人在门口单独呆一会儿，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不成文的规矩是，这一切是在情报收集齐全，并且女方认为有利的情况下才准许进行的。她们先要了解男孩在什么部门工作，因为城里的人几乎都在工厂干活儿。有关的全部细节是以惊人的速度搜集起来的，其实并没有多少内容。一般是先打听有多少工资？是啊，要成家是好事，可是能养得起吗？工厂里的活儿重，但是挣钱多。在多数情况下，有关工资的情报都是令人满意的。另外，调查提纲还提到两个问题：第1，男孩子喝不喝酒？要是把钱全撒到酒馆里去，挣得多有什么用！这样的例子多的是。第2，好不好色？别看他穿着节日礼服来舞蹈学校，可是剥开来看，是个花花公子！同姑娘生个孩子，过上一两年，就去法院闹离婚。

“说不定，你也想到舞蹈学校去捡便宜，”维奥丽卡笑着同他开玩笑说，“可惜没有捡到。那些

做母亲的探到了你的底细，你不老实。忙来忙去，你喜欢姑娘们吗？”

他感到需要进行自卫，解释一下。他是怎么去那儿的，为什么去？哎，完全是偶然的。他只去过一次，像是去看演出，那时城里没有什么文艺节目。在一个秋天的周末晚上，是他到这儿来的第一个秋天。天空下着濛濛小雨，令人心烦，他想散散心，便出去找地方消磨时间……

“算了，算了，”她用手指着他说，“我了解你，你是采花能手。说说看，你想搞到手的姑娘都漂亮吗？”

他又一次争辩说：“我根本不想同谁胡搞。漂亮？是的，有两个金发姑娘，秀丽可爱。可是她们哪能比得上你呢？”他们拥抱起来，长时间地亲吻。有关舞蹈学校的谈话到此结束了。

他们很快爬上了楼梯。斯拉霍特卡太太像刚才一样麻利地找出钥匙，在锁孔里转一下，打开门，请他们进去。“这是客厅。”她自豪地介绍第一间屋。一共有3间小屋，像火车上的小屋，一间挨一间。头一间是客厅，这个小小空间里的家具摆得恰到好处。一张沙发，两把扶手椅，一张椭圆形的小桌，一个5屉柜。沙发和扶手椅都是墨绿色，那颜色如同经过雨水浇灌的草。椅子的靠背上面铺着编织花边。斯拉霍特卡太太证实说，这些花边出自她的手。当然是很早以前，她年轻

时的作品。另外两间的家具少得可怜，全是拼凑起来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他们看上了这儿间房子，认为是自己真正的窝。斯拉霍特卡太太对房租没有过分苛求，因此很快便谈妥了。他们不必费劲就可以出得起房租，他那实习工程师的工资绰绰有余。女房东拉开窗子，他探头望望窗外，下面是冷清安静的罗马人大街，右边不远的地方矗立着工厂的3个烟囱，宛如悬挂在天上的3个问号。

当天晚上，他们就搬了进去。他们自己终于有了住处，有了一个家，这可不是城里人人都能享有的。他想起了厂长德拉戈什出席的一次会议。会议是在有舞台的大厅里举行的。虽说是工会开会，厂长也参加了。最后，讨论"其它"事项时，也谈到了住房问题。

"住房少，同志们。"德拉戈什一边说，一边用他那大拳头敲桌子，震得水杯叮噹响。他抱怨说："住房不够。"当时正在隆格盖第1个工人新村。他用沙哑的嗓子补充说："你们都登记一下。"紧接着，他感到需要明确一下，说："先是有家的，有孩子的，在工棚里住得最久的人。"工棚可是有些年头了，它们像苔藓逐渐增多。开始时，大家都住集体宿舍，有些人是从外地来的，他们听说，这儿的活虽重，但挣钱多，于是携家带口地迁来了。新住宅区建起来后，工棚就慢慢消失了，城区不

知不觉地扩大了。

利斯尔出嫁了吗？直到他住进医院后，才提出这个问题。他在医院里终日无所事事，于是像翻日历，回想过去的生活。他们搬到罗马人大街时，利斯尔还是个小姑娘，长着一双蓝眼睛。斯拉霍特卡太太的眼睛也是蓝颜色。当初，不知约翰什么时候偶然遇上了这双眼睛。除了利斯尔的眼睛颜色非常引人注目外，他记不起小姑娘的其它特征了。对，他还记得一个细节：小姑娘的两条辫子乖乖地垂在胸前。也许，她已经出嫁了，城里的姑娘都是年纪轻轻就结婚。斯拉霍特卡太太一定衰老了。如果利斯尔结婚的话，可能搬到前院门朝自由大街开的屋子去住，后院的房间租给别人住。他们搬到利斯尔家的第2天，小姑娘牵着普拉特穿过院子时，看见了维奥丽卡。她一见维奥丽卡忙站住，脸上露出只有孩子才会有的惊喜表情，高兴的劲儿像得到了什么礼物。她看了一阵子，就站直身子，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后，隆重地弯了一下膝盖。不错，她行了礼，这种动作无疑早在幼儿园里学会的。

“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维奥丽卡悄悄问道，看得出来，她想装得严肃一些。

她用手抚摸小姑娘的黄头发，当手触到她的面庞时，小姑娘嫣然一笑。这叫“屈膝礼”，他小声说，同时也板着面孔，显得庄重点。她多么懂

礼貌，学会了这样问候人。他对这一场面记忆犹新。他们在罗马人大街住了好多年，天天在院里看见利斯尔，看着她长大成人的。不过，他想不起来别的事情了，像照相机曝了一次光，仅留下利斯尔一张相，也就是那个小姑娘在行礼时努力保持平衡的姿势。他很少想到她，老实说，从来没有想起过她，因为他要考虑的事太多了。现在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费力编写这个蓝眼睛小姑娘的经历呢？她去舞蹈学校了吗？也许她在那儿找到了合自己脾气的男孩子，更可能是符合斯拉霍特卡太太要求的男孩子。恐怕情况早起了变化。利斯尔属于另外一代人，姑娘和小伙子可以通过合情合理的途径，认识得更快。几年前，安卡长大后，他也开始考虑女儿的问题。

# 第四章

## 一

他来到街口，看见落地灯的柔和黄光照在窗户上。每天晚上回家，灯光老远就告诉他快到和平、恬静的家了。是幸福的家庭吗？他慢慢地开着车，惊异地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狡黠地眨眨眼睛，把它看成是"形而上学"的复杂问题。他不喜欢抽象思维，讨厌哲学，认为那纯属空谈。如果有人对他说，不管他怎样贬低哲学，他也有自己的哲学时，他定会大吃一惊，他的生活哲学是舒适、富裕和安静。为此，他谨慎地避开各种矛盾。现在，当车子徐徐向前滑行时，他不无遗憾地发觉，贝尔巴的病带来了"并发症"，他无力回避它。再过几分钟就要看见奥尔坦莎，可是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话回答她的问题。他得采取法国人说的"镀金药丸"的策略，不能把全部真相和盘托出。也就是说，不要把从阿格利切鲁教授那儿得来的消息全部告诉她。当然，她心里清楚，贝尔巴住院决不是小题大作，不过还没有到病情危急、复杂和毫无希望的地步。好奇心驱

使他乘机观察奥尔坦莎的反应，这对她将会成为考验吗？考验什么？他觉得太复杂了，决定不再考虑这一类问题。

沃什蒂纳尔离家愈近，落地灯的光线就愈亮。他亲手把落地灯安放在两个窗子中间。他看见窗子敞开着，说明他的妻子一定是在临街屋里等他，她想早点听到刹车的声音。他了解她的焦急心情，感到自已好似被小蛇咬了一下，心里不是味儿。为了暂时忘掉她，他把视线集中到灯光上。奥尔坦莎一般不呆在临街屋里，尽管她也承认街上很安静，但还是喜欢朝花园的那两间屋。"对了，我得设法探讨她的隐秘，简单介绍贝尔巴的病情，让她慢慢揣度吧。"他拿定了主意，又望一眼灯光。他认为，把落地灯放在客厅里最恰当。客厅是个四边不等的大房间，从街的两头都能够看见柔和的灯光。陌生人从这儿经过时，一定会把它当成台灯，勤奋的人正坐在扶手椅上读书。他是在扎格勒布市一家古董店的橱窗里发现这盏落地灯的。他那次是去参加国际妇产科大会，是的，它陈列在橱窗里。过边境的时候，海关官员大为惊愕，尽管他说干了多年海关，"鬼玩意儿"他见得多了。他从验看护照的边防员背后瞟了一眼，说，"行了，大夫先生。"他想尽快摆脱尴尬处境，因为他无法给"鬼玩意儿"上税。回到家后，沃什蒂纳尔把它放在两把巴乐克式的高背扶手椅中间。他搬着两

把椅子进门时，奥尔坦莎说“像教堂里圣坛上的椅子”。不过，她很快就习惯了他的怪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并不认为是怪癖，说是爱好倒恰如其分，这是古旧家具收集者所应有的高尚爱好。

他像许多人一样，有自己的“霍比”①，这是新近在“上流社会”流行的英国说法。奥尔坦莎警告说：“你快变成贵族了。”他听得出她是讲讽刺话，反驳说：“贵族？没有的事！”不管怎么说，他有“霍比”。它有理由在自己的诞生地英国存在，因为，当年的帝国有许多阔佬，现在还有不少，难道不是吗？可我们这儿呢？他不是心血来潮对旧家具有了兴趣，而是不知不觉地慢慢产生了爱好。奇怪的是，他最讨厌出格，却染上了奥尔坦莎说的“怪癖”。他从成了“收藏家”的有钱朋友那儿学来的。他们光顾各种古董店，收集风景明信片、水晶玻璃器皿或中国瓷器。玛尼卡蒂德医生吹嘘说，他拥有全城“最了不起”的唱片。有天晚上，他们应邀前往玛尼卡蒂德家作客，这实在是一个错误。玛尼卡蒂德是高个子，已经开始歇顶。他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们说：“大夫，我要给你看些东西。”听他的口气，像是对酒鬼说，给他弄到了“美酒”。玛尼卡蒂德宣称是卡洛夫② 的《布尔伦诗集

① 霍比(Hobby)：一种形成癖好的业余爱好。

② 卡洛夫(Karloff，1887—1969)：英国演员。善于演恐怖角色，也演其他名角，但都是不会说话的机器人式的类型。

抄本》①，可不是像捷克交响乐团演奏的一般录音带，那种带子在城里到处可见。“不，亲爱的同行，”玛尼卡蒂德说，“是卡拉扬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原声带。”有什么可说的？是个烦人的夜晚。

不能再拖延了。他已经到了家门口，奥尔坦莎一定听见了车子的声音，她的听力好，能辨出他的拉达车的马达声。这是他下车后想到的。她一定为他迟迟不回家而生气，他除了说送特列塔外，还得找其它的借口。他砰地关上车门，平时爱车如命，从不这样做，他这辆马力大的漂亮汽车是城里第一批出售的拉达牌车。当时，他有能力买别的车，尽管奔驰或沃尔沃太招惹是非，但是买一辆最新型的菲亚特还是可以的。它的吸引力太大了。最后还是他那讲求实效的禀性起了决定作用。即使是这样，也没有逃掉人家的议论，尤其是同行们的说三道四。有什么好处呢？他关上车门后，急忙走完他与家门之间的距离，一个箭步登上台阶。楼道的灯亮着，说明奥尔坦莎正在等他。他走到屋门口，摸出早准备好的钥匙，正要将钥匙插进锁孔，门开了，奥尔坦莎出现在面前。

“你耽误了那么长时间。”她注视着他说。

---

① 《布尔伦诗集抄本》(Carmina burana)：13世纪的手抄本，可能是10—13世纪期间在西欧各地的游吟诗人的作品，包括《布尔伦诗集》和6个宗教剧。

“我送特列塔回家了。”他解释说。这是他早就想好的理由。

她毫无反应。也许她根本没有听进去，谁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

“贝尔巴怎么样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她关心地问。

这是他预料到的问题，因此，他回答得非常从容，像谈论普通事一样，使你觉得并不是严重、紧张和令人惊慌失措的事情。

“他的身体衰弱，疲累。此外，还能给你说些什么呢？我又不是心脏病专家。”他说话有分寸。他纳闷，奥尔坦莎为什么不像往常称贝尔巴为“厂长”。她是故意坚持不承认现实。贝尔巴有他的功绩，他并不想否认，可是贝尔巴已经退休几个月了，不能再像奥尔坦莎那样称他为“厂长”。一切是从会议上开始的，那是贝尔巴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据奥尔坦莎讲，那并不是什么特别会议，只是研究生产的例会。他正做总结发言，忽然觉得不舒服。事情突如其来，他们只好休会。他的心脏病仿佛是第一次发作。

“你跟教授谈了吗？他说什么？有什么看法？”她关切地问。她的身体略微前倾，避开了阴影。他看见她的双眸像发烧的病人一样闪亮。

“他没对我说什么。你知道这些权威的作风，说话吝啬得很。他只说，‘情况严重，心力衰竭，

需要休息’。”他满意自己几乎复述了阿格利切鲁的原话，只不过用了双方可以接受的词句，更加婉转罢了。心脏病专家说是“危急”和“心力极度衰竭”，他改为“严重”和“心力衰竭”。区别不算大，他将慢慢告诉她，现在先让她自己去猜想真实的情况。况且，阿格利切鲁院长不是许诺，将全力抢救吗？

“你是怎么想的，斯特凡？”

这个问题是他始所未料的。他明白，她想了解的不是他这个医生的看法，便继续装糊涂说：

“我不懂心脏病。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有信心。我对你说过，阿格利切鲁是权威，而贝尔巴是或曾经是——他感到有必要作一更正——个人物。我相信，教授也是这样说的，他们会全力以赴的。”

奥尔坦莎又往前探探身子，仔细打量他。她似乎感到他没有把话说完。不过，他朝她笑笑，有时他走进接生室前对孕妇们也这样笑。后来，她疲倦地慢慢从扶手椅里站起来，沃什蒂纳尔明白，难熬的时刻过去了。“情况”是严重的，他并不相信会很快好转。他得让她逐步了解事实真相．不管怎么样，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奥尔坦莎是个聪明女人，她终究会懂得的。贝尔巴只是她的厂长，曾经录用了她，他们一起共过事，但他们不沾亲带故。如果贝尔巴的病情出现不测，也就

是说心血管发生意外，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事。奥尔坦莎的表现似乎超出了通常对病人的关心。因为说到底，贝尔巴不是她的兄弟或什么近亲。

他们二人都从扶手椅里站起身来，要说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是不可能轻易解决的——至少是暂时放下了。他走进浴室洗洗手，他养成了回家洗手的习惯。他脱掉外衣，穿上一件薄晨衣，往书房走去。奥尔坦莎站着等他，她没有抽烟，显得比刚才镇静一些。“抽得太多了，奥尔坦莎。”他常这样劝说她，而她只是耸耸肩，表示听腻了。

“我在这儿给你铺了床，”她看着别的地方说，“我的扁桃腺发炎了，头痛，想吃片安眠药。别忘了，明天早晨叫我。吃的都准备好了。在冰箱里。”说完，走到他跟前，例行公事似地吻了他一下，完全是出于应付。他们结婚已经快15年了。她转身走出去，不大工夫，他听见她进入卧室。

剩下他独自一人了。按说应该满意了，因为他曾经那样害怕见到她。可是，他并不称心。他来到厨房里，把盘子和刀叉放在桌上，打开冰箱，取出食物，这在平时都是她干的事，今天却说扁桃腺发炎，找个借口躲开了。什么扁桃腺发炎？她想一个人呆着，对，就是要一个人去想贝尔巴。他惊讶自己竟闪过这种赤裸裸的念头。近期来，尤其是贝尔巴与布拉索夫的那个虚荣心很重的女人结婚后，他知道他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是的，

贝尔巴再婚后，奥尔坦莎相当成功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女人介入“厂长”的私生活，那不正好证明……贝尔巴结婚使沃什蒂纳尔稍感舒心，尽管他竭力否认。他，沃什蒂纳尔，一向是相当客观的。尽管他不懂电动机，但是他承认贝尔巴的能力强。奥尔坦莎对她的厂长那么快就表现出格外钦佩，使他感到不是滋味。她去电机厂任职前，总是从一个合作社转到一个小厂，然后又回到另外一个合作社。他曾经嗤笑她想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后来，事情起了变化。她变得严肃了，一心扑到工作上。她以自豪的口气对他说过：“你要知道，我们厂生产的电动机是独一无二的。”他觉得她完全变了样儿。

书房里的台灯亮着。他在扶手椅里坐下，漫不经心地环顾四周，映入眼帘的都是熟悉的东西。他自言自语地说：“该睡觉了。”但是没有动窝。这一天过得太紧张了。上午，先与阿格利切鲁教授会面，接着去病房探视贝尔巴……郊外的散步最惬意……最后是同奥尔坦莎见面。夜深了，他开始脱衣，换上她为他准备好的浅蓝色睡衣。这是奥尔坦莎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买的时候，她笑着说：“你穿上它，显得年轻，斯特凡。”她很周到，是个会关心人、体贴人的妻子，一切合乎常规。有时，不过，次数不多，也发生过似乎不大合乎常规的事，今晚就是个例证。他不愿深究这种模糊

不清，瞬间即逝的想法，认为不必予以重视。可是，瞧，对这件事不能漠然处之，视而不见，他和奥尔坦莎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了，难以和好如初。是的，当然是这样的，她对“厂长”的格外钦佩是事出有因的。

“你去这个厂干吗？”一听说她想转厂，他有点不理解地说：“我听说，他们厂里要求严。而你，依我看，对合作社的工作并不怎么认真。你何必呢？不是去自找苦吃吗？”

奥尔坦莎只是耸耸肩。这是她新近养成的习惯动作。是他不理解，还是连她自己也糊涂，或者有意隐瞒什么？片刻之后，她才回答说：“斯特凡，我很难给你说清楚。”当时，他没有深想这句话，倒是找了些自欺欺人的理由。也许是她厌倦了原来的工作，用她的话说，天天围着公文转。她厌烦了，想换一换环境，如同小姑娘想换个布娃娃。不过，他也隐隐约约地感到，这种解释不太站得住脚。如果过3—4个月，甚至半年，她受不住，求他找个轻松工作，他是不会奇怪的。当时，她坚持去，他警告说：“好吧，你去吧，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后悔就好。我听说，在电机厂干活得拼命。”

“要是我愿意拼命干呢？”奥尔坦莎气呼呼地说。

她那种近于威胁的态度使他十分吃惊，不过。

他并没有认真对待，心想，她是硬充英雄，会过去的。后来，他不得不承认，她并没 有“回头”。是的，他错了。实际上，他对妻子的变化很伤脑筋。也许，她的变化是在入电机厂前开始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他得认真思考，为她的转变找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应该正视现实，问问自己是否有责任。结婚时，他们商定奥尔坦莎继续当她的工程师，她说："我念工学院不是为了装门面。"他表示同意。从表面上看，这件事完全正常。

他不相信预感或流言蜚语，但是，当她决定转到电机厂去工作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惊讶——不是反感——可以被视为警报，预示他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宁舒适生活即将结束。起初，他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嘲笑说："这就是说，你找到了崇拜的对象。"那次谈话发生在奥尔坦莎去电机厂上班不到一个月时，她第一次热情称赞贝尔巴厂长。不能说，他，沃什蒂纳尔，比别的丈夫心眼儿小，但是，谁会承认，包括对自己承认是小心眼儿呢？因此，开始时，也不过开开玩笑而已。世界上难道有甘心戴绿帽子的丈夫？当然，从讽刺她找到崇拜的偶像到他觉得心里不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贝尔巴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奥尔坦莎把他看得那样“了不起”？他并不是嫉妒心重的人，尽管她快满40岁了，但仍像一般人所形容

的是个“性感”女人。不，不是嫉妒，他完全信任她……但他还是暗地里调查了这个“人”，他对自己说是了解了解情况。他听到的反映与奥尔坦莎说的大同小异，都说他是“干将型”的人，县里十分器重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地方报纸报道过他的工厂和他本人的事迹。私生活呢？结过婚，多年前妻子去世。直到他于“蠢事”同布拉索夫的律师结婚以前，大家公认他是个严肃的人。沃什蒂纳尔和奥尔坦莎结婚快15年了，他从未有过嫉妒心，因为他了解妻子，她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即使跟上级、厂长打交道，也很自重。他不大善于做心理分析，不会自我剖析，只故意回避问题。妒忌心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哪能冒冒失失去探讨？他想，干脆置若罔闻，对贝尔巴保持一定距离。他已经学会相当巧妙地掩饰自己。

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厂长有威信，受上级器重，这对妇女有吸引力。但是，他，沃什蒂纳尔，在自己的行业里算得上个人物，他开始考虑，如果他能作出更多的成绩呢？这就是他接受儿科系主任奉迎的潜在原因。系主任明确地说：“沃什蒂纳尔大夫，你是位出色的实践家。我呢？算是钻图书馆的书呆子。我们二人合作写一本书，怎么样？”因为妇产科同系主任的专业相当接近，他不便拒绝合作。系主任是可敬的人，居然找到他，使他受宠若惊。他的确有丰富的实

践经验。他认为合作写书的建议是可行的，这正是他的错误。后来，他发现写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惜为时已晚。他被著书的美好理想吸引住了。系主任不愧是外交家和心理学家。他先在医学学会上做学术报告吹捧他们，建议他们这些实际工作者也做些科学研究。沃什蒂纳尔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吹捧是别有用心的，系主任存心拉拢他。系主任克里斯特斯库教授有的是合作者，为什么偏偏看上了他？他迟迟不得其解。后来，他才知道事情并不复杂。人家干活儿，他在学术论文上署自己的名字。一本著作……意味着艰巨的劳动，许多人退避三舍。

写一本书？一本专业书？他不曾有过著书立说的念头，也许连克里斯特斯库也没有想到能不费吹灰之力拉他写书。他是怎么了解到可以拉他参加写书的呢？他不可能知道沃什蒂纳尔参加这一工作是为了向奥尔坦莎炫耀自己。作者不等于厂长，可是，也有些分量。况且，系主任把这件事想得周到细微。"系图书馆员将把有关的资料准备齐全。专业杂志也不成问题，不，其他人会把材料准备好的，作者只要编辑一下就行了。"据克里斯特斯库的介绍，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真是个雄辩家。他还保证说："技术问题由我负责，一切都会圆满实现的，尊敬的同事。"沃什蒂纳尔接受了对方的建议，他有许多理由，最主要的是

让奥尔坦莎折服。

“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她这样问道，并且还用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词表达自己的怀疑。“你怎么对付得了？你应该明白，你是拿钳子的，不是耍笔杆子的。”

沃什蒂纳尔听了很伤心，但他不服气地想，她认为他只能干他妇产科本行，难道只能在电机厂进行“革新”?他不自觉地用起克里斯特斯库的口头语。系主任一有机会就用上这个词儿，并且说完就用舌尖轻轻舔一下嘴唇，活像小孩子吃完奶油或巧克力夹心点心舔嘴一样。系主任的另一个信条是，“实践者和医学教学人员应该紧密联系”，当然，这是客观存在的，而他却竭力把它说成是自己的独创。他忘不了系主任在医学学会上的报告，人难于抵挡人家的恭维话。在一个冬末的晚上，系主任打电话通知说：“告诉您一个意外的喜讯。我已经把您列入去扎格勒布参加国际妇产科会议的代表名单中了。5月初开会，您有足够的时间。”

“我5月初到南斯拉夫去参加国际妇产科会议。”他对奥尔坦莎说，同时斜着眼看她的反应。

“去南斯拉夫?你到那儿去干吗?!”她不明白。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他见奥尔坦莎并不惊喜，不免有点生气。“在扎格勒布举行一次专业会议，克里斯特斯库把我安排到我国代表团里了。”

参加这次会议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他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撰写论文，然后找法语教师帮忙翻译出来，并纠正他的发音。他由此认识到学术论文太难写，跟系主任不遗余力吹捧的病例报告完全不一样。此外，在从扎格勒布回国的路上，他想既然克里斯特斯库给了他"礼物"，哪能不还礼？答谢他的最好办法是著书。

"序言。你就不必操心了，尊敬的同事，我来写。同出版社交涉和签合同的事，我也包了，用不着你操心。"克里斯特斯库对他说。好吧，我什么也不用操心，可是，其余的事呢？系主任果真把"合作"局限于这点事情上？

"奥尔坦莎把安眠药放到哪儿去了？"他从床上坐起来问自己。他不主张用他称之为"鬼玩意儿"的安眠药，并且劝过妻子不要用它。她一般是听他的……而今天晚上……显然，她已经知道"厂长"的情况不妙。"我正把写书的责任归咎于她了。"他心里想着暗暗发笑。他很少笑，更没有独自笑过。他打开灯，瞧瞧表。午夜已过，他还无法入眠。是的，写书的事进展得缓慢。从扎格勒布回来后几个星期，系主任去了一趟布加勒斯特，带回了合同。他高兴地搓着手对沃什蒂纳尔说：两年后出版。我们得着手干了。"接着，他眉飞色舞地问："您编得怎么样了？"他一下子从"我们得着手干了"，跳到"您编得怎么样"，这使他感到愕然。克里斯特斯库具有使用模棱两可的语句的

"天才"，如果可以称之为天才的话。他郁郁不乐地承认，"进展缓慢"。对方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用探索的目光瞅着他，心想，是不是看错了沃什蒂纳尔医生？随即，他的圆脸又露出笑容，容光焕发："加把劲儿，您将发现一切都会顺利的。"这就是说，还得他克里斯特斯库来教训人。

如果能够得到奥尔坦莎的理解和道义上的支持……可是，她从一开始就表示怀疑。"你揽下了这份苦差事，斯特凡，上一天班已经够累了，有时晚上还要叫你去接生，哪还有时间坐下来写书？"不错，她说话和和气气，仿佛具有善意和同情心。但是，他决定写书不正是为了向她显示自己的钻研精神和干劲吗？佩服？她已有佩服的对象，不可能再佩服别人，包括她的丈夫斯特凡·沃什蒂纳尔。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小蛇阴险地抬起了头，狠狠地咬了他一口。这就是事情的原委，不用再问是谁让他接受了愚蠢的计划，克里斯特斯库的甜言蜜语迷住了他。好个美人鱼，原来是秃顶和大腹便便的美人鱼！奥尔坦莎需要一个崇拜的对象，就像那些着迷的女学生专门收集杂志上的照片、崇拜影星和流行歌星。他承认自己有点偏激，可又消除不了满腔的怨恨。

贝尔巴错误地决定同比他小得多的女人结婚时，他曾好奇地观察奥尔坦莎的反应。女人爱动感情，他估计她会彻底暴露的。结果令他失望，

因为妻子并没有指责“厂长”的婚事。

“他独身生活了那么多年，应该找个人来照顾他。”奥尔坦莎同情地说。

“太年轻了。”他反驳后，又补充说：“我听说，她非常漂亮。”

“漂亮更好。”她笑笑说：“太年轻？贝尔巴并不显老，再说是有名的人。她也许崇拜他。”

如果说他嫉妒过贝尔巴，那么现在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自尊心往往是伪装起来的嫉妒心。一旦自尊心受到伤害，嫉妒心便会露头。他无可奈何地承认，今夜睡不好了。他的脑海里翻腾着一个又一个设想，随即又一个个地推翻。他不愿承认事实。自尊心有时能使人变成两面派。他佯装不知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一场长期默默进行的斗争，远非始于今天或昨天。他竭力否认奥尔坦莎对贝尔巴的敬佩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但是无济于事。他为了向奥尔坦莎表明，自己也敬重厂长，曾经邀请贝尔巴来家做客，努力同他搞好关系。他费力摆出来高姿态，不管愿不愿承认，其中包含着虚伪。他不习惯阳奉阴违，过去从来不这样做，如今是被迫做违心事。这一切都成了过去。遗憾的是，对他来说，自尊心是个不能降服的魔王，主宰他的现在、未来，以及对往事的回忆。

# 二

如果抛开某些细节，仅看事物的表面，沃什蒂纳尔也有或者似乎有他的一部分道理。他们并没有吵过嘴，奥尔坦莎是同他日渐疏远的。因此，为了找出她转变的原因，就得退后许多年，从他们结婚说起。他曾想拉上一块厚厚的帷幕，遮住记忆中的事。也许他有过模糊的责任感，后来变成愧疚。多少年来，他陶醉于自我设计的形象。事业上的成就进一步突出了这种形象。他可以顾盼自雄，安然欣赏自己的形象，如同观赏威尼斯精致镜子里的湉湉水面。他要尽力保持美好的形象，不让它受任何损害。如果非要回顾过去的话，他不得不承认并非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首先，奥尔坦莎对他的"事业"表现出不以为然的轻浮态度。难道不正是他长期奋斗，才得以从山区小城——他们就是在那儿相识并结婚的——调到这个重要的省城里来工作的吗？她从未说过他什么，更没有指责过他，甚至不曾含沙射影提起他很久以前干过的蠢事。这些年来，她的表现是无可责难的。他，沃什蒂纳尔像所有贪图安逸的人，满足表面现象，把它们看成是现实本身。假如没有出现"厂长"的话，可能至今仍然安于现状。

一提起何时开始起疑心的问题，他惊讶地发

现，自己对女人的了解肤浅。他在这方面的经验极为有限，简单说，他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一模一样。他从来不考虑她们在想什么，有什么感受。折磨奥尔坦莎的“问题”是什么？他曾想弄个水落石出，可是力不从心。他认为，她应该心满意足了。他们过得很阔绰，有钱，每年夏天去海滨休养，住最豪华的旅馆，他们还到国外去旅游。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他把一些问题列入禁区，特别是他妻子有没有追求生活权利的问题。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跨过用脚踏实的坚硬土地，跑到松软的流沙地带去呢？她转到电机厂去，没有触发他的自尊心和嫉妒心。不，那是需要时间的。不过，某些迹象出现得相当早。他从前的日子无忧无虑、舒适、安宁。当然，他得忙于公务及纠缠不清的麻烦事。他无可抱怨。因为，凡是想保住地位、名列前茅的人总免不了辛苦。

最早的信号是怎么出现的？首先，产生了隐约的不安感，几乎是令人难以觉察的忧伤。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出来奥尔坦莎找到了精神寄托。但他不予以追究。多年来，他乐于回避现实，对不愉快的事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认为，他们已经结婚多年，任何家庭都难免出现小磨擦，这是正常现象，不值一提。他不承认他们夫妻之间有严重分歧。他为了能一起去保加利亚的“黄金海滩”度假，曾经作了巨大努力。他们城里还没

有人去过那里。他想方设法让奥尔坦莎忘掉不愉快的事，照他的看法，这些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即使他做了错事，后来的行为弥补过失绰绰有余。奥尔坦莎应该承认，他是模范丈夫。他没有意识到，模范丈夫的想法恰巧说明他有根深蒂固的中庸思想，这使他做事循规蹈矩，不敢出格。模范丈夫？什么意思？他不酗酒，不好色，尽管他所从事的职业根本不用找机会，唾手可得。在海滨，在真正似金粉的沙滩上，她竟无缘无故地笑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又默默流泪。她哭得很伤心，泪珠一串串地往下流。她发觉他正在看她，便毅然站起身来，走了几步，投身于海水里去了。她从海水里走出来时，面色平静如故。他若无其事，或更确切地说，是装作没有看见她哭。“我去找些冷饮。”他说完便起身离去，他知道她需要独自呆一会儿。他想：“她还年轻，会过去的。”整个假期都过得十分愉快，要想从记忆里抹掉这件事，并不困难。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他恍惚感到，是的。奥尔坦莎不再像过去那样活泼、好动，变得稳重了。他自我安慰说，那是因为她快35岁了。不，他不愿正视现实。如果他认真照照威尼斯镜子，他就会发现水早已浑浊了。

再往前说，那是初春的时候，她做了一次手术，用的时间很短，像拔牙一样不大痛。他安慰她说：“我们还年轻，有的是时间。”他们确实有的

是时间，有时间生孩子，眼前不必着急，因为一生孩子会把事情搞糟。他是那样想的，但他本能地感到，这在奥尔坦莎的心目中算不了什么理由。他需要集中全部精力去工作，人在创业的时候都是这样，甚至有时得豁出去干。那时，怎能陷入“麻烦”，使一切“复杂化”呢？他必须放开手脚，无后顾之忧，因为要想在社会上混个“出人头地”的地位，并不是简单的事。他仔细考虑过各种理由，没有全部讲出来。有些理由听起来不太顺耳，似乎有点强词夺理。

“瞧……”他抚摸着她的头发说，她喜欢这样子。“孩子？现在？我们得承受很大的负担。以后呢？不清楚，也许行。可是，不能现在要。等一等。过一段时间再说。我们还年轻，等得起。”他懂得如何坚持自己的意见，必要时就慢条斯理地解释，说服对方。在给她做手术前的几天时间里，他以为一切迎刃而解了。果真是一切吗？有时，往往是欲速则不达。总之，当时的关键问题在于她的态度，他只不过说说而已。她被说服了。当然，他运用了自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不是用含混话糊弄她。他相信，奥尔坦莎已经明白生孩子是双方的事，夫妻都要同意，而他的意见是再等一等。他不能断言，保加利亚的金色海滩是否起到了……治疗作用。

他后来想，她那时不会意识到自己难再怀孩

子。她不可能知道流产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起初，他像往常一样，不愿正视现实，甚至不愿坦露心声。从那以后，奥尔坦莎再也没有怀过孕，年复一年，他作为丈夫和医生，应该关心关心……是啊，说来也怪，他却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一到需要时，他便情急生智，想出种种理由，像魔术师从手帕里变出美妙的词句。在生育问题上，常常存在许多不可知因素。有些妇女等了10年，甚至15年，不敢再企望，不再等待了，可是，突然……他通过临床实践，了解许多这类病例。总而言之，他“干得”准确、正常、迅速和漂亮。他是无可指摘的。有时，医院临床检查已确诊为不育症，大自然往往还会开点玩笑。他试图向奥尔坦莎介绍这些实情，可是下意识地感到，她已不感兴趣，不再相信他了，他们之间出现了裂痕。

起初，他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奥尔坦莎的态度令人难捉摸。他们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她对待私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依旧幼稚无知。后来，他总算了解到她的想法。她要作一次妇科检查。“斯特凡，你难道一点也不怀疑，过了那么多年，而……”她的话没有说完，脸上泛起了红晕，眼睛望着别的地方。他没有回答。他的确没有想过，因为自己缺乏做父亲的愿望。有些男人从来没有这种愿望，女人则少见，另外一些

人，这种愿望来得比较迟。真奇怪，他居然没有想过这件事。他决定给她做检查，省得她纠缠不清。几天后，轮到他值班，一开始病人多，他让她晚点来医院。妇科检查，小事一桩，几分钟就够了。可对奥尔坦莎来说，这件"小事"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他没有这样想，甚至没有想过应该这样去考虑问题。他应该知道，这个问题对正常的女人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他曾经愚笨地想，自己是妇产科医生，不是"心灵的医生"，尽管他应该或至少应该努力成为奥尔坦莎"心灵的医生"。她原本是坦率的、近乎幼稚的性格，后来慢慢变了，她学会装模作样，女人善于当演员。他天真地认为，她也一心一意等待妇科检查的结果。检查毫无结果。不，他们看这个问题的角度不同。他快50岁了，尚无要孩子的愿望。如果有人问起这个问题，不过，谁会问他这种事呢？他有的是论据。不少人没有孩子，不也过得很好。人的一生，尤其是杰出人物的一生，难道非要完成传宗接代的生物本能吗？他内心是这样看"问题"的，尽管他不是辩证法专家。在做了对她具有那么重大意义的检查后，他试图用"生育不确定性"向她解释。

"我们再去试试。"他这样说，尽管自己也没有把握。"去试试，到索瓦塔去试试。你知道，那里的矿泉……"

“我哪个索瓦塔也不去。”她斩钉截铁地说。

他们又去海滨度假了。奥尔坦莎买了一件合身的红色游泳衣，充分显现出她那丰满的体型。假期生活很舒服，但是他的妻子却少言寡语，仿佛彼此之间有什么误会，不过他慢慢习惯了，更确切地说，他没有介意。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3年前？不，已经4年了。那次像现在一样，也是秋天从海滨度假回来。他把一年一度的车子检修安排在秋天。那时，他还没有买拉达，用的是达契亚1100，他开着它跑遍了全国。达契亚修理厂的人认识他，去检修车子用不了多少日子，当然，城里人谁不认识他沃什蒂纳尔医生？没有车子，就得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去挤汽车，赶无轨电车。有一天，他们因事外出。无轨电车里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他总算体验了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滋味。他没有坐在奥尔坦莎的身边，拥挤的人群把他们分开了，但他能看见她。猛然间，他发现她漂亮的蓝眼珠变混浊了，眼角里含着泪，泪水慢慢流到面颊上。他纳闷地问自己：“出了什么事？”奥尔坦莎没有注意到他，可能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车到站，下了不少人，乘人群骚动之时，他偷偷地观察她的表情，只见她脸上的泪水已干，她到底看见了什么？他从人缝中看到她正注视着一个座位，那儿坐着一个衣服朴素的普通青年妇女，奥尔坦莎并

不是看她，她有什么好看的？可是，那个面带倦容的女人抱着孩子。他用眼睛估量了一下，孩子能有几个月？ 4 个月，也许，5个月，一个普普通通的婴儿乖乖躺在母亲的怀里，好奇 地 朝 窗 外看，他是第一次瞅见街上的树木和房屋吧，幼小的孩子把一切看得很神奇。已经过去 4 年了。那个小毛孩长成大孩子了，先是由大人扶着 走 路，后来就独自跑了。他奇怪，怎么会想 起这件 事？他们乘车的时间不算长，很快便到了目的地。“奥尔坦莎！”他小声唤了一下。她却吓了一跳，仿佛刚从梦中惊醒，勉强从婴儿身上移开视线。他们下了车，无轨电车沿着大街疾驰而去，她久久地目送着在秋天午后的尘雾中消失的车子。

那天晚上，他们进行了一次非 同 寻 常 的谈话。不，不能说是争吵。他们还从未红过脸。他们的婚姻看上去是美满的。不是争吵，而是……算作意见分歧或者有“问题”吧，又一次对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斯特凡，”她说。他发现奥尔坦莎的眼 皮 在神经质地猛跳。“斯特凡，”她又重复叫了一次：“我想谈一件事。”

“想谈什么，亲爱的？”他有礼貌，并谨慎地问。

“斯特凡，”她用一种平淡的、冰冷的 口 气说话，听的人会以为她对自已谈的事并不关心。“斯

特凡，”她反复叫他的名字，好似为了增强信心。“我想我不会再怀孩子了。”她用手势制止他的反驳，说：“算了，我心里清楚。你在医院里也给我解释过了。有过那种例子，我知道，10年，20年，甚至……还可能……打那以后已过了10多年，……我已经36岁了（其实，她还差几个月才满36岁）。还要等多久？我想……”

“想什么？”他问，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领养一个小孩……”

“怎么？什么？”他大惊失色。

“是的，斯特凡。”她慷慨激昂，申述起自己的理由。“瞧，这次天灾，现在水灾刚过，会有许多孤儿。哪怕不多，但总会有的。我想领养一个小男孩，小女孩也行。由你定吧。”

他很快从震惊中醒悟过来，感到事情棘手。什么念头？领个小孩？奥尔坦莎竟想出这一招儿！不过，他控制了自己的情绪，表示她的意见可以商量，但必须慎重行事。

“奥尔坦莎，”他停顿了一会儿，字斟句酌地说：“你到春天才满36岁，我对你说过，不能下定论。你还年轻呢。”

“斯特凡，要是那样的话（他明白，争论现在才开始），我命中注定，正如你所说的，能有这种好事，那就更好，到那时我们就有两个孩子。这不更好吗？”

“可是，你不想想，”他开始不耐烦地说：“能收养一个遭灾的孩子吗？我们去哪儿了解他的遗传特性？遗传因素能产生重大影响。”他企图用一般的抽象理由说服她。

“是的，斯特凡，”她和解地说：“就算遗传会起重要作用。可是……”她沉默片刻之后，很坚决地说，“还有我们……小孩的父母，我们养育他，监护他，不也会起重要作用吗，你信不信？”

“是的，是的。”他不悦地喃喃说。他不想正面反驳。他本能地感到眼前又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跟那次在小山城一样。她那时年幼无知，很容易地说服了她，现在呢？现在要作出事关重大的决定。“奥尔坦莎，”他继续说，“我们不能就决定……毫无准备。”

“谁说毫无准备。”她嚷叫道。他没料到她竟会狂怒地喊叫。“我们是说什么来着？我……”她沉默后，坦白说：“你以为我想小孩才想一天，二天？斯特凡。”她忽然换了温和口气，竭力笑着说话，因为她知道他喜欢笑脸。“斯特凡，我早就想要了……真的是这样。我一直想要孩子。小孩就是阳光和幸福。”

“怎么？我们难道还不幸福？”他反问道。他希望换换话题，有个喘息的机会。如果他能成功的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领养小孩的怪念头就会打消，不过也难说，女人是变化多端的。现

在最好谈谈别的事，议论一下空洞的“幸福”也行，尽管他平日厌恶谈空话。

“斯特凡，现在不谈过去的事。”她有点不高兴地说，“我想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小孩是家庭的光明。”

“奥尔坦莎，这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得再想想，斟酌斟酌。”他千方百计想掩延时间。

她听后，古怪地瞅了他一眼，……就像是看一个陌生人。“好吧，斯特凡，你再想想。”她以惊人的平静口气说。事情到此为止，她，更不用说他，以后再也没有提过孩子的事。

他几乎忘记了，这件事发生在4年前。他们那次谈话后几个月，她调到电机厂工作，对贝尔巴产生了莫名其妙的热情。他从不讳言，贝尔巴是个出色的人。他们结识了不少幸福的家庭，做妻子的并不一定都喜欢在业余时间里洗孩子的尿布。他没有生理缺陷，只是没有想过要孩子。婴儿意味着什么？是个未知数，没有未知数也同样可以过得很好，可以全力实现自我，比如说他，已经成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尔坦莎应该心满意足了。有些人，当然是庸人，总是责怪女人不育。他从来不这样想。他们的生活美满，应有尽有，干吗要无事生非？如果有人说他的全部论据像纸牌搭的城堡，不牢固，他是不能接受的。认识意味着明智，意味着摆脱某些习惯思维（思

维也有自己的先天局限性)。认识的果实并不都是甜的，有时也是苦的，想吃果肉的人，就得先花力气剥去果皮。花力气吗？他已经费了不少力，但不是为了无谓的空想。他拼命干，努力钻研业务，首先是为了出名，然后是要保护自己的名声。他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干别的事！这样做能带来什么恶果？使他丧失认识真理的机会？他不怕接受这种恶果。他根据自己的需要剪裁真理，使之像海绵床一样舒适。他希望奥尔坦莎总有一天回心转意。时间对他有利，时间将使她的热情减退，失悔心情消失。她想领养孩子的小小意外事件将被遗忘。他是这样想的，并认为一定会做到。

# 第 五 章

## 一

刚住院，他没有失眠，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它才开始出现。它故意姗姗来迟，因为它有的是时间，时间同它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盟。它像最危险的敌人，总要尽可能长久地隐蔽起来，慢慢伺机露出真面目。这种敌人相信最后胜利属于它。“最后”意味着多长时间？几天？一个星期？时间并不重要，它学会了等待，并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失眠对他采取了既容忍又嘲弄的态度。他是什么人？运动员？住院是为继续保持竞技状态？他是不是忘了自己的处境？他装做不明白为什么来这儿，认为是来进行竞走训练的？他从屋里走出来的神态，简直忘掉这里是病房，是在医院里……每天早晨，他一起床就去花园里散步。有人形容医院花园小得可以装进口袋。第二次散步是午饭后。那时，其余病人了解自己的力量，认输了，不得不上床午息。他尽量把晚上的散步往后推迟。天天如此，他已

经习以为常了，尽管从走廊通往花园的那扇门上的灯光暗淡，只是微微颤抖的苍白亮光，但他的步伐稳重。他很快就熟悉了花园的情况。每天，他都很有规律，无数次地走遍小花园，先从左到右，然后倒过来，从右到左。5条小路有如通向花园中心的5条条幅，小喷泉哗啦啦的流水声奇迹般地从花园中心传向四方，看来它在教授的理疗理论中具有一定的地位。每年春天，花工都要油漆一遍砖砌的小路。砖不是朱红色，而是赭色。

他像往日一样走得很快。至少在这方面，他恢复了过去的步态，看上去完全是个珍惜时间的人。他的这种步子在工厂出了名。“厂长来了。”工人们看见他急匆匆从一个车间走到另一个车间时都这样说。他用急匆匆的步子逼得茹曼卡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他发现后面的那个人实难跟上，只好停住等等。他又看见了茹曼卡……满脸冒汗，正从口袋里抽出一块又大又白的手帕，拼命擦汗。他们那次是去察看新厂址的地皮。无轨电车站离得远，后来才一直延伸到工厂门口。那是3月初的一天，天空飘着雪花，可以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片黑乎乎的树林。他心里想，把工厂建在树林附近。他们往回走的时候，他尽量与同伴保持同样的速度。从榆树后的一个院子里，传来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和狗吠声，以及女人的

莺声。大约这就是那时的情景。

他和茹曼卡是最早到那儿的人，接着去的是打字员，她硬要别人叫她阿斯帕西娅·普洛普小姐。他们就在树林边上的别墅里办公，因为房子破旧不堪，得等修理后才能用。八·二三① 以后，许多人在那里住过。临时的房客不爱惜公物。后来，记不得是谁出的主意，把别墅给他住。房子很旧，2楼的地板已经霉烂，水管生锈，连门把也被人拿去当纪念品了。他和茹曼卡去接收房子时，只有一只老鼠迎接他们。它正卧在院里的垃圾堆上，用前爪不紧不慢地洗理胡子，眼睛直盯着他们。

修理和使用别墅，最令老鼠恼火。他们先用预制板在院子里搭起临时办公室。阿斯帕西娅小姐不知从那儿弄来一台打字机。他们在工棚里录取了第一批人。他和茹曼卡一起负责招收工作。开始，茹曼卡认为是他自已的事，不同意他插手。过了几个星期，茹曼卡不得不承认说："厂长同志，您可以当个顶呱呱的人事科长。"初夏，他们终于搬进了别墅，未来工厂的墙砌起一人高了。临近秋天，厂房尚未完工，有些车间就开始干活了。后来，他们开始清理花园。工厂的花园比不

---

① 罗马尼亚的解放日。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法西斯政权。

上这儿，教授雇了花工管理花园，他主张“病人应该有块绿地，晒晒太阳，松松筋骨”。花园中心有小喷泉和水池，夏天打开窗子便听见哗哗的流水声。花园里的树不多：他窗前的板栗树，一棵核桃树，还有几棵洋槐树。核桃树荫下有一排条凳，供游人小憩。草地和玫瑰花点缀着小花园。直到9月下旬，每天中午和黄昏时，都有病人坐在条凳上聊天。患心脏病的人能谈什么？当然是谈他们的病。他不愿扎堆聊天。于是，有人说他“不合群”，还有些人说他“装模作样，以为自己还是厂长”。大家很快认定他的身份，后来不再惹他，这也正中他的下怀。

他同“白夫人”的斗争一开始就处于有利的地位。他把失眠叫作“白夫人”。他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散步，即使午后感到困倦，也坚持不改，晚上延长散步时间，直到全身产生一种愉快的疲乏为止。遗憾的是，他散步的日子不长了。9月中旬的好天气是短暂的。秋天来得神速。他发现，早晨的太阳升起得愈来愈晚了，正午的阳光是温和的。晚上，虽然通向花园的门灯光线微弱，但仍然可看见一层薄雾笼罩着大地。日益微弱的阳光和薄雾表明季节在变换，但对人暂时不足以构成威胁。真正的秋天仿佛是为了挽回迟到的损失，骤然降临大地。首先是在一天夜里，天将破晓的时候，一阵强风把他从梦中惊醒。只听见窗玻璃哗

啦响，栗树枝疯狂摇动。接着，下起了滂沱大雨，雨点顺着窗玻璃往下流，大雨慢慢转成毛毛细雨。雨水汇成细流，顺着铁水管往下流，听起来令人心烦意乱。他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头下，静听窗外那单调但连续不断的风声和淅淅沥沥的雨声。“白夫人”一来，他的头脑更加清醒了，思考问题和回顾往事都十分有条理。那次发病后，厂医对他说：“您需要找专家看一看。”他又一次看到厂医的面孔似乎比他自己还紧张，他的“病情”成了问题，厂医无能为力了。“好吧，先生，我会去的。”他平静地回答说。他觉得束缚胸口的千条绳子突然被人扯断，早先那种奇怪的疲乏和软弱无力的感觉消失了，他轻松起来。他想：“他有什么看法，是不是认为我现在就得去见上帝？”他挣扎着要站起来。可是，厂医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制止了他——这是他唯一可做的事——并迫使他重新躺在俱乐部的人造革沙发上，他发病后，被人从会议室抬到这里来的。俱乐部就在隔壁，从薄薄的门外传来沸沸扬扬的说话声，犹如蜜蜂嗡嗡叫，人们也许惊慌失措，正在好奇地谈论他。他无形中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开头是这样，后来，沃什蒂纳尔和奥尔坦莎等都劝他住院，他只好同意了。

他不喜欢医院。可谁又喜欢它呢？他不愿回想过去的事。维奥丽卡没有住在这儿，他到心脏

病医院来干什么？唉，如果仅仅是那样就好了。心脏有时可以修复，如何修是容许商量的。她不是死于心脏病。这儿使他又想起维奥丽卡住的那一所医院。他把她抱起来，她的身体轻如鸿毛，那是他最后一次拥抱她。“白夫人”是忠于职守的。一想起这些事，你还能睡得着吗？他住进这家医院，要看看被人尊称为权威的阿格利切鲁教授是如何修理心脏的。他可不是轻而易举作出住院决定的。起初，人家劝他提前退休，说“这是为您好”。后来，玛拉抛弃了他。她凭什么守着病人，况且又是退了休的人?!是的，结婚显然是错误的，近几个月来，他不时产生这种念头。不错，玛拉迫不急待地按自己的方式修正错误。他怀着厌恶心情住进心脏病医院，不能说他厌世，但至少对现在的生活多少有些腻烦。当然，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第一天，他们让他去做心电图。他已经换上医院的病人服，穿着睡衣和长袍。回来时，自己的衣服不见了，护士伊丽娜笑着告诉他，她亲自把他的衣服送到存衣处了。她还补充说：“等您出院时，再去取。”她说话露出了微微向外翘的大牙齿。她交给他一块写有白色号码的绿牌子，每个病人都有一块这种牌子。过了几天，他才发现病人把它放在床头柜里。有时，有人把它紧握在手里，仿佛它能保佑自己早日出院。

他陷进了这儿的生活旋涡，成了一个不知向

什么方向旋转的小齿轮。最初的几天就这样熬过来了，他努力使自己适应环境，并心服口服地承认是自愿来治病的。后来，他开始与“白夫人”搏斗，到花园去散步。现在，他不能去室外散步了。住院后，他养成了散步的习惯，他认为散步是自己意志力的体现，表明他有能力对失眠进行斗争，或至少有进行斗争的幻觉，总而言之，表明他不会轻易向疾病低头。

他隔着厚玻璃窗往外看，花园变了样，毫无吸引人之处。板栗树上的叶子全部脱落，绿草变得枯黄，水池的水停止了流动，一切显示深秋景象。夏天早已成为过去，冬天即将来到。不过，离下第一场雪的日子还早，到那时，早晚打开窗户就会有一股冷空气钻进病房，使你打消去花园散步的念头。他只好在医院的走廊里散步。这固然是一条出路，但是也得冒着危险。首先，他必须顶住病友们投过来的好奇目光；其次，存在着被医生或护士制止的可能性。人一住进医院，就成了弱者，得受别人管辖，任何爱好秩序的人都可以责问他在干什么？到哪儿去游逛，为什么不上床休息？清晨，走廊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人去化验室，有人找医生，散步不易被人发现。午饭后，尤其是到了晚上，病人不该在走廊里走动，必须躺在床上……

他下决心继续散步。他从家里带来了十分舒

适的皮便鞋。医院发给病人的是木拖鞋，走起路来像荷兰的木履一般响，走石头地板老远就能听见响声。于是，一旦天气不允许他去花园散步时，他就换上自己的皮便鞋，在走廊里无声息地散步。室内散步只不过是不得已时的做法，因为医院的走廊向来是不通风的，服务人员不会想到通风问题，何况还有人怕穿堂风。他的病室经常开窗，因此一走到走廊里，马上感到医院特有的污浊空气。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散步，他常用这种办法对付“白夫人”，避免同她会面。可是，他没有能逃脱另一种意外的会面。那是在一天深夜里，他遇见了护士。她是个年青姑娘，脸上光滑，没有雀斑，皱眉头时眼间出现一道明显的竖纹。她一定正在值班，要不然深夜在走廊里干什么？看来这个姑娘是刚参加工作的，满腔热情，对工作严肃认真。她猛一看见他吓得张口结舌。但是，当她发现他张皇失措，就像中学老师突然在厕所里遇见学生，学生来不及把刚刚点燃的香烟藏起来一样。她很快就镇静下来。她面带愠怒地瞅了他一眼，讥笑地问他：

“您在这儿干什么？出来散步了？请立即回到床上去。”

不能说她说的话不够客气，但他认为带有责备口气，甚至可以说有点粗暴。他心里想：“她简直想叫我跪在核桃壳上。”那目光和笑容令人难以

容忍。不错，小姑娘十分坚决和自信。他估计，她和安卡的年龄相仿，也许要大一两岁。可是，站在他面前的小姑娘确信自己的权力，竟敢教训他。他瞪了她一眼，那种目光在厂里被认为是“吓死人的”。护士恍惚感到有点不对劲，不能再坚持下去。她从楼那头来，不认识他，本能地感到还是少管闲事为妙。她装做生气，“哼”了一声，耸耸肩，转身朝另一方向走去。她穿着高跟鞋，瘦小的臀部随着脚步的节奏扭动着。

他对这次意外的会面格外生气。医生、阿格利切鲁、伊丽娜护士都对他彬彬有礼，他们不让他产生病人都有的“自卑感”。此外，他几乎已经忘记自己还会受到责备。至少在他当厂长期间，电机厂一直是模范厂。再往前说，他开始工作的那个厂的厂长德拉戈什，从来没有指责过他，要知道德拉戈什一向是有理不饶人的。而现在，这个小丫头，臀部小得不知能否引起男人的注意，居然来……他知道，自己把问题看得过重了，但又无法冷静对待。直到天快亮时，他才入睡。在这之前，他少不了又要同“白夫人”相遇。那个小姑娘无意中告诫他，病人住进医院，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还有人格。问题是病人出院时，能用一块牌子换回它们来吗？

## 二

第一次失眠后，他没有绝望。相反，他像要进行一次空前的新试验，斗志昂扬，跃跃欲试。陌生的东西召唤他，好奇心驱使着他。怎么，头放在枕头上，居然会睡不着？他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维奥丽卡死后的头几个星期里，他失眠过。他总是在凌晨相同的时间从梦中惊醒，如同身上有走动准确的闹钟，能不受任何干扰按时响铃。在黑夜行将消退的茫茫晨雾中，他习惯把手伸向左边。维奥丽卡睡在左边。多少年来，他甚至做梦也会伸左手摸到她。她爱蜷曲着腿睡觉。如今，每逢他伸出手，摸不到她，才完全清醒过来，感到房间里充满孤寂的气氛。他坐起来，一直坐到困眼难睁，才重新躺下睡觉。床头柜上的闹钟吵醒了他，这才急忙跳下床，穿上衣服去工厂上班。他往往夜以继日地呆在工厂里，冷不防地出现在各个车间里，家里没有人等他了，不必急于回家。

他住院后，情况不同了。第一次失眠是难免的，“白夫人”早就等在那儿，尽管她也作了准备。他关上台灯，房间里一片漆黑。关灯前，他看了一会儿书，这是他新养成的习惯，因为生病前根本没有时间读书。现在他有充足的时间。他把书

放在床头柜上，准备睡觉了。可是，他又迟迟没有睡意。开始时，他莫名其妙地问自己："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情？"那时是前半夜，不算太迟。自从住院以来，每天早晨都有人问他睡得好不好。他总是回答说："好，我睡得很好。"他没有领会人家问话的含义。现在，他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到目前为止，睡眠一直像驯服的小狗，只要召唤，它就会哼哼唧唧摇着尾巴跑来。当他对教授的问话给以肯定的答复时，教授满意地点点头说："好，非常好。"接着，他又居高临下地补充一句："至少在这方面不存在麻烦。"存在什么麻烦？为什么好？在那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过心脏病与失眠有什么联系，因为许多人都抱怨失眠。他不失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一直睡得很好。病人都责怪阿格利切鲁教授太吝啬，舍不得开安眠药，其他医生也模仿他的做法，简直把安眠药当毒药，开得很少。教授决定说："只有长期得顽固失眠症，我才帮助你们，请相信我。"教授还劝说道："不能养成吃安眠药的习惯，整天迷迷糊糊的，那是真正的灾难。"躺在床上的人眨巴着浮肿的眼睛，不信任地瞅着教授。他又激动地对大家说："请相信我，第 1 天，第 2 天睡不着，第 3 天肯定能睡好。"他用 3 个天字，没有用夜字。实际上是这样，过度疲困的人会在快天亮时睡一两个小时，夜间该睡却难成眠。

他决心不用自己称之为"鬼玩意儿"的安眠药。这是几个星期前，他睡得香时下定的决心。第一次失眠，到了拂晓前才入睡，醒后感到浑身困乏。白天过得慢，住院病人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他决定不午睡，可是又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并且一直睡到傍晚才醒。失眠症故意捉弄人，在不该睡的时候，让你睡上几个小时，夜间是它的王国，它可以为所欲为。他心想："午饭后喝杯浓咖啡就好了。"但是，他随即想起来，不能再喝土耳其老头用热沙过滤的咖啡。他眼前浮现出黄红色的铜咖啡壶在滚烫的沙土里滚动的情景。维奥丽卡声明说："我还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咖啡。"他笑了："难道你非得从康斯坦萨跑到这儿来，才能喝上一杯货真价实的土耳其咖啡吗？"

门无声无息地开了，他什么也没有听见，只是感到进来了什么人。他在毛毯里转过身，只见阿格利切鲁教授正全神贯注地看他。他来了多长时间？是来侦察他的吧？心脏病专家问，"工程师先生好吗？"他认为这类问候有点愚蠢，也许是医生的职业需要，故意对病人表示关心，他们肯定准备了不少标准问话，有上午用的，有下午用的，一天各个时辰都有话说。他什么时候来的？心脏病专家没有等待答复，三大步就走到他对面的床上坐下。阿格利切鲁的个子矮小，腿短，坐在床上脚够不着地板。他滑稽地晃着脚，那动作根本

不像具有“欧洲水平”的学者。他心想，可能是夸大其词，这时才记起对方曾经问候过他，也许仅仅是问问而已，不过出于礼尚往来，他还是应该答复的。他尚未摆脱午后的困倦，没有马上答话。

“看来您夜里没怎么睡好。”阿格利切鲁说。他是怎么猜着的？

“是的，”他承认说，同时尽量掩饰自己的惊异。“很晚才睡着，都快天亮了。”

“都是这样开始的。”另一个人说，但他没有说明是指什么。

他听出心脏病专家的话里隐约含有失望，即他原来的预计，甚至可以说是希望落了空的情绪。这就是说，他，贝尔巴也气馁了？教授对他寄托着相当大的希望。

“我想这是偶然的。”他忙解释，并补充说：“我相信，晚上能睡好。”

“我也这样想。”阿格利切鲁说，“您要尽量保持平静，放松。我不苛求。我敢肯定，您不会求我给您安眠药的。药只能起安慰作用，请相信我。”

“我不会用乞求来麻烦您的。”贝尔巴反感地回答说。心脏病专家好像把安眠药看成洪水猛兽。

“我高兴，我很高兴。”阿格利切鲁说，“我猜

望如此。现在，我走了。别忘记，夜间睡得好的必要条件是安静、镇定。”他作个告别的手势，但又半途中止，看来还想说些什么，过一会儿，他又改变了主意，摇摇头，很快步出病房。

他几乎是急不可待地盼着黑夜降临。他决定“睡得晚一些”。他的精神振作起来，按习惯到走廊里散步。医院于几天前开始供暖，他开窗户通通气。他比往日散步的时间长，一进屋就感到冷气袭人。于是，他连忙关上窗，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室外的湿气也乘隙而入，不能再嫌屋里的空气干燥了。他想“看点书，熬到半夜”。屋里渐渐暖和起来。他继续阅读已经开了头的长篇小说。他看得慢，不习惯从现实进入虚构的世界，因为那需要一定的想像力。他并不缺乏想像力，问题在于看书是个借口，目的是要消磨时间。“到半夜时熄灯。”他这样想，同时发现自己一点也没有看进去，于是又从头认真读起。现在，汉斯·卡斯托普来到了山区疗养站。他那身材魁梧的侄子若奇姆前往车站迎接他，并谈了对疗养站的初步印象。原来该书讲的是疗养站的事。“特列塔为什么给我这本书呢？”他又拿起书，想从中找出答案。这本书是大部头，德国作者不着急，按部就班地写，写得不错，看来是个老手，他不得不这样承认。他看一眼表，已经快午夜了。于是，他忙乱起来，像是需要按时赴约会的人。“该睡了，睡

吧。”他自言自语，连忙关灯。他不必担心，“白夫人”会准时赴约的。她是个严肃认真的女人，可以信赖。其实，她是个小姐，一点不老，仅只30岁。她一遇上单身汉，便盯住不放，直到人家结婚才罢休，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经过两个失眠之夜后，他着手总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最明显的现象是头脑格外清醒。但奇怪的是，他不能长时间地集中精力思考一件事。复杂纷乱的事茫无头绪。他的思想像陀螺不停地旋转，又像一个小孩掉进羊圈里，不住地从一头转到另一头。他恐惧地发现，自己已经被“白夫人”缠上了。他想，“因为我活动少”，人总要设法安慰自己。他还想，“我是夏天来的。是不是让他们去家里给我取来保暖的厚大衣和其它衣服？对了，要大衣和冬衣，并且要求他们允许我再去花园里散步。”……他懊恼，因为不得不求人。毫无疑问，教授一定会编出理由阻止他。他担心病人从医院里溜走。

能容忍和屈从“白夫人”吗？怎么才能战胜她？他向阿格利切鲁保证过，不会要那“鬼玩意儿”的。那么，当失眠症的俘虏？听任它摆布吗？失眠一般延续到天亮前。瞌睡随着黎明到来，酣睡1小时，2小时，有时甚至3小时，直到早晨查病房的医生来叫醒他。他开始理解别的病人了。阿格利切鲁有一定道理，但他止不住找教授的岔子了。

他一贯对人和蔼，现在表现得很烦躁，不愿理睬教授，意思是暗示医生早点离开病房，别打扰他，让他再睡一两个小时。院长终于明白了。早上，他经常不参加查病房，让他的助手达比扎负责这项工作。有些病人对达比扎的评价很高，他比较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医生形象。有人叹气说，“要是达比扎当院长的话，不会那么吝啬安眠药。”令他惊愕的是，阿格利切鲁尽管很出名，可是相当多的人对他没有好感。“专家？权威？”也许，曾经是，现在……有个人称他“老头”，……还有人刻薄地说他是“疯子”。

教授照常探望他，但次数少了，并且多数是在晚上来。他享有特殊病人的待遇。他住着单间。至少表面上看，他接受的是一般性治疗，用不着打扰教授。教授借口想同他闲聊，给他解解闷，医生笑着解释。仿佛他贝尔巴缺少的，最希望的就是找人来闲扯。

他担心安卡知道住院的事。他想，“不能让她知道我患了心脏病。”他怕吓坏女儿。他自我安慰说，康斯坦萨很少有机会获悉实情。奇雷斯库家的交际不广。第一次发病后，他收到过女儿的信，开头这样写：“我亲爱的爸爸……”如果安卡听到点风声，她会乘第一班火车，不，乘飞机赶来，突然冲进这间病房的。她会忘记自己和玛拉的冲突，当然还不会知道父亲离婚的事。安卡远离父

亲，她爱他。他同玛拉结婚前，这个在外地的父亲在女儿心中的形象是完美无缺的，尽管她只能在假期里看到他。那么，自己在女儿眼里的形象到底起了什么变化？他结婚后，一个女人闯进她父亲的生活，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后来还是来见玛拉了。玛拉似笑非笑地对她说，“让我们交个朋友吧。”安卡冷淡地回答说，“好吧，夫人。”他从这时就预感到，天上布满乌云，暴风雨即将来临。

住院前，他慎重地采取了措施。他和女儿的来往信件均由特列塔收转。他也同阿格利切鲁教授谈妥，并作了精心的“布置”。“万一她来了，不能让她知道实情，您找个托词吧。”心脏病专家要他放心，甚至说这本是医生份内的事。他没有对女儿提退休的事，日子会过得紧张些，不过得让她拿到应有的钱。关于住院的事，他给奇雷斯库太太写信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只住院做做检查，休息休息。他的口气轻松，为的是别吓坏她。奇怪的是，奇雷斯库太太回信劝他安心，说不会告诉安卡的。看来，她没有估计到病情的严重性。

阿格利切鲁早晨不查病房了，改在傍晚来。因为，心脏病专家知道他此时的心情较好，可又难免不为夜间的睡眠提心吊胆。教授有意观察他，经常不固定时间悄悄走进病房。起初，他对教授

的这种突然袭击十分气愤。慢慢地，他却期待这种来访了。教授不大跟别的病人说话。病人的疑心很重，若不怀疑教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意图，那么他倒是一个有趣的对话者。贝尔巴想，“不能总是看书，来个人谈话有助于摆脱痛苦的回忆，至少可以解解闷。”令他反感的是阿格利切鲁爱用转弯抹角的方式，打听他所关心的问题。他开始扯得很远，好像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序言，说来说去，你根本猜不透他想说什么。有天晚上，他说一大堆自认为是必要的闲话后。忽然说：

“我不得不坦率地对你说……”他停顿了一下，仿佛想以此加强谈心的重要性。“您住进来后，我一直仔细观察您。当然，这是责任。可是……”他又停住了，贝尔巴立刻明白，对方决定对他说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医生接着说：“我仔细观察过您，……您知道，我对您的病颇有兴趣。”

“那您发现了什么？”贝尔巴情不自禁地问。

“谈不上什么发现。从治疗角度说，我怕您会失望的，除了上次告诉过您的，我没有更多要说的了。您的病情暂时没有发展。应该说，这就是胜利。我想说的，不是这方面的事。”

“那您想说什么呢？”贝尔巴刚才像孩子一般高兴、吃惊和激动过，此时却大失所望。他到底想让我知道什么事呢？是不是我的病突然好了？医学问题中的奇迹寥寥无几，据说在心脏病方面

几乎不存在奇迹。他暗暗想，阿格利切鲁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不肯轻易吐露心里话。他只知道按自己的意志说话和行事。耐心听他说吧。他瞥了阿格利切鲁一下，对方没有发觉或者故作姿态。

“您瞧，”教授接着说，“我们这儿的人各不相同，我是指人，不是指他们的心脏病。”

贝尔巴听着失望地想，“看来，他要给我上一课了。”

“当然，同病相怜，”教授说，“不过，他们的差别悬殊。您发现没有？”

“当然，当然。”贝尔巴淡淡地表示同意。

“病像一面镜子……迫使你去照它，观察自己，重新发现自己，可以说重新找到自己。你的看法呢？”

“我情愿不去认识自己。”他不高兴地回答说。他已经厌烦了，认为这个医生是瞎扯。

“请原谅我反驳您。”阿格利切鲁打断对方的话说，“您若是允许的话，我想说，事情要复杂得多。您会明白的。对我们的某些病人来说，不可避免要进行自我反省，自我发现和自我认识，那时会引起震动。况且，生病这一事实本身，您知道，也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贝尔巴也是那样吗？回想心脏病猝发时他所感到的震惊和困惑，当时他躺在俱乐部的人造革

沙发上。周围的人惊慌失措，厂医感到无能为力，毫无主见。后来，他听到汽车送他去医院的响声，甚至感到了颠簸和被人送上楼……往后，他和玛拉在医院里第一次见面，她来得较晚，说有案子……不，至少现在他不愿回忆这次会面……至于说到病，心脏病专家说得对，他确实不是心悦诚服地承认生病的。

"我们的许多病人，"教授接着往下说，"很难接受自己成了病人这一事实，尤其是开头的几天。我可以告诉您，最初的几天里十分困难。他们不愿承认生病，也就是说回避现实，不肯面对现实。"

"好吧，我明白了。"他似懂非懂地说。其实，他不明白对方究竟想说些什么，只知道他的话有所指。

"他们要求我治好病，眨眼间就让他们恢复健康，好像我可以把一个新的心脏放进他们的胸腔。唉，不那么简单，巴纳德[1]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做过一些试验，您知道，结果是机体排斥……我们的情况还算不错，竭尽全力，有时也取得一点成绩，不过还无法保证成功。尤其是，请您记住，我们十分需要病人的合作。"教授停顿一下，像是说累了，需要喘一口气。然后，他接下

---

[1] 巴纳德(Barnard Christiaan，1922—)，作第一次人类心脏移植手术的南非外科医师。

去说，“就您来说，我发现情况不一样。您能与我们合作。您和我们进行了合作，尽管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怎么回事？我不明白。”

“这并不复杂，我马上对您讲清楚。您知道，病人一住进我们这儿，马上会产生反感，忧心忡忡，悲观失望。我相信，您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对吗？”

“是的。”贝尔巴承认说。

“我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不要服输，要顶得住。您也许怪我说得轻巧，尽拣好听的话讲。这可不是说漂亮话。”心脏病专家做了个手势，表示排除这种可能性。“问题不在于说，而是还有更严肃的事。”

“是什么？”

阿格利切鲁瞅了他一眼，衡量一下是否值得向对方吐露心里话。随后，他神气活现，嘴角挂着狡黠的微笑。

“哈，关于这个问题嘛，我们以后再谈。目前，我只想告诉您，您住院后，我们一直密切地观察您。这是我作为医生的职责。怎么给您说呢？事实上，当病人陷入绝望，病情没有好转，甚至恶化时，我们医生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小如针孔。”大概他喜欢这个比喻，于是又高兴地重复了一遍。“好啊，您没有坐等我们的帮

助，独自进行了斗争。这很好……”

“您指的是什么？”贝尔巴不解地问。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请原谅，我要重复说，我的责任是监视您。在花园里散步和其它……”

这么说，他如此引以自豪的散步受到了监视和盯梢，毫无疑问也得到了批准。而他却以为……他忽然懊丧起来。他曾幻想，散步是出于自己的本意，是他自己决定和倡议的。结果，这个有点古怪的医生却把它列入自己的治疗方案，成为对付病人悲观失望的方法之一，说不定明后天他会就这件事做一次学术报告，关于心理因素在治疗心脏病中的作用或类似的题目。他们善于为自己的报告取题目。

“您散步时间多了点，”教授说，“可是，我不认为需要进行干涉。您可能走得快了点，不过，这并不一定带来危险。运动，走路有助于心脏的收缩，而且，事实上，您没有过量。”

他说“过量”是什么意思？再多走四五倍路？去竞走？他连想都没有想过，退一万步说，即使他那样做了，院长会干涉，使它付诸东流吗？或者，他只好像不违抗老师训示的小学生，接受阿格利切鲁的忠告。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无形界线。他们会解释说，这是医生的职责。问题的实质不会改变。花园散步带给他的

满足感消失了，跟肥皂泡一样炸飞了。有什么好说的，一进医院就变成了犯人，连他认为的自由行动，也变成法律上所说的受管辖的自由了。

他看了一下心脏病专家。他一直专心听教授说，没有留意他的大鼻子，厚玳瑁边眼镜也没有能把它全部遮住。

“我惹您不高兴了吧?”他想安慰贝尔巴，“我也许没有把话说清楚。事实是，您最初几天表现得相当不错……”他停顿片刻后，支支吾吾说，“从各个角度来说，最初几天特别难熬，往后慢慢会习惯的。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他说完，自己先笑起来。

如果允许的话，他真想数落教授一顿。他没有得到确切具体的消息。教授怎么说的?猜字谜吗?“相当不错”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忍住了。他承认，“说到底，我也像其它病人，希望准确了解真实情况，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信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教授是个谜，但不必大惊小怪……”他想起来，几天前，在花园里遇见一个退休上校的情景。这位上校因为没有天天做心电图大发雷霆。他挥动拳头喊道:“这是很重要的，先生。”上校是个难对付的病人。他不愿，也不想模仿上校。但是，心脏病专家那种神秘作风，不能不令人生气。他默默看着医生。他们仅一米之隔，却觉得相距甯远。说实在话，医生为什么鼓励他?仅只

为了激发他的乐观精神，因为它对一个心脏病人有益处？也可能是个诡计，他赞赏这种设想。因为，他发现阿格利切鲁正眯缝着眼偷看他。他的计策是装睡，当然也可以采用别的办法，比如教授的助手达比扎戴墨镜也是一计。教授坐累了，站起身来活动活动膝关节，然后又坐到床上。

“我必须向您交底，”他边说，边漫不经心地看窗外的树，板栗树已经掉了四分之三的叶子。“您来之前，我就听说过您。我也看地方报，上面登过您的大名，如果没记错的话，中央报也登过您的事迹。您领导的厂，……请原谅，我对电动机一窍不通……”

“我也不懂心脏病学……”

“确实不错……您不曾没完没了地追问我，是好事……有些病人临住院前，狼吞虎咽地看两三本心脏病学专著，有时也读我写的书。唉，不谈这些了。有人要我特别关心您……”

“谁让您这样做的?”贝尔巴莫名其妙地问。

“嗯，要保密……不过，既然我已经说开了，……是县卫生局领导。他不认识您，上面有人向他打了招呼。”教授说到“上面”时，用手指指天花板。假若楼的这一部分不是平房的话，你准会认为他指的是楼上什么人关心住在下面的人的命运。“我不能再多说什么了。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只得到通知说：‘请关心他，这是个特殊病

人。'"

"'特殊病人'是什么意思?"

"唉，他们不过说说而已。"阿格利切鲁试图换话题，"我对您说了这么多，是为了让您宽心，您知道，您没有被人忘掉，很多人惦记着您。"

"好吧，大夫。"贝尔巴兴高采烈地说，"不过，请您告诉我，这全看您的了，跟别人没有关系，外面，就是说医院墙外有人挂牵我，这一事实对我的心脏有好处吗?"

心脏病专家望了他一会儿，答复说：

"您给我出了个难题，"他就像是站在大课堂里讲课一样，说："一个难题，因为，即使我竭尽全力，也无法给予肯定回答。不过，不排除将产生积极影响，我倾向于它对情绪会有积极影响的看法。关键在于，我还不知道会对您有什么作用，请不要对自己丧失信心。"

"您真想了解'情绪'的作用吗，大夫?"他尽力心平气和地说，"这不是把问题扯远了吗?"医生有意干涉他的私生活，不免令他愤慨。"我的'情绪'同您的专业能有那么大的关系吗?"

阿格利切鲁几乎是心灰意冷地瞧了他一眼。他没有立刻回答。他从白大褂儿里面的上衣口袋抽出一块手帕，摘下眼镜，开始认真擦起来。他真的长了个鹰勾鼻。过了一会儿，他把手帕放进口袋，重新将眼镜架在鼻梁上，开始小声说起

来。

“请原谅我，”他说，“看来，您以为我是……突如其来地要打听您的私生活。我明白了，您提醒我超出了职业范围。您赞成笛卡尔关于身躯和灵魂是两个不同实体的理论，它们之间毫无关系。我，作为医生，同意希波克拉底① 有关身体上的病同时也是心灵上的病这一说法。”

“我不懂哲学。”贝尔巴冷冰冰地说。

“显然，”教授没有听进对方的话，只管按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从某一个角度看，您说得对。我们让您住院是为了治您的心脏病。我们将全力以赴。不过，您瞧，二者是不能分的。”

“哪二者？”

阿格利切鲁失望地看了他一眼。

“我很难向您解释清楚，”他说，“看来我得从头说起，尤其是您，对，请不要反驳，似乎怀疑我探问你的私事。我不提问题了。我只希望您想一想我们刚才谈的事，即被我们医生尊称老师的希波克拉底说过的话。请原谅我引用他的话，可能是职业习惯吧，不过这也是最起码的常识，不考虑心灵因素是治不好身体上的疾病的。”

“看来您变成了巫医。”贝尔巴打趣说，开玩笑的后面隐藏着毫不妥协的固执态度。“我既不需要

①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是古希腊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

巫医，也不需要忏悔师。”

阿格利切鲁教授勉强笑笑说：

“唉，我怎么会成为巫医呢？我连起码的道具都没有，比如吓人的面目，您也许在非洲博物馆或电影里见过。我只是个医生。我们谈得太多了，可能打扰了您。我走了，……我还会来看您的。”他又笑笑，贝尔巴觉得非常不自然。他走出病房门，是出了门或者装作出门。他在门口停下来，回过头说：

“至于失眠的问题（他可没提过自己失眠的事），您知道，我有不同看法。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求我给安眠药。可是，一点也不解决问题。这种该死的药会使人上瘾，一吃就离不开它了。一般来说，我们不提倡用安眠药，更要绝对禁止心脏病人用它。”

“教授先生，”他极其严肃地说，“您可以放心，我不会向您要那‘鬼玩意儿’的。”

“那就好。”心脏病专家高兴地说，并做了个再见的手势，如果能够这样理解的话。这一次，他真的走了。

## 三

他从梦中突然惊醒，白天睡觉时常发生这种况。慷慨的“白夫人”愿意的时候，允许他休息

几个小时。时间不长，但相当定时，睡意总是下午袭来。"该几点了？"他问自己，并稍转身伸手摸床头柜上的手表。过去，他睡眠正常时，夜间有生物钟起作用。如果偶然从睡梦中醒来，他可以说出离天亮大致还有多少时间，误差不超过一刻钟。现在，午睡很不踏实，醒后觉得很累，得过几分钟时间才能起床。他失去了生物钟。外面已经黑了，这不足为凭据，因为随着秋天的消退，天黑得愈来愈早了。必须打开台灯，才能看清几点钟，他倒不是嫌开灯麻烦，而是怕灯光驱走黑暗，使他立刻清醒过来，他宁愿眼前的状况再持续一段时间，哪怕几分钟也好。这是舒适的慵散感，能使他从梦境中慢慢摆脱出来。他做梦喝咖啡。疾病对任何病人来说都是可诅咒的，在心脏病发作前，他每天开始工作时都要喝一杯咖啡。他刚才梦见了喝咖啡，并感觉到滚烫的液体香味直往鼻孔钻。他静静地坐在厂长办公室品尝一大杯浓咖啡。不是在家里，他连做梦也避免遇见玛拉。他在家里喝速溶咖啡，她说，这更方便，顷刻即成。她很善于为自己辩解。她讨厌洗盘子和锅，他们雇了一个女工，每周来一两次。有一次，女人很同情地看着他，奇怪他怎么找了个这样的妻子。梦也能体谅他，避开玛拉。他梦见面前摆着咖啡杯，香喷喷的咖啡味扑鼻而来。每天早晨的生产会议之前，他在办公室里先喝上一杯咖啡。

他的思路不自觉地从咖啡转到退休后的几个星期，也许是两个月后，他去工厂的情景。那次造访显然是失策，唯一的安慰是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他是信步走去的。多少年来，他日复一日地来回走这一段路。他住在别墅里时，只要把通向工厂花园的小门打开就行了。后来，在玛拉的坚持下，他们搬到离市中心较近的地方去住，他习惯步行上班，有时一天要往返多次，只有当会议拖到深夜时，他才同意派车送。因此，习惯就是罪魁祸首。他心里并不想进工厂去。他学着拥有富足时间的人的步法，从家里慢慢走出来。他走不惯慢步，总会不知不觉地加快步伐。那天的情形也是这样。他记得很清楚。最初几个星期里，他跟往常一样，一大早就醒了，不再急于上班去。他打开窗户，仰望蔚蓝色的天空，在同一个方形窗框前面，不时飘过几朵白云。他认为早晨的时间最好用来散步，尽管他已经讨厌公园，许多退休者去那儿下棋、玩牌，不知不觉地消磨着时光。因此，他早上不到公园去散步了。他傍晚出去的时候，长椅上挤满了一对对恋人。“安卡也这样跟男孩子去公园里散步吗？”他担心地想过这件事。他不熟悉康斯坦萨，但是，他记得奇雷斯库家所在的伊昂·伯内斯库街附近有一个公园。

他绕过公园，可以朝任何方向走，但为什么偏偏往工厂去？他每走近一步，厂里的大小建筑

就愈清晰入目，他亲自验收了每个车间及行政大楼。那是最后建成的红砖塔楼。他们那时已出了名，得到上级重视，可以毫不拖延地拿到贷款。

“我来这儿干吗?”他走到工厂门口时问自己。现在转回去，未免有些可笑。于是，他走进大门。

“您要干吗？”

瞧，伊利耶老传达不来迎接他了，过去，他每天早晨都问候，“厂长同志您好”。现在，这样的问话让人听起来别扭，什么“干吗”？一个彪形大汉站在他面前，挡住了去路。他在心里问，“尼奇富尔从哪儿物色来这样的人?”这个人穿的制服，“像是夜总会的门卫”，他悠闲地瞅着对方带丝缘的肩章时想。噢，他想起来了，伊利耶早该退休，是他把老工人留下来再干一两年的。尼奇富尔有自己的看法，他讲究“制度化”，雇来这个带丝缘肩章的大汉，活像拳击家或橄榄球运动员。他没有马上回答，门卫警惕地等着，他们有自己的礼节，善于随机应变，大汉意识到不能粗暴，谁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也许是视察工作的，只得耐着性子等。

“您是……？您找谁？”他用殷勤温和的态度重复问。

贝尔巴应该道一声歉，转身就走，或者提个糊涂问题，比如：“这儿不是火柴厂吗?”哼，不错，

门卫准会火冒三丈，"这儿怎么会是火柴厂呢?!"然后，向门卫道歉，退回原路，一切就此结束。可是，事情没有完，他一点不喜欢丝绦肩章，又瞅一眼，大汉似乎沉不住气了，脸色开始变化……他弯下身……就像橄榄球员在比赛时准备冲进人堆……他一定是个橄榄球员。不大工夫，院里来了人，工厂的院子里时常有人走动……

"厂长同志，厂长先生，太令人高兴了！"什么地方传来的声音。有人伸出双手从通往行政大楼的小路上朝他跑过来，嘴里不停地说："多么意外，太出人意料啦！"好啊，现在不仅是意外，而且是"太出人意料"了，这是怎么回事？

贝尔巴认出来人是工长沃伊库。他和茹曼卡一起录用了沃伊库，是茹曼卡录取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茹曼卡到了年龄，他们让了他退休。他是属于年老退休，是有区别的，他对此不能不感慨。

"是贝尔巴厂长同志，"沃伊库对门卫说，"瓦西莱斯库，你明白吗？"

"厂长？什么意思，难道有两个厂长？"瓦西莱斯库皱着眉头思索，好像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请，厂长同志。"沃伊库邀请他进厂去。于是，他犯了第二个错误：接受了他的邀请，同工长一起走进工厂。他听到瓦西莱斯库急忙走进传

达室去打电话的声音。

沃伊库请他进工厂。可是，工长并没有要他到大门口来，也没有强迫他踏进工厂大门。如果他不愿意到公园去看下棋，那完全可以找别的事干。人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他却忽然心血来潮，到他“过去”的工厂门口散步。“工长”——这里都是这样称呼技工——不停地重复说，真是一次意外的愉快相逢，非常令人高兴，也许，他惊慌得想不起别的词儿了。

“我也高兴又见到你，沃伊库同志。”贝尔巴说。“情况怎么样？好吗？”

“是的，是的。”对方赞同地说，眼睛直盯着他。

“老伴、孩子呢？过得好吗？都结实吧？”这些话一出口，他就认为纯是客套话。

“谢谢，都好，厂长同志。”工长说着兴奋起来。“那个小的叫维奥雷尔，我已经把他送进这儿的职业学校，让他将来也留在厂里。”

“你做得对。”他表示赞同，但心里感到别扭。没有他贝尔巴，事情进展得也很顺利，用沃伊库的话说“都好”。工长把孩子送进了厂办学校。过去，报纸上报道过他办学校，培养接班人的事。虽然他已经不担任领导工作了，但一切都顺乎自然地向前发展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不可替代的人。他记得，自己常在会议上用这个

道理教育人。现在，一轮到他自己头上，便认为现实残酷无情。

“您，厂长同志，过得好吗？……我是说，身体怎么样？”看来，工长在发问前犹豫过。他像询问一件机密事，降低了声调。有些人不喜欢别人问起自己的疾病。他们认为不应该，也不能够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甘愿偷偷忍受痛苦。是不是工长也把他看成这种人了？

“哼，我可不会认输。”他苦笑着说。

“那就好，那就对了。”对方赞赏地说。“您知道，厂长同志，请原谅我，那次会……我们非常为您担心……奥尔坦莎同志从医院回来，我们连珠炮似地向她提问题……”

“沃什蒂纳尔·奥尔坦莎同志到医院去过？”他惊讶地问，奥尔坦莎可没有对他提起过。

“去过，厂长同志，去过。不过，她没能见到您。他们对她说，‘不行。他会好的，会回家去的’。回，倒是回来了，我们都知道您出了院，可是‘好不好’？”沃伊库说完耸耸肩。

楼梯上传来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尼奇富尔出现在走廊里，他伸出双臂迎过来。这说明门口的彪形大汉不是白拿工资的。

“您来了？这个意外的见面多么令人高兴！”

贝尔巴会意地笑笑，这使得对方深感不解，他当然不可能弄清楚贝尔巴笑的含义。尼奇富尔

不自觉地使用了工长刚用过的问话。

“是啊，我想念‘我们’的工厂。”这是他的由衷之言。“我想看看你们，不会碍事的，对吗?”

“请，请。”尼奇富尔回答说。直至贝尔巴走出厂门，来到街上时，才想起对方并没有就他说的碍事表示抗争。看来，尼奇富尔不喜欢他这次突然的来访。当然不高兴，有什么好说的，事情明摆着的，尽管新厂长竭力装出好客的样子。

“对，对，我明白。”尼奇富尔表示同意，他想显得自然一些。“走吧。”他想说，至少贝尔巴认为他想说，“上我那儿去。”也就是说到厂长办公室去，但他及时停住了，因为想起那个办公室不久前还是“他的”，而不是尼奇富尔“工程师”的。现在的情况变了。

“我走了，厂长同志。”沃伊库嗫嚅地说着向后退去。

“再见，沃伊库同志。”尼奇富尔握握工长的手，简单招呼了一声。然后，他忙指着通往二楼的梯子说：“请，请。”他们一起上楼，楼梯很窄，他想起这是当初为了压缩预算造成的。有人强调说，“我们造的是工厂，不是宫殿，同志。”那些审批预算的人也说，从一楼到二楼还有其它的楼梯，大家不会挤到一个楼梯上。他们走了几步，尼奇富尔只好让他先行。来这儿肯定是不合适的，他边走边想。他来干什么？尼奇富尔根本不挂牵他，

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位新厂长尽力掩饰自己。是的，一念之差就坏了事……

他从毛毯下伸出手，在黑暗中一下就摸到了台灯的开关。打开灯，幽静的黄色灯光立刻照亮了整个房间。是啊，病房里一切如故，他仍旧躺在病榻上。尼奇富尔这时正在忙什么？也许酣睡着，他不像失眠的人，自己在“外面”时，也不失眠。贝尔巴的来访对尼奇富尔来说不合时宜，不太好接待。几个月过去了，现在可以冷静地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他肯定是犯了个错误，不过，错误能教育人。不是吗？他从厂长的新角度加深了对尼奇富尔的了解。他不认为，可以从这个形象中找到自己过去的影子，但他把这次活动看成是十分有趣的经历，甚至是值得纪念和加以思考的事情。尼奇富尔的性格内秀，不是那种外向型人。他只坐了半个小时左右，从进厂门算至多不过40分钟。在任命尼奇富尔当厂长的问题上，他说了话，而且自认为起了重要作用。他被召到县委去，……在退休前夕，……也就是说给他做了工作后，说是为了他好，为他的健康着想，坦率地说，需要他退休，县委的同志问他：“您看，谁能接替您的工作？”也许，甚至可以断定，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但还是想了解他的看法。尼奇富尔有几张王牌：他是工人出身，随和，会处理人际关系。后来，他想应该多提出几个人。比如，斯

托伊卡……他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修过，聪明机智，似乎比尼奇富尔更爱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不一定是缺点，就他而言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优点。可惜……不知斯托伊卡是怎么回事，法院里有他的案子。他提出离婚，结婚18年了……竟然要离婚？因此，尼奇富尔……

他们上楼时没有交谈。尼奇富尔彬彬有礼地让他先行。他觉得尼奇富尔的目光炙得后脑勺发热。他心里想："尼奇富尔到底在想什么？他一定在琢磨'这个人干什么来了？还用得着他吗？'"尼奇富尔很有自制力，态度和蔼，记得他总是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同斯托伊卡不一样，斯托伊卡有自己的看法，并且敢于坚持……是不是低估了斯托伊卡？支持尼奇富尔就说明对斯托伊卡的估计不足，斯托伊卡向法庭提出离婚……可以断定，他不会走运。可能选择尼奇富尔最恰当。说到底，不是他贝尔巴任命的厂长。他们来到厂长办公室的门口，尼奇富尔淡然一笑，按动门把手，侧身让他进去。韦图丽亚同志上哪儿去了？只见一个姑娘从女秘书韦图丽亚的座位上跳了起来，并用膝盖推上抽屉，一本画报从未关严的抽屉里露出来。这个年青姑娘新做了头发，指甲上涂了油，血红血红的……她在那儿干什么？韦图丽亚上哪儿去了？尼奇富尔穿过女秘书的房间，打开自己的办公室门，说了一声："请！"他弯一弯腰，迫不

及待地解释说：

“是布若雷亚努（部里的局长）的侄女，没有考上大学……想上法文或英文系……我把她要来帮忙处理与外国的来往信件。”

“韦图丽亚呢？她可是个模范女秘书……打字员……打字快得像机枪一样。”贝尔巴皱皱眉头问。

“啊，韦图丽亚嘛，”尼奇富尔满不在乎地回答说，“韦图丽亚吗？我把她调走了，在销售科工作。”他说话的口气表明不值得回答这个问题。

“我怎会看上尼奇富尔呢？”他在寂静的病房里问自己。那个“倒霉”的一天过去好长时间了。他在尼奇富尔的办公室里没有谈什么，但他从另外的角度观察和认识了坐在对面的这个人。他到底看上了尼奇富尔什么？一张橡皮糖似的脸，随时随地都可以露出赞同的笑容。声音如天鹅绒一般柔和，多少年来只会说“您说得对，厂长同志”，或者“正如您所说的，厂长同志”。不错，他是个出色的工程师。可是，电机厂有许多出色的工程师……他有点厌倦地回答对方的提问：身体怎么样？“谢谢，好一些，好多了。”他不喜欢人家问他的身体状况，在这方面他与众不同，大多数病人急切地等着机会发牢骚，详细介绍自己的病情。他明白，坐在对面的那个人对他的心脏跳得正常与否根本不感兴趣。尼奇富尔变了，自命不凡，洋洋

得意，似乎当上厂长发福了。他当然问起工厂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平淡的客套话，显然尼奇富尔把他当成“局外人”，应付几句完事。他贝尔巴居然落到这样的地步，不再属于工厂了。后来，尼奇富尔活像站在讲台上的雄辩家，准备发表演讲，干咳一声说：

“我要感激您。我得知，当时，您的话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停顿一下，因为，他意识到当面对人家说取代了厂长是不合适的。“……当我被任命当厂长时。”

“不是我决定的。”贝尔巴辩解说。“的确，我支持过你，你配得上，当时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尼奇富尔那橡皮糖似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既含着自满，又带着自负。他当时果真认为尼奇富尔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不打扰你了，”贝尔巴从扶手椅里站起来说，“你一定有许多事要办的。”

“对您来说，我随时都有时间。”尼奇富尔反驳道，也从扶手椅里站起来。

他们出了厂长办公室，穿过女秘书的屋子。布若雷亚努小姐坐在打字机前，字键响得很慢，像是初学打字，根本无法同韦图丽亚的机枪速度相比。他们一前一后走下楼，没有说话，俨如两个陌生人。沃伊库传播了消息。他们路过时，有几个办公室打开了门，在新厂长的严峻目光下几个

职员壮着胆走过来同他握手。眼看着来跟他握手的人愈来愈多，他被一张张笑脸包围，他的陪同者悄悄退到一旁，人们冷落他，使他不耐烦。贝尔巴心想："别让他等我。"于是，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群。他那次回工厂唯一愉快的回忆，便是与这群人的会面。

他们快步穿过院子，来到大门口。厂长恢复了常态，做好分手的准备，脸上又浮现出那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女性温柔的笑容。真见鬼，过去怎么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呢？他们走过瓦西莱斯库身边，彪形大汉为给他们让路，把身子紧贴在墙上。他们走出大门，来到街上。还有什么要做的呢？噢，对了，得握握手。他忙握一下陪同者的手。尼奇富尔已经想好短短几句话，不多，使你感到厂长可能是怕贝尔巴再回来，谁知道呢?!尼奇富尔的手软绵绵的，有点湿浸浸，过去他同样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今，任凭你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毫无意义了。他在工厂通向市中心的林荫道上不慌不忙地走着，感到从背后几米的地方射来尼奇富尔探询的目光。贝尔巴那时百分之百地断定，尼奇富尔一直站在工厂门口目送他，生怕他再转回身来。

他承认去工厂是打错了主意，想想那天迈着方步走路，俨然是个悠闲自得的退休者。如果，尼奇富尔真留在门外看着他远去，心里想什么是

不言自明的。他真想往前跑一阵，尽快拉开他和工厂之间的距离。他终于相信，那儿已经不再需要他了。他走进菩提树林，时值6月，空气里飘着菩提花的清香。他没有回过头去，其实，即使从他止步的地方回头望去，只能看到塔形的行政大楼。他记得拆脚手架的前一天晚上，曾经在茹曼卡的陪同下，又一次绕楼慢慢转了一圈。

“嗳，怎么样，约瑟姆?”他问茹曼卡。茹曼卡姓约瑟夫，但按他的巴纳特口音，约瑟夫变成了约瑟姆。

茹曼卡没有立刻回答。他先用眼睛估量大楼，接着抬头仰望八层楼，然后又一层层地往下看，直到底层，宣布说：

“我看不错。”

茹曼卡说得对，不必怀疑。他们从整天人来人往的预制板小棚，进入矗立在菩提树间的大楼，的确迈出了一大步。他径直往前走，林荫路突然拐了弯，工厂留在后面，他什么也看不到了。大约就在离这儿三四十米的地方，有一条街，他常在这条街的转弯处同茹曼卡分手。贝尔巴感到很奇怪，他就住在附近，这些年来竟没有想起去看看他，连他退休后也没有去。茹曼卡退休时，他自言自语地说过，时间过得多快！7年过去了，茹曼卡在干什么？贝尔巴没有见过他。他想了一阵后，记起来当时有人提议搞一次同志式的聚

餐，……谁的主意？是被大家称之为工会“主任”的玛诺莱斯库。她是个热心肠的女人，高个子，她说：“厂长，咱们应该祝贺一下茹曼卡同志。”“好的，玛诺莱斯库同志。”贝尔巴同意了。哪料到不容易说服茹曼卡。他生气地说：“搞化装舞会，我要这干什么？劳务和工资科长杰茹给我办好手续，就成了。”后来，连杰茹也坚持要举行庆祝活动，他才不得不答应。

“你打算干什么，约瑟姆？”贝尔巴有点没话找话地问过他。

“我乡下有座房子，在阿尔梅尼什河边。房子倒没什么，”茹曼卡解释说，“我夏天总到那儿去。哈，我要买一双高腰靴，夏天好去黑德格钓鲑鱼。秋天，我到海尔库兰去治一治腿上的风湿病，山上的水太凉。”

两人不约而同地笑起来，贝尔巴是文质彬彬地小声笑，约瑟姆则是开怀大笑。贝尔巴无法想象茹曼卡手拿钓鱼杆，脚穿高腰靴的样子……

说实在的，那次聚餐完全是玛诺莱斯库的馊主意。她发表了一篇劝告性的演说，他作为厂长，也不得不说两句。老头儿心不在焉地听演说。既然让他退休，茹曼卡当然是老了，对不对？”谢谢你们。”他后来说了这样一句话，便回到桌子中央自己的座位上。显然，聚餐是件蠢事，他们弄来了那么多酒，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

找到酒鬼，若不是他在那儿的话，他们会闹翻天的。他们把茹曼卡置之一边，忘记是来同他碰杯的，当然，大家还是向他齐声欢呼了"长命百岁"。茹曼卡苦笑着，贝尔巴发现他的酒杯虽满，但连一滴酒都没有沾。他不声不响地走了，其余的人根本没有注意，贝尔巴跑到院里追上了他。茹曼卡昂着头，迈着大步径直往前走，像是要甩掉什么东西。"怎么回事，约瑟姆?"他不理解地问。对方仿佛把他当陌生人，古怪地瞪着眼睛看。"我受够了，"他勉强地低声说，"你们都很关心我，谢谢你们，可是我受够了。"他握握他的手，匆匆忙忙走了，消失在傍晚的薄雾中。

## 四

"我不认为太晚。"阿格利切鲁笑着说。他还是那样轻轻地走进病房。"我值班，院长也得值班，至少是我们这儿的规矩。我在走廊里看见门缝下有一缕亮光。我心里想，'工程师先生在干吗?去看看他吧。'我想，您不会见怪的吧?"

他站在门口，似乎想表明他并非愿当不速之客。他背后长方形的白门如闪闪发光的镜子，映照出他矮小的身材轮廓。他面带笑容，深信自己的来访只能是意外发生的快活事。

"您一点也不打扰我。"贝尔巴诚恳地说。天又

黑了，他怕忍受令人讨厌的孤寂。

“真的吗？”对方佯装惊喜地问。他决定离开门口，快步穿过病房，走到他的床前。

“您在看书？”他边问，边自作主张拿起翻开的书。医生有时对病人享有这种特权。医生的食指像书签插到翻开的书中间，合上看书名。“《魔山》①。”他一字一顿地念，脸上泛出阴影。他沉默片刻，看样子是想控制自己不要把话说出来。但是，他失败了，就故意用漫不经心的口气问：“您认为在医院里看这种书最好，对吗？”

“我不知道。”贝尔巴不知所以然地回答。“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看了几页。”

“是本令人心酸的书。这里不宜看这类书。”

“您还管病人看什么书吗？”

教授哈哈大笑起来。他习惯这样笑，笑声酷似用小叉子刮锅底的声音。

“请别生我的气。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没遇到过什么麻烦。看书的人不多，最多看点报，首先是体育报纸，……还有杂志，图片多的杂志受欢迎，读者只看图片和下面的一两行字就足够了。啊，对了，我差一点忘了，还有侦探小说，

---

①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魔山》(Muntele vrăjit，1924)以一个疗养院为中心，描写欧洲许多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疗养院充满病态、垂死的气氛象征着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

简直是消磨时间的工具。我们这儿，您明白。时间过得很慢。侦探小说都是传来传去地看，直传到支离破碎为止。”

“您建议我看这种书？”

阿格利切鲁仿佛听到有趣的笑话，又笑起来。

“我哪能劝您干这种事呢？请不要误会。我只不过认为，读关于疗养院、疾病、甚至死亡的书，会使人感到压抑，意志消沉。”

“您认为我会受影响？”

心脏病专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眼睛扫了一下对方，想确定可否同他交心。他好像对得到的结果颇为满意。平时，他说话十分流利，现在却有点结巴地说：

“不是什么高深的看法，而是一种考虑，就算是……纯属医学的吧。我想谈点这方面的意见。这是本内容消沉的书。”他拿起《魔山》说，“看了这本书会伤心。不好。”

“您认为，一本书能影响，”贝尔巴停顿了一下，想找一个合适的词儿，“一个人的心理平衡吗？”

“正是这样。”教授满意地说，“您说出了我的观点。请记住，我不作美学评论。我不是文学评论家。当然，这是一本好书，是名著。但是，从某个角度说，我不感兴趣。您一个人呆着更易动

感情，思维活动频繁，特别容易产生不愉快的思想活动。我想提请您注意。”

“您以为我那么……容易受感染？”

“也许是。况且作者的有些意见是十分诱惑人的。不是所有的，我承认，只是某些。比如关于时间的看法。”

“关于时间？”贝尔巴吃惊地问。

“是的。他的看法听起来很矛盾或至少很怪，当然这只是小说作者的看法，他认为人无所事事时，时间过得快，并且是不知不觉地消逝。嘿，您说呢？”

“让他到这儿来，到您的医院里来住住，然后，我们再谈。”

“我很高兴您这样看问题，说句笑话……不过，这个思想对您的作家（贝尔巴听了一惊）来说，是书的支柱之一。”

“不是我的。”他反驳说。“其实，我只看了几页。”

“如果您坚持的话，就继续看下去。”阿格利切鲁说。“我重复一句，我可是提醒过您了。请理解我。我没有说这不是好书。我还可以向您透露一个秘密，我喜欢它。我理解它的中心思想是说，疾病是通向认识的途径或阶梯，是一种特定的认识，甚至是一种探索。”

“小说家也生过病？”

“不，说的是他的妻子。我记得，她好像死在瑞士达沃斯的一家肺病疗养院里。那时，结核病还在各地肆虐。小说的情节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你注意到没有？可是，我想作者的妻子是后来，也许是在他写小说之前去世的。我不敢肯定。”

“您很熟悉小说的情节。”贝尔巴惊异地说。

“知道一点。您知道，我也研究过关于疾病有助于认识，一种特殊的自我认识的看法。我休假期间重读了这本书。我去山区休假，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雨。第一次……我真怕您听着厌烦。说来话长。”

“您不会使我厌烦的。如您所说的，疾病是认识的途径或阶梯的想法，是可取的。不管怎么说，疾病迫使你按某种方式进行自我反思。我住院后，也有类似的体会。您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看这本书的？”

“说来话长。要是您说，我不会使您厌烦的话……”他沉默片刻，犹豫不决。“好吧……”他下了决心。“反正有的是时间……那是1939年8月末。那年的夏天很热。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样的。”

“很可能，我记不得了。那时我正在念初中，穿短裤。”

“啊，对了。”阿格利切鲁好像没有听到对方

的话，呆愣地说："当时，我还年轻，是大学的青年助教。不是在这儿，在雅西，我是后来到这儿来的。我应邀参加了一次心脏病学代表大会。确切地说，不是我，是教研室、教授接到了去德国的邀请。可是，教授不喜欢纳粹分子，不愿去，就派我去出席会议。那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我是第一次出国。到汉堡去的路途遥远，得乘火车，那时不像现在，坐上飞机，一两个小时便到目的地。"他停了下来，可能是回忆自己久已逝去的青春。他从口袋里摸出手帕，全神贯注地擦眼镜。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一种策略，也可能是为了集中一下思想。

"我在德国买了这本书。"他又开始叙述。"就在汉堡。我说过，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939年8月的最后几天。汉堡城位于北部，濒临大海，我原以为会凉快点，去后才知道闷热得很，犹如我国的巴拉干辽阔平原，暴风雨来临之前又闷又热。一种危险在天空游荡。我没有立刻意识到，那不仅仅是天热的缘故。我们在大会上只关心自己的事……学术报告。我没有发觉，至少在汉堡没发觉有人正策划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不过，还是回头来谈读书的事吧。"他笑着说，仿佛为离题而表示歉意。"我是在相当奇怪的情况下买这本书的。事先不知道作者的这本书在德国被列为禁书。我在旧书店

里找到了它。我不熟悉这个城市，陪我去的是兼作导游的德国同事。后来，我才觉得奇怪，他和旧书店老板怎么会那样信任我。也许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大会一结束就会离开该城。我和那个临时导游保持着通信关系，当然谈的都是专业问题。开战一年多，我接到他从巴黎寄来的印有凯旋门的明信片，往后就音讯杳无了。他从巴黎寄来的明信片盖着德国的军邮戳，说不定已经阵亡，或者他在汉堡找到了归宿，因为同盟军曾把这个城市夷为废墟。"

他又停顿了一会儿，眼睛失神地凝视着远方。"我还没有告诉您是如何买到这本书的。旧书店设在一条狭窄的小街上，街面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已经过去多年了……"他苦笑着说，"您知道，记忆像一面镜子，随着岁月的流逝，被蒙上一层薄雾。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街道弯弯曲曲，年久失修，路面坑坑洼洼。旧书店位于汉堡老城。现在，战后，经过轰炸，您明白?"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情况早变了。我去过的那条街是下坡路。旧书店就在街的拐角。离它不远有一条发黄的脏水河，可能是通往易北河去的运河。关于书店，我记不大清楚了。"他想了想说，"像个黑魆魆的地窖，窗子很小，到处是灰尘。书店门上有个小铃。我记得很清楚，铃铛能发出欢快的音乐声，呼喊你跨进店门去。书的价钱不便宜。书店老板

解释说，‘这书不是当地出的，是荷兰的版本’。不管怎么说，托马斯·曼的小说还没有罗马尼亚文译本，于是我就买了一本作为出席大会的纪念。老板转弯抹角地让我明白，《魔山》是禁书，尽管我看完后，仍然弄不懂为什么要禁止它。托马斯·曼离开德国流亡到国外，后来宣布同纳粹主义不共戴天。我想，这可能是原因。老板用红皱纹纸把书包起来……真怪，先生，”阿格利切鲁对贝尔巴说，“我怎么把细节记得那么清楚?!”

贝尔巴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是第二天到柏林时才觉察到要出事的。柏林城像高压下的锅炉，随时会爆炸，崩上天。我只给您举一个例子。我看见一连士兵排着整齐队伍走过两旁栽满椴树的大街。好吧，您会问我（他的对话者根本没有提问），队伍怎么开到市中心来了？迷路了？不是，哪能呢，他们的‘使命’是来给群众的好战狂火上加油。这帮人（贝尔巴知道他指的是纳粹分子）擅长作鼓动宣传，当然是他们的沙文主义、复仇主义的宣传。”心脏病专家接着说，“我走出旅馆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坐的是夜车，快到午夜才开车。我没有买到卧铺票，因此只好进行一次疲劳的长途旅行。我去年又去了柏林，也是去参加代表大会的。战争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尽管战争结束快30年了。”他婆婆妈妈地说个没完，连自己都给忘了。“这就是

说，去年，我去过一趟柏林。您在听吗？”他停下来问贝尔巴，如同教师检查学生是否在听课。被问的人只是略微点了一下头。

“好吧。”阿格利切鲁满意地说，“我找到了原先住过的索非亚旅馆，是保加利亚人开的，供应保加利亚菜，有酸菜汤，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他慢吞吞地开始了另一段叙述。“我无意中碰见，我们的导游，他带我们去布莱希特剧院观看柏林歌舞团的演出，然后，到稍远的一条街上去参观多若特公墓，我们是坐小面包车去的，回来时，我想活动活动麻木的脚，便独自步行。实际上是我不愿同别人挤在一辆车里。您知道这个多若特是谁吗，先生？”贝尔巴本来听得很费力，这一问更使他张口结舌，无从回答。“公墓吗？对，相当有意思。”心脏病专家接着说，“一块大石板，跟乡下一样，尽绊你的脚。只有一块大石板。如此而已。石板上用白漆写着贝托尔特·布莱希特[①]的名字。没有栏杆，没有墓穴，什么都没有。我想是剧作家要这样……以便同大地母亲融为一体。对了，布莱希特的墓位于较偏僻的林荫小道旁，挨近墙，仿佛是为了有个遮靠……我离开了大家，心想何必听导游叨唠？他凭这份差事生活，

---

①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ptold Brecht，1898—1956）德国戏剧家和戏剧改革家。著名作品有《高加索灰阑记》和《伽利略传》。

无非是履行职责罢了。因此，我没有听他介绍布莱希特，沿着小路走，找到了黑格尔和费希特[1]两位哲学家的墓，他们并排安息，显然他们生前购买墓地时商量好的。当然，他们的夫人也长眠在那儿。”

“嗨，这是另一码事，我走了题。”他说着拍了一下脑袋，乡下女人常有那种动作。“我不是想说这些，而是1939年发生的一件事。请原谅……队伍排成密集的队形前进，他们就喜欢这样……这是心理学问题，密集的人群意味着力量，不可战胜的力量，当时，他们至少是这样认为的。我是在菲德利希大街和两旁是椴树的大街的交叉口看到它的。许多人站在人行道上看。街道很宽，不像汉堡的小胡同。围观者多数是妇女，您了解，她们终日游手好闲，使大男子主义者深感头痛。德国娘儿们的腿粗，包括年青女人在内几乎都穿平跟鞋。在全柏林城，先生（他可真能记细节），我没有看到一个细脚脖子的女人。好了，我不是专门对您介绍女人的腿的。先生，她们都是肥膨膨、胖乎乎的。您记得那个胖子戈林吗？作为第三帝国的元帅，戈林威严好战地断然告诫她们：要大炮不要黄油。胖子操纵着“空中武器”，他们

[1] 费希特（Fichte yohan Gottlie B，1762—1814）德国哲学家。先验唯心主义的第一位主要代表人物。

都这样称呼空军。他的飞行员扔下的炸弹，只几天就把华沙炸平了。哎，可是在8月底的那个炎热的下午，两旁栽满椴树的大街还是一片升平景象，人们正尽情观看队列。我挤在前面。刚好乐队过来了，走在队前的指挥着魔似地舞动着带丝绦的长棒。他们吹着铜号，恰巧走到我的面前时停下休息。我听见一个男子的嘶哑喊声，肯定是喝多了啤酒的缘故，只有啤酒会使人的嗓子发哑，葡萄酒是不会的……尼采说过，啤酒使人沦为畜牲。我想，尼采是他们的人，他懂。是的，我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人，可能是队伍中的一个人，连着大声喊了两次：'打倒凡尔赛'。我惊呆了。凡尔赛怎么能打倒呢？酒鬼的喊声一落地，为他喝彩的掌声骤起。我终于弄明白，这个人攻击的是凡尔赛和平条约。军乐队走过去后，出现了一段空缺。我刚看见一个旗手，就被人挤到了一边。我回过身来一看，原来是个穿制服的年青姑娘的热乎乎的臀部紧贴着我。接着，又有好几个穿制服的姑娘挤到她身边。这群姑娘是希特勒青年组织的成员，她们用胳膊肘和臀部左右开弓才挤了进来，其余的人让着她们，据说那儿的习惯是让青年人站在前列。我刚才说到旗手……您知道，在军乐队的后面，有6名军人，3人一排，其中举卐旗的健壮小伙子，看来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姑娘们一看见他，便伸出手行礼，您知道，希特勒

的举手礼是右手斜着高高举起。小伙子立刻稍压低旗帜，以示还礼。这个场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小伙子很高，长得壮实，按我们的说法像一棵挺拔的松树。他举起旗帜时，飘带迎风飞舞，仿佛连55旗也是自动向前游动。他从老旗手那儿学来了这一技巧，或者是自己常举旗，慢慢琢磨出来的。姑娘们也看出了这套把戏，她们放下手，鼓起掌来。他俨如一只骄傲的孔雀继续前进。酒鬼的嘶哑喊声又响了：'向华沙进军！'当时，我真懵了，不懂围观的人为什么要鼓掌。他们究竟想干什么？还要华沙？我知道，有关方面正就但泽问题进行谈判，他们为了跟东普鲁士联系，要一条'走廊'，即领土范围外的通道，可是，华沙呢？我们在大会上只谈学术问题，事实上……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看报了。闷热的汉堡城使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读报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晚上，火车开动之前，我才了解到真相。我从车站报亭买到了报纸。您知道，他们有好多个车站（贝尔巴点头表示明白。他了解柏林，至少是今日的柏林，也就是东边的部分），是吗？"心脏病专家高兴地说，"这么说，您了解情况。我是从菲德利希大街附近的车站走的，那儿离我住的旅馆仅一箭之地。从车窗便可望见我住的房间的窗户。我买了纳粹党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头版上用特大号铅字排印的通栏标题立即映入眼

帘，我记得大约是这样：《第三帝国不会容忍波兰的罪行不受惩罚》。什么罪行？波兰人没事干了？简直是耸人听闻的新闻。”阿格利切鲁叹口气说，“有什么好说的，完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们的报上说，波兰突击队袭击了德国的一个无线电台，双方发生了冲突，造成死亡，穿军装的波兰人……猛一看是他们受到了进攻，但一切说法都十分荒诞。波兰人没事干了？他们说得有根有据。还有什么可说的？哦，对了，几年前，我看过民主德国的一部电影，它尽力想再现当时的情景，揭露事实的真相。什么袭击，先生？完全是骗局，只不过是规模大的骗局罢了。一次戏剧性的演习。他们让死刑犯人穿上波兰军装，并发了枪，夜间用密封卡车把他们送到电台附近。他们对这帮人说：‘瞧见了吧，天亮前拿下它，你们就能自由。休想溜走。我们监视着你们，想逃跑，一个也活不了。’他们又给犯人们灌了酒，推他们上前去，囚犯就演出了这出戏。当然，事后没有一个犯人得到自由，全部被处决。他们完成了使命，应该带着秘密进坟墓。总而言之，罪恶的手制造了这出戏，他们朝思暮想地找借口，终于得手了……国际法称之为正当理由。您明白吗？”

“是的。”贝尔巴简短回答道，教授的叙述已经引起他的兴趣。

“对，先生，”教授停止叙述，喘一口气，又接

着说,"战争竟然是这样开始的。一个骗局，弥天大谎。我坐在火车里，怎么给您讲呢?…… 我上了当。我那时忐忑不安地想,'瞧瞧，先生，波兰人在干些什么!想做什么?为什么要惹德国人?'当火车轰轰隆隆地开动时，我才醒悟到长途旅行开始了。我们的车常停在小站的支线上，国际列车得给其它车让路。我很快发现一晃而过的都是军车。车上的青年用沙哑的声音高唱希特勒进行曲。我想，他们准领到了酒，因为发酒是一般的做法。当车驶近边境时，一个胖胖的老列车员拉上了窗帘。他大概快退休了。他弯腰扣窗帘环时，我瞅见他那公牛脖子般的肥后脑勺上的肉堆在制服领子外面。我心里想,'这家伙等不到退休,中风或心脏病将会要他的命。'也许,我估计错了,说不定他已经死于狂轰乱炸之中，您知道，美国人一参战，车站和编组场最先遭到轰炸。如果他命大,那就会活下来。"他停顿片刻,回忆着往事。他的脸色豁然开朗。"来到边境,他们没有让我们久等,几乎没有验关，可能想快点摆脱我们。我们能带什么?他们忙于搜查其他人。火车突然启动，老头费了很大劲才拉上的窗帘被震开了，窗帘飘了起来。透过黎明前奶油色的晨雾，自然景色尽收眼底。我坐在车窗前,看见列车超过一辆平板货车,上面装载着装甲车。一个金黄色头发的男人坐在装甲车里，我不相信他是日耳曼人，他的目光同

我相遇，对我笑笑，如果我打开玻璃窗，他会祝我“早安”的。德国人彬彬有礼，先生，至少我在汉堡遇见的人是这样。”

“火车出了德国的国境后放慢了速度，我们到达波兰的边境站。边防人员仔细翻看了我们的护照，看来他们已经觉察到什么，接到了来自华沙有关加强检查的指示。行李呢？可给我们带来了麻烦，他们要一件件地查。他们在我的箱子里翻出了小说。我想，波兰人听到了风声，正防止奸细、破坏分子和第5纵队的人入境。因为，在敌对行动开始前，双方可以利用火车，让自己的人混杂在普通旅客中过境。这种假设看来有一定道理，可是同我的小说有何相干？海关官员把书放在手中，瞪大眼睛细心地瞧来瞧去，如同对待即将拆除雷管的地雷一样。后来，他打开书，一看到德国文字就冒火。他翻来覆去地看，过了一会儿，才用蹩脚的德语问我，看得出来，他厌恶地从牙缝挤出来话。

“这是什么？”

“一本小说或类似的东西。”我回答说，表面上尽力保持镇静，心里却七上八下。我想，真不走运，从德国买一本书，看来得留在波兰的边境火车站了。

“他不满意我的回答，又要去我的护照，转身离去。我的心里直犯嘀咕，可别把我留下。战争

快开始了，德国人会进攻车站的。他带来一个上尉，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海关官员认为靠他能解决问题。军官十分有礼貌。”

“‘书里讲的是什么?’他微笑着问我。我给他指指书。‘啊，托马斯·曼，有意思。您在德国买的?’我不悦地点点头。军官说：“‘祝贺您。啊，当然是荷兰出版，只能是这样。作家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出书。有禁令，不准托马斯·曼在自己的祖国出书。他的公民资格也被取消了。”我当时心想，瞧，我从什么地方了解到小说家的生平。对我来说，关键是领回了书。军官对海关官员小声说了几句话，后者的脸色顿时开朗，并亲自把书放回我的箱子。军官抱歉地说：‘我们不得不谨慎。’他说完这句话，用戴手套的手指指我们身后看不见的边境线，然后行了个礼，就走了。随即，火车开动，它像一条虫在柏林和华沙之间的带有沼泽地的凄惨平原上爬行。当我们在一个车站停留时，我又想起那个上尉。几节车厢停在我们旁边的轨道上，只见一队骑兵正上车。”

“骑兵?”贝尔巴不相信地问。

“是的，先生，波兰人仍在用这一兵种。骑兵曾经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就是那样，但在作战技术上落后了。马被一匹匹拉上车，它们从一块窄木板上慢慢走过去。看上去全是良种马，喂养得膘肥体壮。我想起我们国家检阅的情景，骑兵一

过来，乐队便奏起《骑兵进行曲》，骑兵的刺枪用小旗装饰着。敌对行动开始后，波兰人用骑兵攻击德国的装甲车。这大概是历史上记载的最后一次冲锋。当德国坦克手从瞭望孔里往外看时，他们简直无法相信……骑兵冲锋？他们嗜杀成瘾，甚至编出一句成语：战争就是战争。这句成语很有说服力，不是吗……它像是一张许可证，准许你成为刽子手。好，杀人吧……可是，畜牲呢？马呢？当马队趋近时，第一个射击者的手扣动枪拴时可能会颤抖。后来就铁了心，放开手，肆无忌惮地干起来。那会是什么样子？被机枪子弹射穿肚子的马狂叫？还是拉着已死的骑手奔跑，直至碰到土堆，骑手的脚从马蹬脱出来？难道上百匹马被重机枪子弹击中，也不约而同地齐鸣吗？有些子弹的射程远，如果射中……我想到了我的上尉，但愿他不是骑兵队的。可惜，我忘看他肩章的颜色。”心脏病专家的叙述骤然终止，在贝尔巴欲言而又未来得及说话之前，便匆匆冲出了病房。

# 第六章

## 一

黎明前，月台上人烟稀少。他对车站的情况了如指掌，故乡的车站能是别的样子吗？晨雾笼罩下的月台呈暗黄色，你会认为用小方块砌成的地面没有尽头。这是一个重要车站的长月台。从前老早的时候，也就是孩提时代，父亲曾告诉他，每天从这儿通过的列车比布加勒斯特主车站还要多。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青年人喜欢把童年说成比任何年龄都遥远。在大轰炸前，车站的建筑颇为宏伟。如今，东一块，西一块，到处是粗糙修补的痕迹，使它变得丑陋不堪。他走在空旷的月台上，发出"噔噔"的脚步声，老远就能听到。隔一段距离有一盏光线昏暗的灯，微弱的黄光正徒劳地努力穿透姗姗来迟的秋季黎明前的黑暗。

他估计错了。月台上并不只他一人。从支撑着大顶棚的铁柱子后面，传来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他们说话爱动肝火，他心里想，不会是从乡下来的农民，他们往往赶在火车进站前几小时来等车。他先听见沙哑的声音说：

"听我说，要是安德莱的竞技状态正常的话，至少能进4个球……"

"是啊，可是彼特里卡……在球门口丢了，你还能说什么？"另一个人用尖细的嗓音说话。

"这我同意。不过，别以为他真抓不住，是故意丢的。要是他愿意的话，什么样的球也逃不掉。"沙哑的低音说。

他们一听到脚步声就不吭声了。他心里想，"得避开他们。"他想往左边走一走，不料在黑暗中碰到箱子。看来那两个人占了好地方，正坐在长凳上等车。他决定快绕过去。但是，有个东西横在前面，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双伸直的腿。他被绊了一下，打个趔趄，好不容易才站稳。"为什么碰我的腿，先生？"男低音说，粗狂的笑声中多少含有不满。显然是存心用腿绊人，由于他小心谨慎，才没有倒下，男低音的小动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男低音气急败坏，恶狠狠地骂起来，骂一阵子，歇一会儿，反反复复，直到后来又重新谈论足球为止。

他快步离开那儿，来到调度室门前，灯光从敞开的窗子里射出来。调度室内有个扳道工，他刚刚起床，睡眼惺忪。从他六神无主的神色看，可以断定快到下班时间了。扳道工走到门口，厌烦地、冷冰冰地瞥了他一眼。此时此刻，这个人也许正在想着家里温暖的床。但是，他还得忍耐，

等待头班电车的到来。他可能住在离这儿不远的栈桥处，那儿是铁路员工的住宅区。他一刻钟前离开的地方就在附近。他从那个困得眨巴着眼皮，并幻想回家睡甜蜜觉的扳道工身边走开，径直走到站房的尽头——至少是原来站房墙壁的顶头，那一带落过炸弹，把墙壁炸开了一个口。“那是第二次轰炸，美国飞机干的。”他边想，边看那个洞，木板墙取代了原来的墙壁，更确切地说是补好了原来的墙，看上去创痍满目，令人不快。机车停在车站一头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当年，他的视力好，一眼就能看出他将乘坐的列车停在第一股道上。他走过几节车厢，随意停在第四节车厢门口。他健步登上车，这与他从小就在编组场爬车玩不无关系。

如果记忆能像一串珠子或者一团线，抛下线团，它就依顺序展开……线团松完之后，你再从反方向缠绕，那么你记忆中的往事便能一件不少地按原先的顺序呈现出来。你只要让它慢慢地，慢慢地转动，往事如同相片按照年月确切地重现。当然，你不能焦急，不要让棉线团或毛线团滚得太快。你若是性急的话，线团从手中掉下，那就前功尽弃，乱成一团，找不到头绪，你什么也记不准了。记忆很奇怪，它不像线团聚在一起，倒像大河的无数支流往前奔腾不息。更形象地说，它犹如受干扰的电视图像，迅速翻滚，根本看不

清是什么。屏幕上不时出现重叠的线条，好似完全被遗忘的往事。你若想让事情进展顺利，就得慢慢滚线团，并且要有间歇时间。同样，电视机的问题并不严重。你把它送去修理也无济于事。若是你想看慢镜头和特写镜头，那就要调好图像。其实，不管你把线团抓得多么紧，它最终还是会像水银从手中滑掉。

他决定照上面说的办法去做。反正，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没有值得着急的事。迄今，他缺少的正是时间，现在绰绰有余。不可避免会忘掉些事情，那也无妨。他清楚地记起车站的月台和停在第一股道上的列车黑影。他把走进车厢后的情景淡忘了。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象，是上车时手触到右边的金属扶手时的湿乎乎的冰冷感觉。这里有时间的因素，时间使他跟自己疏远了，或者说是疏远了当年的他：工学院的年轻毕业生第一次接受分配，正前往工作岗位。是的，他保存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当年照的，但为数不多，因为他历来不喜欢照相。如果说他有一大堆相片呢？也帮不了多大的忙。他与那个笑眯眯的、头发蓬乱的青年有何共同之处？笑容？那是聪明的照相师要他装出来的，说是都兴那样照，并且给他照了好几张，尽管工厂发的身份证上只贴一张，照相师自作主张为他多拍照，这也是赚钱的窍门。如今，他的头发灰白，稀稀拉拉，几乎看不出卷发了。

母亲曾经骄傲地笑着对他说："你的头发多好看。"还有眼睛……青年人满怀信心展望未来，一个尚难实现的未来，他怎么知道以后的事情呢？相片上的他瞳孔大，眼睛炯炯有神，也许原来不是这个样子，是照相师修饰成的。照相师夸口说是一张"艺术相片"，大概是为了多收钱。后来，他送给母亲一张相片，她把它挂在镜子上面，每天早晨梳头时，都要看上两眼，也许不只是早上看。他从照相馆里出来时很不满意，他对照相师说是办身份证用的，怎么还没有说清楚？"好办，马上就成。"照相师对他说。他确实是立等就拿到了。

他记得很清楚，这段往事是在他接到分配通知后发生的，可是记忆作祟，他记不起第一次到工业城市去的路上的情景了。他只记得上车时右手摸到冰冷的扶手，他上的是普通车厢，没有隔成单间，他随意坐到一条长凳上，记不准是面对列车前进的方向，还是逆方向；是坐在车厢中间，还是坐在两头。他像做梦似地回忆，也许是坐在车厢的中段。他听见黑暗中有两个人压低了嗓门，平心静气地谈着话。乡下人往往是小声说话，他们在叙家常，谈论年成，也许还议论乡间的种种传闻，听不清他们到底谈什么。火车过栈桥时，他往窗外瞥了一眼。黎明时，他才发现窗玻璃肮脏得很。他知道编组场的那段墙上有个缺口，从他记事时起就是那个样子，因为缺口不太大，所

以没有人去修补它。虽然缺口小，但是他们小时候就从那儿钻进去，爬上静静停在编组场的货车厢里玩。严格说，墙上的那个缺口算不上是洞，只不过是一道裂缝，正对他家的大门，火车快速驶过时，他能看到一道亮光闪过。他与母亲商量好，要等火车过后再熄灯，好像是向它表示告别，随后才安然入睡。

“不错，就是那么一回事。”他躺在床上凝望着窗外的板栗树枝，快慰地自言自语说。暮色苍茫，树枝被今年的头一场雪压弯了。时值11月中旬，比往年下雪早，下得时间长，鹅毛大雪从早下到晚。天黑前，他一直兴致勃勃地看着纷纷扬扬的雪花，一片接一片，这样的雪景他已经好久没有观赏过了。他想找与它相似的另一场雪景作比较。有一次，不是下这样的雪，就时间来说，是一场初春时的晚雪。那时，他和茹曼卡都呆在预制板搭起的小厂房里，机器轰隆隆响，震耳欲聋。他们已经招收了第一批工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电机厂的骨干。那一场雪无法同眼前的相比，想到它可能与人事科长有关。为什么想茹曼卡？茹曼卡退休后几个星期，他差不多把他忘了，现在又忽然想起他那略带愁容的面孔和由于驼背而前倾的双肩。“我怎么没有关心关心他？只派了一个人去看了看。”他这样责问自己。派去的人当天回来汇报说，“他已经不在城里了，好像是回阿尔梅尼

什河附近的老家去了。"那个人的口气冷漠，但又为自己迅速完成任务而得意。他听之任之，没有再追问。唉，如果茹曼卡在城里就好了，他会派护士伊丽娜或特列塔去找他来，问问他，"喂，茹曼卡，你说说看，怎么让我也退休了？"他们二人可以尽情地回忆往事……

一想起以前的人事科长，他就感到这是个危险的领域，随时会产生麻烦。说记忆是稳稳当当朝一个方向滚动的线团，只是一种比拟，并不是事实。它不驯服，经常随心所欲地停留在某一件事上。他和工程师霍尔兹维格到瑞士的苏黎世去出了一趟差。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结了婚，安卡已经出生，他被提升成厂里最年轻的车间主任。维奥丽卡在世，那时的一切似乎都属于另一个世界。她们送他到车站，春天的暖风拂面。火车开动了，维奥丽卡把小女儿举起来向他告别，同时唤道："给她买个洋娃娃，别忘了，好看的娃娃。"火车依依不舍地离开月台。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维奥丽卡高举着小女儿，安卡严肃地把手慢慢放到嘴唇边。火车拐弯后，月台和那儿的一切才统统从眼中消失。到了布加勒斯特，工厂代表处的职员去车站迎接，并给他们飞机票。于是，他们直接前往巴尼亚萨机场，当时还没有奥托佩尼机场。到了苏黎世，他记得像做梦似地第一次看到国际机场的繁华景象。一贯保持镇静的

霍尔兹维格也沉不住气了。他们走进人声喧哗的候机室，听到扩音器里呼叫："霍尔兹维格先生和贝尔巴先生。"他们听见喊声后松了一口气。朱尔策的人告诉他们，有人在3号出口处等候他们。其实，来接他们的不是代表团，只有一个人，并且不是男的，是个女性。"凯欣。"她笑着介绍自己的名字，没有说姓什么。她要求先生们跟她走，说汽车停在前面。凯欣小姐的穿着庄重，好像上身穿一件短外套。她在汽车里介绍说，自己在接待处工作。她说话时主动笑了笑，但是笑得拘谨，大概怕破坏脸相。她的脸上涂了一层薄粉，看上去有瓷器的质感。他们住在苏黎世的日耳曼人聚居区，中午是日耳曼人神圣的午餐时间。他们有一个半小时的更衣和就餐时间，她在下面的餐厅里等候，然后，带他们到朱尔策去。他注意到，这里的人十分珍惜时间。他们果真来到精确计时的国家。

他们是4月中到达苏黎世，5月初离开的。在那些日子里，春雨绵绵，小雨滴如珠子挂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人们穿雨衣，打雨伞，在雨中来来往往，显得庄严肃穆，高不可攀。他们到处可以看到报时的大钟。是的，无数的广告反复出现在脑海里：多夏、欧米加、浪琴等著名手表厂，布劳恩—波伐利和朱尔策精密电动机厂。朱尔策公司的厂在城外。"这里的空气清新。"面带笑容的

凯欣小姐对他们这样解释。瑞士人考虑事情可谓周到。临行前夕，他们应邀出席了一次酒会，小型的招待会，喝了低度葡萄酒。同向导一起出席酒会的，还有销售经理，可惜记不得他的名字了，甚至忘了他的相貌，只记得是个中年胖子。他们看过一次演出，最后的节目是一个胖姑娘在大提琴的低音伴奏下慢慢脱衣服。各种颜色的灯光变幻不定，渐渐暗淡。当她一点点脱到最后一层衣服时，灯光只剩下了模糊的白点。观众席上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看来羞怯的瑞士城里人不大欣赏这种节目。

他清楚记得给安卡买洋娃娃的经过。离开苏黎世的那天上午，他去一家超级市场找到了洋娃娃。“是纽伦堡来的。”售货员向他介绍说。她是个年青的金发姑娘，用画笔描了眼皮，当然脸上擦了粉，只是化装得不如凯欣小姐艺术。他笑笑表示赞同。他当时不知道巴伐利亚的这个城市是世界玩具的首府。洋娃娃的头发也是金黄色，蓝色的大眼睛会闪动，精心编成的小辫子披在肩上，身穿巴伐利亚服装。他回到家里，安卡一看见它，就高兴得拍起小巴掌，马上给它取名叫利斯尔。它的确同斯拉霍特卡太太的女儿相像。这就是他记忆中的瑞士之行。当他们乘飞机飞越阿尔卑斯山回国时，已经是受过培训的人了，工厂可以凭朱尔策的优待证生产第一批国产电机车。

其实，这一切都是在他们去瑞士之前，在厂长德拉戈什办公室里研究、计划和安排好了的，有如一次作战方案。德拉戈什怎么样了？他吃惊地在心里问，竟然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想到过他的老厂长。他早已经退了休，这是毫无疑问的，也许过世了，如果还活着，也成了老头儿。那天下午，把他们叫到他那里去时，他就已经不年轻了。工厂发展成联合企业，厂长的任务增加了，每天穷于应付。他的肩膀上经常像压着重担子，使他驼了背。他还能准确记得那间宽敞的办公室。春天暖洋洋的太阳从开着的窗子射进室内，德拉戈什一根接一根抽烟，开窗是为了让烟味出去。办公室里有两张皮扶手椅，是从以前的老板那儿接收过来的。他严峻地审视着他们，似乎他们做了什么错事，来听候处分的。后来，他终于打破沉默说，"好了，就这么定，你们到苏黎世去，我已经买了专利。"用不着告诉他们谈判购买的是什么专利。工厂生产的第一台机车陈列在联合企业的大厅里。当初，人们把它放在牛车上，送到多瑙河，再船运到维也纳参加展览，连皇帝也参观过。如今，他们又肩负起制造第一台电机车的任务。德拉戈什告诫他们说，"要用心，别错过机会，把本领学到手。"谈判困难得很，拖延了很长时间，朱尔策的人善于做买卖，也许他们生来就有这种本领。"真他娘的！"厂长这样惊叹过。他对瑞士人的

犟驴劲儿和韧性是既讨厌，又暗中佩服。他紧锁双眉，陷入沉思，后来，他的愁容逐渐消散，一丝笑意掩盖了疲倦，他骤然间显得容光焕发了。“别吃闲饭。专利可是花大钱买来的。机灵一点，把技术偷到手。”他在言谈话语中总会不自觉地透露出老观念，即技术只能“偷来”，而不是学来的。也难怪，他原先是这个工厂的学徒，亲身体会到学艺不容易。尤其是那些工长和老炼钢工，害怕青年人抢他们的饭碗，因为钢铁工业一发生危机，老板总拿他们开刀。

德拉戈什不知不觉想起了那个年代，瑞士人不也是资本家。尽管他们卖了专利，但可能留一手，要滑头。估计事情不至于那样糟，不过，他，德拉戈什还是要提醒他们注意。其实，他们不必“偷”，朱尔策公司的人是诚实的商人，准备了大量资料，他们讨价还价不含糊，但不耍滑，严格按条款办事。德拉戈什不说话了，他没有什么可言的。他机械地用手拢一下头发。他曾经有一头乌黑的卷发，那时，双鬓开始发白。他若有所思地说：“他们有点冷冰冰的”。他作为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去过苏黎世。他重复说：“有点冷冰冰的。不过，你们不用考虑他们的脾气。我可是非常讨厌那种性格。天一黑，街上静悄悄无行人，都回家看电视了。”罗马尼亚那时还没有电视。他也许像瑞士人一样度过夜晚的，一个人呆在旅馆里

看电视。“是啊，”他又想起一个新话题，“你们不是去那儿找蓝眼睛的心上人，是去学造各种各样的电机车。他们是这方面的行家，精得很。”他的话既含有暗暗的妒忌，同时也钦佩那种完美的工作。他接着说：“精得很。不过，我们也不能自卑。明后天，在铁轨上跑的将不再是这种破烂货（他用手指指陈列馆，那里停放着100年前替换下来的机车），而是内燃机车和电机车。”

他又不吭声了。但是，他的脸色开朗，仿佛正憧憬着未来，渐渐地，他的脸上出现了古怪的笑容，这对一个严肃的人，尤其是德拉戈什这样的人来说，很不相称。他犹如一个顽童，忍不住为自己的淘气发笑。“就说这些吧。”他乐滋滋地说，“我们喝些什么呢？”他扫视他们一眼，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他的身体很胖，但动作敏捷，可以说还相当优美。他穿过房间，走到门口放保险柜的地方，过去那里面存放着股票、有价证券和现金。他熟练地打开了带号码锁的保险柜，伸进手去，看也不看就取出一个装满金黄色液体的瓶子。瞧，他把酒藏到哪儿去了！“我不请你们喝白兰地，瑞士有的是。我留着它招待客人。你们知道，我们这儿什么人都来，不见得都懂得酒。白兰地……名字响亮。”他晃晃瓶子，只见在蜂蜜似的金黄色液体的表面下，出现了小珠子般的气泡。“这是阿尔玛日河谷的烧酒，是朋友送我的。”德

拉戈什说。那时，他们发现瓶口是用玉米芯塞住的，乡下人都这样做。厂长把酒瓶放在办公桌上，走近小酒柜，取出3只杯子。他一边倒酒，一边说："我们不用客气。喂，霍尔兹维格，你说呢，这比你的酒好吧?"霍尔兹维格忙端起酒杯，同厂长碰一下杯，然后一饮而尽。他马上变得满脸通红，咳嗽不止，低声说："好，好"。他是当地人，不喝纯烧酒，习惯往烧酒里加点糖。

## 二

他做了个梦，醒来时记不清梦的情节了。火车急刹车，他突然惊醒过来。望望窗外，天已经大亮，人声鼎沸。他后面的门"咣"的一声被人推开，响起小伙子去当兵时常有的欢叫声。皮靴踏着车厢的脏地板发出沉重的声音。很早以前，地板是用柴油擦洗的。列车到达一个枢纽站，几条铁路线在这里汇合。吵吵闹闹，你推我搡的人群争先恐后地涌进车厢。开车时，车厢里剩下很少的几个空位子。

他回忆事情的经过。上车后，他到底干了什么?他恍惚听见火车经过栈桥时发出惯有的咯吱声。他似乎还隔着肮脏的窗玻璃看到一条河，水色发黄。黑暗开始消散，他的眼皮直打架。在微弱的晨曦中，他看不清车外的景色。怎么，这是

流经他家乡的河水吗？童年时代他和小伙伴们常下河游泳，当年曾觉得河水清清或确实是清澈的。他没有过多想这件事，因为那时不存在污染问题。后来，他记得太阳从什么地方升起来了。阳光温和，但略带忧伤，它当然知道好日子不长了。不过，它还能给大地带来温暖。远处是绿色的原野和地平线，对，深绿间灰的颜色，其中以灰色为主，那一定是树林。

他乘坐的车厢是旧的，只有旧车厢才停在支线上。小时候，父亲带他去编组场见识见识其它车厢。他们登上一列车，车厢外写着闪闪发光的大字，但他们没有留心看写的是什么。那次参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它可以像刚冲洗出来的相片，真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父亲用检票员专用的钥匙打开车门，他们进入车厢。过道里挂着精致的绿窗帘。走进包间，只见百叶窗垂挂，父亲很聪明，让身后的门开着。起居间小巧玲珑，四面挂着柠檬色的壁毯。洗脸盆藏在小柜里面。它下面还有一个小柜，父亲轻轻拉开小门，那里面有两个格子，上下各放着一个便壶，比小孩用的大一些，是瓷器的。父亲关上柜门，嘲笑说："这是给少奶奶准备的，有了它，就不必上厕所，免得腿受凉。"父亲招呼一声："走吧！"又瞥了一眼包间，才离开那里。他后来到工业城市去坐的车厢十分朴素，不讲究。原先那种

车厢早已经完成使命。但是，由于战争、轰炸和德国人征用列车，铁路车辆大为减少，不得不继续使用车轮和轮轴都锈蚀的车厢，它们好似顽固的老头不愿退休。

后来，他的视线离开田野。他是城里人，杂乱无章的旷野，荒芜的休耕地，都引不起他的兴趣。火车走走停停，车厢里的人愈来愈多，把座位占满了。后来，他记得发生了奇迹。两个中年的胖农妇，准备下车了。他简直无法想像，她们怎能成功地挤过人堆，况且手里还提着篮子。座位一空出来，他就听到一阵骚动和恶狠狠的喊叫："鲁萨利姆，这儿来！"一眨眼的工夫，他面前的座位上就多了个用白线缝的红口袋，这是农民用的口袋。有个人侧着身挤到对面的凳子中间坐下，只听木板凳嘎吱响，仿佛要断裂。新来的人一坐下就不动了，宽心地叹了口气。接着又听见很响的走路声，是个壮实人的沉重脚步声。"穿带钉的靴子就好了。"他想起了自己早先的打算，自言自语地说。新来的人也像刚才那个一样，是侧着身子挤过来的，因此，一时也没有看清他的脸。他提起用来占座位的口袋，轻巧地把它扔到头顶上的行李架。然后，他坐下来宽慰地叹了口气。

"瞧，"他说，"我没有听见闹钟响，差一点误了火车。"

"谁让你整夜同女人瞎混。"另一个人毫不同

情地说。

“什么女人?!”青年吃惊地说，“我只跟索罗米娅相好，不跟任何人好。”

贝尔巴记住了索罗米娅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至少在他看来有点古色古香的。

“让她爹瞅见，能打断你的骨头。”年纪大一点的人说，显然，他不喜欢出现自己所预见的那种前景。

接着，火车钻进隧道，轰隆声压住了说话声。出了隧道，那两个人不再吱声，也许他们感到在陌生人面前说得太多了。上了年纪的人马上打起瞌睡来。于是，贝尔巴可以随意观察那个人。他穿了一件又粗又厚的蓝衬衣，这在他们附近车站的商店里有的是。他母亲认为，这种衣服“耐洗”。铁路员工、干苦活的工人爱穿它，说“蓝颜色耐脏”。他看看那个老头儿，其实年纪并不大，满是皱纹的细脖子露在衣领外，他真能，这样快就入睡了。

这时，车厢里的人摩肩接踵，挤进车里的人心满意足，不言语了，许多人开始打瞌睡，他们像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脖子上有深皱纹，如同绳子勒进了肉里一样。有些旅客把长老茧的厚手掌垫在后脑勺下睡觉，避免头碰到硬木板。没能找到靠背座的人，只好用手抱住头睡。火车到一个村子，从村中心驶过。往后的路程，他了如指掌，

现在回忆起来不费力。沿途的房子是用优质砖砌成的，正面的墙都用白灰粉刷过。铁路一拐弯，农村的面貌变了样。门前放着宽板凳，让过路人小憩的古老房屋不见了。火车经过一片荒野，这里与其说是农村的放牧场，还不如说是城郊的空地。接着，有一个工厂出现，猛一看同周围环境十分不协调，随着工厂小火车的来来往往，这种不协调的感觉越发强烈。普通的村庄变成了工厂的居住区。在从山坡后拉过来的粗钢缆上跑动着矿石车。后来，因为他所在的工厂同该地区有联系，所以就经常到这里来，来的次数多了，对这儿的景色就习以为常了。不过，初次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在那个村庄里，势不可挡的工业进程必然地取代了古老的宗法式生活。

火车出了村，便加快前进的速度，看来是要挽回刚才的损失。时移景迁，两边山岭的距离缩小了，河谷也愈来愈窄。他远远望见左侧山上有一处废墟。那儿曾经是古城堡，如今只剩下残缺不全的方塔。几条奶牛在山下静静地吃草。奇怪的记忆竟无意中留下这些细节。火车进入第二条隧道，它比第一条隧道长，出来后就来到一座小城，从房屋的建筑看它很古老，几乎全是用石头砌的墙基，给人以僵化的宗法社会的感觉。矗立在山上的小教堂可能更加深了这种感觉。火车继续朝前方运行，很少停站，没有多少人上下车。

火车经过一片树林，林边有足球场。球场里的看台是用木板搭成的，顶上盖着铁皮。火车转过大弯，出人意外地又钻进一条隧道，出了洞口，铁道左边有个石灰窑，圆鼓鼓的，活像即将分娩的孕妇。车厢里开始骚动，这是到达终点站前常发生的事。不远处，笔直的烟囱冲云霄，上空飘浮着浓烟，这些是城市的标记。

## 三

在小小的病房里回顾往事，他感到去工业城市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仅如此，他还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即今天的他同那时的他判若两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变，尤其是时间的变换会给遥远的过去留下痕迹。他具有扮演双重身份的本领，但现在的他同过去的他之间的联系已不复存在，那时他是第一次去报到的青年工程师。如今只能回想起那个年轻人的模糊形象，仿佛他去城郊电影院看的影片。放映室的隔音条件差，他在黑暗中听见轻微的沙沙声。每逢断片，黑暗的大厅里就对放映员骂骂咧咧和吹口哨。也许根本不是放映员的过错。他可以推卸责任说："这种机器，哪能看得好？"或许，他确实不尽职，开机后就去过道里吸烟了，听见吹口哨才回来，马马虎虎粘上断片，只求平息一下大厅里的喧哗声。观

众可用想像力轻易地补全断片部分。

他的情况大致相同。他记不全当年的自己了，至于某些细节也只能随意补充。显然，他也跟其他人一样下了车，走进车站。他对车站很熟悉，一座标准的长条建筑物，80年，100年，甚至120年前修建的火车站都相差无几。他来到离车站不远的河边，双手支在石头栏杆上，静静地俯视流水，上游的水流清澈、湍急，这里的水肮脏、油腻、黏糊糊的，流动缓慢。河水在这里获得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新的成色：黄一粉红色。因为，战争刚结束那些年，不懂得什么是污染，把矿碴倾入河里去了。

乍一看，不像是工业城市，倒像宗法社会的集市。后来，情况起了变化。记得最初他有点失望，心想能在这个小镇里生活下去吗？这儿完全是田园式的生活。街上几乎无人迹，居民似乎都是退休者，过了八点钟，他们还等着太阳升得更高，以便拄着拐杖去公园里晒1—2小时的太阳。可是，这儿有公园吗？迄今为止，他没有看到。

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初步印象是多么错误。因为，人们都正在工厂上班，城里才安安静静，不见人影。更令他吃惊的是，过桥后，左边又出现一座古怪的建筑物。

他无意中想到，这座房子酷似马戏团的帐篷。不过，屋顶不是帆布的，换成了锈迹斑斑的

铁皮。他走近一看，才发现这个初步印象也需要加以更正。毫无疑问，他眼前是一栋旧房子。建筑师可能在布达佩斯或维也纳看见过类似的房子，不过，他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建筑。对比难免牵强附会。本世纪初，这种建筑在中欧盛行，建筑界极为推崇。造这所房子的建筑师迷上了数量众多的大小阳台和塔楼，他在房主预算所允许的数额内，尽量采用它们。木材取代了水泥、石头以及大理石。最后建成的房子荒诞古怪，恰似自然主义戏剧的道具，格格不入地矗立在旧民房中间。几根粗柱子支撑着房顶，最高点有一只铁皮公鸡，那是当作风向仪用的。他走到房子跟前时，才发现是座电影院。可以断定，它早在无声电影时期就存在。从墙的外表看，它还被派过别的用场。醒目的黄色海报贴在商店的橱窗里。他不太喜欢看电影，没有留心那黄色海报。他认为，去电影院“纯粹是浪费时间”。“艺术家”仅用黑红两色配上黄颜色的纸，使海报鲜明协调，引人注目。画面上有个黢黑的男子，他脚穿带刺马针的高统靴，身穿黑色礼服，怒气冲冲，连脸都气歪了。他手握一把大刀，像是屠宰场杀猪用的刀，朝吓得魂不附体的女人砍去，她吓破了胆，无路可逃，往哪儿逃好呢？她是个金发女郎，身材丰满，衬衣被撕开了，人们不难想像两个隆起的乳房。海报画得十分平庸。“无路可逃！”他取笑着又望一

眼海报，才提起沉甸甸的箱子，离开了电影院。

过了电影院，工业城市的特色慢慢显示出来。左边，远远可以望见——早在火车上就看见过的——高烟囱，因此，城市比他下车时想像的大。后来，工人们在那个地方树立起许多金属柱子，每根都有7层楼房高。他们还在电影院的上空拉起金属网，防止矿石落下，砸伤行人，因为运矿石车就在他们头顶上的钢缆上来来往往，那些金属柱子是支撑钢缆用的。从地面上看，在大柱子间运行的矿石车像是儿童玩具。不过，这项工程在他离开该城的那年才完成。

他清楚地记得到人事科报到时的遭遇。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了，他记不得谈话的详细情况。当时，克隆塔有事出差，副科长也不在，接待他的是女打字员。她一心想快点打发他走。为什么在她正想休息的时候来打扰？

“明天来，”她说，“克隆塔同志（他设想这也许是人事科长的名字）不在，您明天再来。”她的口气冷淡、厌烦，可能心里想，这年轻人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不让人安静一会儿？

他坚持要见副科长。

“卢米诺苏同志也不在。”女打字员无动于衷地回答说。“他们去布加勒斯特开重要会议了，是部里叫去的。”

他模模糊糊记得，女打字员是中年妇女，大

约40多岁。他记不清她的相貌，但她脸上的厌烦神情却使他记忆犹新。从打字机桌的抽屉里露出来半本色彩鲜艳的画报。不言而喻，他打扰了她看画报。

“好吧，可是，我怎么办呢?”他想进一步交涉。“通知我今天来报到的。”

女秘书——打字员也兼秘书工作——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她似乎说，这有什么，人事科就是录用人的。现在，克隆塔同志和卢米诺苏同志都不在，她有什么法子？她能录用他吗？这不行，秘书一打字员的职责可没有这一条。是的，等克隆塔同志回来，如果一切都符合规定，年轻人说的事经过审核，就会让她把录用决定打出来，并送去签字、盖章。她只能这样做。

他还想跟她磨一磨。“总得有个解决‘办法’吧。”他是从另一个城市来的，怎么好因有关人去开会而回去呢？难道这儿就没有别人了？她从墨镜片后面投来愤怒的一瞥。什么，她不是人？她前几天买到这副眼镜。“亲爱的,你戴上好看，使你显得……怎么说呢……更出众。”丽丽这样劝她。丽丽是她的朋友，也是打字员，仅仅只是打字员，不兼秘书。丽丽至少比她小15岁。不过，丽丽八面玲珑，硬说根本看不出她们间的年龄差别，“你保养得好”。不管怎么说，戴墨镜的主意不坏，你可以看别人,而不被人发觉。事实上,他

是打扰了她，杂志上的画片多么有趣。比如，封面上是影星与摩纳哥王子结婚的照片。很漂亮，可是，世界上有的是漂亮女人？摩纳哥？她竭力调动自己有限的地理知识，它好像是有赌场的地方，著名的赌场，对了，叫做蒙特卡洛。那个王子一定腰缠万贯，……嘈，她正在计算陛下有多少钱，这个年轻人来缠上她，不让她安静地阅读和遐想。

“请您明天来。”她千方百计想把这个小工程师打发走。他一定是个工程师，只有工程师才这样纠缠不清。

“什么明天?”他固执地反驳说，“通知我今天来的。”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至少他只记得这些。也许，不，可以肯定忘去了一些细节。他未能猜透小桌后面的女打字员的心思，她正盯着他看，心里想，“你要明白是在跟谁打交道”。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人来人事科办事。她总细心打量他们。从面部特征可以猜出一个人的性格。这也是从她的好友丽丽那儿学来的。“相面，你要明白，可是门科学。”丽丽保证说，她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她读的书多。丽丽还说：“尤其是同男人打交道时，相面十分重要。”后来，女打字员的好朋友也对“相面”的看法产生怀疑。事情发生在一个男同志邀她去城里唯一像样的奥尔特尼亚饭店之

后。头天晚上丽丽来求她做头发，信心十足地说：“看起来是个出众的人（她喜欢用这个词），我在会计室门前认识了他，他说自己叫科巴尔切斯库，是来找会计主任同志的。”丽丽长着金黄色的头发，她当时蛮有把握地说：“也许会有结果的，亲爱的。”结果是一场空。那个科巴尔切斯库寄给她一张明信片，“致以普洛耶什蒂的问候”。他在那儿工作。丽丽当即将明信片撕了个粉碎。

奇怪的是，她仍然相信相面。她仔细端详青年工程师，不错，他的宽下巴说明性情粗暴，下嘴唇厚说明好色。女打字员兼秘书一边观察，一边回想她与丽丽一起研究相面的情况，她给他的结论是“放荡的人”。顿时，她感到惴惴不安。人事科在一条较偏僻的过道里，现在只有她和这个工程师，因此，还是不要过于刺激他为妙。

“很遗憾，”她说，“我爱莫能助。”她停顿一下，仿佛是为了使自己的话有更大的份量，接着补充说：“您明天来吧。”

不料，“那家伙”——他不配别的称呼——居然毫不让步，宣布说：

“我不离开这儿。至少在给我解决住处之前，不离开。”

“什么？”她问道。她简直没法相信亲耳听到的话，尽管已经从相面得到了警告，她记得书上写着：“方下巴意味固执。”

“就这样，”青年回答说，“是通知我来的，我要求解决我的问题。”

女秘书兼打字员叫特列扎。她心里想：“我知道迟早要出事的。不就为了多拿点工资吗？瞧，现在报应来了。”她不久前才调到人事科来，从打字员提升为打字员—秘书。随着提升，工资也上调了一点。没有人强迫她，征求过意见，问她是否愿意去人事科工作，她表示同意。如果留在会计室……她的座位不错，靠窗子，随时可以往外看，使盯着打字机的眼睛得到休息。她挨着丽丽坐，两个人可以闲聊，这儿可没有说话的人。而责任……责任更重，那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一出现意外情况，需要动脑筋，解决问题。女打字员感到得绞绞脑汁了，这可是千载难逢……

“您不想离开办公室？”她尽量严肃地问。

“我没有说不离开办公室。”青年人纠正说，“问题一解决我就走，但是，不解决不走。”

过了一段时间，他在街上遇到特列扎·波波维奇小姐（她是个未婚的姑娘），她故意拐到另一边人行道上，使工程师先生难堪。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星期以后，他的“问题”早已经得到解决了。但是，当初，人事科只有他们二人，问题要由她解决。她心想：“我可不能生气，生气会增添皱纹，我没有钱上美容店。”丽丽爱美，还去染过一次指甲。不管起不起皱纹，当务之急是把他打发

走。

"您不能留在这儿。"她想加重语气，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儿是人事科，有人事机密。"

"问题一解决，我马上走。"方下巴的青年无事取闹地嘟哝说。

忽然间，她计上心头。怎么一直没有想到呢？她慌忙抓起电话，拨通供销科的内线。对方的电话响了一下，传来妇女的懒洋洋声音，回答公务电话的声音大都是这样。

"贝比吗？我是特列扎。巴比安同志在吗？请他来一下。有事，对，是件急事。不，我不想在电话里说。让他来一下，要快。已经出来了？好吧，再见。"她说完，便把话筒甩回原处，她至少在这件事上可以显显威风。女打字员心里计算着："下了楼，转弯，他会赶紧走，这么说……2分钟，也许3分钟就能到。"她等着敲门声，说"进来"。那时，她就不是单枪匹马对付这个固执的工程师了。从工学院刚毕业的大学生，手里有了文凭，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礼貌……还是不说的好。过了多长时间？1分钟？1分半？巴比安随时都会出现的。他有主意，能找到办法打发走这个小工程师。然后，她可以继续看那一篇关于影星与拥有万贯家财的王子结婚的文章。她抬头望望墙上的布谷鸟挂钟。谁也不知道它的来历，连克隆塔也说不清楚。其实，人事科长讨厌这只布谷

鸟，它每小时从钟肚子里钻出来叫一次，使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得不到安宁。可是，它被列入财产清单，要办一系列手续才能把它搬走。因此，只好……留下它。“也许，我太性急了，估计错误。”她在心里说，“巴比安来到这儿，至少得5分钟。”就在这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如果说，时间从他的记忆中抹掉了特列扎·波波维奇小姐的形象，老小姐们彼此十分相仿，那么，巴比安的形象却被他永远铭记在心中。他在那儿工作期间，他们二人一直是好朋友。他几乎能回忆起初次见面的全部细节。特列扎小姐——他是后来从巴比安那里了解到女打字员的名字——说“进来”，有人压了下门把，打开门走进来。从初次见面的印象来说，巴比安似乎是个理想的或确切地说，是个典型的公务员。他没有戴套袖，可能留在办公室了。他的身材不高，黑黝黝的，头发是，或者说，曾经是漆黑的。他现在仍然是黑头发，不过略微发红，因为巴比安爱染发。他穿的是当时流行的混纺衣服。后来，他在街上遇见这个小公务员时，发现他也有别的衣服，只不过式样过了时，但料子可是英国产的。巴比安感叹地向他交底说：“是过好日子时剩下的。”经过他观察，认为巴比安除头发外，服装和其它方面都并不出格。

“吻您的手，特列扎小姐。”新来的人说。他的

男中音听起来悦耳，而这句“吻您的手，小姐”对女秘书来说就更加动听了。一般情况下，别人称呼她“波波维奇同志”，在特殊情况下，有人称她“小波同志”。不过，她不太喜欢过分亲昵。巴比安耐心地听了特列扎的解释。他没有打断她，甚至连打断的表示都没有过，他只不时用手指弹一弹左边的袖子，弹掉肉眼看不见的尘土，这大概是巴比安的习惯动作。最后，特列扎说得精疲力尽，把肚子里的气全倒出来了。

“要是我理解得对的话，”巴比安同志开始说，“问题在于给这位同志找个住处，一个过夜的地方，要是可能的话，找个旅馆。明天，克隆塔同志就回来，其它事便迎刃而解了。对不对？”

特列扎被刚才的那篇滔滔不绝的讲话累垮了，只同意地点点头。

“不过，很难在旅馆里找到房间。听说你们的旅馆从来没有空房间。”他插话说。

“是这样的。”巴比安笑着回答道。“不过，可以试试。”然后，他彬彬有礼地问特列扎：“小姐，能否允许我打个电话？”

“可以，当然可以。”女秘书连忙说。

他发现，新来的人没有向总机打听旅馆的电话号码。巴比安后来承认说，他已经把城里主要旅馆的电话号码背熟了，据说是“为了训练记忆力”。他拨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人气呼呼的声

音，还夹杂有音乐声，显然是客房处的人借音乐消磨时间。他听到千篇一律的答复："一个空房间也没有。"接着是一连串的对话。巴比安耐心听对方讲述理由，连贝尔巴和特列扎小姐都失去了信心，等着对方撂下话筒。后来，巴比安说："好吧，约瑟夫，我理解，但是，请照顾一下吧！"他说着看看工程师，脸上带着特殊表情，意思是他已把工程师认做是自己的朋友了，因为不这样是无法摆脱困境的。双方都停顿了片刻，仿佛是考虑什么办法，后来，对方传过来几句话。巴比安一听，笑逐颜开。"行，约瑟夫，"他说，"行，就来，当然来，1小时就到。"他挂上电话，得意洋洋地对贝尔巴说："您的房间是11号，请您1小时内赶到。他们只能等1小时。"他风度翩翩地吻了特列扎小姐的手，嘴里说着"没什么，没什么"，作为回答其他二人的感谢话。他很有礼貌地向贝尔巴告别后，转身走出房间。

他已经记不得旅馆房间的样子了。其实，旅馆的房间都大同小异。后来，那座旅馆被拆除掉了。

## 四

过了些日子，巴比安告诉他当过房产经纪人。他也经营家具，但是多是贵重家具，偶尔也经营

珠宝。

“是为了让您知道同什么人进餐。”有一次，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巴比安小声对他叨唠说。

“算了，巴比安先生，”他有点尴尬地说，“过去是过去。重要的是您现在在这儿工作。连克隆塔同志都这样说……”

“克隆塔同志是这样对你说的?!”他的同桌不无吃惊地问。“克隆塔这只 老狐狸。他们真会挑选人事干部。”

“我倒觉得他的话是真心实意的。”贝尔巴反驳说。他想打消对方的怀疑。

“也许……”巴比安模棱两可地说，“不管怎么说我可无法改变过去的事。过去就是过去。”

餐厅里只剩下他们二人了。来食堂就餐的人吃完就走，不习惯坐在那儿闲聊。他们是午餐时间快结束时来的，两个姑娘走过来收拾桌子。

“工程师先生，”巴比安说，看得 出他是鼓起勇气说话的，“我们去喝杯咖啡吧，真正 的 土耳其咖啡。请您接受我的邀请。您肯定没有喝过像默赫梅特那儿的好咖啡，我可以向您保证，是用滚烫的沙子过滤的……”

贝尔巴点点头表示同意。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他还想再去厂里看看，不过，晚些时候去也行。再说，咖啡已引起了他的好奇心。现在，他反正没什么事……

出了厂门，他们步行了一段路，便来到土耳其咖啡店，店门面很小，里面放着几张桌子，在午后的这个时间，空无一人。

“默赫梅特，”巴比安向他介绍自己的同事，“这是贝尔巴工程师先生。他想尝尝你的咖啡。”

“没说的。”土耳其人极口称赞自己的商品。他是个细高挑儿，头上戴着红色圆毡帽，帽上装饰有黑色大穗子。在他的祖国，阿塔丘尔克① 曾禁止戴这种帽子。默赫梅特很快就端来了装着咖啡的绿色小杯子，杯子上面印有一个半月形图案。味道确实非同寻常，贝尔巴记不得有多长时间没有喝过这样的咖啡了。老实说，他从未喝过这种味道特殊的咖啡。土耳其人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端出来一碟土耳其焦盐花生。他们坐在小桌子旁边的蒲团上，巴比安欣喜地接受了默赫梅特的款待，开始嚼起花生来。

“您知道，喝咖啡时，吃花生最好。”他解释说。“您喜欢咖啡吗？”

贝尔巴同意地点点头。

外面下起蒙蒙细雨，这是秋天的连阴雨。山城的雨多，至少比他的家乡雨水多。坐落在辽阔平原上的城市，秋季漫长，温暖的太阳是渐渐失去威力的。他透过咖啡店的大窗户，观察冷清清

---

① 阿塔丘尔克·凯末尔(Ataturk Kemal，1881—1938)，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第一任总统(1923—1938)。

的大街，雨水顺着窗玻璃慢慢往下淌。

“资产阶级，工程师先生，请您相信我，”巴比安盯着贝尔巴的眼睛说，“是的，我明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资产阶级政权。但是，习惯、生活方式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十分顽固，您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它们。瞧，这些人！”他漫无目标地指指城市。“他们仍旧是原来的样子，一从工厂出来，就赶回家。我说的是当地人，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几乎全有自己的房子，儿子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他们躲在家里。您若有机会的话，可以看见小窗子里面，在稍稍掀起窗帘的地方，有几双蓝眼睛监视着街上的动静。唯有奥尔特尼亚人例外。这儿的奥尔特尼亚人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是高薪吸引他们来的……唉，该怎么说呢，只有他们的到来，才给城市增添了生机。他们从家乡带来了热闹气氛，喜欢上街转悠。夜深时，您要是在街上遇见人，我敢打赌，他必定是奥尔特尼亚人，并且是从奥尔特尼亚饭店出来的。其它地方如玛拉穆列什、比霍尔的人也开始来了。我就是比霍尔人。这里成了真正的巴比伦，先生。不过，他们不太到这儿来，倒不是他们不喜欢喝咖啡，而是因为默赫梅特不卖烈性酒。先生，土耳其人信奉可兰经，那是它们的圣经。”

用帘子隔开的另一间屋里，响起了轻轻的噼啪声。看来，默赫梅特正在炒花生。贝尔巴坐

在顾客稀少的咖啡店里，听着巴比安的叙述，开始感到别有一番情趣。他觉得巴比安蛮可爱，连他说话的声音也是顺耳的。

“可是，您，巴比安，怎么到这儿来了？”贝尔巴这样问道，同时奇怪自己怎么打听起别人的私事来了。他不习惯追查人家的私事。

他的同事深深地叹一口气，对刚从布帘后面走出来的土耳其人说：“默赫梅特，再来两杯咖啡，把你新炒的花生也拿点来。”随后，他陷入对自己的往事的回忆中，眼神温柔、忧郁。他那供销科的女同事议论说，当年许多女人迷上了他这双眼睛。“说来话长，”他开始叙述，“当然，我没有把它写进克隆塔要我写的简历里去。我没有隐瞒什么，怎么说呢，我的事在另外一个地方，用不着往简历里填。我，先生，我只写了是房产经纪人。人事科长认定：‘也就是说，是剥削者。’我回答：‘不，同志，我怎么是剥削者呢？！’我问他是不是知道工人，就是说无产阶级，也是买楼房或别墅。我问：‘喂，您说说看，工人在战争时期能有那么多钱买房吗？那时，我的买卖最兴隆。’克隆塔听了笑笑说：‘见鬼，你真有道理！’我不能不承认，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严厉，但是公正，讲道理。他说真理总像浮在水面上的油。我不大同意他的真理观。但是，我没有对他说，干嘛惹他生气？”

默赫梅特张着缺牙的嘴，笑着端来了咖啡。他把沙子放在一个古怪的小铜炉上过滤咖啡。咖啡热气腾腾，香味充满整个咖啡店。雨愈下愈大，他们不能走，贝尔巴并不着急。他住在单身汉宿舍里，那儿能干什么？宿舍比不上“家”。

巴比安轻轻吹了吹咖啡，大概是为了降温吧。香喷喷的黑色液体使薄瓷杯变得滚烫。他小心翼翼地喝了几小口，然后问默赫梅特：“你还有过去的那种烟吗？”

“有的，巴比安先生。”土耳其人边说，边从柜台后取出一包形状奇特的烟。“从阿达—卡莱赫来的，”他自豪地解释说，“阿利·卡德里香烟。好烟。工程师先生也来一根？”

“不，默赫梅特先生，谢谢，我不吸烟。”

“遗憾。”巴比安说着用他细长的指头打开烟盒。“阿达—卡莱赫的土耳其人有好烟。”巴比安哆哆嗦嗦地从锡纸里抽出一支烟。“带过滤嘴的。”他善意地对一个不抽烟的人解释说。他点上烟，咖啡味和烟味混杂在一起，又甜又苦。他接着说：“是啊，房产生意可是好买卖。在奥拉迪亚，战争快结束时，人们仿佛预感到将要起变化，许多人急于卖房子，说也奇怪，总有人愿意买。我还参与过一起珠宝交易，做这笔买卖的人在克里什河畔开有咖啡店。买卖做得很成功，我赚了大批钱。有一天，他们的老板把我叫到咖啡店的角落里，对我

说：‘喂，你这个阿尔明尼亚人，’他还用怜悯的眼光瞅着我，上帝保佑我不要再看到这种眼神。‘瞧，阿尔明尼亚人，我让你做成了这笔买卖，你心里明白是哪一笔。我们的人都蒙在鼓里。你小子机灵。不过，你是知足。懂吗？’他瞪着眼珠瞅我，我想他肯定患有巴塞多氏症①。然后，他又压低嗓门说：‘你要是犯糊涂，孩子，警察会在克里什河里或卡尔瓦里亚山上，找到你被捅了窟窿的尸体。你自己选择吧。’我吓懵了。他对我笑笑，我永远不想看见这种笑容。他瞪大眼睛看我走出咖啡店。唉，我现在还存有那些钱，分散收藏着。拣来的便宜钱可使我倒了霉。”

“怎么了，巴比安先生，倒什么霉？”贝尔巴问道。其实，他是随便问问，表示他在听对方讲话。

“唉，等我慢慢给您说。我犯了傻。常言道，钱是鬼的眼睛。我发了昏。我大手大脚，讲起阔气来。我产生了什么念头呢？买了一座有6个房间的别墅，它恰巧在奥拉迪亚的罗杰里乌斯区。唉，该怎么说呢，别墅买到手，倒霉事紧跟着来了。我是说伊尔迪科……”

“什么，巴比安先生？”贝尔巴笑着说，“一个女人使你倒了霉？可能吗？”

---

① 巴塞多氏病(Basedow's disease)眼球突出性甲状腺肿。

“别笑，工程师同志，您不了解伊尔迪科。她才16岁，我是40多岁的人了。我该怎样给你解释清楚呢？您知道，做买卖很花时间，我全泡进去了。我没有过过家庭生活。女人吗？唉，我只同妓女有过来往，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称呼她们，处处有她们的踪影。唉，伊尔迪科是我的邻居。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她屋里的灯亮着，我看见她一丝不挂地躺着，毫无疑问，是她那当皮调匠的母亲教唆的。我是偶然间看到的。她发育得很好，请您相信我，她长着蓝眼睛，金黄色头发。我挖空心思去讨好她，给她送礼，以为她很快会顺从的。不成，显然是她母亲使的诱淫手腕，企图卡住我的脖子。这样磨了一年左右。后来，我终于成功了，娶她为妻。其中的苦乐，我就不说了。结婚……你明白吗？她还不满18岁。我进行了贿赂，有关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举行了婚礼……真不如不举行……”

“婚礼后呢？”贝尔巴微笑着问，努力显得严肃些。

“结婚以后？不到一年，钱都花完了。我留了一点，作为救急用。女人挥霍无度！我相信，伊尔迪科是花钱能手。”

“后来呢？”

“唉，还能怎么样？把我给甩了，带上珠宝、衣服和皮货逃到国外去了。我有几块金币，您知

道，是战时制币局铸造的……她发现了，也拿了去，说是留作纪念。”巴比安苦笑一下，美丽的黑眼珠凝视着远方。“她跟高个子司机跑了。有几次，她买完东西，是他帮忙送回来的。我想，她看上他，同他鬼混，是想利用他偷越国境。当时，战争尚未结束，罗马尼亚军队还在匈牙利境内打仗，还可以偷越国境线，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巴比安沉默了，饮一口咖啡，像是要借咖啡浇愁。不过，贝尔巴知道故事还没有结束，巴比安只是稍微休息一下。只见他失神地望着窗外，仿佛从行人中寻找伊尔迪科。雨过天晴，苍白的太阳正在山后同云彩作斗争。“还说什么呢？我借钱赎回了房子。我欠下债，讲好了条件。当然，全城人都得知她逃跑的事……”他停了片刻，又说：“人家知道她同什么人私奔了。我卖掉别墅，价钱不理想。因为，我不能再在那儿住下去了，每间屋都使我想起自己的妻子。我预感到世道要变，房产买卖将无法进行，于是就卖掉全部财产。之后，我来到这儿。克隆塔对我说：‘我们可以留你，给你个劳动的机会，老老实实挣饭吃，我想，你从来没有尝过这种饭的味道。’我忍气吞声接受了工作。有什么法子？关键问题是达到了目的，我找到工作了。”他奇怪地笑笑，有如忽然想起一件愉快事。

太阳战胜了密云，露出了面孔。秋天的太阳郁郁寡欢，离完全消失到山后去的时间不远了。他们走出咖啡店，互相道别。巴尔安住在靠近城边什么地方，他解释说："那儿的空气新鲜，我还有块园子哩。"

时间，时间在流逝……飘忽不定的回忆恰似一块随时都会被风吹散的乌云……

时值2月底，阴雨连绵不断。今年，雨下得比往年早，下雨是春天将至的信号。"你会以为是到了洪水泛滥的时节。"有一天晚上，护士伊丽娜这样说。下的多是阵雨，雨点斜打在玻璃窗上，发出炒豆般的噼啪声。一天下午，天空大约晴朗了半小时，又忽然布满乌云。头顶上响起夏季常有的闷雷声。不管怎么说，春天已经近在眼前了。他走近窗口观看雨景。砖砌的小路地势低，雨水落下来后汇成一条小溪，流进水池。也许，医院领导曾计划在那儿挖一条排水沟。冬天寒冷，但雪化得快，在雪层掩护下的粘湿黑土又露了出来，看起来大地像是吸足了脏水的海绵，再也吸不进雪水了。满身长节的板栗树皮如同防雨布，雨水顺着树干往下流。尽管房间里还有暖气，晚上打开窗户，便能感到春天的气息，显然春天正日益临近。

阿格利切鲁院长来得更勤了。"我喜欢到您这儿来，请相信我，这不仅是出于职业责任。我有

了可以与之交谈的人。请相信我，医生讨人嫌。他们口口不离病、病人及最新的治疗方法，简直无法跟他们谈别的事。”他小声笑了笑。贝尔巴已经习惯他那十分独特的笑声了，听起来像是用叉子刮盘子底时发出的嘎啦声。“并且，”心脏病专家狡黠地笑着说，“我的到来可能有助于您消磨时间。”他每天都在医院里呆到很晚，有一回，他苦笑着说：“反正家里没有人等我。”他来到的信号是在木门上轻轻敲两下，接着就笑眯眯地出现在门口。有个时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秋天刚刚开始，也就是他住院的最初几个星期，他曾经对这种访问很反感，曾是没好气地应酬他，意思是让对方意识到来访是不合时宜的。现在，他不仅渐渐习惯了，甚至期待着敲门声。教授不受欢迎的来访，总引起他猜想：“这家伙来干什么？”那时，他确信医生是抱着一定的目的来的。“他在刺探我。”“但是，他不会成功。”而进屋的人又往往可笑地解释说：“我只是进来看看您怎么样，马上就走。”几个月过后，他才相信阿格利切鲁是医院里唯一可以聊天的人。其他人一本正经，只关心自己的专业。他们有时也说点笑话，可都像是从幽默杂志上学来的。病人呢？唉，他们自顾不暇，天天想的是病。

这天晚上，阿格利切鲁看上去心情不错。“您最近的心电图略有好转。”贝尔巴不难觉察出医生

说话的声音中含有喜悦。"我并不认为，您可以由此产生幻想，认为我们会在周末放您出院。这种好转有可能是暂时的，尽管我不希望如此，但它不取决于我，心脏像个脾气古怪的太太。但是，我有充分理由对您透露一个秘密，我认为，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了。我重复一遍，有这种可能，我不敢肯定。您刚来这儿时，我们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那时，我感到很为难。您还记得吗？县卫生局长每隔两天就打来一次电话，问您的情况如何？感觉好不好？因为，有人告诉他，您是个'特殊'病人。是真的，只不过看法不同罢了。我的看法吗？最好不要再去回忆……" 他笑着望了一眼贝尔巴。然后，他如恍然大悟似地说："您一直想知道还要在这儿呆多久，什么时候能出院……唉，要是您当初知道将在医院同我们一起迎接春天呢？还是少想为好。如果，您一定要想，那就记住今天我说过的话：最新的心电图情况有好转。"他不等床上的人作出反应，便像往日一样匆忙走出病房，也许他后悔说得太多了。

"这个教授真鬼，"贝尔巴独自想道，"既狡猾，又精明。只透露他想说的事。"有一次，阿格利切鲁把自己和他的同事比作"包谎言的金色玻璃纸"，说得真妙。情况差不多也就是那个样子。医生要是一开始就坦率地告诉他："您的希望很小，

但我们将全力以赴"，难道会有更好的效果吗？当然不会。其实，心脏病专家一开始就暗示过他，情况不怎么妙。现在，似乎出现了转机。是的，同一个阿格利切鲁告诫他要做精神准备。好转？有可能。不过，还没有确实把握治好。他觉得这句话含糊不清。心脏病真能治好？彻底治好？关键在于好转，哪怕是蜗牛爬行似地往好的方向转化呢。去年秋天，像是距今一个世纪以前，情况可完全不一样。"我让您的朋友沃什蒂纳尔医生明白，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别害怕，那时您希望不大。"对了，心脏病专家说的是这个意思，顶多用的字眼不一样。

"那么，现在呢？"他奇怪竟听不出自己的声音来。他的嗓子沙哑，并且因激动而发颤。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比较好了。"医生说。"否则的话，我不会向您透露的。您知道，心脏病人最忌激动，您也不例外，尽管现在我了解您，知道您是个强者，一直是强者。是的，情况好一些了，至少暂时是这样。"他用另一种音调说出"暂时"一词后，便停住不往下说了。他提醒贝尔巴注意，尽管已经闯过或者说似乎已经闯过最困难的时刻，但危机还没有过去。

"让我如何理解这个'暂时'呢？"贝尔巴问。他重新感到不安起来。

阿格利切鲁凝视着他，想看透自己是在同什

么人谈话。他说："我很难对您的问题作出满意的答复。很难，因为我不能完全肯定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事。心脏病总有个不可知的系数，我们当医生的也无能为力。当然，几乎我所有的同事们，对，几乎是所有的医生，都不愿在病人面前承认这一点。请您不要把这看作是批评，这是事实。他们认为，病人需要知道确切的诊断，如果只对他们说我们的怀疑或推测，会有什么好处呢？从理论上说，他们有点道理。你瞧，情况犹如埃斯库罗斯① 的悲剧，但是，我不相信，我的同事中会有人看过他的悲剧。唉，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里，每个人都有一部分真理。您明白吗？"

"我尽心竭力吧。"

"我很高兴。"医生继续说，"瞧，就您来说，心脏不听使唤了。心电图表明它跳动的节奏不规律，您知道，这现象在图纸上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一般不让病人看心电图……现在，不是开始的时候，而是最近一个时期，您的心脏跳动比较规律了，是个好兆头，请相信我……"

他们实质上就谈了这些情况。阿格利切鲁走了，又留下他孤零零一个人沉思和回忆。

回忆，特殊的回忆。疾病有时会成为智慧的

---

①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524—前456/455)，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有悲剧之父之称，著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

洗礼，他认为这样的奇迹出在自己身上。同时，疾病也有助于时间抹去某些往事，或者恰恰相反，加深对另外一些旧事的印象。比如，他对玛拉的印象变得淡薄了。他有几次想过她，但是愈来愈少了，也不那么强烈地感到自尊心受伤害。时间起了作用，起了安慰治疗的作用。有时，他回味起生理上的感受，它远比精神上的需要强烈。她用肉体俘虏了他，使他惊讶地发现，40多岁的人还能有那么强烈的性冲动，这是他不曾想到过的。他迷恋她的肉体，曾为失去它而感到痛苦。后来，渐渐地，他忘掉了那个香艳诱人的躯体。她使用的是具有强烈刺激性的香水，如今香味消失了。他关于玛拉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因为他把她看成与己无关的人，甚至连她乳房的形状，细长的大腿和拥抱时的感受统统淡忘了。这一切都离他而去，自行消失了。当你不再去追求时，也就不再去想了。与此相反，维奥丽卡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更加鲜明有力。

"当然，你们可以留在这儿。"波托切安太太笑着说。这是明事理的善良老太太发自内心的笑，她看见青年人幸福而高兴。那时，他们结婚才几天。"要谈幸福的话，就由此开始。"贝尔巴吉笑着想。往昔的幸福已经烟消云散，可是对它的回忆仍旧刺痛他的心。当时，他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

样子，如任何年轻人一样只顾眼前。那年的秋天很美，阳光宜人，也许因为太阳猛烈燃烧了整个夏天，劳累过度了。他们结婚那年遇上了旱灾，以至于山林起火。他们选择了10月初的一天，没有举行仪式，他们也不迷信。一个佩着三色旗绶带的瘦小中年人，为他们履行了结婚手续，于是一切合法了。那个人像是偶然到结婚登记处来的乐队指挥。维奥丽卡拿着巴比安送的一束鲜艳的红玫瑰花。他们在奥尔特尼亚饭店订了一桌，巴比安不愿来赴宴。那束花不是他送的，而是找了一个孩子送来。小孩说了句"是巴比安先生送的"，转身想跑走，激动的维奥丽卡连忙拉住他，并搂进怀里，亲吻他的双颊。巴比安随花送来一张大名片，一看便知是当年为了招徕生意而制作的名片，阿拉姆·巴比安用紫墨水涂掉自己名字下面的一行字"房产经纪人"，以同样的墨水写了适于这种场合用的庄重热烈的祝贺词。

名片用的是皱纹纸。名字是斜体字，十分秀丽，如过去名门望族的小姐们所使用的名片，巴比安可能认为这样才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他的字体流利，无可挑剔。当时，社会上不时兴名片了，有些人认为它是爱模仿旧习惯的人从什么地方借用来的，是过时的、没落的、昔日资产阶级旧习惯的残余。巴比安显然有另外的看法。玫瑰花从发响的玻璃纸包探出头来，招待员拿来一个花瓶，

小心地把花插进瓶里，放在桌子中央。

他记不清婚宴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了。维奥丽卡邀请了两个女同事，他请来同办公室的一个女工程师，姑娘们按照习惯在桌子底下偷偷传递新娘的鞋子。上香槟酒时，他的上司约尼德站起来祝酒。有人去出租汽车站要车，当时全城仅有几辆出租车。黎明时分，他们才从饭店出来，汽车等了很长时间，然后，对，他不会忘记这个场面，他们轻轻推开大门，波托切安太太像所有的老人一样，睡觉时很惊醒。他们打开房门，他抱起她跨过门坎，走进他们的第一个住所，他们将在那儿度过几个星期。他们住的大房间配备有旧家具，老式的高床，大床头柜。波托切安太太说，“这间卧室是从奶奶那儿继承来的”。房间里还有一件五屉柜模样的家具，轻轻掀开上面的盖子，才发现不是五屉柜，而是个白搪瓷大脸盆和水壶。确实，波托切安太太的祖母在世时还没有自来水。

他们在那个有老式家具，给人以旧货店印象的房间里，度过了所谓的蜜月。其实，按照劳动法规定的合法假期只有3天，以后就开学了。维奥丽卡不能缺课，而他怎能不去工厂上班？如果让记忆结成的线团再往前滚动，追忆早一点的事，那就是他们初次邂逅的时刻。

初次约会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3月初，冬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它已经疲乏无力了，对，

是在3月初，一个相当寒冷的下午，山上吹来阵阵寒风，他穿了一件厚呢大衣还不停地打哆嗦。不言自明，他提前20分钟来到约会的地点，他邀请她看电影，倒不是他爱看电影，而是因为当时的电影院是恋人们会面的理想场所，不在黑暗的电影厅里，能去什么地方谈情说爱呢?去咖啡馆?那未免过于莽撞，准定会遭到拒绝，因为他们刚认识不久。他想，面对发亮的银幕，欣赏电影里变换的场面，……是最合适的办法。于是，他选择了电影院，许多青年人在那儿会面。如果有人想尝试诗意生活的话，看来那儿是最理想的场所。那种方式似乎带有宗教色彩，现在早已经变了样，青年们多在舞厅里认识和约会。当时，确实有教跳舞的舞蹈学校，可是，他认为不是约会维奥丽卡的最好地方。他不大会，也不喜欢跳舞。“好吧。”她同意了，并说了一个稀奇古怪的电影院名字，屋顶上装了个公鸡作为风向仪。她解释说：“离家近一些，我就住在附近。”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他沉不住气了，愈来愈频繁地看表。人们漠不关心地走过他身旁。人人自顾不暇，哪能帮什么忙。他气鼓鼓地想：“要是不来呢?”不料，她在桥的另一头出现了。她扭动着腰身轻盈地走过来。他后来发现，她这种习惯性的走路姿态常引起男人们注目。他快步迎上前去，然后一起走进电影院。电影院已经收归

国有。过去的老板善于精打细算，充分利用了空间，为了多容纳观众，他把椅子排得很挤。他们坐下时，他如触电似地感到维奥丽卡丰满的臀部碰了他一下，一股热流透过毛料裙子传了过来。

他不知道看的是什么片子，只记得电影散场时，已经是日落西山了。

天还没有黑透，淡紫色的天空渐渐变得漆黑。冬末的雪很脏，有时还能看到白雪的返光。积雪的表面上洒了一层闪闪发亮的细粉，那是焦炭的灰碴，无论冬天或夏天，它们都漂浮在城市的上空，不被人们觉察。他们在电影院里说了些什么？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记不得了。时间一久，就把它们给忘了。不过，他永远忘不了，自从她在桥头出现时起，就产生了一种冲动。他陪送她回家。由于山坡迫近，河对岸的街道拐了个大弯。走到街头时，他看到工厂的高烟囱被山挡住了，街上万籁俱寂，使城市的这一部分给人以田园小镇的假象。屋顶上覆盖着的白雪像童年的梦一样纯洁。山脊俨如盾牌，抵御着焦炭灰尘的侵袭。在静悄悄的街道上，你不会想到身处于工业城市里。他们肩并肩地慢慢走着，说话字斟句酌，因为最初的印象至关重要，不是吗？他们相当快地，对他来说是十分快地来到一座古老房子的前面，门很大，老房子的门都大。奇雷斯库小姐住在这里。奇雷斯库是维奥丽卡当初的姓。她说，“我

住在这儿”，他觉察到她几乎是不无遗憾地补充说了“再见”，然后伸出一只滚烫的小手。他抱歉地说，“我们走得太快了”，请她再散一会儿步，“当然，要是您不觉得冷的话。”他说。她笑着回答道，“不，我不冷。”同时，她聚精会神地盯着他，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他们转身往回走，那时还没有日光灯，就在昏暗的路灯下漫步。最后，他们又不知不觉地来到她家门口，这次不得不分手了。他觉得维奥丽卡面有难色，于是，他要求新的约会。“什么时候?”她问。他鼓起勇气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明天吧。”她的态度认真严肃，睁着大眼睛瞅他。她细心端详他，过了一会儿才小声回答说：“好吧，老地方见。”她伸出手，但又缩了回去，迅速走进大门。

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时间，回忆他们开始接触的情景。他有如导演要求重放电影的某些片段，脑海里就重现了他们第一次约会的经过。这些都深深印入他的心中，即使同玛拉共同生活时也抹不掉。他不自觉地把两个妻子作了比较，尽管是下意识的活动，不受理智的控制，理智能够排除它。他在布拉索夫与玛拉结婚后，并没有想过她和维奥丽卡有什么相似之处。或者，即使有过闪念，他也只能埋藏在心底里，不让它冒出来。他在长时期里产生了对第一个妻子不忠的负疚感。他曾经自欺欺人地想过，这两个女人之间

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她们好似莱布尼兹①哲学中的单子，彼此永远不会相遇。维奥丽卡只见过几次特列塔，不大熟悉。有一回，他们在康斯坦萨说服他一起去度假，奇雷斯库太太像防小偷处处监视他。维奥里卡却很喜欢特列塔。玛拉则对他讲外交。他们搬来同特列塔住在一个城里，他却愈来愈少地来看望他们。兽医总能找到不来的借口。"你到我这儿来一下，贝尔巴，我一个人快闷死了。"特列塔有时这样央求他。贝尔巴理解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也许起决定作用的是玛拉和维奥里丽之间的对比。他不承认，也不愿承认他的朋友不喜欢玛拉，玛拉对他也没有好感……

他们只在波托切安太太家住了几个星期。他们的好天使巴比安后来在罗马人大街为他们找到了住处。他们住进去后，才第一次感到有了自己的家。在那儿，波托切安老太太就住在他们隔壁的房间里，中间有一道门，不过好好坏坏还隔着一道板墙和一个衣柜。有时，夜间可以听到女房东的鼾声，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矮小的女人会发出如雷的鼾声。在罗马人大街，他们住在后院，

---

① 莱布尼兹(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其唯理论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基本要素是"单子论"。单子即终极的、单纯的、不能扩展的精神实体，是万物的基础。

离前院的房子有一段距离，相当安静。他把小客厅的门油漆了一遍，因此，虽然房子破旧，经风吹雨淋一半木头腐烂，坑坑洼洼，颜色发白，但看起来像住家过日子的样子了。房间的天花板低矮。不过，他还不至于要低着头进屋。他很快就习惯了，也不想改变环境。他吹牛说："一伸手就能够着天花板。"其实，哪怕他踮起脚尖，伸直手指离天花板还差二三掌。维奥里卡说："算了，这样更好，屋里保暖。"她就是这样的人，总喜欢往好的方面想问题。他们跟年轻的夫妇建立了联系，朋友们羡慕他们，说："你们这儿是一座真正的宫殿。"他们还都借住在别人家里；城里建造了第一批住宅，但人们住得很挤，仍然存在严重的房荒。因此，尽管楼梯走起来嘎吱嘎吱响得厉害，他们也没有放在心上。维奥里卡说："响有什么关系？我还可以早点知道你到家了。"她说出内心的秘密后，对他莞尔而笑，这一笑深深印在他的心里。说实在的，楼梯的响声简直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惊醒。

罗马人大街只有一排房子。它们的作用好像是为了堵住伸延到街边的山坡。这条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比较窄，一头通到工厂附近的小市场。从他们的窗口望去，山坡直抵街边。冬天，孩子们爬到坡上玩雪橇。山区的冬天来得早，每日下午，山坡上到处是孩子们的欢叫声。起初，他们

难以忍受，后来不仅习惯这种经久不息的嘈杂声，而且走出去观看，并结识了一些孩子。有一天下午，他们正兴致勃勃地看热闹，维奥丽卡忽然感到难受，她叹气说："我觉得恶心。"她从窗口站起来，走到外面去了。次日，他们去看医生。毫无疑问，她怀孕了。

# 第七章

## 一

起初，我只看见一道线。一道灰颜色的斜线向下滑动。我踏第一级台阶时，差一点滑倒。我拼命抓紧扶手，当时的样子一定非常狼狈，幸亏没有人从那儿经过。我命令自己说:“清醒，清醒，别让人听见!”我刚离开沃什蒂纳尔的办公室。凉鞋走在走廊里的石头地上发出回响，后来，忽然听不见响声了。他也许从办公室里出来看看，我仿佛听到他关切地问:“怎么回事，奥尔坦莎?你怎么了?”我闭上了眼睛，不愿看他。我再睁开眼时，看清楚了楼梯，于是下决心走。凉鞋的趿拉声又响起来，但是……我得救了。我走到楼梯的拐角处，离他远了一些，这正合心意。“吻您的手，沃什蒂纳尔太太。”这声音吓了我一跳。啊，原来是门房。半小时前，我走进医院门时，他也这样问候过。我报之一笑，是为了应付而笑。我又下了几级台阶，从一扇玻璃门走出去。在春天午后的这个时间，出人意外强烈的阳光迎面照着我。我得救了。

妇产医院的入口处在小胡同里，小胡同连着两条大街。有轨电车的轰隆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我往左来到一条熙熙攘攘的街上，这里没有电车。我希望尽快回到家，以便一个人静静思考刚才发生的事情。我的猜疑有根据吗？他真的瞒着我什么吗？同时，我还有个迫切的理由，希望尽快离开医院。下楼梯时，我听到附近什么地方有微弱的哭泣声，如同蜂群的嗡嗡声。大约是新生儿啼哭，我侧耳细听了片刻，一个护士就用力碰上了门。我感到似匕首刺心。离妇产医院愈远，那个创口的疼痛愈轻。我必须穿过大街，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瞎了眼，想找死？"我被吓得心惊肉跳。一辆载重卡车在我身边来了个急刹车，黑乎乎的司机从驾驶室打开车门咒骂……我匆匆跨过人行道的石栏杆。每走一步，我就离开沃什蒂纳尔远一步，我就赢得了一分。眼前这是最主要的。我继续向前走，试着辨明方向。我来到了陌生的地区，过去只坐车经过，从茶色玻璃车窗往外看，景色大相径庭。那天，我乘坐有轨电车到教堂前的广场下车，好几条街通到广场。我朝前看，只见不足100米的地方有一座塔，银色的塔尖正在阳光下闪光。我记得塔左侧有出租车站，看到过司机在钟楼的阴影下聊天。如果走运的话，我可以找到一辆出租汽车……10分钟就可以回到家里了。

我不走运，连出租车的影子都看不见，车站已经撤销了。“怎么，您不知道?!”我问到的一个男人惊异地说，“他们就是这样子，一会儿换个地方，一会儿换个地方，怕呆烦了。”唯一的办法是乘有轨电车，当时正赶上下班时间——我请了一天假——电车挤得水泄不通。我也去挤？完全不可能。再说，我想躲开人，自己清静一会儿。我决定步行回家，只要沿着大街走，总不至于迷路。这样一来，就躲不开有轨电车了，至少也得忍受几分钟的时间。我应该在第2或第3条街口向左拐。拐弯的地方有一座3层红楼房，房顶有尖塔。房顶铺着红、黄、绿3种颜色的瓦，其中以红色为主，十分显眼，从这儿路过的人会留意的。我记得街道是以阿尔迪亚尔学派的一个学者的名字命名的。中学时代，巴西利亚德小姐——她是个老姑娘——给我们上拉丁文课时，曾经提到过阿尔迪亚尔学派。我对那位被时间挤干了的瘦小女教师的形象记忆犹新。她随身带着裁缝用的皮尺，专门量姑娘们的裙子。“你们想露出大腿来吗？不要脸的东西！”她生气骂人时，摩尔多瓦口音特别重。她看不顺眼漂亮的姑娘，千方百计虐待她们，她更不放过金发姑娘玛里莱娜。她长得丰满，有魅力。拉丁文考试玛里莱娜只得了3分。她不在乎，因为自己已经跟一个飞行员订婚，秋天就退学结婚。女同学们都应邀去参加婚礼。大家议论

说："玛里莱娜多走运！"她，奥尔坦莎，4年后，上大学时才结婚。

我要找的那条街既不是第2个街口，也不是第3个街口。当她快走到第4个街口时，才远远看见红砖墙和在太阳下闪光的彩色琉璃瓦屋顶。红墙上钉着一块蓝牌子，上面写着白字：蒂莫特伊·奇帕里乌。看来，我没有记错，这条街的板栗树成荫。刚才，我一直在太阳下走路。然后，我得向右转，再左转，就到公园，穿过公园，也就回到家了。不料，走公园的捷径并不理想，因为正遇上母亲们推着婴儿车在铺着柏油的林荫道上散步。她们面带倦意，据说妇女产后几个月睡眠不足，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人们从她们脸上的倦容中，还可以看出慈祥的幸福感。这时，我又感到匕首刺心，于是加快了步伐……

我推开虚掩的门，快步登上那几个台阶，从手提包里取出钥匙，打开屋门，轻轻松一口气，我终于回到了家。我随手扔掉手提包，倒在最近的扶手椅里，松散松散筋骨。室内安静，百叶窗半开着，只能从外面射进少量光线。在我面前的小茶几上，一只钟滴答滴答响。我走得很快，只用了20或25分钟就到家了。小茶几是沃什蒂纳尔的最新"收藏品"，4条腿很精致。家里像个旧货店，被他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具，只有我的房间没有遭到侵扰。他俨然是个从事崇高事业而受迫

害的人，自我辩解说："有什么法子呢，亲爱的？我也有自己的爱好。"他说话的腔调矫揉造作，真使我奇怪。我知道，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怎么学会了戏言？后来他才解释说，这是"时尚"，能显示"身份"。水晶玻璃？波斯地毯？日本或根德牌的录音机？他耸耸肩满不在乎地说，那是所有的暴发户都有的。贵重家具吗？这可不一样。我在它们中间穿行，愈来愈困难了。

我扔掉连衣裙和内衣去淋浴。从开到最大限度的喷头里射出来的冷水刺激着我，使我顿感舒服。我走出浴室，用一块硬梆梆的大浴巾擦身子，觉得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加快了，浑身产生了一股愉快的倦意，我披上长睡衣去找烟。其实，找烟并不困难，我平日到处乱放烟，使沃什蒂纳尔很伤脑筋。甚至放在中国的黑漆小柜的抽屉里……我还买了一个中国造的小打火机。我走到长沙发跟前，长吁短叹着倒在沙发上。

是的，一切正常，或者几乎是都正常。但是，在所谓我不能生育的问题上，沃什蒂纳尔比我知道得多。这个印象日益突出，甚至成了我的坚定信念。什么"情况"？以他们难懂的、专用来吓唬外行人的术语说，我没有"器官性不正常"，也就是说不存在器官方面的缺陷，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婚后几个月，我怀过孕，尽管那是多年前的事。那么？问题缠得我脑袋发胀，淋浴带来的舒

服感消失了。结婚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跟自己的男人疏远了，这个词可能太重，可是我找不出另外的字眼儿。简单说，他若不是在骗我，就是有意拖延，认为全是我的问题，时间一长就自然而然解决了。

我盖着毛毯躺在长沙发上，翻了一个身，手里拿着从厨房找来的香烟，我在那儿弄了个小仓库，相信他不会想起来去翻腾。我点燃第一根烟，凝视着蓝灰色的烟圈慢悠悠地升起来，直抵天花板。透过百叶窗射进来的少量光线，使我只能看清烟雾冉冉升起的部分景象。我继续想着他，也许，他为了隐瞒什么，故意要含糊其词。隐瞒什么呢？我的头痛得厉害，得把没抽完的烟掐掉，把烟头捻在烟灰缸里，我抽得不少了，满屋是烟味。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开窗，让烟味散一散。我从长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拉起百叶窗。我离开沃什蒂纳尔已经一个多小时。阳光变得柔和了。我贪婪地吸一口新鲜空气，一个无法避开的念头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我接受不了，并且害怕它。恍惚我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受他宠爱的长着一个娇小可爱脑袋的奥尔坦莎，一意孤行地试图论证像水晶一般清楚的事实；另一方面，作为女人，正痛苦地发现丈夫在欺骗自己。不，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欺骗，沃什蒂纳尔没有情人。他几乎是个体贴入微的

模范丈夫，只是很少有空闲时间陪伴我。他不吸烟，不酗酒，没有恶习，只有一点例外：高傲。更确切地说，两点例外：高傲和自私。我想，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缺点。孩子吗？怎么说呢？他没有要孩子的愿望。他不想看见孩子，因为觉得没有必要。他的心如同缺了一根弦的竖琴或钢琴，只不过他自己意识不到。当然，近几年来，我们议论过孩子的事。每次都是我先开头说。他则嘲讽地瞧着我开玩笑——怕我把他看得太坏——问我："我的小奥尔坦莎想要个小宝宝，好在她怀里撒尿，她下班后也可以高高兴兴给他洗澡？"他像一条鳗鱼从指缝中溜走，从来不深谈这一问题。如今，一切都黑白分明，无可争辩。这是令人心碎的事实。我勉强站起来，踉踉跄跄朝冰箱走去，想喝一杯矿泉水。我的上颚已经被无休止的吸烟熏坏。我还希望再有一点时间，以便回顾一下结婚前发生的事。

"姑娘们，你们听说谁要出嫁吗？是奥尔坦莎，那只小猫！"

我正要开门进大教室，手在门把上停住了。我小心翼翼地抽回手，避免有人从门缝里发现我。从教室里传出来呀呀嘈嘈的说话声和一个男生的无礼笑声，仿佛是在说："我们管这种小事干什么？！"接着，那个被惊人的消息弄得兴奋的声音又说："是啊，简直想不到是她，那只小猫！"

“可能是个什么老头儿看上了她。”一个男生说。

“你呀，维奥雷尔，管好你自己吃喝就得了。”一个非常威严的声音反驳说。我后来才听出，那是克莱蒙蒂娜·布苏约克的声音。我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朋友……结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什么小老头，酒鬼，我认识他，不是什么小工程师，你将来只配是那样的人！他是个‘挺帅’的男子汉，医生，而且是妇产科医生。今年夏天去实习时，我也见过他，他们是那时‘勾搭’上的。”

“行了。”米瓦拉·斯皮尼亚努说，“奥尔坦莎挺可爱。”

“可爱……？她？”克莱蒙蒂娜不以为然地说。

“是啊，她的体型好，腿很美，你得实事求是，亲爱的，你得承认。”

“哼……”

从走廊的尽头传来匆匆的脚步声。不用回头看就知道是谁，她们已经熟悉并能分辨教授们的脚步声。副教授卡波塔来上课了。她刚刚躲到迎门的窗口边，点上了一支烟，大口抽了几下。卡波塔来到教室门口，看见了她，向她问好，并打开教室门，彬彬有礼地请她先进。他们一前一后走进了教室。

事情的大致经过跟克莱蒙蒂娜所说的差不多，尽管她用了粗俗、不拐弯的话：“他们勾搭上

了。"12年前，沃什蒂纳尔确实是个英俊的男人，现在也不……她不无忧伤地想起他的霜鬓，不过，她倒挺喜欢那质朴的双鬓白发，使他显得"气派"。她当时是大学3年级的学生，怎么能不着迷？他的笑容开朗，别人根本不会想到笑中藏着什么东西。近几年来，他那修长的身材发胖了。他一笑，左脸上有个酒窝。现在酒窝消失了。他也很少笑。他们初相识时的散步是在城内的公园里，实际上只是一块草地。小树之间有几条林荫道，还有一个花圃，市政当局在花圃周围放了两三张长条凳。到底是几张？两张或三张？她记不清了。在公园旁边，有一条流水湍急的小溪，上面用白桦树干架起小桥。在一个望日的月夜，沃什蒂纳尔就在那座桥上第一次吻了她。他请她上饭馆，她要求克莱蒙蒂娜作伴。桌子很小，显得气氛亲切。桌上铺着红白方格布，也许送这块去洗时，换上另外一块蓝白方格布。沃什蒂纳尔把里齐亚医生带来，想给克莱蒙蒂娜介绍一个男朋友。他和里齐亚都在一家普通医院里工作，是医院里仅有的两个单身汉。很遗憾，她又想起了医院。里齐亚没有看上克莱蒙蒂娜。后来，她失望地了解到，这位医生一年多来同附近村庄的一个胖农妇同居。克莱蒙蒂娜为了会见里齐亚，头天晚上就开始打扮自己，梳起了留海，并在金黄色的头发上涂了油，那油发出一种霉味。克莱蒙蒂娜得知里齐亚的私

情后，抱怨说："他不是真心的。"

我留在沃什蒂纳尔住处的第一个晚上，并没有问过自己，他是不是"真心"的。他住的房子座落在一条街上，确切地说，那是乡下小镇上的一条路，没有自来水。婚后的第1个月，他买来了个小水桶，我们从街头的水泵运水。我们在那儿仅住了1个月，度过了所谓的蜜月。后来，我们分到1套单间，就搬进了楼房，从此有了自己的"家"。我愈回忆，愈伤心。时钟表明，离他回家来还有2小时20分或30分钟的时间。他回家后会改变一切，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推迟他的到来。

我们结婚前后的几个月里，情况是另一个样子。如今，我想不起他当时的模样了，因为时间的推移和失望情绪已经使它变模糊了。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我甚至忘记了自己当时的样子。我只记得爱他爱得发疯，我认为他对我也一样。否则，他为什么与我结婚？我既不富有，又没有亲戚在部里工作，帮他飞黄腾达。他是爱我的。但是，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爱，即表现为占有欲。我痛苦地回忆起，自己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认清这一点。我应该坦率地说，结婚后，他变了，变得像个中学生，要不然就是故意做出的姿态，不愿摆出一副"医生先生"的铁板面孔。后来，他不苟言笑，这成为他的习性。秋天，我继续上学，不过

到校的时间稍晚些。沃什蒂纳尔对我保证说："我可以给你弄到病假证明，要多少有多少！"我在宿舍里等他的信，念一遍又一遍，百看不厌。是的，我为什么不好意思承认？我进入了新环境，想念他，焦急地等着他的电报。每月，至少他能抽空到这个大学城市来一次。11月底，我们城里的医学院举行妇产科学术讨论会，我们一起呆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不开会的时候，我就逃学。他让我去旅馆订房间。我昂首挺胸地走进旅馆，因为在我看来那是"太太"应有的派头。我们总是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客房登记处的人和楼层服务员都认识我们。他们一看见我，便眉开眼笑地迎上来。"是的，当然，"他们回答说，"对太太和医生先生来说，我们随时都有空房间。"12月放假时，他把我接回家，对我说："不用操心，开春后，我们将分到一套两间的房子。你的分配问题，我也安排好了。你去实习过的那个工厂厂长皮什库莱斯库，欠我的情。他妻子生孩子是我接的生。"那时，我觉得自己就是阿拉丁；我把手放在神灯上，说道："芝麻，开开门。"我的任何愿望都能实现。晚上，我们去公园散步，听到游人低声说："多么般配的一对！"我感到无限幸福，紧紧拉住沃什蒂纳尔的胳膊。

12月底，我们前往奥拉迪亚，去我家里同父母亲一起过新年。元旦下午，我们出外散步。人

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正在酣睡，城里寂静无声。我们沿克里什河走，小雪纷纷扬扬，我们的脚印破坏了地面上的薄薄积雪，使人行道露出了灰色的柏油路。我们朝城外走去，过了一座桥，走近另一座桥。现在，我恍恍惚惚看见那时自己踮起脚尖，贴近他的耳朵，说出了一个“新闻”。不料，他立刻拉长了脸，就像有人用木棍敲了他的脑门。“好吧，奥尔坦莎，”他对我说，口气里含有责备的意思，“你采取预防措施了吗？”他怀疑地看看我，像那些善于对付“打击”的人一样，旋即镇静下来，并笑着说：“你好运气，挑了我这样的丈夫。”我不明白，至少没有马上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是的，奥日诺并不是万无一失的，有例外，不多，但是有例外。你就愿意成为一个例外。”我们走过了第2座桥，也就是后来建起旅馆的地方。天已经黑下来，我想往回走，他不同意，看来，他需要找个没有人的安静地方说说心里话。他说：“奥尔坦莎，你星期一先别回去上课，到我的医院去，我替你请一周假。”他说着笑了笑，我第一次对他的笑声产生反感。只有我们两人在冬天黄昏的薄雾中漫步，没有别人听见他的话。克里什河水懒洋洋地、无动于衷地往前流动。“我设法给你弄缺课病假条，我来为你安排。听我说：我要给你做个小手术，不痛，你不会有感觉的，给你用上麻药，等你醒过来

时，一切恢复正常。”他根本不问我同意不同意，自己说了算。他用铲子般大手搂住我的腰。我们开始往回走。我们脚下的薄雪被踩得吱吱响。

## 二

隔壁房间里的钟摆响了 7 下，轻轻的颤音悦耳动听。作为收藏家的妻子，我只知道那是一只布尔[①]钟，它的字盘放在 4 根大理石的小支柱上，烤漆的钟盒上镶嵌着象牙和贝壳。几年前，我们去布加勒斯特买来的。那次，我们从利普斯坎尼街逛到科瓦奇，当天上午我刚从罗马尔塔买的鞋太夹脚，走路很困难。“先生懂行，我看得出来。”中年售货员对他说。售货员长有一双色徒的眼睛，头发上了蜡，梳着40年代的发型。他说了一声“请跟我来”，就掀开小门帘，领我们走进一个地下室，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斜着眼瞅我的腿。他拉开一块布罩，从架子上取下他的“宝贝”，将时针拨到12点，钟便发出美妙的声音。他说：“是地地道道的布尔，一个缺钱用的收藏家卖给我，或者确切地说，委托我出售的。日子艰难啊。”他边发议论，边耸耸肩。难道真的是桃花心

① 布尔(Boulle André-Charles，1642—1732)法国著名家具工匠。他的木镶嵌技艺高超，被人们称为布尔工艺，18—19世纪，布尔工艺在欧洲十分流行。

木制作的？擦发蜡的人在沃什蒂纳尔的耳边说了价钱——值得那么保密吗？——他就一声不响地付了钱，真不便宜。我们打电话叫来出租汽车，他像抱小孩一样谨慎，把钟紧紧地抱在怀里，返回旅馆去。

此时，钟声表明他快要回家了。如不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几分钟后就该回来了，否则，他会打电话通知我的。我从长沙发上跳起来，走进厨房，冰箱里有现成的肉，我忙做了一盘烤肉和生菜。烤肉没有凉，门外就传来了刹车声。他回来了。我把烤肉就这样连同生菜塞入冰箱。我又赶紧脱掉睡衣，换上晨衣，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把窗子统统打开，倒掉烟灰缸里的烟头，因为他可能会进来。我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但没有出去迎接。

“喂，家里没人吗？”通过虚掩的屋门，我听到他的问话。这天下午对他来说与平时一样，是我犯了精神病，要检查吗？好吧，他满足了我的要求。至少对他来说，一切正常。

“沃什蒂纳尔，”我装作刚睡醒，从屋里对他说，“我的扁桃腺发炎。吃的都准备好了，放在冰箱里。”这个晚上，我必须争取时间，尽量少看见他。

“好吧，好吧。”我听到他嘟哝着向浴室走去。一听到淋浴的水声，我知道可以有几分钟的时间

了。天气闷热，他要冲淋，凉快凉快，而我则要利用时机。我取出一条床单，一个枕头和一条相当保暖的薄毛毯，给他在办公室里铺了个床。我们有间办公室，当然也兼做诊室。我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就从浴室走了出来。

“沃什蒂纳尔，”我从卧室里对他说，“我给你办公室铺了床。我觉得不舒服，想一个人呆着。我睡了，得吃一片安眠药，还想吃点止痛片。明天早上叫我！要是叫不醒的话，摇晃摇晃我。”

“放心吧，”他笑着说，“我会抓你的痒，弄醒你的，用不着担心。”他在门口站住，推开半开的门，走到床边。“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没什么。”我眯缝着眼看他，回答说，“扁桃腺发炎。明天早上就好了。”

“好吧。”他说完就走出屋，往厨房去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用脚尖找到拖鞋，穿上晨衣去浴室，从小药箱里拿了一片安眠药，一片止痛片。然后，又去厨房，从碗柜里取出杯子，打开冰箱门，准备倒一杯矿泉水。我手拿杯子弯下腰时，听见他说：

“别受凉，冰箱的水凉。”

“不会的，”我说，“我只喝几口，吞下药就行。”

“好吧。”他同意了。这是他的口头语，我一听就烦。不过，我没有理会，只回身看了他一眼，

他后脑勺的头发开始灰白，脖子也变粗了。他正在贪婪地吃饭，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我想，这是从他身上发现的第一个缺陷。他狼吞虎咽吃东西时，就吧唧吧唧响，忘记了吃相。如果按顺序重现往事的话，必须纠正一下，这是第二个缺陷。因为，早在奥拉迪亚，即我们结婚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就发现了他的第一个缺陷。确切地说，是在元旦下午沿着克里什河散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两次他那粗俗的笑声，我们称之为“公鸡叫”。同年夏天，作为对我顺从他的一种奖励，我们前往保加利亚旅游，在那里发现他有令人厌恶的吧唧声。我们住在旅馆里，第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能欣赏壮丽海景的露天阳台上用餐。天空万里无云，繁星闪烁，像我们的家乡一样。有一只船正在远处的海面上像蜗牛爬行似地慢慢移动，船上的灯光一闪一闪。船驶向北方，可能是去康斯坦萨。年轻的胖姑娘身穿民族服装，给我们端来了烤肉和一大盘凉菜，做法同我们不一样，他们加了黄油、奶酪、奶豆腐以及别的什么东西。沃什蒂纳尔拘谨地取些凉菜，放在自己的盘子边上，聚精会神地品尝起来，忽然间，他莫名其妙地吧唧吧唧咀嚼起来。他的盘里堆满了菜。他吃着对邻座的人说：“天哪，真好吃！”我记得，那人自我介绍说是从锡杰图-玛尔玛齐耶来的。他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表示同意。“我

知道。”沃什蒂纳尔边往嘴里填东西，边炫耀说：“我以前也来过保加利亚。”我用脚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他，凑近他的耳朵小声说：“你是怎么吃的？人家都听见了！”他立即意识到了。后来，我们应邀去做客时，他倒注意吃相。而现在为什么呢？他是在家里。

去保加利亚旅行是我第一次出国，过了多年之后，我才又回忆这件事。沃什蒂纳尔喜欢“出”国，并且也感染了我。我想，他出国是为了出风头，好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见多识广。总之，他是想表明自己真正见过世面，至少他认为见过世面的人都应该如此。作为有文化的人，我们还去听过一次交响音乐会。不过，他感到腻烦，对我坦白说：“我什么也没有听懂。”我也没有听出个名堂，但是喜欢听。

我们在德累斯顿参观了画展，沃什蒂纳尔手里拿着说明书，皱着眉头观赏拉斐尔① 的圣母像。我叫他按自己的方式“欣赏”，自己单独活动。那么多杰作，看得我腰酸腿痛。你知道旅游中的事，导游总催着你快走。我们参观完歌剧院，一走出门，导游便一个劲儿地喊“女士们和先生们”。她是个可爱的德国姑娘，我想她学过美术史，去过我们的海滨玛玛亚，她在那儿通宵跳舞，天一亮

① 拉斐尔(Raphael，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杰出人物之一。

就下海洗澡。我们还参观了歌剧院，那儿正首演瓦格纳① 的歌剧。我们只用了1小时40分钟的时间参观画展。然后乘汽艇游易北河，晚上赶到巴乐克式的大教堂去听管风琴演奏巴赫的曲子。

将近中午，我们来到德累斯顿。上午，我们“参观”了魏玛的歌德故居、城堡和公园。有人还想瞻仰诗人的墓。但是，锡格林德开着玩笑制止了。他表示歉意说，离公墓很远，我们还得参观席勒和李斯特旧居，然后乘车去德累斯顿。上车后，我发现腿累肿了。

在展览会上，我坐下来休息，要不是难为情，我真想把鞋子脱下来舒服舒服。可是，一张画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且走近去细看。我说不清楚是为什么，它像磁铁吸引着我。那是弗美尔② 画的《掮客》，通俗的说法是皮调匠。前景画的是穿时髦服装的中年妇女，脸上的表情狡猾奸诈，一枚闪闪发光的金币放在她稍向后伸出的左手掌里，她背后站着一个青年女子，正用热切的目光斜眼看着金币，那是她的卖身价。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竟把自己比作弗美尔画中的年青妇女，金币则是我们的保加利亚之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简直是胡思乱想，你当时并不知道将来会发

① 瓦格纳(Wagner Richard，1813—1883) 19世纪后期德国主要作曲家、歌剧作家。

② 弗美尔(Wermeer，1632—1675) 荷兰风俗画家。

生的事。"当然，这是事实。不过，这一赤裸裸的对比法犹如一个精灵，长期缠着我。

沃什蒂纳尔早就说到索瓦塔去。后来真去了，尽管我是半信半疑，他事先知道会白跑一趟。我们碰上了坏天气，整天闷在别墅里，连一天吃三顿饭也离不开雨伞和雨衣。有什么说的，白白糟蹋了假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采纳沃什蒂纳尔的一个熟人（他处处有熟人，以结识"朋友"为荣）提出的建议。他说："你们既然开车来，为什么不去特尔古一穆列什玩玩？在那儿呆一两天。我认识一家旅馆客房处的人，住宿不成问题。"我们立刻同意。逃出这个与世隔绝的休养站，令人感到高兴。次日清晨，我们便驱车离开索瓦塔这个窝。

我们在一条荒凉的公路上低速前进。雨哗啦哗啦地下，猛烈敲打着挡风玻璃，使得雨刷子不停地擦来擦去。我们路过一片枞树林，如果天气晴朗的话，景色会十分优美的。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云彩像跳意大利民间舞，至少我当时有这样的感觉，飞舞的云层很低，几乎贴着针叶林的树冠。当我们到了城郊时，雨停了，太阳羞羞答答露出了脸。我们很快找到了旅馆，朋友说的话算数。我们散步不用雨伞和雨衣，而前几天几乎处处离不开它们。天空开始放晴。沃什蒂纳尔非常随便地开玩笑说："要是这样下去，孩子们，下

午就可以去游泳了。晒晒太阳。"他在旅行中爱用这种口气。

我去沃什蒂纳尔的医院做检查，已经两个多月了，至今对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下午，他低声细气地对我说，要到医学院去看看，并解释说："是学术访问。我知道，同事们都放假了，不过，也许还能见到个把人。"他还是那个毛病，一心想当"作者"，"研究者"或什么"科学家"。不管怎么说，我巴不得一个人呆着，可以"自由"了。干什么呢？散散步吧。但是，不大一会儿我就厌烦看橱窗了，因为这儿的橱窗与我们那儿的恰如两滴水，完全一样。我想："进书店去买本书，回旅馆看到黄昏。"我已经买了晚上的电影票。

忽然，有人叫我："奥尔坦莎，怎么这样巧？"我吃惊地回头看。我在这个城里没有熟人，玛里奇卡·拉雷什热情地吻我、拥抱我后，我才醒悟过来。她是我四年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黑卷发总是乱蓬蓬的，小鼻子朝上翘。她没有变化，看一眼她的眼睛就知道仍然是个"好姑娘"、"热心人"——我用了大学生们的行话。

"你来特尔古—穆列什干吗？"她这样问我，好像昨天我们才在食堂的走廊里分手。不等我回答，她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想起来了，她的绰号叫"机关枪"。有一次考试，她对答如流，教授笑着制止她说："小姐，请慢点，您说话像机关枪一

样快，我什么都听不明白。”她口若悬河向我传播了“新闻”，没想到自从跟这个同屋住的同学分手后，发生了那么多事！她与一个同行结了婚。“你不认识他，在雅西毕业的，比我们早一年。”她还没有小孩。不过，她狡黠地笑着强调说：“只是暂时没有。”后来情不自禁地补充说：“奥尔坦莎，我太幸福了！我已经怀孕了。明天就去医生那儿检查。”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哪儿会知道能遇见玛里奇卡呢？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以后也不可能再来了，我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玛里奇卡，带我一起去吧。”

她没有马上弄明白我的意思，当然也无法明白。

“带你去哪儿？”

“做检查，我也想做一次检查，明天就去，不要拖，后天我们就回索瓦塔。”

“好吧，”她犹豫地说，“你想去，就带你去，可是……奥尔坦莎，据我所知，你丈夫是医生……妇产科的。”

“我根本不想让他知道。我想可以信得过你，你会保守秘密的。”

“当然。”她迷惑不解地应承了。忽然间，她那满月似的面孔丰润有光，仿佛自认为发现了真情，“奥尔坦莎，”她说，“你有情人？好的，我什么都

不说，也不再问你什么。你住在哪个旅馆？明天早上我来接你。现在我走了。再见。”她朝我会心地笑笑，便灵活地钻进行人中。

当我从头上套连衣裙的时候，听到水龙头的流水声。我用手理了一下散乱的头发，然后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向挂着我的手提包的椅子走去。我忙掏出小镜子照了一下。我梳理了头发，心怦怦跳，脸上泛起红晕。几分钟前，我从那张可怕的台子上爬下来。幸亏医生是个小老头，如果是年轻医生，那就更让人难为情了。玛里奇卡对我说过：“波普医生是我们城里最好的妇产科医生。”波普医生具有老年人特有的礼貌，十分慈祥，他用凉手检查了很长的时间，我不禁害怕起来。

后来，我听见流水声和关水龙头的声音，这就是说他已经洗完手。我看见一块樱桃红色的大毛巾，不堪入目，可是，话说回来，毛巾的颜色关我什么事？我斜着眼看他拘谨地将毛巾挂在水池旁边的金属架上。我忐忑不安地瞅着他的一举一动，心想他是不是故意磨时间。他终于完了事，不慌不忙地向他的办公桌走来，我坐在他的桌子旁边。他把青筋突起的手放在一堆纸上，手背上满是皱纹，皮肤很薄。我像被人施了什么魔法紧盯着他的手。我心里想，这位医生至少干了40多年，一共接过多少次生？

他戴着老式金边眼镜，默默地望着我，细心

地打量我，看来他知道我正战战兢兢地等着他的判决。

“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尊敬的太太。”他这样对我说。“没有什么器官性的毛病。”对了，他用的就是“器官性的”这个词。他接着说：“当然，检查一次不一定能确诊。比如，怀孕的最初几周不一定有征兆。”他转换话题，问道：“您如果允许的话，我提一个问题：您结婚几年了？”

我回答说，15年了。我通过老人的话慢慢了解到实情。

“而在这期间，哦，……请原谅，从来没有过？”

“有过一次，是在婚后的几个月。”

“是一次正常的怀孕？”

“我想是的，”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打了胎。”

我忘不了他那时的目光，是怜悯，同情，鬼知道是什么？

“尊敬的太太，”他说，“我不想说这是唯一的可能，总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但是，这是最大的可能。也许，手术没做好，做得不熟练，受到感情的影响。或者，我的同行手术是做得成功的，我不想责怪他，可是大自然很古怪。”他停顿片刻后，相当严肃地说：“是的，很古怪。它不愿受人摆布，会出人意外地进行报复，尊敬的太太，报复。”

秋天，我失去了任何信心，建议沃什蒂纳尔领养一个孩子，不过，我并不抱多大希望。我知道，他会绕来绕去，设法避开问题，一旦他被逼得无路可走，我只不过能得到模棱两可的答复。我了解自己的丈夫，他不会断然拒绝，只能躲躲闪闪，找到含糊不清的答案。我发动了一场没有获胜希望的战役，我怀着好奇心看他如何应付。使我伤心的是，他如同被忘在水中的海绵，身上浸透了自私和偏见。我为什么要再次痛苦地证实他的这些弱点呢？有什么益处？于是，我妥协了，尽力克制自己，幻想着又回到了婚后的甜蜜日子。可惜，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的结合是幸福的。我这几年换了不少工作地点，所到之处，女同事们都有同样的说法。我发现，任何地方的女同事们都愿意谈论家丑，津津乐道他们私生活中的烦恼，这未免有点不知羞耻。该怎么说呢？她们在大庭广众中有清洗自己的脏衣服的愚蠢嗜好。一个丈夫酗酒，另一个同"那号人"鬼混，再一个没给家里钱。许多人有古怪的暴露癖，喜欢谈家庭生活中的阴暗面，使人感到有如闻到了腐烂的腊肉或脏衣服。她们想引起同情，得到女人的声援。但是，不，我不同情她们，厌恶她们喋喋不休的诉苦。她们夸沃什 蒂 纳尔"挺帅的"，"会关心人，体贴人"，"你真幸福，奥尔坦莎，找了个那样能赚钱的丈夫。"

是什么决定了我到电机厂去试试的呢？首先，我厌倦了原来的工作，其次，沃什蒂纳尔怀疑我的能力反而促使我下决心。"我听说那儿得拼命干。你何苦呢？念完大学了，现在又想去考试？"是的，我就想去考一考。在小厂和合作社晃来晃去，已经使我落后了。我好奇，想知道自己到底懂不懂专业，是不是已经忘了？我没有马上见到贝尔巴。他委托了一位年纪稍大点的工程师先作一次"筛选"。他要求我们一早到工厂去，那儿有2个空位子，候选人有4名。工程师沙菲雷斯库不信任地瞥了我一眼，他可能在想，这个唯一的妇女去做什么？不过，他仍然有礼貌地控制住了自己，带我们去车间里转，在每台电动机前面停下来，向我们提出有关的问题。他不正眼看我。不难看出，"这个沙菲雷斯库一定跟妇女过不去"。我装作没有看出来什么，从容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我回答时才知道，自己过去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几乎都记得，忘记的东西很少。次日，4名候选人只来了2人。工程师神秘地笑笑。他严肃地向我们宣布，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告别前，他走近来问我："您在我们这样的工厂里工作过吗？"我认为他有意取笑我，便气呼呼地回答说没有，并用机关枪的速度罗列了我工作过的合作社和小工厂的名字。他轻轻地摇摇头。看来他十分震惊。我惊喜地明白，自己通过了考验。他请我跟他走。他

说："厂长同志要见您。"那时，我才第一次见到贝尔巴。

我什么时候发觉爱上了他？爱上了他，是最恰当的说法吗？我想，不至于是在那时。我跟着沙菲雷斯库上楼，心里不再害怕了，如果说我没有"击昏"工程师，那他也得明白女人生来是有用的。真不晓得这个沙菲雷斯库受到过什么样的感情刺激。据我所知，嫌弃女人的人往往受过什么刺激。至于厂长嘛……我不太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了，因为我一直在生沙菲雷斯库的气，他竟然瞧不起我。他已经"汇报"过了，但是厂长要亲自考察。贝尔巴厂长对我说："希望您能跟我去厂里转转。""难道还要进行第二次考试？"我顶了他一句，连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会变得如此粗鲁无礼。他自上到下打量我一遍。我差一点忍不住要对他说，第一次考试够烦人了，我受够了，完全够了，我也不再申请，放弃了，用体育术语说是弃权了。我不如回小厂去，那儿谁也不会这样折磨人。我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一句话，我差一点拂袖而去，因为感到已经忍无可忍。我担心，再过几秒钟会扮演歇斯底里女人的角色，到那时，一切全完了，我为进电机厂所作出的努力将被沃什蒂纳尔嘲讽为心血来潮。我控制住了自己，因为，他对我笑了笑，那个出人意外的笑改变了他严肃的表情。他对我说："别把这看成是考试，您冷

静一点，我们想了解一下来我厂工作的人。”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应承，至少一半是应承。他接着说："工程师同志，我还想问您一件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它看作是我的好奇心作祟。您在哪些地方干过？怎么能不忘掉专业？”他盯着看我，我立刻明白，这个人可不是在考试。“还有一件事，您怎么一直没有搞自己的专业？您可以干得很出色，我和沙菲雷斯库都对此深信不疑。”他说完就瞪大眼睛望着我，他的眼睛很美，可能带一点忧郁，但却更富有表现力。这种眼神鼓励人说心里话。我随即改变了态度。他说得对。我为什么白混了那么多年？我不知所措地回答说？“不知道。我是瞎混。”他大概没有料到会得到如此坦率的回答，愣了一下，我们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我想，那就是开端。

回家后，沃什蒂纳尔讽刺地问我考上没有。我回答说："不知道。等着他们通知吧。”他反应说："一般都是怕人下不了台，才这样处理的。”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第二天，我们厂人事科的人就对我说，电机厂来要我的档案材料，“准备录用”。几年后，我仍然能回味当时的那种高兴和自豪的心情：看来，我并没有因为在合作社和小厂混日子而丢掉专业技术，还有用处。当初，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高兴的原因还有能再看见严厉的“厂长同志”。我迷上他的笑或那一双眼睛，对，首

先是他的眼睛。临近黄昏时，电话铃响了，我吓了一跳。为什么？每天从早到晚，有人找沃什蒂纳尔，还有人竟半夜打扰他，当然，都是些有身份的人，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这样做。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我确信电话不是打给他的，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沃什蒂纳尔在医院里，我去接电话。“是沃什蒂纳尔家吗？”我听到对方的问话。“我是贝尔巴。”“您是工程师同志吗？”我辨明了电话里的声音。“是的。”我回答道。同时，我感到自己的声音发颤，心怦怦跳，鬓角发胀。“我想通知您，从下月开始，您被我们工厂聘用了。我已经同您的厂长谈妥了。请您明天就把调职申请书交来，下月1日，您将接到任命通知书。我希望这是个好消息。祝您晚上愉快。”我只喃喃说了句“晚安”，不知道他听清没有，传过来挂断电话的声音。

我对贝尔巴的好感是逐渐明朗化的，我甚至不敢对自己承认这种感情。不管怎么说，若不是女人心里空虚的话，男人进不了女人的生活，他想也别想。我不是黄毛丫头，已经年过30，并日益趋近40岁。起初，主导的因素是敬佩，现在依然如故。我得感谢沃什蒂纳尔，他使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感情上的微妙变化。他觉察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新情况，犯起疑心来，他面对新情况，失去了坚定的自制力，变得束手无策。

不是他不信任我。我想，他一刻也不会怀疑我

能像律师们所说的“不贞”。我连想也没有想过这种事。在很长的时间里，贝尔巴对我的吸引力是时隐时现，我并没有深入思考它。沃什蒂纳尔相信我，把我看作是他挂在椅子背上的衣服，是属于他的。就我来说，始终是个“严肃的女人”。我的新厂长也不像是沾花惹草的人。其实，我对另一个男子所表现出来的毫不加掩饰的敬佩，使沃什蒂纳尔的心中苦涩难言。我不知道，他是否把它看成是不忠实或者背叛。我在大学时期结了婚，某些女同学对我的意外“运气”(“其实，她有什么可爱之处”)所表现出来的妒忌和贬损，传染给了我。后来的事实表明，沃什蒂纳尔是硬纸板制做的虚假偶像。另外一个男人闯进了我的生活，尽管仅只引起了我对他的敬佩，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但伤害了沃什蒂纳尔的自尊心，侵犯了他那神圣的所有权。

我的工厂在郊区，为了能在7点钟赶到，我必须起早。我不让他送，“不行，沃什蒂纳尔，你来不及用车送我。你会迟到的。”于是，我跟其他人一样在车站等有轨电车，挤进满满当当的车厢。车里的人渐渐少了，仅剩下我们这些去电机厂的人。我在终点站下车。秋天来了，有时夜幕还未散尽，前面几百米的地方，隐约可见树林形成的黑线条。走在去工厂的路上，我感到迎面扑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我并不认为自己幸福，早就没有

这种感受了，不过，从来没有过的欣喜之情却油然而生，因为我像那儿所有的人一样，正在从事有益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使我重新发现了自己，并能独立谋生。回想起我同贝尔巴的初次谈话，简直羞得无地自容。他说?“您是工程师，为什么不从事自己的专业?”现在，我有了专业，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而这是过去在合作社和小厂里办不到的。

4月，我被派往布加勒斯特进修。贝尔巴把我叫去。我进厂后没有再跟他说过话。他问我:“您觉得我们这儿好吗?”“很好。”我回答说，并且深情地望着他的眼睛，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仅只是我的感觉，他的眼神变了，那不是一个男子对女性谈话时的冷漠眼神。回家后，我把进修的事通知了沃什蒂纳尔，他表示反对。“怎么到布加勒斯特去，独自一人?”他问道。与此同时，我也有点忧伤，因为过去我们没有长期分开过，最多只不过几天的时间。我回答说:“不是我一个人，有许多人去进修。”“好吧，可是家呢?”他仍然不理解。“家”意味着他。“我找个女工来打扫卫生，换洗床单，你去医院或饭店吃饭，只不过一个月，又不是永久性的。”“好吧。”他迟疑地说，显然不满意，不仅因为要分别，而且还因为我开始表现出独立性，要自作主张了。当然，他多少有点为我担心。临走时，贝尔巴对我说:“相信您不会给我

们丢脸的。”他长时间地握住我的手，也可能是我敏感了，我觉得他的手又热又有劲。进修的工程师来自全国各地，有些比较年轻，尤其是布加勒斯特的工程师们的信息灵，他们带来电机制造方面的新信息，我必须专心致志地学习。

离开家后，沃什蒂纳尔不在跟前，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爱上了贝尔巴，尽管我不愿承认，并把它埋在心里，不让任何人觉察出来。我果真是堕入了情网吗？这个说法似乎不大恰当。我堕入过沃什蒂纳尔的情网，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仿佛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事。我引咎自责："你可是个成年女人，不能再像少女那样狂热。"区别恰巧在这里：她们朝前看，期望过舒适富裕的生活，我却是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那么，我追求过吗？贝尔巴不仅给了我劳动的愉快，而且使我产生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甚至把他当自己的丈夫看待。因此，我一方面暗地责备自己荒唐可笑，另一方面又觉得根本谈不上什么荒唐。

去布加勒斯特出差，打破了我正常的生活习惯，使我更加想念贝尔巴。沃什蒂纳尔呢？离家后没有想过他。到布加勒斯特后，我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如他常说的，一切正常。我觉得有趣的是像大学时代一样，大家住在宿舍里。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沃什蒂纳尔，他一定会皱起眉头表示反对。并且坚持说："搬到旅馆去住。"他还会给同

事打电话，让给我在“像样的”旅馆里找个房间，也就是说住在雅典皇宫饭店或丽都饭店。我当然不能同意，因为我喜欢重新过过大学生活。此外，我能给他写什么呢？其实，火车一离开月台，我就把他置之脑后了。哎，要能看见贝尔巴，我就不会感到孤单了。

沃什蒂纳尔没有忘掉我。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是从哪儿打听到我们的住址的？我听见他的声音从远方传过来：“你是怎么回事，奥尔坦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想回答他：“有什么好写的？”话到嘴边又改变了主意，这种回答似乎不“合适”（不知道为什么真想顶他一句），于是说：“我们忙极了，晚上累得倒下就睡，睡得跟木头一样。”他装作不明白，又问：“是啊，可是为什么不给我来信？我不放心。”我没有马上回答。不知从什么地方隐约传来两个女人的热烈谈话，真不知她们在闲扯什么。我让了步，冲着话筒喊道：“好吧，沃什蒂纳尔，我给你写信去”。不等他再说什么，就挂上了电话。回家时，他手捧一束红石竹花，站在车厢门口迎接我。我最喜欢石竹花。我心里想：“他怎么了？”莫非男人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本能，预感到自己面临危险？不过，只是想像中的危险。在厂里，贝尔巴当众热情欢迎我，也许这只不过是我的主观感觉。“祝贺您，奥尔坦莎太太（他习惯叫我的名字），您进修的成绩非常好。”我

感到满意。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他这一笑使我心满意足。

我建议沃什蒂纳尔找个晚上请一请厂长，他没有反对。他装出冷嘲热讽的口吻说："我倒也想认识认识这个行业的先进人物。"是的，"厂长同志"在八·二三时获得了劳动勋章。沃什蒂纳尔结识名流的爱好早于收藏古董。后者是在这个城市开始的，也就是从"发起来"后才有的爱好。"发起来"是他踌躇满志笑着使用的词儿。前几天，我们请过乐队指挥吃饭。沃什蒂纳尔给我解释说是他中学时的同学。在演奏过程中，沃什蒂纳尔一直坐着打瞌睡，不过，他的掌声却十分热烈。音乐会结束后，我们邀请他共进晚餐。我感到客人有点拘束，他对我说："您知道，尊敬的太太，我父亲当过军官，我们常从这个兵营搬到另一个兵营。我与您丈夫只同过两年学，两年多一点。"

"3年，列奥尼德，将近3年，"沃什蒂纳尔插话说，"我记得很清楚，你坐在靠窗子的座位上，你和乔奇纳·蓬皮里乌同桌。"

"乔奇纳吗？"列奥尼德竭力想回忆起往事。

"我们叫他高杆儿。利维乌·米隆给他起的绰号，他叫你音乐家。"

"高杆儿？"指挥若有所悟地说："是的，我记起来了。"看来绰号使他记起了早年的事。他变得兴奋起来。"是的，我想起来了。我也想起了利维

乌·米隆。他叫你什么来着？”仿佛是什么非常神秘的事，他贴近沃什蒂纳尔的耳朵，小声说道。

“他可没给我起什么绰号。”沃什蒂纳尔不快地说。

让我去说服贝尔巴就不太容易了。看来，他不愿使我难堪，最后只好妥协。“好吧，我来，可是不能呆得太晚。我住在这儿。”他说着，用手指指树林中的别墅。

“没有问题，”我说，“我丈夫可以用车送您，他只喝一杯酒。从我们家到您这儿，用10分钟就够了。”

我没有料到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开始时，气氛有些压抑，当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坐在一起时，常常会话不投机，难以交谈。他称赞我们的酒好，菜做得好，这都是一般的应酬话。

“您去听音乐会了吗？”沃什蒂纳尔问他。

“没有。”客人说，显然他没有想到主人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谈音乐会。

“可惜。音乐会非常成功。指挥是格奥尔吉亚德·莱温丁，伟大的天才，我同他很熟。瓦伦丁·乔治乌独唱。”

“是吗？”客人有礼貌地问，“唱了什么？”这个问题难住了沃什蒂纳尔。因为，他是从节目单上看到歌唱家的名字，但唱了什么？他忙给我递个眼色，这个动作并没有逃出客人的注意。我只得

出面解围。

“莫扎特。”我为了挽回局面，这样回答说，“莫扎特和贝多芬。《田园交响乐》。”

“莫扎特？”贝尔巴沉思地重复说。“是的，从前我们听过他的唱片。我们买了个唱机。”他的眼睛流露出悲伤，表明他又想起了往事。我理解，这个“我们”指的是他和过世的妻子；“从前”则是说遥远的过去。我明白，我比他们年纪轻，不是也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我爱上沃什蒂纳尔，并同他结婚，这已经不能以日、月、甚至年计算了。不过，差别依然存在。我稀里糊涂上了一次当，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没有哪一个女人婚后不发现幻想破灭，上了当，那些年轻的同事都对我说过这种心里话，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贝尔巴失去了一切，我相信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

这天晚上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很快就出现了。沃什蒂纳尔回家后确认他“可爱”。我觉得他用词不当，不过没有挑毛病，他一贯不太讲究修辞。他说，“厂长同志”是个人物，这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因为，他既然爬到了厂长宝座……我了解沃什蒂纳尔的老毛病，把人的价值和职位混为一谈。他是不随便请人来吃饭的。我意识到，他仍然在生气，不愿我对他以外的男人表示钦佩。他也许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利。他为了博得我的欢心，两星期后得意洋洋地宣布了他的

计划。

“我要写书。”他庄严地说，俨然挤进了“作者”的行列，我后来发现，“作者”同时意味着“科学家”。

“一本书，你？”我吃惊地问。

“对了，一本关于妇产科和助产学的专著。”

“好啊。沃什蒂纳尔，”我说，“可你只是临床医生，不是写书的人，能善始善终吗？”

“有人认为我行。”他仍严肃地说。

“有人？谁？”

“系主任，克里斯特斯库医生。我和他一起写，我们合作。”

“你的这个系主任写过多少书？”我问他。

他不无诧异地瞅我一眼，也许他正考虑这个问题，我猜中了他的心思。

“只有一本。我想，就是他现在正教学生的那本教科书。另外有些论文。”他仿佛有点泄气，但又赶快补充说：“他是系主任，很能干，做很多工作。”

“什么工作？”

“咳，”他不愿正面回答，“你又不是没有上过大学！应该知道。”

“当然知道。我知道系主任是干什么的，专管行政事务，打报告，做总结，可是你得承认，这不能算学术工作。”

“他是个好人。无论他多么忙，也会立刻见我，他受重视，主管一个大系。”

我没有再坚持下去。他又犯了老毛病。在认识克里斯特斯库之前，我就对他有了成见。他长着一双獾似的小眼睛，让人看来狡猾，引不起我的信任。当然，我们请过他们夫妇来吃晚餐，他的夫人是个高大的胖女人，沃什蒂纳尔说她“出色”，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我没有反驳他。随他去想像吧。一切都荒诞无稽。过去，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对自己估计过高，或者像一个新手不考虑自己挑起了什么样的重担。晚上，我躺在床上能从门缝看见他办公室的灯光。在静谧的夜晚，我通过客厅敞开的门听到他神经质地撕纸声，接着是把纸扔在地上的声音。我看着他日益消瘦，脸色苍白，他也不再对我提“工作”进展的情况。我确信，这项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两年后，我的看法同他不期而合。不过，我不愿对他明说。我指的是贝尔巴的婚事。他已经属于另外一个女人，我悄悄退让一边，这样说，好像我们之间真有过什么事情。其实，什么也没有，我只不过有些糊涂念头。我责备自己当他的生活里有了另一个女人时，仍然迷恋着他。

“喂，你说呢，你对我们朋友干的好事有何看法？”沃什蒂纳尔斜着眼试探我。

"你说谁?"我佯装不明白。

"谁?"他学着我的腔调说,"那还能是谁,不就是指你的厂长。"

"你是指结婚的事?"

"当然是,我能讲别的什么事?"

"我认为他做得很对。"我成功地装出神态自若的样子说。"怎么,你要他一辈子孤零零?你不是对我说,不喜欢老小伙吗?他结婚也许正是为迎合你的愿望。"

"奥尔坦莎,别装模作样了!"他先火了。"不用说,这是合乎情理的事。我想说别的事,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我指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太太。"他用讽刺口吻说。

"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听说她是个十分可爱的女人。"

"可爱还是不可爱,是另一码事。"他生气地打断我的话,他一不顺心常常那样做。"你的厂长多大年纪了?"

"大约一年后满50岁。我们正暗中准备庆祝他的50大寿。这是人人皆知的秘密,全厂人都知道。"

"好了,"他又一次打断我说,"……太太的芳龄是多少?"

"不知道,我没有见过她。我想,也许快30岁了。"

“瞧？”

“行了，沃什蒂纳尔。”我装作刚刚明白，尽管从一开始就听出了他的用意。“你，作为医生，怎么还有这种成见？好像女人只能找同她年纪差不多的丈夫。差距是大了些，这是事实，可能是她出于敬佩，认为他像你一样是个出色的人。”

“这就是说，”他挖苦说，“黄毛丫头可以嫁给老头，只因为他是出色的人？”

“你总喜欢夸大其词。她不是黄毛丫头。黄毛丫头可不会嫁给你所说的老头，她们只跟年纪相仿的小伙子上舞厅。”

他没有往下说。他设的圈套太露骨，我一眼就看穿了。我想，他有过这种念头：“她喜欢他，会暴露出来。”有一次，他对我讲了他们医院里发生的故事。他的一个同事是主角。沃什蒂纳尔不无讽刺地说：“老唐璜①，鬼老头，他没有改掉年轻时的恶习。他已经有了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就是说，老唐璜同时勾搭上了两个年轻美貌的女护士，她们没有头脑。没过多久，两个护士争风吃醋，互相揭短。”他皱着眉头对我说，“她们都来找我告状。我就对她们说：‘好啊，我很高兴，你们都注意了维护医院的名声。可是，你们瞧……下面有人嘀咕……当然，她们谁也不肯承认。

---

① 唐璜(Don Juan)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浪荡子的象征。他的传奇因莫扎特的歌剧《唐璜》(1787)而永久流传。

她们完全忘了自己是当事人。嫉妒心使她们争吵不休。’”我忽然想起他以前讲的 故事。他的心理分析尽管很粗浅，但是合乎实际。只是我不同于他的护士，没有追求老唐璜。

几天后，贝尔巴夫妇来拜访我们。我应当承认心情紧张。正如传说的一样，玛拉的容貌秀美，很有魅力。我真没有想到贝尔 巴 会看上这种人。听说他的前妻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当然，自那以后，已经过了多年，爱情也在变。我应该想想沃什蒂纳尔和贝尔巴，他们彼此 没 有相似之处。女人善于把自己的真实感情藏在心底，我对贝尔巴太太笑了笑，我尽力并确实当了好主妇。

“这种婚姻维持不了多长时 间。”我们 把他们送到街上，回到家里时，沃什蒂纳尔断定说。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仍然若无其事地问。

“她嫁给他，是因为他是有名 的厂 长。这是明摆着的事。我不喜欢。她的深 眼 窝很不顺眼，我想你一定也注意到了，她被迫装得温顺。她是律师。我一向不喜欢律师，尽爱无事生非。”

“行了，”我故意迎合他的意思说，“她是法律顾问，不是诉讼律师。”

“全一样。你听我说，这种婚姻长不了。”

我也这样想，不过没有说出 来。总 而言之，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来我们家，使人 很 不愉快。既然贝尔巴决定结婚，那也该另选一个妻子，直

至不久前，我还不愿去想这种可能性。正如沃什蒂纳尔所说，她的眼睛长得不顺眼。她具有一种挑逗性的妖艳美……但是，我没有想到，也不能相信他们会很快就分手。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离异，从某个角度说对我毫无意义。不管怎么说，贝尔巴到退休没有15年，也得有12年的时间。那时，玛拉也上了年纪，甚至比我现在还要老。我们只差8—9岁，当然这个差距是很重要的。女人到了30岁以后，皮肤就会失去光泽，不错，有化妆品,但无济于事。身体不再像柳枝那样的柔软,线条变得模糊,对了,对了,她终归会有这一天的,所有的女人都必经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漂亮女人更是在所难免。这是我对未来的设想。这就一般而言，……过于简单了。我没有考虑意外因素，而恰恰是它在不长的时间里出来报复。

贝尔巴的心脏病第一次发作时，我正在大厅里开会。是一次普通例会。我没有坐在前排，因为不想被他看见。但是，为了能看清他，我坐得相当靠前。离墙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张长桌，上面铺着红布，当作主席台。心脏病是在会议开始时发作的。他正讲话，说得轻松流利，并不时看一眼写满数字的小纸条。他的面容蓦地变了样，没有拿纸条的手抚摸着胸口。他想继续……我看见他在竭力挣扎……可能那时发生了第二次心绞痛，比第一次更剧烈。他像一袋土豆，重重地倒在椅

子上。不知他对会议的主持人小声说了什么，只见那个人惊慌失措，站起来宣布："休息10分钟。"坐在后面的人大概没有看清前面发生的事。人们议论纷纷，对他来说像从远方传来的窃窃私语声。两个人搀扶着他——如果不是情况严重，他们的样子是很滑稽可笑的——像母亲教孩子学步，艰难地走到一间小屋。我一直站在门口，看着医生急急忙忙冲进屋去，他的脸色苍白，可能也被这晴天霹雳吓懵了。他在屋里呆了一会，很快就出来了，我猜想也许情况不太严重，只不过是偶然的头晕。瞧，每逢发生不愉快的事，人多么会设法安慰自己！过了几分钟……医生又像刚才一样紧张地出现了，他仿佛看出了我们的忧虑，说："我想，他的心脏病发作了。我打了电话，要一辆救护车。他必须住院。"我们呆愣愣地给他让路，他从人墙中挤过去。救护车出乎人的意料竟很快地开来了，医生和担架员跳下车。我听见，贝尔巴起初不愿上担架，医生耐心地劝导他。后来，门开了，我们本能地往后退了退，让出比原先宽点的通道，担架员走得很慢，是怕震动他抑或他太胖，他们一出门口，只见一个担架员的额头上浸着汗珠。我们跟着担架下楼，救护车就停在楼门口，司机打开车后门，担架被举上车，后来就看不见了。当汽车开出厂门时，门卫向它行了举手礼。汽车疾驰而去，看来"情况"不

容许拖延。过了一会，有人喊道："同志们，请回会议室开会。"

## 三

我什么时候意识到爱上了他？我想，可能是在他精疲力竭躺在担架上的时候。这不能算是顿悟，我早在布加勒斯特进修时就有所觉察，现在更加明朗了。回家后，我装做把他忘了。我对自己提出种种问题，并且在心里进行一场辩论……"爱情？从何说起？尊敬，钦佩，对了，可是，爱情呢？"这些字眼儿在脑海里轮番出现，形成了雾障，把我与现实隔开。我害怕现实。当厂医急匆匆从小屋出来，对我们说了句"心绞痛"时，我感到脚下的大地往下沉。我和真情之间隔着的一层薄壳顿时破裂。我在真情面前清醒了，竟然变成为他的健康牵肠挂肚的女人。我所爱的人濒临生命危险。"是尊重？是钦佩？"当然，二者均有。我是个正常的女人，应该尊重和敬佩自己爱的男子，只有心理变态的人才会爱小人。这也是真理，试想你怎能爱自己不尊敬的人？尊重和敬佩都只是表面现象，我却想把它们变成合理的借口。我不无奇怪地问自己，是不是受了沃什蒂纳尔的影响，接受了他观察事物的方法。据说，两口子经过长期共同生活，在思考问题，甚至人生

观方面都会发生潜移默化。难道真是那样吗？沃什蒂纳尔在找借口方面堪称老手，他能随机应变，如鱼得水。我最恨说谎，即使是冠冕堂皇的谎言，也会使我厌恶。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怕对自己承认陷入了情网，因而自欺欺人？是不是装做不爱贝尔巴？我为什么欺骗自己？我参加那次倒霉的会议，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担架员，……担架……刺耳的汽笛声……全都向我袭来。我觉得受到了锄头的打击；不，更像是受到一只公羊的顶撞，它冲破了我为圈住自己对列姆斯的爱而修造的——也许是自己觉得修起了——不坚固的栅栏。现在我竟直呼其名，而不叫他的姓了。我同沃什蒂纳尔谈起他时，得格外谨慎，要像过去一样，称他为"厂长"或贝尔巴。

我和其他人一起挤在小屋门口。有位领导，似乎是工程师尼奇富尔，招呼大家说："镇静点，同志们，都散开吧，现在继续开会。" 没有人动弹。其实，他心里也发毛，但又不得不故作镇静。接着，一个悦耳的男中音字斟句酌地说："贝尔巴的身体结实，抵抗力好，会康复的。"声音从稍远的地方传过来，我真想过去拥抱他，这位陌生人的预言如能兑现，该有多好啊。后来，我身边的一个妇女问："他怎么啦？"没有人理睬她。医生还没有来，站在那儿的人都佯装没听见，我认为她不识相，要不然就是太无礼。

我根本听不明白会上又讨论了什么问题。会议重新开始后，并没有进行多久，显然，大家的注意力不在这儿。有两三个人发言，我们厂跟其它地方一样，总有那么几个人喜欢让人家听他发言。他们发言后，会场鸦雀无声。我想，大多数人同我一样想着救护车。汽笛声在他们的耳边回旋，思想早开了小差。他们到了医院，他躺在床上，一群医生围在四周。会议结束后，我才记起自己原准备发言的，车间派我来开会，会前就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一张纸条上，塞在工作服的口袋里，散会后，我换衣服回家，才发现了字条，瞧我忘得干干净净。即使没有忘记，恐怕也讲不了两句话。工作服口袋里的字条帮不了我多少忙。我的手颤抖得厉害，不可能认出那上面的字。奇怪的是，没有人提醒我发言。谁也没有提醒，可能大家都认为，既然厂长不在，讨论就毫无意义了。

"一定去看看他!"这个念头自然而然产生了，并立刻成为不可抗拒的强烈愿望。我不能只身一人去医院。一旦有沃什蒂纳尔熟识的医生认出我，就会出现流言蜚语。最大的危险是遇见玛拉。她一定得到了通知。我恍惚看见她那双探索的眼睛正盯着我，什么事休想瞒过这种女人，她冷冰冰的眼神凝聚成一个无声的问号："你到我丈夫的床头来干什么?"我想，她会问的，尽管我

没有把握能否进入病人的房间。因为我不可能单独去看他，所以必须找个伴儿，多少是“正式的”，也就是说组成一个代表团，这才能受到重视，获准入内的可能性大，甚至还可以问问主治医生，“厂长同志”的健康情况如何。

我抬眼环视大厅里的人。你们知道散会时的情景吗？往常是乱哄哄的，大家有许多事要做，都急于赶回自己的车间。这次却没有人着急，不少人留了下来，两三人一堆在小声议论什么。我看见玛诺莱斯库同志正呆在一个较大的人堆里，我们都叫她是工会“头儿”。我端详了她一会儿，计上心头。我能不费吹灰之力说服玛诺莱斯库同志。说不定她心中有点酸溜溜的，她本人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主意呢？“是个好建议，对，一定得支持，再吸收一个什么人，一位领导成员，工会，也就是我本人，还得有群众代表……（她停顿一会儿，似乎是在考虑）您，当然也算一个，是您提出的建议，谢谢您……好了，走吧。您同意吗？”我谦虚地点点头。

“您考虑，代表团什么时候去最好？”为了讨好她，我用商量的口气问。

玛诺莱斯库同志想了一下回答说：

“今天来不及了。得让医院的人先做检查。也许星期4去吧，是探视病人的日子。好吗？”

我又聪明地表示同意。我们像男子汉一样握

手（玛诺莱斯库同志喜欢这样）道别。

“今天开会时，贝尔巴突然患了心绞痛。”吃饭时，我对沃什蒂纳尔说。他手里拿着汤匙，十分震惊。

“怎么？会吗？他看起来很健康，结实。”几个小时前，那个陌生人也是说，“结实……”

“把他送医院了。”我继续说。“你那儿有人吗？你能关照一声吗？”

“医院……”他说，“你说把他送医院了？那一定是送到阿格利切鲁教授的心脏病医院去了。阿格利切鲁是心脏病方面的权威人士。”

“据说，是医院派来的救护车拉他走的。你那儿有人吗？”我紧紧追问他。

“医院里吗？心脏病方面吗？有，当然有，主治医生科斯塔是我的同学。你要我向他打听打听？好吧，过一会儿，现在，他也许正在吃饭。”

我听出他的话里含有不满。我去厨房取来一盘烤肉，又把他用过的汤盘送回厨房。我让厨房敞开着门，洗完盘子，点上一支香烟。他不喜欢我抽烟，我只好留在厨房里。约过了半根烟的工夫，我听见他站起来去拨电话。于是，我掐灭烟，忙走进客厅。我听见对方的电话铃响了几下，有人拿起了话筒。沃什蒂纳尔问：“是科斯塔医生家吗？”对方给了肯定的答复后，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沃什蒂纳尔医生。能同科斯塔医生讲

话吗？"他发现我站在他身边，在等待对方什么人去找科斯塔医生的空隙里，转身望着我，电话筒仍然贴着耳朵，做手势叫我别吱声。后来，我听见一个男低音自我介绍说：

"我是科斯塔医生。"

"你是蒂比吗？"沃什蒂纳尔激动地喊道："是我，沃什蒂纳尔·斯特凡。我想没打扰你吃饭吧？"

我听不清对方的回答。我想，他会表示欢迎的。也许真的没有打扰对方吃饭。沃什蒂纳尔一般回家较晚，吃饭的时间不得不推迟。这个陌生人可能正在午睡，做着美梦或者在干别的事，其实，这些都不关我的事。

"蒂比，"我听见沃什蒂纳尔说，"今天上午，有人住进了医院，也就是说，救护车把我妻子单位的厂长拉到你们那儿去了。他叫贝尔巴，你一定知道这个名字，对吗？有没有？"

从那头传来粗重的男低音。我没有听清楚讲了什么，不过，他可能证实了确有其事，说贝尔巴住进了他们的医院。

"他怎么了？"沃什蒂纳尔又问："我妻子说，他在开会时犯了心绞痛。现在怎么样了？"

电话里又响起了低沉的说话声，我想是在解释事情的经过，用救护车拉去的那个病人贝尔巴的情况。沃什蒂纳尔没有打断对方，只时而说一

声“对”，“我明白”，“自然”。我无法猜他“明白”了什么，只有注意他的表情，他变得严肃起来，近乎冷酷，我意识到住院的那个人的情况不妙。过了一阵子，沃什蒂纳尔说：

“谢谢你，亲爱的蒂比，请原谅我打扰了你。怎么？我不是唯一的？你已经接到了两个电话，工厂去的？对！还有……”停了一下，随后又啰嗦起来：“是啊，他们当然会关心的，都知道了，对，对，他是有名的人，是个人物，当然应该关心他……再次谢谢你，衷心感谢，再见，蒂比，再见！”他挂上电话，转身望着我。他的目光奇异，我倒很坦然，也许这只是主观感觉吧。

“暂时没有危险。如果不出现并发症，科斯塔认为不至于那样，一个星期便可出院。”他沉默片刻，又用奇异的目光瞅我。我猜想，他停顿下来是因为有话要说，一定是扫兴的消息。他说：“是的，他捡了一条命，连科斯塔都感到震惊，贝尔巴居然能挺过来，他对我说，若换成别人的话，这种病一发作会要命的，他挺住了，可是需要精心护理……”

“科斯塔还说了什么？”我紧追不舍地问。

“咳！虚弱得很，比他所想象的要弱，心脏，你明白，可能还有其它伤神的事，他的妻子年轻……科斯塔打算把他介绍到阿格利切鲁那儿去，不是立刻去，但也不能拖。他说，他们那儿

一般只收急诊病人。科斯塔的意见是，长期治疗的话，最好转到心脏病医院去。那里的条件比较好，有专门的仪器。”

“需要长期治疗？”我喃喃自语地说：“是什么意思？多长时间？”

“他没有说时间，暂时难确定。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要把他转到阿格利切鲁那儿去……”

“贝尔巴不会答应。”我自言自语地说：“他会要求回厂工作。”我看了一眼沃什蒂纳尔，这时才明白他刚才为什么用奇异的目光盯着我。

“正因为这样，”他对我说，“我才留到最后说。科斯塔考虑到你厂长的健康状况，将建议他退休。他暂时不对病人提这件事。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当面告诉病人。他有点担心，你知道心脏病人什么样，一个坏消息能起什么作用，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后。是的，科斯塔还拿不定主意。也许，他不向病人提这件事，但希望在病人出院前能谈一次话。即使不直接提出建议，他也要让对方猜出点意思。无论如何，科斯塔说为了不让病人担风险，他要建议他退休和转院到阿格利切鲁那儿去。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别打扰我，我想休息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得去医院，天黑时，也许晚上，我有可能要接一个难产儿。病人的情况不佳。她的亲戚再三坚持要我接生，无法拒绝。”

后来发生的事简直是一场恶梦，有如庸俗电影充满陈词滥调和传奇情节。一星期后，他果然出了院。沃什蒂纳尔听说，贝尔巴休病假，偷偷去了工厂，因为他不喜欢动感情的场面。不过，更可能的是他……听说了……可能出院时科斯塔医生亲自对他讲了，要不然就是明确地暗示过或者别人向他透露了必须退休的消息。

他一退休，玛拉便离他而去，这在我的意料之中。这是必然的。我像沃什蒂纳尔一样，认为贝尔巴同"黄毛丫头"的结合长不了。但是，我没有说出来。他显然是出于妒忌，耍手腕儿激我反对玛拉，而我只不过一笑置之。他在怀疑，自尊心促使他试探我。我及时识破了他的用心，未加理会。男人太幼稚，自以为能够在这种问题上使我们女人上当。

我们去探望过贝尔巴，那是一个错误。沃什蒂纳尔出的主意，不知道他想通过拜访贝尔巴解决什么问题。我不能不坦率地承认，我惦记着贝尔巴，想看看玛拉出走对他造成了多大伤害。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造访是令人反感的。按沃什蒂纳尔的说法，主人不够礼貌，我却不在乎礼貌不礼貌。他家里乱七八糟，身上穿的衣服皱成一团，像是从来没有换洗过。没有刮脸，长满了硬刺似的灰白色胡子……他变老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他先后遭受退休和玛拉出走所引起的

痛苦。我们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他只说了几句话，我们感到十分尴尬。我们说走，他并不挽留。他想表现得礼貌一些，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沃什蒂纳尔认为："他送到门口是想确定我们真走了，不会再回去了。"

几个星期后，他终于接受科斯塔医生的劝告，住进心脏病医院。入院前夕，他约我们到他家去。他试图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你们可以算作我的执行人，我遗嘱的执行人，可是我没有任何财产。"沃什蒂纳尔反驳说："先生，算了，别开这种不吉利的玩笑。"我斜着眼看了他一下，发现他很激动。贝尔巴同意说："好吧，那就算作朋友吧。"其实，他的"指示"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按时交纳房租和电话费。他抱歉地说："我原想找特列塔办，不过你们知道他的工作性质，经常出差。"沃什蒂纳尔又打断他说："算了，算了。"看得出来，他不喜欢提到兽医。他与上次一样，又把我们送到门口。分手时，他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他想笑笑，但没有笑出来。我们望着他迈起健康人的脚步朝楼里走去。

# 第八章

## 一

幻想是虚无缥缈的，它不止一次地欺骗我，尤其是涉及到人时更是如此！我不相信朝日相见的人，相信想象中的人，因为这种人是存在的。我惶惑地感到，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并不依存于我的想象。维奥丽卡就是那样的人。但是，情况并非我所想的。在她的问题上，我充分发挥了单身汉的丰富想象力。我得到了她与贝尔巴结婚的消息，没有见面就给她罗列了种种罪名。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罪名并不存在，全部是我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原出于一个可恶的单身汉的主观偏见。我认识她后，便向自己承认了错误，我所想象的维奥丽卡犹如太阳下的雪人融化了。我试图解释误解的原因。我发觉自己是独身“理论”的受害者，实践经验十分贫乏，我却自恃理论知识丰富。在我看来，女人都是刁滑的。贝尔巴呢？我看他被一个机灵而又卑鄙的青年女人迷住了。她先把他逗得晕头转向，然后拉住他的手到民政局去登记。想象中的事是幼稚不可信的，但也有可

取之处。我何必要相信他们是先恋爱后结婚呢?!

大约在一年前，我在法格拉什山区的一村庄当兽医，产生了维奥丽卡是“吸血鬼”的怪想法，怪她使用卑鄙伎俩迷住了我的朋友。记得那是初秋，也就是9月初的时候，山区的秋天来得早。天空秋高气爽，法格拉什山清秀入目。我刚从水牛养殖场回来，想休息一两个小时。那时的我雄心勃勃，恐怕全区，甚至全州的国营农场找不出像我那样积极工作的人。车把式特塔尔赶车，送我回来休息。一年前，是他把我这个“大夫先生”从法格拉什车站接来的。我准备推开车门，从马车上跳下来，忽听有人喊“大夫先生”，我回头一看是邮差。他伸手递过信来，我一眼认出是贝尔巴的笔迹。

我拆信前，先把它放在手上掂量一下，又从这只手转到那只手，反复数次，才拿着信打开门，登上通向屋前平台的台阶。我住的房子非常牢固，这是法格拉什地区房子的特点。房屋临大街，门朝着山。从屋前的平台上可以望见山峦起伏。记得我当时迟迟不敢拆开黄色信封，仿佛今日那信封还在眼前。我先摸摸薄信封，心里嘀咕说:“唉，能有什么事?”贝尔巴很少来信，现在出了什么事?后来，我下了决心，撕破信封，取出那两张对折叠的信纸，打开来念。他写的字又大又清楚，十分规范，笔体刚劲有力，我想，书法

家一定会这样评价他的字。他过去的信曾简单介绍了工业城市的繁荣景像，并且自豪地称赞这个“全国最老的钢铁中心”。我看了信的内容后，不仅愣住了，而且喘不过来气。他结婚了。好吧，我对自己说。可是，在这之前，他只字未提过同女人有接触，甚至连一声招呼也不打。他过得像个修道士。现在，突如其来地……结婚了！我又从头看信，想核实一下是不是看错了。一点儿没错。日期是9月初。也就是3天或4天前发生的事。事实确凿。一个陌生人闯进了他的生活，而且是怎样挤进去的！她紧紧拡住他的胳膊，女人善于干这种事，把他拉到结婚登记处去。

前面说过，我屋前的平台是朝着山的。山前的空气清净，仿佛一伸手便可够着阿尔帕什雉堞的山岭。棉絮似的白云有如淘气的孩子，在蔚蓝色的(那个钢铁中心的天空会是什么颜色呢?）天空中飘游。它们无忧无虑，真使我羡慕。我又浏览一遍信封。维奥丽卡这个姑娘是什么样子呢？是美女或妖精，竟能迷住我的朋友？当今的姑娘就会缠男人，我嫌弃女人的思想又在作怪了。我敢断定，是她迷住了贝尔巴，尽管我心里并不认为贝尔巴是轻易上当的男人。后来，我见到了维奥丽卡，想象中的她便消失了。但是，我在法格拉什山区时曾经担忧过。我问自己，我和贝尔巴的友谊还能继续吗？我还设想过新婚夫妇的一场

对话。贝尔巴对她说："我有个小时候的朋友，是个兽医，你会看见他的。"她则说："有我在你的身边，还要朋友做什么？"我不再往下想了。我认为，她一定非常狡猾，不会轻易暴露自己。但是，她将找机会和办法来破坏我们的友谊。

我又一次抬眼望山峰。乌云从布特亚努猎场上空滚滚而来。你知道山区的天气吗？变幻无常。我耸耸肩，走进屋去。维奥丽卡会教训他，让他懂得，只有单身汉才需要朋友。朋友可以使你忘掉孤单。一旦你结了婚，变成"严肃"的人，情况就变了。如果你顽固不化，女人就会把单身汉看成是新郎的候选人或者流氓。什么坏主意驱使我径直走到窗口去。灰色浓雾笼罩了山谷，山峦也随之隐去，看来秋天的好日子不多了。

后来，我见到了维奥丽卡。我后悔不该给她枉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我对女人的无知，或者说由于胡思乱想所造成的无知，使我把她们想象得一钱不值。工业城市里的姑娘，至少就我所听说的，从小学会对小伙子甜言蜜语，尤其是工程师们是她们追取的"好对象"。当初，我不了解维奥丽卡是外地人，否则关于贝尔巴被她"迷住"的想象便失去了依据。我又看一遍信，贝尔巴说，维奥丽卡是教罗马尼亚语和法语的教师……我想，她像梅拉尼亚。我几个月前认识了梅拉尼亚姑娘，她急于出嫁。她也是教师，只教罗马尼亚

语，不兼法语课。无论怎么说，这足以使我的想象力驰骋了。我把两个姑娘做比较，直到维奥丽卡的幻影消失，我不再想梅拉尼亚为止。

有一次，我被迫到阿夫里格去做客，因为一个同事非要我去不可，实在推辞不掉，只好随便说个日子，不料招来了许多麻烦。同事们都说他关系广，是个有影响的人，甚至有人说他快当州卫生局长了，现任的那个“不称职”，好像干了什么蠢事。他叫梅德雷亚，虽然一双狡黠的眼睛深埋在脸上的肥肉里，但仍在墨镜后面闪光。他早就盯上了我，嚷嚷说：“整年都见不到你，先生，你去哪儿逛了？来我家吧。说说话，喝上一杯，我们农村兽医就应该这样生活。工作，当然要工作。听说你干得不错。我们会考虑的。”咳，正是这句话诱使我接受邀请。我想，说不定传闻真有其事，明后天他就擢升为卫生局长，况且还是州卫生局长呢。我何必同他过不去？

我一跨进他家的门，就发现正赶上他们吃饭饮酒的时候。他和妻子已经用水杯喝了不少烧酒。他像欢迎回头的浪子对我说：“你终于来了，好啊！”他吻了我，那两片黏糊糊的嘴唇贴在我的脸上，真叫人难受。“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弯腰去吻一只胖乎乎的手，手上擦了香水，但香水味未能驱除另一种更强烈的气味，是什么味道？烤肉味？辣椒味？臭奶酪味？我笔直地站在距梅德雷

亚太太的手相当距离的地方。怪味稍微小了些。我看到了责备的目光："您以为，我们阿夫里格没有漂亮姑娘吗？"我呆愣愣地瞅着她。烧酒与姑娘有什么关系？进入客厅后，我才发现自己掉进了狮子窝。我记不清落座之前握了多少次手，吻了多少只手。梅德雷亚太太坐在我的右边，梅拉尼亚坐在我左边。

"喂，大夫先生，您能说我们没有漂亮姑娘？"我吻过小姐的手后，梅德雷亚太太又追问我。

我碍于情面，没有反驳。

其实，姑娘长得不丑。她的身材纤小，皮肤苍白，蓝眼珠有点混浊，头发呈麻褐色。她的发育良好，胸脯发达，坦胸的连衣裙突出了她丰满的乳房，显得同瘦小的身体很不相称。

"她在什姆列乌—锡尔瓦尼耶有 房产，还有积蓄，你们可以买辆小轿车。我在锡比乌有熟人，能帮你们买一辆大众牌车，价钱公道。你们也可以卖掉什姆列乌—锡尔瓦尼耶的房子，不过得晚些时候。"梅德雷亚太太说。

我张口结舌，无以对答。有什么好说的，我被当作傻瓜来"展览"了。我与姑娘没有谈上几句话。她回答得正确，像小学生……无论如何不是放荡的人。是谁将她置入圈套的？临走时，我感谢梅德雷亚太太的邀请，并答应再来。接着，我闭上眼睛——可惜它们不管呼吸——吻了吻她的

手。

“大夫先生，请您下次再来，别不好意思，我们家的门永远对您敞开着。”她说完又问姑娘：“对不对，梅拉尼亚？”

姑娘满脸通红，机械地回答“对”。我没有再去阿夫里格。

过了一个多月，像忘掉一场恶梦似的。我已经快把梅拉尼亚忘了。但是，姑娘还记着我。我长得并不英俊，小个子，戴眼镜，当然那时不秃顶，肚子也没有鼓起来，这些都是逐渐形成的。一句话，我不是美男子。那么，她看上了我的什么呢？她的小脑袋里早打好了主意，并要努力去实现。我估计，她大约有二十五六岁，乡下女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免不了着急。可怜她误认为我是她的意中人。后来，她还是出嫁了，嫁给了一个农艺师，按梅德雷亚太太的说法，“相当不错”。看来，什姆列乌—锡尔瓦尼耶的房子和银行存款起了作用，谁知道？也许是梅拉尼亚的两个诱人的大乳房起了作用。不过，那是以后的事，在当时，她把我看作是意中人。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感到十分疲倦，倒在长沙发上睡觉。敲门声吵醒了我。只有房东是这样敲门，我讨厌她这会儿来打扰我。等我喊一声“进来”，她进屋后，我看出来出了什么事。她的眼神平时毫无表情，像什么呢？一池风吹不

动的湖水。现在，她那双从不激动的眼睛却闪着异光。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规规矩矩的女房东，当时满怀好奇心。她说："大夫先生，有位小姐找您。"我惊奇地问："小姐？"刚才说过，梅拉尼亚的形象早已同她隆起的乳房一起，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如同海绵擦过的黑板，不再留下任何痕迹。我呆头呆脑问了声："是谁？"马上意识到问得荒唐，她显然不会去看她的身份证。我对房东说："请她进来吧"。我机械地用手理一理头发，扫视一下四周，屋里的东西杂乱无章。我心里想，谁让她不预先通知就来的。房东出去了，在门外小声说了几句话。接着，木头门上响起轻轻的敲门声。我说着"进来"，朝门口走去。门口出现了……梅拉尼亚。

她的脸蛋红得像玫瑰花，身上穿一件有松紧开口的坦胸蓝背心。这件衣服突出了梅拉尼亚的宝贝……我茫然不知所措，只说了一句："啊，请坐！"她坐在椅子上，用浑浊的眼睛瞪着我说："我来向您借本书，记得吧，您答应过的。我有事到这儿来，顺便看看，然后乘班车回阿夫里格。"我不知所以然地喃喃说："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那次在梅德雷亚家里做客时，他妻子建议说："梅拉尼亚，你怎么不去向医生先生借书？只有锡比乌的阿斯特拉图书馆可以同他比。"我认为她信口开河，反驳道："医生太太过于夸奖了。不

过，我倒是有几本书，当然愿意出借，很高兴借给您。”我想这只是客套话，她怎么会从阿夫里格跑到我这儿借书？咳，她果然来了。

她的目光离开了我，偷偷地东瞧西望。她可能想了解一个单身汉的住处，这种人一意孤行，不愿建立家庭，任凭那么多姑娘等着他，有的还有银行存款，打算给他买小轿车。她没有什么可看的。床上有一条褪色的红长毛绒床罩。我刚睡过的长沙发上有一条毛毯，它的一角掉在铺着粗地毯的地板上。窗口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沿墙放着一个衣柜，一个没有油漆的松木书架，书架上放有几百本书。她问我：“能让我看看吗？”我怀着好奇心想知道姑娘的文学爱好，梅德雷亚太太打算把她嫁给我，嫁妆是买“小车”的存款和什姆列乌—锡尔瓦尼耶的房产。她站起来，向书架走去，随意抽出几本书，看了看封面说：“啊，您没有爱情小说？”“没有，小姐，我只有哲学书和诗集。现代诗。您，作为罗马尼亚语教师……”“当然，当然。”她忙表示赞同，并乖乖地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她的脸上浮现出迷惑不解的表情。她在梅德雷亚太太的指教下，不知同周围的多少人谈过情说过爱？如今又找上我了，不是吗？是我采取主动的时候了。如果我看上她的房产和银行存款，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还有她那隆起的乳房，激动的时候上下起伏，几乎随着呼吸露出来。

尽管我模仿她，也斜着眼偷偷看她几乎露出奶头的胸口，但是并没有采取主动。我心里想，可怜的人，她已经把自己全部亮出来了。我并不为她担心。男人有的是，会有人看上她的大乳房。我记不清我们还谈了什么，后来，她本能地感觉到是浪费时间。“我得走了。”她终于开口说：“别赶不上车了。您什么时候再到梅德雷亚太太家去？她让我告诉您，随时都欢迎您光临。”她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请转达我对她的谢意，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模棱两可地对她说，“您知道，我们当兽医……”她生硬地点点头说：“对，对”。我主动提出：“送送您”。她随便拿了两本书。我心痛这两本书，因为明明知道，今后再也看不到它们了。假若想想以它们的沉重代价换回我作为单身汉的自由，使我脱离了危险，那么就不难理解，这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必要牺牲。我应当感谢女房东。她一直好奇地想知道，这位小姐是谁？能是谁呢？她端来了一个盘子，上面放着咖啡杯和果酱碟。

“这就是说，你把我比作你的梅拉尼亚？”维奥丽卡一本正经地问我，但她忍不住笑了，并且偷看我一眼。

“我认罪。”我开玩笑地承认错误说。

“法庭要求你老实交待。你真没有看上那所房子和银行存款，尤其要坦白有没有迷上那对诱人

的乳房，你自己说过它是相当引人注意的。”

“我发誓没有沾魔鬼的边儿，也没有沾它的化身梅拉尼亚。”我拿腔作势地一说完，3个人都捧腹大笑起来。

那是在他们结婚后约一年左右，我已经到了贝尔巴信中提到的那个工业城市。我还有几天假期，去跟他们一起过。我早就感觉到她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希望认识认识她。维奥丽卡没有，也不可能跟梅拉尼亚有任何相似之处，相貌差别也大。梅拉尼亚的蓝眼珠鼓出来，维奥丽卡的眼珠是绿色，有如经过了第一场春雨浇淋的青草颜色，怎么能一样呢？梅拉尼亚小姐微微驼背，哪有维奥丽卡长得结实，后者还保留着青年女子柔软苗条的腰身。

“瞧，维奥丽卡，快来认识一下，他是我的朋友特列塔医生。我叫他‘医士’。这是学生时代起的绰号，我改不过口来，是个坏习惯。”

“要是您不介意的话，我就叫你米哈伊。”她同我握手时笑着说。

“行，维奥丽卡。”我同意说。我们哈哈笑起来，周围的人都回过头看我们。

我事先打电报通知了他们，他们到车站去接了我。我准备住几天，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好奇心呢？我要认识认识她，看看贝尔巴“选”了个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想，原来这就是维奥丽卡。我

用探询的目光望了她一眼，立刻相信贝尔巴找到了好伴侣。我早先抱着敌视妇女的态度，把她想象成另外的样子，与真正的维奥丽卡毫无共同之处。那些年，看上去贝尔巴过得十分幸福。你只要看看他那亮晶晶的眼睛和笑容，就足够了，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那种笑容了。

“孩子们，晚上我们去逛逛大街。”他说：“老家伙，我带你去进进当地的豪华餐馆。”我笑了。看来，他还没有忘记我们学生时代可爱的吹牛话。我们那天晚上去了奥尔特尼亚饭店，据他介绍说是城里唯一像样的饭店，但谈不上豪华，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饭店罢了。他们指着我们坐的桌子说，一年前就在这儿举行了婚宴。维奥丽卡故作严肃地宣称，“这是历史丰碑”。我学着她的样子，极其庄重地从历史丰碑上叉起一块烤肉。

我只有 3 天的假期了，不能在他们家长住。其实，贝尔巴也没有更多的空闲时间陪伴我。第一天，我们上山玩，并在水库边的客店里住了一夜。贝尔巴骄傲地介绍说，这是“全国最老的水闸之一”。我们还乘坐“全国最老的”电缆车上山顶。我们顺着钢缆轨道往上滑行，脚下是披上红褐色和黄柠檬色秋装的老树。休息 3 天后，我不得不回我的法格拉什山村去。清晨，一层薄雾笼罩着城市上空，天色阴沉，呈铅灰色。他们送我去车站。我上了车，车子开始缓缓滑行。随着

列车的速度加快，他们站在月台上的身影渐渐缩小，车子拐弯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关上窗子，规规矩矩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惆怅地想，又是孤身一人了。在某个新年的前夕，我们又匆匆见过一面。两年后，他们给我拍来一封电报，要我参加安卡的命名日。怎么办呢？我只好坐雪橇去法格拉什。日历上已经是春天了，但由于我的村——变成了我的村庄——被群山环绕，冬天还在这里肆虐。我一大早出发，换了3次火车，入夜才到他们家。他们极小心地把我领到摇篮跟前，安卡用像维奥丽卡一样的绿色大眼睛从柳条摇篮里盯着我。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安卡。

贝尔巴的长时间沉默没有使我感到不安。我给他的两封信犹如石沉大海。我心里想："咳，他工作忙，成了家，得照看妻小。到时候，他会抽空给我写信的。"后来，我忙于调动工作。我并不忍心离开那些朝夕相处的人，他们都把我看成自己人。"对，我明白。"合作社主席特塔鲁说。他是附近利萨村人，邮差也叫特塔鲁，利萨村有一半人姓特塔鲁。他斜着眼看我，嘴里反复说："对，我明白。"我听了母亲的话，要求调离。她说："我老了，有病在身，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来不及赶回来。"可怜的母亲说得有道理。年龄不饶人，近些年来，她总是病病歪歪，变得骨瘦如柴，又脆又细的骨头上包着一层干裂的皮肤。她孤零

零地住在一座空荡荡的房子里。她常常忧心忡忡地说："等你赶回来时，我早就闭上眼了，连蜡烛都没有人点。"人人知道老年人叨唠起来停不住，就像吟咏诗文，慢吞吞不间断，不知疲倦地重复来重复去，没完没了；又像水滴不断落在同一点。我听烦了，只好让步说："好吧，妈，我找个近地方。"她露出笑脸说："妈的好孩子，我知道你会听我的话"。

后来，我离开了山村。我想，临行前应该把这一切告诉特塔鲁。他也有或曾经有过年迈的母亲，他能理解，也应该理解我。我感到为了消除内心的歉疚，需要进行解释，可是又把它深深藏在心底。起初，我担心特塔鲁不放我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他的那双蓝眼睛，没有谴责，又含着失望。他对我说："当然，您有您的理由……"他停顿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说："……只是，我们都习惯把您看作自己人了。"我登上开往法格拉什去的长途汽车，坐在驾驶员旁边，一路上没有回头。

## 二

我进入了一个大家庭。我早知道有这样一个家庭，可是每次路过，从未留意它。从童年时起，我就模糊地感觉到这是个独特的世界；从那儿传

出来刺耳的汽笛声和车厢组合时的撞击声。在那个蒸汽机车时代，车站街的上空白烟缭绕，这就是它同那个世界相邻的明证。我院里住了几名铁路员工，他们的帽徽是有两只小翅膀的火车车轮，使我看了羡慕。不过，那时并不理解它的含义。我向父亲打听过他们。他总是带着小公务员的清高口气回答说："哼，一群可怜虫"。他自认为兽医比院里住的房客高贵。后来，我也像其他人一样乘火车旅行。童年的好奇心理消失了。我去车站售票处买票，上车后，把票交给列车员，接着便可听到检票机卡嚓打孔的声音。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调到铁路上工作后，回忆起童年的经历，记忆犹新。

有个公务员说："这算不上什么艰苦的工作。拉杜利安医生一直干了40年。您将看见他来介绍情况。他的身体棒得很，您会认为他能给我们二人，您和我，送葬呢。哈，哈，哈！"他自以为说了句有趣的笑话，洋洋得意地大笑起来。我出于礼貌，也跟着笑了笑。我不想被拉杜利安埋掉。此外，我开始有点气恼，因为通知我在12点左右来"见面"的。我不明白，他们是如何理解"见面"的，可能是由刚退休的我的前任拉杜利安先做些介绍。时钟过了一点，他还没有露面，等到快两点——我不能不生气地看看表——他终于到来了。他发现我看表，笑了笑，露出满口大黄牙，

后来才了解到他抽烟斗。

“我让您久等了。”他说着伸出一只肥小的手，手指像短木棍，一握住他的手，恍惚觉得手伸进了胶水瓶。

“没关系。”我勉强客气地笑笑说，尽管心里气呼呼想顶他几句。

“那么，您就是我的接班人？”他端详着我说。我仍然保持沉默，差一点说自己不是来供观赏的……“嗯，是的，他们要我来指点指点您如何干工作。”他又停下来打量我。我真想问问他，我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告诉一下，让我也知道知道，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美男子。但是，我忍住了，心想，“随他的便吧”。其实，他没有说什么。他说话的声音嘶哑，很难叫人听清楚。他说：“既然我来了，说些什么呢？啊，对，卫生，这是关键问题。我们是干这个的，现在是你了（他把您改为你了）。卫生是关键。餐厅和餐车里的事并不复杂，你看一看厨师的打扮，查查炊具和餐具，就足够了。小吃部复杂一点，对，对，”他略微沉思了一下说，“数量大。你知道，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州，有人很自豪，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言归正传，还是说说小吃部……意见都集中在那儿。管事的？全是骗子。的确，他们没有冰箱，夏天，食品容易变质，他们有变质的限额，可是，他们常用这种办法对付查帐……好了，说

到底，这不是我们的事，就是说不再是我的事了，我已经退休了，也不是您的(他又用起您来了)，不错，人们一提意见，就得去核实，很困难，您得采取措施，写报告。”他停住不说了。我想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同我谈得深一点，说说他转了40年的铁路餐厅、小吃部和餐车都干了些什么。“就这些，啊，对，差点给忘了。”他说着从旧皮包里掏出一堆印刷品和打字材料，并用手指指说：“这些是必要的规章和条例。我全部交给您。好好看看!”他又取出一把钥匙给我，说：“这是您办公室的钥匙，他们会带您去的。现在，我真的没什么好说了。祝您一切顺利。”他又朝我伸出手来，我立刻感到手上如沾了胶水，必须用肥皂好好洗。但是，我得等拉杜利安离开房间后才能去洗。

仅过了几天的时间，我就得知拉杜利安医生早在几个月前退休。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现在是我的了——找到一堆未经处理的群众告状信。看来，他退休前很少出差。我估计他这样想：“如果问题发展得严重，出现了什么，那我早就退休了。”奇怪的是，他竟连车站餐厅也没有去过！我必须从头做起，先处理群众的来信，然后去支线上转转，得住在冰冷的值班车里。因此，我好不容易挤出时间给贝尔巴写信。我只写了寥寥数语，完全是电报式的。我从山村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也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在我当上“卫生检查员”两

个月后，一天晚上，我与母亲谈话时，顺便问起小时候在车站街住的朋友是不是找过我。

“没有，亲爱的，”她说，“你知道，我们搬到这儿来以后，你爸就对我说，现在该结交另外的‘关系’了。”

“好的，妈妈，可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爸爸也不在了，你还记住他的话?”我问道，心里觉得奇怪。

她没有马上回答我。她以诧异的，更多是责备的目光瞥了我一眼。她一辈子只相信父亲宣布过的“真理”。在漫长的岁月中，她只不过是父亲手中的软蜡，任他随意捏。父亲过世后，即使不是他的全部观念，至少也是他相当部分的想法，还有他那狭隘的社会等级观念，都依然存在，并且经过神秘的转换，深深地潜入母亲的思想和灵魂。

“他是那样说的。”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说。我知道，父亲的话对母亲来说永远是法律，她从不怀疑他，更谈不上违抗。我朦胧记得，父亲曾对她解释说：我们成了有产者，太太。父亲生前，母亲俯首贴耳；他去世后，母亲继续遵循他的话。

“这些年，你就没有遇见过车站街的老街坊，他们也不来这儿?”我继续追问。

“哪里，”她回答说，“我们有时在街上、市场

上碰到一起，相互问个好，也就是这些。还有，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参加了格什帕尔的葬礼，他是帐房先生，我应该去，你爸不会不同意。你知道格什帕尔死了吗？”

“知道。妈。”我兴致索然地回答。

我没有从母亲那儿得到任何消息，只好亲自去看看。事情很清楚，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区里，母亲什么事也不知道，连贝尔巴结婚不也是我告诉她的吗？她是个普通女人，不大恋旧。现在有自己的房子，为什么还要老远地跑去看旧居？就我来说，每次休假回家，不也没有想过去车站街看看吗？贝尔巴早离开那里了，我去干什么？但是，我决定“找一天去那里”。我开始逐件地处理公务事，积累的群众来信日趋减少，我还作了多次“视察”，车站餐厅和小吃部的人慢慢都认识我了。机会很快到来了。一天，刚过晌午，我乘车去车站，临时决定去看看，“半小时，最多3刻钟”，我随即迈开大步向左走，回到了我小时候住过的街道。

车站街依然如故，肮脏得很，人行道上坑坑洼洼；比过去有增无减。来往的人似乎增多了，车站附近总有一群复杂的人。天桥加长了，横跨马路，直抵人行道边的一家酒店，过去那儿也是酒店，记得小时候经常拎着瓶子去为大人打酒。街上比过去繁华，满载水泥的卡车驶过去，空车

又从反方向开回来，不知什么地方正在修房子。街上的房屋是原样未动，低矮，肮脏．有的墙皮已经剥落，看来年久失修了。我站在天桥前，回想当年是如何爬上天桥的。我们一群孩子都喜欢上天桥看火车。令人奇怪的是。回忆引不起反响，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感觉，我想至少心应该跳得快一些。天桥的变化不大，没有刨平的厚木板当桥板，栏杆是用铁丝编的密网，简直看不到网眼。如果拿天桥跟马路比，它的变化微乎其微。不能不承认，我自己发生了变化，我多么盼望时间倒流，但那是枉想。

走过天桥，我急急忙忙来到童年时代住过的房子。我按动门把，推门进去，大门像格什帕尔年代一样嘎吱响。我走近旧居，看见门上挂着新房客的姓名：斯皮雷亚·列奥波尔德。我心里想，有些人喜欢把自己的姓写在前面，就像是军队或学校的名册。这个姓名也起得怪，斯皮雷亚是罗马尼亚姓，可是列奥波尔德呢？谁想起来给他起的名？我想，可能由于我在屋门前停的时间长了，门打开了，一个年轻女人出现在门口，她的身材长得很好，带有星星点点的雀斑的脸微微浮肿。“您找谁？”她的目光多疑，边上下打量我，边问。我想，他可能要记住我的特征，去向派出所报告。“找贝尔巴同志。”我回答道，并且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褪色的红头发。她很久不染发了，可以

看出来她的头发本来是栗色的。“在后院楼上。”她用手指指。哦，我想起来了，是在那儿。我不记得是不是向她表示了谢意，慢悠悠地朝后院走去，感到她还站在门口盯着我的后脑勺。尽管春天尚未到来，但是能够看出那个“花园”里面的土垅，都还空闲着没有种花。时过20多年，我还十分熟悉这里的窄楼梯，那是努米安精打细算的成果。如今，又有谁记得他呢？如果他的妹妹、格什帕尔的妻子在世的话，会记得他的。我终于来到贝尔巴母亲住的屋门前，我心里直嘀咕：“她不在家怎么办？”我先轻轻敲门，后来又敲窗子。

“是谁？”一个好久没有听到过的熟悉声音传出来，我立刻辨出是贝尔巴母亲的腔调。

“是我，特列塔。”我回答说。接着又重复一遍：“是特列塔。”

过了好长时间，我听不见屋里的动静。我想，老人正在努力回忆，特列塔是谁？她所听到的名字和声音说明什么……是谁呢？她在慢慢地想，上了年纪的人知道着急没有用。我这次来访，对她来说太突然。她猛一听见我的名字时，可能有点陌生感，后来，终于想起来了，因为我听到她自言自语说：“特列塔吗？对了……等一等，我马上给你开门”。

乍一看见她，确实令我惊奇，我没有能掩饰自己的惊异，也没有想控制自己的感情，老人无疑是

注意到了这一点。我母亲的年龄与贝尔巴母亲的年龄相差无几。我渐渐习惯了母亲衰老的进程。我每年回家两三次，每次都怀着恐惧心情看见她的头发日益变白，脸上的皱纹逐年加深和增多，特别注意到她面部显现出的疲劳，以及老年人特有的古怪冷漠表情。每次回家，我都在心里说："妈老了。"自从我上大学后，一直没有回过车站街，因此也不曾见过贝尔巴的母亲。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她正值中年，现在却是老态龙钟了。我愣了一会儿，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敲错了门。我不能把记忆中的她同站在门口的老人联系起来。她大概看出我的心情，于是笑了笑或者说勉强笑着问我："特列塔，你不认识我了？我变样了吧？……你知道，时间……你……成了真正的男子汉。快进屋来！"她侧着身子让我进门。我一看见熟悉的东西，便不再感到拘束。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旧黄麻地毯。记得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被它绊了一下，若不是贝尔巴抓住我的胳膊，准会跌倒。然后，我看到了衣柜。我记得，当年它是绿颜色，现在已经褪掉，只能勉强认出它着过绿色。我又细心观察一遍，仿佛它能唤醒被我遗忘的旧事。

贝尔巴的母亲做手势，让我往里面走。她指给我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她说："你来了，特列塔。"她说话的声音有点疲软。我回

答说："是的。"我觉得她有不顺心的事情，可是说不清楚是什么折磨她，也许是她流露出来的与年龄不相称的疲困。她紧紧盯着我，目光中含有宽恕，也许是宽恕我的无知。起初，我只预感到异常，后来断定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坏事。

"特列塔，"她用温和的口吻问道，"你真没有听说，一点也不知道？"

"听说什么？知道什么？"我自言自语。

她又长时间凝视着我，好像是要弄清楚，我确实一无所知。后来，她以疲惫低沉的声音说：

"维奥丽卡……维奥丽卡去年秋天刚开始的时候死了。"

## 三

伊昂·伯内斯库街7号的房前有个小花园，我记不得种了什么花，大概是晚香玉吧。总之，那儿有几行花，花丛中有一条小路直通屋门。屋门外搭了个遮日棚。这条街离大米尔恰大街仅几步远，十分安静。历史书上说的老米尔恰大公，在康斯坦萨变成了大米尔恰。

我决定和贝尔巴一起度假。两个单身汉，尽管其中的一个并不是真正的单身汉，不过，这无关紧要。我不喜欢大海，望着那时而变蓝，时而变青的茫茫无际大海，我不禁感到厌烦。他向我

保证说:“我们只呆几天,老伙计。我们带着安卡走,上山去,无论去哪儿都行。我们可以去你呆过的法格拉什山村。”他没有说为什么不单独去,我猜想是害怕康斯坦萨勾起他的回忆,你被压得支持不住时,友谊有时会成为支柱或者拐杖,支撑着你。出于对他的爱,我接受了建议,当然,我也希望和贝尔巴一块儿度假。我记忆中的安卡是她在襁褓中的形象,那时她刚刚几个月,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不过尚未长成小姐,不至于撒娇,耍脾气。因此,我想可以放心带上她。自从我回城后,我和贝尔巴的友谊加深了,如同孩提时代一样。他闭口不谈那几年与维奥丽卡共同生活的情况,我也不问。至于安卡,……我也10年没有见她了。维奥丽卡去世6年了,贝尔巴仍一往情深地怀念她。他几乎整天泡在工厂里,即使呆在家里,他也无法照看不满5岁的小女儿。男人干不了这种事。护送维奥丽卡的骨灰去康斯坦萨时,他只好横下心,把孩子留在岳母家。岳母对他说:“等安卡再长大一点,上了学,放假时让她到你身边去。”这话显然是为了安慰他。那么在那之前呢?贝尔巴说:“每逢去布加勒斯特开会,我总要拐到这儿,趁换车时间跑来看她一眼。春天和夏天,有时还乘飞机来。”他还说,奇怪的是,尽管很少看到安卡,但没有忘记她,当然每次见面总不会空手而来。他苦笑着说:“你知道,我快成为玩

具专家了……我在岳母心目中的地位也提高了。她的等级观念很深，自从我当上厂长以后……刚结婚时？她骂女儿没出息：'找个小工程师？就找不到别人了？这种人像树叶和草一样，遍地皆是，能凑成一个班。'这是维奥丽卡转弯抹角说给我的……现在，我想她改变了看法。因为，不管怎么说，厂长凑成一个班是不大容易的。"

我们拐过弯，来到伯内斯库街，街道不长，很快就到了7号门口。贝尔巴对我说："就住在这儿。"我看到铁门里面有个小花园，花园那头是房屋，房前搭着玻璃遮日棚。贝尔巴正准备开门，忽然想起了什么，放在门把上的手缩了回来，转过身来瞧我。他想对我说些什么，但又犹豫不决，似乎难以启齿。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说：

"特列塔，别生气，我想求你一件事，你就把它当作是我的怪脾气吧。"

我认真瞅了他一眼，发现他犹犹豫豫，欲言又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副样子。我们之间一向是直来直去，他现在怎么了？我装作没有看见他的窘相，鼓励他说：

"说吧，我听着。"

"瞧，是这么一回事。"他略微平静了一点说，"我给岳母写了信，说你和我一块来康斯坦萨。我对她说，你是我从小的朋友，是医生，不过没有说明是什么医生。她有疑心病，想象自己百病缠

身。她将向你提出一连串问题，你对付得了吗?”

“放心好了。”我说后，他才轻轻喘一口气，这也许是我的感觉。他转过身去，把手放在门把上，转动了一下，我们推门走进小花园。我们没有走出几步，只见遮日棚下面的屋门开了，一个刚刚齐他肩膀高的黑发小姑娘张着双臂跑过来，嘴里喊着“爸，爸，爸来了。”我想，她从朝花园开的窗户里看见了我们。贝尔巴忙把右手提的包换到左手里，弯下腰抱起小姑娘，一个劲儿地吻她，嘴里不停地说“爸的小乖乖，爸的小乖乖”。他的嘴角浮现出幸福的微笑，我好久看不到他这种微笑了。他抱着她，我真不可理解，他怎么手里提着重东西，又能抱孩子。他对她介绍说：“瞧，安卡，他是我的朋友，米哈伊·特列塔。”她听后，十分庄严地向我问好：“您好，先生!”她已经是个半大不小的姑娘了，我打量着她，视线停留在她的绿眼睛上，这使我记起了柳条摇篮里的小丫头。不过，那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当年襁褓中的婴儿，今日变成婷婷玉立的少女，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我不禁想起另外那一双眼睛。安卡的绿色大眼同她母亲的完全一样。由于遗传因子和染色体的神秘作用，安卡的眼神也与母亲一样。

她搂着父亲的脖子走过小花园，贝尔巴目不转睛瞅着她，我的目光也没有离开过她，直走到屋门前，我才发觉有人正密切注视着我们。我看

见奇雷斯库太太伫立门内。如果不是她在家里迎候我们，那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她是维奥丽卡的母亲。她们母女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是个矮小的胖女人，斜眼看人，目光狡黠，仿佛在说，“谁也休想骗我”。她的表情虚伪傲慢。我心里想，奇雷斯库太太有什么值得傲气呢？后来，贝尔巴解释说：“她是希腊人，自以为出身高贵。”吃饭时，我认识了她的丈夫。他像个典型的退休教师，他确实当过教师。维奥丽卡有点仿父亲，尽管父女相似之处并不多，他们的眼神尤其不同，他的眼睛无神，忧郁，他相信生活是一场败局。

我们在康斯坦萨住了几天。贝尔巴竭力想博取岳母的欢心，但他显得有点拘束。就我来说，自认为戏演得不错。其实，即使她不把我看作“专家”，我也可以对付过去。朋友的估计完全正确，她的“病”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断抱怨头痛、失眠。饱食终日的人必然会生这种病，况且她像个无底洞，从早到晚灌进数不清的咖啡。我给她开的处方是多活动，尽量活动，尤其要利用晚上散散步。因为，愈严厉的医生愈受尊重，所以我严禁她喝咖啡。“要科学地饮食，尊敬的太太，不要吃点心和熏制的食品，尤其忌禁甜食，尊敬的太太，大量吃甜食会引起头痛。”她害怕地看着我，叹口气说：“好吧，医生，您的处方比鲁德亚医生的严格得多。的确，他也认为过量的咖啡会……”

我有把握地说："瞧，不要喝咖啡，多活动，尽量多活动，我不能要求您参加体育运动，可是多活动，不喝咖啡……您就主动了，失眠自然而然就好了。"我停顿一下，故意严肃地望了她一眼说："要严格控制饮食，明白我的意思吗？简单地说，您这样做就不会头痛了。"那天晚上，我们回旅馆后，贝尔巴笑着对我说："真有你的，你简直是块做演员的料。"我又一次看见他笑了。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当演员的天才。第二天，我发现安卡真不愧是贝尔巴的女儿。她像他一样犟，我不想用固执这个词。早晨，她问他："爸爸，今天去玛玛亚吗？"贝尔巴的脸沉了下来，我猜想，他一定记起了过去和维奥丽卡在海滩度过的日子。他犹豫了一会儿说："不，安卡，我们不到玛玛亚去。"小姑娘忽地沉下脸，生气地跺着地板说："就要去玛玛亚！"他父亲同样坚决地回答："不去。"我只好打圆场说："安卡，为什么非去海滩不可？从你家门前上车，坐15分钟无轨电车就能到那个地方。我看，不如去黑斯特里亚。你去过黑斯特里亚吗？"她皱着眉头说："学校组织过一次，下雨了，没有去成。"过了一会儿，她迟迟疑疑地问："黑斯特里亚好玩吗？"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儿，只看见过旅游广告。于是，我借助它们描述了黑斯特里亚的古希腊建筑遗迹，擎天的石柱，回廊，大理石板（那儿真有大理石板吗？）为了使安

卡忘掉玛玛亚，我特地给她讲了曾经在蓬特城堡码头停泊过的古战船，有三层楼高。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流沙还没有吞没城堡，黑斯特里亚与大海相连。我向她详细介绍了旅游路线：从康斯坦萨坐火车到图尔恰，再乘船进入圣格奥尔基河，那儿有个大沙滩与玛玛亚一样，还有一个小岛叫萨哈林，玛玛亚可没有岛。我们再换上小船通过窄运河，进入长得比人还要高的芦苇，直至鹈鹕的聚居地。我问她："你见过鹈鹕吗?"不，她没有看见过。

安卡的倔脾气不是偶然的，那是神秘的遗传造成的，是从贝尔巴身上继承来的。没有母亲的孩子是任性的。奇雷斯库太太以特殊的爱抚育安卡，这对她来说是不够的。她很少看见父亲，尽管假期里来我们这儿。她快长成15岁的大姑娘了，开始占有式地爱父亲，不允许他的感情打折扣，更不能容忍分给别人。贝尔巴同玛拉结婚前告诉过她。他苦笑着说："那是我一生中写得最长的一封信，你知道，我不善于写信。"过了许久，直到快放寒假时，他才接到回信。他给我看过，那是一封只有几句话的短信。安卡告诉他说："我放假不去你那儿了。我去做什么？你已经有自己的女人了。"奇雷斯库太太肯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谁知道她编了些什么话。贝尔巴失望地对我说：

“我没有能说服她。”他到康斯坦萨去过，安卡对他十分冷淡，几乎是持敌对态度。她不愿别人占有他父亲，把他的结婚看作是背叛。她毕竟是个孩子，有倔脾气，不懂得妥协。贝尔巴沉思地对我说：“我觉得她有妒忌心。”夏天，他和玛拉到内普顿度假。初秋的时候，他对我说：“我让她一个人呆在海滩上，自己跑到康斯坦萨去。安卡的态度毫无转变，根本无法把她们二人拉到一起。”他只希望事情能自动解决。从某个意义说，他说对了，但不是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也就是说，糟糕透了。

第二年春天，安卡通知说，假期里来我们这儿玩。我和他都以为她想通了。我们——我和他——都不大懂女人的心理。我回忆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努力寻找她改变固执态度的原因。我想，她可能是出于好奇心，想了解和研究“对手”。或者是贝尔巴以前的岳母奇雷斯库太太唆使她，“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更可能的是，姑娘态度的转变没有什么客观原因，只是不愿再僵持下去。这期间，他到康斯坦萨去过两次。玛拉总是讽刺说：“白花车票和机票钱。”这也是一种态度。他对我说：“看来，安卡开始明白了。”人总是喜欢往好的方面想，我很快就看出来他错了。他用的办法不合适，常常拿一大堆礼物去感动她。后来，安卡很反感，问我：“爸爸以为这就可以收买我了？”她已经16岁了，是个秀丽姑娘，她也许

有自己的秘密，这就决定她去了解自己的父亲。我想，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不是玛拉……我敢断定，她是故意把事情搅乱。

初春时，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通知我："安卡来度假了。"我听到他高兴得声音发颤。我们决定一起去车站接她。火车晚点半小时。我们只有在月台上散步。阵阵凉风刺脸，4月天有时是这样的。火车的汽笛声一响，我看见他那一直绷着的脸立即舒展开了。我们不知道安卡在哪节车厢，于是便分头去找。我听到了喊声，好不容易才认出她来。两年不见面，她的确长成了大人，而且她和维奥丽卡酷像两滴水，看不出差别。她气呼呼地问我："我想她没有来吧？"我向她保证说，只有我和贝尔巴来了。我把他们送到出租汽车站，握手告别，并答应第二天去看她。我目送他们乘坐的出租汽车消失在黑暗中。我模模糊糊预感到，安卡和玛拉相见不会有好结果。

我的预见很快得到了证实。次日下午，我去拜访他们，发现来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敌对双方正在互相窥测，保持着表面上的休战。贝尔巴满面愁容，显然他的处境困难。玛拉像个殷勤好客的主妇望着我，留我吃晚饭，看来他们需要我，希望我来缓和一下气氛。我看得出来，安卡故意对继母保持一定的距离，答话均用单音节。玛拉劝她说："叫我玛拉好了。"可是，安卡装做

没听见，不到不得已不同她说话，并且口口声声叫她“太太”。玛拉暗暗咬过几次自己的薄嘴唇。安卡忽然问贝尔巴：“爸爸，你为什么从树林那儿搬走？我喜欢那儿，风景好，离你的工厂近。你说过，住在那儿舒服自在。我记得，你曾在阳台上指给我看厂里的灯光，是的，我喜欢它。这儿，没说的，你的住宅更大了，你把家俱也换了，不过，我还是觉得那儿好。”从车站上听到她鄙夷地称玛拉为“她”以来，我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安卡首先发难。她根本不提玛拉，说住宅是她父亲的，一直惋惜过去的住宅。她故意无视继母的存在。我看了一眼玛拉，她快把薄嘴唇咬出血了。她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她露出笑容，尽管是强笑，仿佛吃了野苹果。她说：“这是我的主意，离工厂和法院都近。安卡，你好像不知道，或许你不愿知道（她接受了对方的挑战），我和你爸爸一块儿住在这里，这是我们的住宅，我是他的妻子。”安卡漫不经心地说：“啊，对了。”我想换个话题，不过没有成功。我只有不加选择地讲几个笑话，三个人都皱着眉头听，不知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告别时，我明白留下的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暴风雨疾驰而来。就在第3天下午，我接到了电话。

“特列塔叔叔，”我听出是安卡的声音，“我能

上你那儿去吗?”

“当然可以，安卡。”我回答说。“我等着你。贝尔巴也来吗?”

“爸爸不在家。”她的声音非常激动。“他给我们打了电话。他要开会，晚上才回家。事情发生时，我是一个人同‘她’在一起。我能去吗?我会跟你说清楚的。”

“当然可以，安卡。”我回答说。我这才明白她好像在远方说话，并且话筒里还掺进了其它声音，电车声和好几个人的谈话声。显然，她不是在家里打电话，而是用了街上的公用电话。“你是从哪儿打的电话?”我对着话筒喊，但是没有人回答，她挂断了电话。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急于知道详细情况。肯定是安卡和玛拉发生了冲突，谁挑起的呢?我打算给贝尔巴打个电话，把他从会议室里拉回来，不过，随即又改变了主意。也许为时尚早，自己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不如等安卡来，先听听她的话。遇到这种事情，着急也无济于事。

安卡的到来远远超出了我预计的时间。我等了15分钟，半小时，3刻钟。从他们家慢慢走来只用20分钟，最多25分钟。她给我打完电话，已经过了1小时。我下决心告诉贝尔巴，他应当了解事情的真相，何况玛拉将会对他编造一堆谎话。我从扶手椅里站起来打电话。恰巧门铃响了，客人

焦急的按铃声使我觉得像是拉警报，发S. O. S.讯号。我连忙跑去开门。我没有猜错，安卡站在门口。仔细一看，我明白她迟来的原因，原来提着箱子走来的。

我让她进屋，脱去夹大衣，坐下。她手里的箱子看起来不重，不过已经提着它爬上了三层楼，她也够累了。我没有问什么，知道等她喘过气来将会主动说出来。我问她："喝一杯水吧？"她点头表示同意，下巴一直在微微颤动。她不愿开口，竭力控制着自己，只要一张嘴，泪水便会涌出来。我去厨房取水，并故意多磨蹭一会儿。我不着急，让她有时间冷静冷静。当我端着水回到屋里时，她正站在窗前欣赏房前的广场和教堂。她说："教堂很气派。"我补充道："是巴乐克式的建筑。"我是没话找话，好像安卡提着箱子来就是为评论建筑物的。"广场中央的那一座房子也是巴乐克式的，跟教堂一样，是奥地利人造的，你知道，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过这座城。"她装出感兴趣的样子回答："是吗？"我接着说："是的。他们是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的，这儿曾经是土耳其的一个总督辖区。"她又说一声："是吗？"她虽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但仍然重复问一句，表示她在听，同时也是想推迟另外一场谈话，也就是复述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一切，看来她并不愿意再回头想它。"我一个清真寺也没有看见过。我们康斯坦萨有个清真寺，

还有望月塔，沿着一条蜗牛形的楼梯爬上去，头都会发晕。”虽然我毫无兴趣讲历史，但不得不说，“奥地利人毁掉了清真寺。土耳其人统治时也破坏过。他们只留下了我们罗马尼亚人的教堂。很多简陋的小教堂，人们常常为它们浪费许多时间。”

我发现她斜着眼看我，不过，我装作不知道。也许，她以为进门后，我会向她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我知道她同她父亲一样倔犟，她若不想说下午发生的事，你休想从她嘴里掏出来一个字。我知道，她迟早会主动说的。我猜想，确切地说，我敢肯定，她一定与玛拉发生了冲突，并且相当严重，致使她不愿住在那里。我看了一眼表，想着贝尔巴该到家了。玛拉会编造什么呢，她善于巧言花语……

“安卡，”我谨慎地说，“你不认为应该告诉一声你爸，说你在这儿吗？我想，他会担心你，很焦急不安的。”

她犹豫不决地摇摇头，表示“不”，

“不过，”我继续坚持说，“你也得为他想想。他回家见不到你时，你想，他心里怎么想？”

她终于忍不住了。

“我同‘她’（她这样称玛拉）无法呆在一个屋顶下。”她踌躇了一会儿，用温和的口气问道：“特列塔叔叔，你会借给我车票钱的，是吧？我要回康斯坦萨去。用不了多少钱，坐二等车就行了。”

"好的，安卡。"我强笑着回答她。"不过，我得再次提醒你，要为你爸着想。"

她考虑了一下，才点头表示同意。我抓起话筒，拨了贝尔巴的电话号码。我很快就听到了他焦虑不安的声音。我告诉他："安卡在我这儿。"我想听听他的反应，停顿之后说："我们等你。"他说了一句"我马上来"，便挂断了电话。10分钟后，门铃响了，他许是坐出租汽车来的。我给他开门，走进屋后，我对他说："她非常激动，我猜是跟你妻子吵了架。"他没有吱声，径直冲进屋去。一见到他，安卡就倒进他的怀里，号啕大哭起来。他劝说道："冷静一些，别太激动，乖安卡听话。"他抚摸着她从中间梳开的乌黑长发。安卡好不容易才静下来。她不再像大姑娘，倒像受惊的小娃娃。稍过片刻，他给安卡鼓气说：

"嗨，安卡，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

她终于恢复了常态，确切地说，她装做平静的样子对父亲说：

"爸，我不能同'她'在一个家里生活。"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他故作镇静地说。我注意到他正咬得牙咯咯响。

"相片，妈的相片，你知道，你把它放在电视机上。"

"相片？我不明白。"

"妈的相片不见了。'她'把自己的相片放在

那儿，穿着游泳衣，爸，……那种衣服……几乎是一丝不挂，让人看了恶心，用这种相片替换妈的相片。”

贝尔巴的脸沉了下来，情不自禁地望了我一眼，然后，目光转向安卡。

“你不愿和她住在一起?”

“不。爸，请别生气，她是个无耻的女人。”

他不由自主地一哆嗦，仿佛被人突然揍了一记耳光。他转过脸对她说：

“安卡，那不是她的家，是我的家。我会把你妈相片的事弄清楚，”他停了一下又说，“还有，另外一张相片怎么会放在那儿的。现在，我们回家吧!”

“我不能跟‘她’呆在同一个屋顶下。”

他长时间地凝视着她，我想他想到了自己的固执劲儿(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很快就意识到，姑娘是不会妥协的。

“好吧。”他表示同意，转过身来问我：“你有她睡觉的地方吗?”

“这好办。”我回答说，尽量让他放心。

“安卡，”他说，“你就留在叔叔这儿吧。我回家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明天一早来接你。我明天请一天假，咱们到城里去吃饭，你明天晚上坐卧车走，好吗?”

“好的，爸爸。”她大概认为自己占了上风，便

温顺地说。可以想象得到，‘她’这一夜不会好受。

贝尔巴要走了。我们送他到门口，临出门，他又像想起了什么重要事，必须立即弄清楚，只见他转过身来，用无所谓的口气问：

“安卡，那张相片呢？”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看见她露出笑容。她带着淘气的笑，意思是“够‘她’受的了”！她坦率地回答说：

“爸爸，你别生气，我想我已经气得‘她’七窍生烟了。我可不是故意的。相片？你问我那张相片吗？我把它扔到地上，镜框玻璃也被摔得粉碎。我想，不过不敢肯定，因为没有细看，我把镜框也弄坏了，我用脚踩了它。”

我发现他正竭力掩饰自己的得意笑容。他认识了自己的女儿，但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他没有说什么，吻吻女儿，跟我握握手，会意地看我一下。后来，我听见他强健的脚步踏在楼梯上的声音。我关上门，回到屋里，饶有兴趣地想，居然一个女人来到我这个单身汉的屋里，而且是怎么样的女人啊！次日傍晚，我们二人送她去车站。我故意不问他头天晚上如何同玛拉“交涉”的。交涉？我想，更大的可能是一场针锋相对的吵架。但是，我没有估计到另一种结果，即由此引起了几天后发作的第一次心绞痛。据说，有人发病前

根本没有异常感觉，他是正开着会发病的，他们把他送进医院，但他没住几天就出院了。

# 第 九 章

## 一

贝尔巴迷迷糊糊地站在小窗口前，像参加祈祷似地听着门房呼叫男孩和女孩的名字……还有重量。他明白，这意味着新生儿的体重。时至今日，那天上午发生的一切，甚至连细节他都记忆犹新。炼钢工人提议去喝杯酒"庆祝"一下，说这是"惯例"，他马上同意说："对，当然要喝。"炼钢工人说了附近一家他熟悉的小吃店名字，并说："那儿上菜快。现在干等着没用，反正不会放我们进去。再过一会儿，或许……您能碰上一个护士，好好求求她，她会上楼去您妻子那儿，然后再从她那儿给您带两句话来……"虽然他的话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意思不错。过了那么多年后，他还记得那个人走过来，直一直腰，握一握他的手，自我介绍说："我叫普雷瓦利图拉……"不错，他是叫普雷瓦利图拉。

贝尔巴被说服了，没有必要再留在那儿，尽管妇产医院有如磁石吸引着他。当时他想，楼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了，维奥丽卡和安卡。

他和普雷瓦利图拉一道拐过街角，走进小吃店。招待员很快送来了酒。说也奇怪，他竟然记得装酒的高脚玻璃小酒杯。他们一口气饮完一杯凉液体。普雷瓦利图拉用棉袄袖子擦擦嘴，在他的记忆中炼钢工人的工作服是蓝颜色，那时却成了青色，连袖子也磨破了。当他盯着炼钢工人的工作服时，思想已经飞到她们身边去了。她们在做什么？他问自己，当然得不到答案。普雷瓦利图拉一定是个乐观的人，他的话滔滔不绝。他说，"再来一小杯"，接着谈起有孩子的乐趣。他说："为了这样的时刻，值得活着。"可惜忘记了他的相貌，只隐隐约约记得他的身材高大……眼睛好像是蓝的。后来，他去过那里几次，但是没有遇见普雷瓦利图拉。在安卡出生那天，他们站在一张高桌子旁边，桌面是仿大理石，桌腿是金属的。不错，他和炼钢工人一起喝酒，心里却想着维奥丽卡在哪个房间，哪层楼？她分娩后有什么感觉？据说，疼痛难忍。对，必须设法问问护士。你要是会应酬的话，护士们也能以礼相待。还有小女儿……安卡是什么样子呢？据说，新生儿全是一个样子……孩子一落地，护士就在他和产妇的手腕上分别用绳子拴上一块有号码的金属牌，安卡手上的绳子是不是绑得太紧了？他当时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他默默地想，人一生下来就在手腕拴上一块洋铁片，如同剧院存衣处用的那种牌子。他是

后来从维奥丽卡口中了解到有关洋铁片的细节的。她笑着说："哈，我们女人知道的事，你们男人做梦都想不到。"

他和普雷瓦利图拉还谈了些什么呢？他们等候在妇产医院门前的时候，容易说出心里话。炼钢工人对他说，自己是从附近的农村里来的，他们那儿是穷村，地少，全是石头。他说："我们进了工厂，另外一些人到阿尼纳挖煤去了。工资没说的，不错，可活儿很重，不是人人都顶得住。"

他们如同生死之交的好朋友，紧紧握手道别。他女儿出生那天，太阳当空照，从山那边吹来阵阵凉风，但他不觉得冷，也许是喝了烧酒的缘故，或者因为春天正悄悄地降临。

"我走了。"他忽然莫名其妙地着急起来。

"对，对，"炼钢工人赞同地说，"我们都有事。我们得买些花，请她们送进去。"

花？他的衣服口袋里装着巴比安的名片。一张用白发光纸印制而成的相当大的名片，姓名用的是斜体字。他对贝尔巴说过：

"工程师先生，需要的时候，您可以去找我的朋友。他是花匠，自己有个花圃。全城找不到他那样的花。我们住的离他远了点，不过，值得跑一趟。您不会后悔的，请相信我。"

他记得接她们母女出院的情形。他看见一个个妇女怀抱着什么东西，从小门里走出来，她们喜

气洋洋，小心翼翼地低头往前走。他觉得等了好长时间，最后才看见维奥丽卡，是他先看到她的。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维奥丽卡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她朝他走过来，掀开盖在小女儿脸上的纱巾。那时，他第一次看见安卡。她天生一双大眼睛。后来，眼珠仿她母亲，变成了碧绿色。安卡刚出世的那些日子，每天睡很长时间。她的小床放在最安全的地方，床上挂满图片，如迪斯尼动画片中的图案，什么唐老鸭、米老鼠、白雪公主和 7 个小矮人。过了几个星期，小姑娘的眼睛可以看东西了，她特别喜欢盯着看白胡子直垂到腰部的矮胖老头儿，以及用各种颜色画着穗穗的高帽子。她开始呀呀作语了，这是她最初的语言。那是什么时候？第 2 个月？还是第 3 个月？他遗憾地想："多可惜，没有多照点相片！"那些年的事开始变模糊了。再后来，哈，大约是过了一年，她会叫"爸爸"了，这是他永远忘不了的。渐渐地，他习惯了，男人比较难适应新的环境。

那天早晨，他还想像不到即将发生的事。他和普雷瓦利图拉分手后，迈开大步沿街走去。他走在桥上，匆匆望了一下又浑又脏的河水。从该城的最后几座房子起，河谷慢慢变窄了，愈往前行，空气愈清新和凉爽。房子愈来愈少，只是这儿那儿零零星星有一座房屋，小片土地也被利用起来种菜或种花。现在只能看见湿土地。愈往上

走，积雪愈多，表明阳光很少光顾这个窄谷，冬天仍然在肆虐，迟迟不肯隐退。一辆卡车轰轰隆隆从他身旁驰过，左右两边的泥浆四溅，他忙闪到路边。

花匠叫卡普莱尔，他的房子坐落在一片草坪上。公路拐弯后，山谷变宽了。一条石子小道从公路上岔开去，小道养护得很好。巴比安对他说过："卡普莱尔退休后，过起了野狼似的孤独生活，他不愿卖花，要是我介绍去的话，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走近树林，听到犬吠声。阴森森的墨绿色枞树与四周光秃秃的树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这片枞树林是人工栽种的，并经过了精心管理。他穿过树林，房子和花圃出现在面前，大门里面有个老人正在警惕地审视来客。狗还在狂叫，若不是被链条拴住的话，它早就窜上来咬你了。

这个红头发、耳朵下垂的高个子老人，一定是卡普莱尔。虽然是初春，确切地说时值冬末，他却只穿一件灯芯绒外套，上面缀着发亮的银色钮扣。花匠那双冷冰冰的灰色小眼睛疑神疑鬼地凝视着他。他不禁失望地想："他一点也不像生意人。"他走近小门，站在门前说："是巴比安先生让我来的，这是他的名片。"老头问："巴比安？"好像他对这个名字很陌生。渐渐地，他的眼神变得温和了，他想笑一笑，不过，看得出来，他不善于客套。他又重复一遍："是巴比安吗？请，请进

来！"门嘎吱一响，猎犬又狂吠起来，它们的主人喊一声"不要叫！"它们立刻安静下来。花匠招呼他说："您请到屋里坐。"他客客气气谢绝了，解释说："您知道，我的妻子今天分娩，我想送她些花。"花匠皱皱眉头问："花？您要什么花？"他不知所措地回答说："不知道，我想请您看着办。"卡普莱尔脸上露出了隐约可见的笑容，看来他会笑。他说声"随您的便"，把他留在院里，自己转身进屋去了。眨眼间，他拿着花匠用的大剪子从屋里走出来。他问："您要多少花？""不知道，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这种场合需要用多少花？"老人的表情令人不解，从好的方面想，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微笑。他说："没有定数，5支，7支或9支都行。少于5支就太寒酸了，多于9支又太……对吧？"他说一口地道的罗马尼亚语，出口的字都稍加软化，完全同斯拉霍特卡太太一样。"好吧，就来9支吧。""太好了。不过，您得告诉我要什么花，什么颜色？""看着办吧，你懂，我相信你挑选的一定会非常合适。"卡普莱尔转过身，朝院子的那头慢慢走去，那儿有个玻璃顶的暖房。现在，贝尔巴可以清楚看到，他的一条腿有毛病，他可能因此而提前退休，种起花来了，也许他早就爱好养花……这个寡言少语的红发老头儿，为什么不可能年轻时就爱上了养花呢？他慢慢走过来，手里拿着玫瑰花，确实是玫瑰花，而当时才3月末。他

自豪地问："您喜欢吗？"他记不得何处见过如此漂亮的花，花朵很大，枝挺叶茂。都是刚刚开放的黄色玫瑰花，正如巴比安说的，卡普莱尔种的花堪称全城最美的花。花匠用长满老茧的手拿着花又问："您喜欢吗？"他回答："太好了！""您以为，"他问，"吉卜赛人在市场上卖的花能同我的花相比吗？""那怎么可能呢？"他像受了委曲，急于辩护说："巴比安对我说起过你的花，他让我尽管放心来。""是啊，"花匠善意地笑着说，"巴比安先生也在捣鼓花，他比别人知道得多一点，那是没说的，不过，他还得好好学着点。"

花匠说得十分认真，俨如大学教授在评价一篇博士论文。这么说，那个经纪人巴比安，确切地说是前经纪人，也喜欢花，但他并没有如实向人事部门交待。人真是复杂的生物，远非几页人事档案材料所能说清楚的。不应该根据表面现象给一个人匆忙下结论。老人把玫瑰花递给他，包花的白纸发出窸窣声，他付过钱，告别了花匠。他走出门，一直安静卧着的猎狗又狂叫起来，他走出卡普莱尔所在的枞树林，还能听见它们的叫声。他自问，一年之后，安卡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他不知不觉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时空观，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像潮水涌上海滩浸透了他整个身心。

他上了公路。他来时走上坡路，现在正相反，

因而感觉路近了。他手里捧着用薄透明纸包着的玫瑰花。他透过纸瞧一眼花，心里想“太棒了”。他无意中使用大学时代一个同学的口头语，那个同学喜欢用形容词的最高级。两只老鹰在天空飞翔。他想，它们正往山上飞，春天快来了。他仰望它们飞翔的优美姿态。过了一会儿，他忙加快步伐。几座房子零零落落呈现在眼前，公路变换成了街道，尽管是冷清清的，但毕竟是街道。他现在在城外，离城不远了。街道向左转个大弯，绕过了一座山包，山脚下就是冲云霄的大烟囱。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沉重的喊声，接着是车厢编组时发出的声音。工厂的火车正在作业。时近中午，车间里的人快要到午餐时间了。在食堂里吃饭的人中，也许有人能猜到他请一天假的原因，他们迟早会知道的。他的想像如同弹簧又跳回妇产医院，维奥丽卡在那儿等着他，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她？他听人家说，可以通过医院的一个类似小窗口谈话，或许明天就能够做到。不管怎么说，他得设法把花送给她，借以表示自己对她和那个出世几小时的小生命的思念。

## 二

他回顾往事时，经常不自觉地回避一个时期。但是，这个时期的事却深深刻印在他的脑海

中。清晨，他从梦里一醒来，便会机械地摸摸身边的空位子，这张床睡一个人未免太大了。梦使他从现实中解脱出来，哪怕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他不禁闪过这样一个问题："她在哪儿?"随即，他感到心如刀割。她走了。他不愿提她死了，认为她只不过是远走高飞到了生活的彼岸，一去不复返。他的视线转向安卡的小床。床上是空的，奇雷斯库太太把安卡抢走了，那是在以后……他不愿想这个以后……他抬头望窗外，秋天的早晨凉飕飕，微弱的光线透过窗玻璃射进屋里来。于是，白天又自然而然地开始了。他旋即跳下床，梳洗，穿衣服，自己做早点，每件东西都能引起他对她的怀念。他来到街上，简直可以说是逃出了家门。然后，迈着方步朝工厂走去，他有的是时间。在工厂里，他从早到晚有做不完的事，自我安慰地说把旧事置之厂门外了。

时光就这样消逝了。生活单调得像一团揉匀的面团。他对一切格格不入，甚至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但又不得不忍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人们关于超脱的想法只不过是幻想。因此，必须振作起来，从头开始。人活在世上，就得不断从头做起。记住生活的真谛。对他来说，一切始于德拉戈什的办公室，当然也可以在任何其它地方开始，但命运作了这样的安排，选择了前厂长的阔气办公室。国有化后，德拉戈什占用了这间办公

室。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成为他生活的转折点，其实，什么地方是无关紧要的。

他立刻意识到，厂长找他去不是为了问他的身体情况。他出席了上午的生产例会，会议结束后，德拉戈什神秘地招呼他留下，说："贝尔巴同志，请你12点左右来我这儿一下。"他停顿一下，好像"左右"这种说法不符合他的习惯，于是纠正说："不，还是两点吧，两点正。"他握一握贝尔巴的手，就走了，到门口又转回身说："是个紧急的重要问题。"然后，他按了一下隔开他办公室和会议室的门上的把手，开门走出去。贝尔巴的心里纳闷："什么紧急的重要问题？"他边想边走出会议室，往车间去，那里总有忙不完的事。午饭后，他想起德拉戈什约他谈话。会有什么事呢？同车间的工作有关系？如果有缺点的话，厂长会在会上批评的。他的嘴厉害，从不留情面。况且，车间在旬、月和季度的生产评比中都很好，得过先进生产红旗。德拉戈什曾不无遗憾地说过："你们不是钢铁工人，不过，说实在话，你们干得不错，我祝贺你们。"

他眼前又出现了会议室。各车间主任都来了，他们正充分利用难得的轻松时刻，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一到时间，也就是说上午9点，一分不晚，一分不早，厂长办公室通向会议室的门打开了，德拉戈什走进来，快步走向会议桌横头

的座位。他抓紧分秒时间，边走边说："现在开会"。贝尔巴记得，几年前第一次参加会议时，曾开玩笑说："我们好像是召开银行董事会，是来提取酬金的。"他那会儿是联合企业里最年轻的车间主任，他为了能踏入被称为"圣人厅"的地方而自豪，众人都这样称会议室，但没有人知道出处。或许德拉戈什知道？

会议室呈梯形，四壁镶着烟熏的松木板。在一面墙的中央有个白大理石壁炉，从来没有人生过火。会议桌正中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青铜灯，挂灯的铁链像壮汉的粗胳膊。桌子周围摆着几把靠背椅，硬梆梆的木靠背使你不能打盹。这些椅子同教堂里的差不多。德拉戈什嘲讽说，会议室、家俱以及工厂这一"整套"都是接收来的，过去的所有者是钢铁界著名的股份公司。那时，经理、主任工程师、"参谋部"都到这里来开会。"头头"，即大股东是两次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的金融巨头之一。工厂是个老厂。第一次大战结束不久，厂主从奥地利人手里买了过来。他对亲信说："当时通货膨胀，他们急于要硬通货，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我才做成了一宗好买卖。"厂主的身材矮小，大腹便便，短腿，头脑冷静，思维如刀刃一样锋利，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大捞了一把，至少在罗马尼亚称得上是豪富。有些人，比如他的死对头玛拉克萨，指责他浑水摸鱼。他得到了卡罗尔二

世[①]的宝贵支持，据说付出的代价不小。但是，他却说："代价大，不过，值得，不能跟国王讨价还价。"第一次大战后，厂主初次来到这个会议室，瞪起一双灰眼睛，入木三分地盯着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大家当即意识到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主人。来开会的人是奥地利工程师，几乎都上了年纪，他们不是在维也纳和格拉茨学习过，就是毕业于柏林的夏洛腾堡工学院。他对他们说："我要我的工厂像钟表一样运行，你们必须履行职责。"他先用罗马尼亚语说，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听懂，又用德语复述了一遍。总共不到5分钟的"演说"结束时，他用拳头砸一下桌子，让人们牢记他的话。他的手又小又肥，看上去软绵绵的，尽管是这样，人们明白这是只铁拳。风向开始变的时候，他很快觉察出来了。过了"八·二三"，他就暗中卖掉了股份。他在外交部有关系，同样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变卖了布加勒斯特的产业。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到了护照，他早用秘密户头把钱存到瑞士，谁也不知道，甚至瞒着他妻子。他坐飞机像候鸟飞往温暖的地方，听说几年后死在南美洲什么地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厂接受过赫尔曼-格林钢铁厂的特派员。他们和颜悦色，彬彬

---

① 卡罗尔二世(CarolⅡ，1893—1953)，罗马尼亚国王(1930—1940)。

有礼，故意不计较工厂的“头头”是犹太人的事实。厂主谨慎地藏在幕后，没有出面，指派总经理代表工厂——不是代表他本人——接待他们。他与一个朋友谈心时说：“德国人长不了，打不赢，将同他们的第三帝国一起完蛋。”他们并不是来作礼节性访问的。柏林来的先生在克虏伯、克勒索和维科斯工厂都有股份。总经理惊讶地问：“怎么可能？”他也是在德国的工学院毕业的，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英国人也把股份卖给了你们？”头发梳得油光蹭亮、穿着军装的高个子是团长，他狡猾地一笑说：“不是一般的买卖，我们拿了过来，正如法国人所说，‘战争就是战争’，您懂吗？”谨言慎行的总经理明白，不能再追问下去了。特派员们装得文质彬彬，没有寻问工厂的真正“头头”在哪儿，尽管他早已经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册，当然他本人一无所知。他们关心的是工厂，千方百计让它也为德国的战争效劳。“我们需要大量的好钢。你们可以挣大钱，先生们。”他们说。

女秘书显然已经得到指示，立刻把他引进厂长办公室。德拉戈什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嘴角挂着微笑欢迎他。他指指扶手椅说：“请坐，亲爱的贝尔巴，请坐。”桌前有两把扶手椅，面对面地放着。厂长在一把椅子里坐下，他想让贝尔巴明白，这不是一次正式谈话，就是说不是厂长和下属之间的谈话。他们沉默了一阵子，德拉戈什似乎不

大乐意开口。后来，他终于下了决心——如果他犹豫过的话——说，“昨天，第一书记叫我去州里了(他头一天确实不在厂里)，他想从我这儿了解一些情况，你能猜到是关于谁的吗?”贝尔巴做一个手势，表示他无从知道。德拉戈什接着说：“你的，是关于你的业务能力，尤其是其它方面的情况。”到了该说明真相的时候，他有点不大高兴，“算了，少说废话，他们要提拔你去当厂长，就这么回事。”

“什么？”

“你全听明白了，我可不能白费口舌。”德拉戈什松了一口气说。他有点生气，因为，州委越过了他，事先未向他打招呼。“他们准备建一座电机厂，明白吗？我问他，‘那好，您难道没有足够的工程师、专家？您还有工学院。’他只做了个手势。”德拉戈什学了一下那个手势。“我知道，他们想过这个方案，研究过，反复考虑过，也开过会，但最后都放弃了。他们要你去。”

他不吭声了。他习惯说短话，虽然这段话算不上演说，但也累得他上气不接下气。他望望窗外，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那时正是2月底。他转过脸对贝尔巴说：“一向是这样，他们一有困难就求我们。他们总是对我说一堆好话，什么你们是老厂，有好传统等等，无非是想从我们这儿挖人。他们还说你们的劳动纪律好，技术水平高，是于

部的摇篮，尽给我灌迷汤……一眨眼，他们就把人挖走了。先是卡拉茨、罗曼，现在是克拉约瓦电机厂。几个奥尔特尼亚人回家乡去了，这没说的，可是其他人也走了。他们用甜言蜜语糊弄我，什么干部摇篮，说我们厂出干部。历来如此。"他苦笑着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贝尔巴，要知道，我拼命保你，可是没有成功。明天，你就去吧，6点钟接见。他们提醒我，要你6点整到那儿。在你回来前，先找个人接替你的工作。你自己找吧。当然，您得同意……"他耸耸肩，以很低的声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换个地方……对你有好处……在这儿也受够了。"他站起身，走到贝尔巴跟前握握手，陪他走到门口，对他说："你到会计室去一下。我已经指示他们给你办理必要的手续。"

他彻夜未眠。次日，天蒙蒙亮，他便起床，穿好衣服。现在去车站太早了，离开车还有好儿个小时，他没有事情可做，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最后，他仍然决定离开家门。天空飘着雪花，严冬即将过去的时候，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冰雪正在融化，他感到空气异常温暖。他记得，当时这样想过，"来一次流感，我卧床不起，他们不就少一个厂长了。"他轻轻关上门，自言自语地说："我很快就回来，我不会离开太久，明天上午就回来。"他有过顾虑，倒不是害怕新的工作，只是

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新环境，他有了堕性，现在该振作精神。他将返回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去，却觉得对它很陌生。没有人在那儿等他。他已经习惯了这儿，又不得不从头做起。他失去了维奥丽卡，安卡也不在身边，留下他只身一人。他沿着下坡的街道慢慢往前走去。安卡出生后几年，他从罗马人大街搬进有热水和暖气设备的楼房里。维奥丽卡笑着问他："咳，现在还要这把镰刀做什么？"他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要带走，留作纪念。谁知道，什么时候醋劲一上来，我要砍掉你的脑袋。"二人笑得前仰后合，那笑声常常在耳边回响，岁月不能抹掉它。他回忆来厂后的第一年所参加的那些群情激昂的会议。有一次，德拉戈什敲着桌子要大家安静："同志们，我们无法给每个人都提供住房，房子盖得很慢。不过，有朝一日，我们将向本厂的每个职工提供住房。"德拉戈什的诺言兑现了。

他缓步往前走，街道拐了弯，他站在相当高的地方，尽情欣赏城市的景色，新区，老区（后来工厂在那里扩建），高大的烟囱自豪地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左侧是蛇一样的钢缆绳，一个个小车厢在那上面来来往往。但是，那些巨大的支柱尤为壮观。他心里想，别的地方有这样的铁柱吗？他又赏玩一会儿风景，才恋恋不舍地继续往前走。皑皑白雪上残留着斑斑点点的煤灰。不，那不完

全是煤灰，可能是一种混合物，若用显微镜观察，便可发现矿碴的微小颗粒。确切地说，那是松散的黑粉团散布在白雪上，成为城市的特征。他走过电影院的门口时，发现它的屋顶锈蚀得愈加厉害了，作为测风向的公鸡一动不动地站在屋脊，说明今天，至少此刻没有风。过了桥就是新居民区，是啊，城市日新月异，而他不能留在这里目睹它的变化了。

一路上，他走走停停，几乎在每个交叉路口都停留一下，他的眼睛简直变成了照相机，想把全部景象都拍摄下来。因此，他到达车站的时间比预计的晚，上了火车，没有来得及找到座位，列车就徐徐启动了。他凭窗眺望，平日熟悉的景色一晃而过。列车驶离城市，雪很快恢复了自己洁白的本色。它在山间行进，重山峻岭渐渐被抛在后面，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

中午，他才到达终点站。他疾步走出车站，如果愿意的话，完全有时间到故居去转转。他想，“10分钟，至多12分钟就够了。”随即，他耸耸肩，“有什么用处？”他改变了主意，朝相反的方向即市中心走去。他像早晨一样慢慢走着，不知如何消磨6个钟头的时间。回到了家乡，他却对周围的一切感到陌生。他边走边想，觉得时间冲淡了往事，它们如同儿童吹的肥皂泡，炸破之后即消失了，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

他准时赴约，提前10分钟来到传达室。他要求门房通报。是的，他们得知他到来的消息，看一看他的身份证，把名字抄写在小纸条上。“请签完字交给我，您可以让女秘书签个字。请上楼，她在二楼等您。”他拿着纸条走进小厅，里面空无一人。他想起得上楼，于是登上木楼梯。楼上静悄悄的，不见来迎接的人，他不知该向左还是向右边走。墙上亮着低度数的灯泡，光线昏暗。当他正在彷徨的时候，一个妇女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她不年轻，但也不衰老，只是头发开始灰白，向后梳成发髻，并插着一根骨制发竿。她戴着宽边眼镜，镜片很厚。他心里想，是个近视眼。妇女慢吞吞地问：“是贝尔巴同志吗？”他点点头。她说：“请跟我来！”确认他跟在身后，于是就迅速向过道的尽头走去。

## 三

贝尔巴入院后的几个星期里，一心想着得尽量瞒着安卡。他与特列塔商定，全部信件由他转递。“通信”一词并不确切，因为只是他给女儿写信。他焦急地等着回信，过了许多日子以后，才收到一张印着康斯坦萨俱乐部风景的普通明信片，除了常用的“寄自黑海的问候”外，她在狭小的纸片上尽可能地写了几句话。安卡告诉他，身体健

康。学校开学了，学习不错，语文考了10分①，历史得了9分，字里行间充满勤奋学生的骄傲口气。如此而已。她对奇雷斯库太太说了些什么？目前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不让她知道玛拉走了以及他生病住院和退休的事。

但是，他一直放心不下，安卡终归会知道的想法如同火红的铁钉扎入心中。他长期住院休养以及同阿格利切鲁的谈话，都促使他反思自己走过的路。他走过的不就是通往认识的路吗？他喜欢把它比作一棵树，从这树上摘下来的果实，有时甜，有时苦。这不是他灵机一动，凭空想出来的。他对特列塔说过："喂，朋友，我不懂哲学，你别卖弄自己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不错，很久以前了。他还住在别墅里。春天的周末晚上，他们在阳台上坐到深夜，倾听树林中的鸟鸣。真的不懂吗？现在可好，医院生活已经证明，他善于研究哲学，并且迫使他思考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他还以自己惊人的想像力编出认识之树的故事，树上结着甜果和苦果，甜的赛过石榴，苦的胜似苦胆，他亲口尝过两种果实。这是他编出来的故事。他现在有可能相对冷静地判断人和事，尤其是回顾自己的过去，他经历了这条痛苦的认识路上的各个阶段，甚至一度迷途，如同玛拉的

---

① 罗马尼亚的学校使用10分制。

结合。他经常责问自己，怎么能那样轻率？对旧事，包括对入院前不久发生的事进行重新评价，也是他的新经历。他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不希望重提痛苦的旧事，尽管时间已经冲淡了记忆中的悲伤。他首先想起了玛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至今他从未想过，她离弃他后，谁受的痛苦最大？是他几年来习惯了炽热的女人身躯的男人性欲，抑或是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也许，兼而有之。他已经习惯她的存在，有个时候，甚至在医院里都感到需要她，尽管自他住院后对她的回忆开始笼罩上阴影。从某种意义说，他和玛拉有过几个月的幸福生活，而这种幸福最终表明只是骗局和幻觉。失望情绪帮助他认识了真正的玛拉。当然，他在那以前已经发现妻子有不少缺点。“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他原谅她，尽力替她辩护，或者说对她的缺点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生病、退休和离异使他认识了真正的玛拉。首先，最显眼的是她的薄嘴唇，他虽然不相信相面，但还是想起有人对他说过（奇怪的是忘了是谁）：“薄嘴唇的人恶毒。”如今，他掀开了蒙在自己眼睛上的手帕。其次，还有她引以自豪的身材？她的体形优美，也许过于丰满，过于“性感”，色迷的人会这样想的。尽管她十分注意保养，几乎不吃面包和甜食，但过不了几年也会发胖。她暂时能控制发胖的趋势，她成了美容店的

常客，做电按摩，但始终没有接受他的劝告下决心多散散步。她离开后，他才幸灾乐祸地想像着一个胖乎乎的玛拉。现在，他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几乎不再想她了。

没有过多长的时间，他就惊讶地发现，玛拉在他心目中出现的次数日益减少了。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那天晚上的“交涉”触发了他的心绞痛。他从来不曾患过心脏病，被送进医院后，医生也奇怪他怎么不喊痛。如果开头不是痛得他死去活来，只是胸口有点刺痛或不舒服，那么他会不知不觉地经受住第一次打击。当然，如果过一段时间再突然躺倒，人们就会认为他无缘无故地患了心绞痛，他可以含糊其辞地回答他们提的问题："近来，您吵过架没有，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他怎能让别人干预自己烦恼的私生活，况且又是刚发生的?他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切都是从与玛拉的争吵引起的。他怒气冲冲地离开特列塔，回家的路上看清了她破绽百出的阴谋。她精心策划阴谋诡计，偷换相片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安卡撵出家门。显然，女儿要不是发现她做的小动作，不会有那样强烈的反应。放维奥丽卡相片的地方，居然换上了玛拉的，再说那一张相片连他也没有见过。她气急败坏地问他："你真的要欣赏吗?我有的是!"玛拉以攻为守，边开门，边不顾羞耻地朝他大喊大叫："拿去，看个够，不错吧，对不

对？”电视机上放的相片，与其说是对他微笑的面容，不如说是玛拉几乎一丝不挂的身体。她上身仅戴一个小乳罩，勉强遮住奶头，下身穿比基尼泳裤，全身几乎是裸体的。“是4年前在科德莱亚照的。我的一个朋友给照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会遇上你，没给你看过，怕你不喜欢这种照片。”这话哪像辩解，简直是挑衅。一个朋友？在他们认识前，她有过多少“朋友”？

后来几天，双方都后悔了，想忘掉吵架的事。她像一只驯服的小羔羊温柔可爱。她的相片完成了使命，她又把维奥丽卡的相片放回原来的地方。其实，两人都对发生过的事耿耿于怀。折磨他的主要是嫉妒心，他好不容易才把结婚时产生的疑问压下去，一个陌生的玛拉形象又勾起了它们。她有过多少朋友？在他之前跟她交往的男人都是些什么人？她一直不愿向他坦露自己的过去。为什么？难道有不可告人之处吗？到底是什么事呢？

后来发生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玛拉既然显现了原形，也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他住院后，她相当殷勤（谁知道，也许意识到是自己让他落到这个地步的），提出陪住，“我同你在一起，好照顾你。”他生硬地说：“没有必要。”接着，他又解释说：“这儿有经过训练的人员。再说，我过几天就出院。”她高兴地说：“那好，你还继续工

作吗?”他竭力压住怒火回答道：“不知道，不一定，这种情况一般会给病假的。”“不至于那样严重吧?”她害怕了，你会认为她真为你担心，其实不然，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他嘲讽地问她：“你以为心绞痛是小事?”她没有回答，只认真瞅了一眼，便心事重重地走了。

住院后的最初几个星期，他孤独地呆在病房里，无数次地回忆与玛拉关系的始末。最后，他认为一切都极其庸俗，令人厌恶，他竟不自觉地玩了一次捉迷藏的游戏。他第一次在布拉索夫仲裁法庭看见她时，并不喜欢她。他厌恶律师，尤其是长得漂亮的长舌妇律师。按斯塔玛特的说法，这个律师“鬼得很”，而他认识到这一点竟花费了几年的工夫。因此，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始于布拉索夫，而是在波亚纳山上，也许她特意选择了这个地方。犹如演电影，他又看到他们头一个晚上住过的旅馆里的房间。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早早醒来，一时弄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迷迷糊糊呆了一阵子，他才想起夜间发生的事情。玛拉静静睡在他身边，他们盖着同一条被子。她的面容安然舒坦，青年女子做爱后都是这个样子。她的浓密黑发散落在枕头上。他凝视她一会儿，然后轻轻从被窝里爬出来。他打开门，走到小阳台上去。一夜间，空中飘洒着鹅毛大雪，这在山区屡见不鲜。也许直到黎明时分才停止下雪，他在

阳台上没有看见大雪纷飞的场面，只感到从山上吹来清新的冷空气。旅馆的门前响起了汽车的马达声，有人准备冒雪离开。他看看那几位勇敢的人，又仰望天空，只见乌云正滚滚而来，渐渐吞没一个又一个支撑电缆车的铁柱。雪压弯了他面前的枞树林。他衣着单薄，不禁打了个寒颤。他开了门，又蹑手蹑脚回到屋里。他走了几步，便在床前站住，定睛细看这个突然闯进他生活里来的女人。是睡梦中下意识地感到有人看她，抑或是听到了他的声音，玛拉睁开了眼睛。她倒是很快就明白身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对他嫣然一笑。她起身跪在他面前的床上，轻轻叫了声"亲爱的"，稍微挺直身子抱住了他。她的胳膊像一条项链围在他的脖子上，他意想不到女人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随后的几个月，在结婚前，他经常去布拉索夫出差。他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有时甚至连工作也不顾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一有机会，他就到布拉索夫去，到波亚纳去，到普拉霍瓦河谷的休养站去。数月内，他沉湎于性生活，维奥丽卡去世后，他长期抑制自己的性欲要求。他和玛拉在布拉索夫的老市政府大厅里举行了婚礼。婚后，他把她带到这儿来。回忆迅速跳到了他们共同生活的后期。他出院不久，一天早晨，他觉得浑身软懒，不适应无所事事的生活。电话

铃响了。近几天来，他很少接到电话，因为厂里的人被告知，尽量不要打扰他。尼奇富尔含含糊糊对他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他安安静静地恢复健康”。这次电话里的声音像是机器人，毫无感情，女秘书通知说：“领导上午很忙，要我通知您今晚来一下，他想同您详细谈谈。”会见不算太长，对方想表现得热情些，尽管已经悄悄地瞧了几次表。“我们跟医院联系了，”他说，“这是应该做的。我们很担心，认为到了您该关心自己健康的时候了。”他停顿了一下，怀着明显的同情心望望贝尔巴。他们二人长期共事，相互关系几乎可以说是亲密的，当然没有超过一定界线，他保持着界线，不想也不可能超越它。对方用舌尖舐一舐嘴唇，不难看出他并不乐意说自己不得不说的事。“我们跟医院联系过，不该用担架把您送到那儿去。我们有一个心脏病医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属于最好的一批医院，可能是全国最好的。”他作了大量解释，似乎为了推迟进入实质问题。他接着说：“总而言之，那是一家县属医院，有著名医生。他们告诉我，您患了心绞痛。”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他马上回答。他开始怀疑起来，对方在百忙中抽空会见他，准有自己的目的，可是一时还弄不清楚。

桌上堆满了纸和文件。坐在桌子另一边的人看了他几眼，那人不仅深思熟虑，而且有点忧

郁。"我很高兴，您没有消沉。我想，对您来说，重要的是，怎么说好呢?医生有另外的看法……"

"医生有什么看法?"他问道，同时感到现在才谈到问题的实质。

对方没有立刻回答，又用舌尖舐了舐嘴唇。显而易见，他不喜欢进行这次谈话。他们相识多年了，他主管工业，贝尔巴一来这儿就认识了他。可是，他眼前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比完成生产计划困难。他终于下了决心，说：

"瞧，贝尔巴同志，我不得不通知您……咳，不愉快的事。医生的结论是明确的，您需要住院治疗。我们城里有心脏病医院。阿格利切鲁教授将会得到有关的指示。您应当住院，也许不是马上去，您还得了结一些问题。"他又犹豫了一会儿，断然说："由于您的病，已经决定让您退休了。"他又看看表，站起身来，伸出手紧紧握一握贝尔巴的手。"我将为您尽快恢复健康作出一切努力。"贝尔巴茫然地站起来，机械地握握对方伸过来的手。他明白，会见已经结束。

他步履艰难地慢慢走下楼。他命令自己："我得振作起来。"可是，茫然失措的心情依然存在，不肯消退。那是5月初的一个温暖的晚上，他回过头望着刚才离开的办公楼，只见几扇窗户后面亮着灯光。他知道他们还在工作，并且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变了，一下子成了"退休者"。

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果，当然，他知道迟早要退休，但他想那是遥远的未来，12年或15年以后的事。如今，这个遥远的未来忽然变成了现实。他原先以为自己可以很快复原，只休休病假就行了，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工厂。他问自己："让我住院？"他马上推翻这一可能性，并且自我解释说："医生都是一个样子，喜欢夸大。"不过，他知道刚才的会见时间虽然不长，但有关住院的事可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

他比平时更慢地走到家。他蹒蹒跚跚木然地走上楼，愈往屋门走，好奇心愈大。玛拉会有什么反应呢？他摸出钥匙开门，走进屋里。玛拉听见开门声，便来到门厅，探询地瞅了他一眼说："我提前回家，没有找到你，你去哪儿了？"他默默地端详她，仿佛要记住她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的面部表情。他说："进屋去，我告诉你个消息，咳……不怎么好。"他退到一边，让她先过去，然后，自己朝扶手椅走去，邀请她在另一把扶手椅上入坐，他们面对面地坐着。

"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她疑心重地问。

"领导同志（他没说名字）叫我去谈话，决定让我退休。是病休。看来，那次心绞痛比我想像的严重。"

"什么？"她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

“我已经说清楚了。”他闷闷不乐地说，不愿意重复。

“你没有表示异议?”

“我想，你知道这不取决于我。我的印象是，他们已经做了决定。”

她俨如一个不敢肯定是否上当的人，半信半疑地看了他好大一会儿，然后以怀疑的口气问道：

“你非退休不可吗?”

“我想是的。否则的话，阿尔迪亚(就是找他去的人名)不会叫我去的，他的时间宝贵，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她以迷惑和失望的目光又看看他，他还没有见过她的这种眼神。当然谈不上同情，因为她像一个陌生人，用冷漠的眼光打量他。

“你当了几年厂长?”

“什么?”

“我是问你，”她有点生气地重复说，“当了几年厂长?”

他有点莫名其妙地作了回答。她是什么意思?她想干什么?

“噢……”她若有所思地问，“你工作几年了?”

“你要给我计算退休金?”他嘲讽地问。她点点头。“好。已经29年了。”他想开开玩笑，但由于伤心未能如愿。

“29年。”她重复说，她那漂亮的，尚未长皱纹

的额头里面的大脑正在运算。“喂，我算出了你的退休金。”她说出了一个数字。后来证明与他实际拿到的退休金只差几十个列伊。这笔钱虽不能跟厂长的工资相比，但也不算少。玛拉想着心思，强调说：“太少了。我们得节省一点。我想你会明白的。我相信安卡也能理解。你给她寄的钱太多了。”

“安卡将继续得到她应得的钱数。”他咬着牙说。

她瞥了一眼他那忽然阴沉的脸，谨慎地意识到还是不要说下去为好。

“你遇见了那么多意外的事，我想最好让你休息一会儿。”她出奇平静地说完后，便迅速离开房间。

她可能是在那一刻决定离弃他的。她习惯于当机立断。玛拉有次向他承认说：“这是职业需要，尤其是发生预见不到的新情况时，你无法事先考虑。”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然，这次不是法庭审理案件，不过，场合并不是关键。或许，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她早在他住院时就下了决心。她可能找医生打听过，知道了他的病情。她表面上急躁，但“问题”一直接涉及到自己，必然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决定。这一次可不只是胜诉或败诉的问题。现在仅剩下一个程序性的细节。这是她的说法，她喜欢用职业术语，往往在自己的话里

夹进一些法律词汇。细节即毫无重要意义的枝节问题，她所需要做的事是：把自己的决定通知他。她或许有过犹豫，男人对这种小事的反应是迟钝的。如果她真犹豫过，那也是为了选择时机，因为她是决不会后退的。

后来，他在医院里回忆起来的事，大致就是这样。他有足够时间从各个角度考虑“问题”（这是玛拉的说法）。其实，那天夜间他没有睡好觉；人适应生病的生活是不容易的，需要时间和智慧，有时磨难会使人聪明起来。后来，他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同意这样一种假设，即玛拉看一切问题都酷似赌徒，或者说，她在赛马场上选择自己喜爱的马，他认为后一种比喻更为贴切。可怜的马绊了跤，未到终点就倒下了。他甚至觉得玛拉流露出遗憾和敌视的神情，好像他故意生病骗她。她为什么忍受命运的摆布？他了解她的思想方法，她将摆脱这不合算的婚姻。她准是这样想，自己还年轻，尽管算不上少女（可惜30岁的人想的却是18岁的事），但还有若干“美好”岁月，岂能甘当心脏病人的护士？她没有怜悯心，她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这是缺陷。这一切假设仅仅是他想象出来的，不过，现实是玛拉抛弃了他。

他们没有任何“解释”就分手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当她宣布自己的决定时，他凝眸注视她许久，为的是牢牢记住这一时刻。他当时只感到无

限后悔，选她做伴侣是犯了莫大的错误。她通知他："我回布拉索夫去，已经跟他们通了电话。他们同意我回去担任原来的工作。"她避开了离婚一词。她并不缺少直觉，懂得用赤裸裸的语言说明事实令人难堪。即使是律师，有时也不得不放弃这类词句。她说话的口气平平淡淡，毫无感情，好像是说第二天她将要晚一点回家或者去外地出庭辩护。她站在他面前踌躇了半天，也许还想说点什么。在这种场合，话是多余的，她聪明得很，完全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因此，她稍微耸耸肩，似乎想咽下某些不合时宜的客套话。比如，有的女人在争吵之后还愿意这样说："你别生气"，"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更有甚者，"我们可以继续做朋友"，仿佛友谊与卖淫是同义词。她至少没有让他受这种罪。她又耸耸肩膀，为迅速结束了这一切而松一口气，然后便走出房间。

他犹如脑门上挨了一棍，呆愣了几分钟。随后，他也走了。那天晚上，他住在特列塔家，简单说了一句："特列塔，玛拉把我甩了"。另一个人没有吱声，二人早早上床睡觉，可能是有意避免谈话。"我明天一早去赶火车。你出去时碰上门。我用的是撞锁。"他直到天亮才成眠，街上的吵闹声把他从熟睡中惊醒。他走到屋外去，太阳像头一天悬挂在高空，他沐浴着公平欢快的阳光，昨天他对这个结局一无所知。玛拉当然已经走

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并不想回家。他在公园里慢慢散步，并且停留下来，故作认真地观看孩子们嬉戏。他看了一会儿小男孩和小女孩一本正经地玩过家家。他继续往前走，反复叮嘱自己：疾病和玛拉的离去是祸不单行，我必须挺住。后来，他惊奇地发觉肚子饿了。于是，他走进一家饭店，饭后又向招待员要了一杯咖啡，尽管这是医生绝对禁止的。付完钱，他慢慢步行回家，好像故意拖延时间。他看一下表。他心里说，火车快到锡比乌了，他熟悉列车时刻表，两年前曾经无数次地乘坐这一趟车。他回到了家，从一个屋走到另一个屋，并打开所有的窗子和屋门。风吹得窗帘哗啦哗啦地响。

## 四

最初几天，他寄希望于很快忘记这一切，即使不能全部忘掉的话，至少可以减轻点精神压力。几个星期后，他才认识到，这都办不到，因为不是如他所想象的凭借意志的力量能做到。我们不能轻易抹掉记忆，不像掉落在小道上的树枝，可以把它一脚踢开。他想：“我经历过更为沉重的打击。”奇怪的是，他想的不是疾病，而是维奥丽卡去世所带来的不幸。他不懂得，随着年龄增长，人的感情日益变得脆弱；不仅是因为健康

状况江河日下，而且战胜困难的能力和力量也減弱了。自某个时期以来，灾难接踵而至：先是开会时发作的心绞痛，接着是退休，当然还有玛拉的出逃，这还能有别的说法吗？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意志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玛拉不只没有从他的记忆中消失，反而加深了印象。他为忘不掉她感到自惭形秽。的确，他自怨自艾，用另外的眼光看待她。波亚纳的那一夜普普通通，但一切都是从那儿开始的。在他们初次做爱的夜晚，他所看到的银妆素裹的枞树枝，朝波斯特瓦尔飘动的薄云彩，此时他觉得是人做出来的，如同自然主义戏剧的布景，全是用硬纸板拼凑起来的。她身穿透明的薄睡衣，与其说遮住了臀部，倒不如说暴露无遗……听说在某些豪华旅馆里，女人站在橱窗中展览自己，供顾客观赏，用肉体招徕他们。他把玛拉比作卖身的妓女，而他自己则成了没有“经验”、上当的小伙子。他又回顾了第一天的行程。他们从仲裁法庭出来后，直接上了波亚纳。他们向他保证，郊游用不了两三小时，最多4个小时。工程师还担保说：“天黑以前，我们送你回旅馆。”斯塔玛特发现自己“不巧”患了感冒，他抱歉地说：“我不想传染给你们。”他说完耸耸肩膀就走了。“这个大骗子斯塔玛特。”当时，他笑着这样想。如今，他有新的看法，即斯塔玛特已经发觉“鬼得很”的女人要耍花

招，自己不愿介入。

突然间，他感到寒气钻心，仿佛有粘糊糊的东西堵在胸口，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一切都成为过去，但他妒火中烧，他竭力摆脱这种心情，而粘糊糊的东西却顽固地缠着不肯消退。斯塔玛特可能只觉察出什么，但是那个人呢，他叫什么来着，亚历克萨，还是亚历山德雷斯库？他为什么甘心听玛拉的摆布？他们是同事？不能说明问题。他的工厂里不是也有许多这样的纠葛吗？妻子来告状说，“那个娘儿们”破坏她们的家庭。一种秘密的关系。那个工程师像是花花公子，玛拉喜欢奢侈。他们之间发生些关系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不会是“认真”的，工程师，似乎……他隐约想起，工程师的手指又短又粗，无名指上戴个戒指。他有妻室，也许还有孩子。他和玛拉之间只不过是恋爱冒险。他们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可能追求别的什么。他喝得酩酊大醉后，的确是显现了原形，说了些语意双关的笑话，他从桌子下面伸手去摸玛拉的大腿。她坐在他们中间，随即站起来要换座位。他痛痛快快答应了，因为他看到酒鬼的手从桌下面抽回来。他想：“他真是忘乎所以。”现在，他有不同的看法。是啊，即使一个男人喝醉了酒，也不至于在饭店里无缘无故摸同桌女人的大腿。难道仅只是行为不检点？毫无疑问

是酒后现原形，他忘记了殷勤向导的使命。他在大庭广众下做下流动作，暴露出流氓本性。他之所以这样……不恰巧证明他与玛拉之间有过，也许还存在着暧昧关系吗？

嫉妒心促使他激动地想象下去。后来，他们结了婚，忘记了好色的工程师。事实上，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工程师。一清早，他和斯塔玛特乘火车走了。他记起了斯塔玛特充满疑虑的目光，懂得法律顾问要求调换工作的原因。他试图挽留斯塔玛特，对他说："我们这儿需要您。"可是，一般情况下都很精明的法律顾问，却尴尬地编造了破绽百出的幼稚理由。他已经把工程师置之脑后，只是在探索他所不了解的玛拉的经历时，才又想起一些同工程师相关的事。他现在才开始明白的事，过去却未加重视。比如，为什么玛拉避免谈与自己的过去有关的任何细节？她曾经偎依在他的怀里说："我们都为现在活着，并且感到幸福，别再用毫无意义的提问折磨我了。"每逢她不得不回答某些直接的提问时，不管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模棱两可的词句。她完全可以编出各种各样的答案。不过，她精明过人，知道说谎是危险的。人们会忘记谎言，但如果再编造一个新的，必然引起怀疑。众所周知，妒忌的人喜欢追根究底。他一起疑心，便要穷究不舍。而她却像一条壁虎，任你追问也抓不住她。现在，他坚信，玛拉有意向他

隐瞒自己的往事。她一定有过情人。多少个？都是些什么人？

过了几个星期后，他决定搬家。他已经清醒，至少是部分地清醒过来了，他将要开始斗争。他是个自强不息的人，他生性就这样。如果可能的话，他首先必须忘掉过去，即不久前的过去。努力忘掉不久前的过去，意味着他与自己作斗争。他同别人作斗争时，从来不后退，现在跟自己斗争就是要克服成年男子被年轻女人抛弃后所产生的悲哀。问题的实质也许不在这儿，至少不完全是这样。不管怎么说。他深感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如同被烙铁烫了一下。为了摆脱不久前的事……也就是说玛拉留下的印象，自然而然就想到搬搬家，换一个地方。尽管连续数日给屋里通风，但床上和卧具都还残留着她的香水味，这只有他能隐约闻到，别人是不会发觉的。他记得清楚，每天晚上，她怎样脱掉衣服迅速钻进被窝的。他想："咳，要是巴比安在的话，他会帮我摆脱困境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想着那个前经纪人。巴比安能为他找到一所满意的住宅，不要太讲究，因为他已经退休，需要节省一点。

他想起到这个城市来住的第一所房子，时间过得飞快。那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别墅。在那儿，他夜间睡得很香，偶尔半夜醒来，可以发现探照灯照得满屋通亮，灯光是从花园那头对着工地照

过来的……人们夜以继日地施工，很快把工厂建起来了。别墅引起他的不快，他不愿多想下去。他得自己想办法。特列塔呢？可以给他讲讲笑话和趣闻，减轻他的忧伤。至于找房子？根本办不到。沃什蒂纳尔呢？他犹豫不决，觉得不便求他。奥尔坦莎，不错，她一如既往。可是，妇产医生沃什蒂纳尔呢？退一步说，即使愿意帮助他，也没有时间。他无法想像沃什蒂纳尔会抽时间帮他找房子。也许奥尔坦莎能做到？如果求求她呢？女人在某些事情上的精明能干劲往往出于人的意外。再说，他们比较熟悉，对他来说也许方便些。他和玛拉结婚前，有一次或两次，他觉得……她现在仍像他当厂长时一样尊重他（如果说他有值得人尊重的地方的话）。而沃什蒂纳尔却……他不知道沃什蒂纳尔是不是还生他的气。沃什蒂纳尔是赌着气走的……他确实做得不对。他们是从哪儿听到玛拉出走消息的？这种新闻经常是不胫而走，因为人身上都有小市民习气，说长道短，编造谎言，热衷于传播妻子遗弃丈夫等新闻。

他的心情不好，沉默寡言，但他没有下逐客令，说自己希望安静，不愿见人。他们连半小时都没有呆够。后来，沃什蒂纳尔勉强装着有礼貌地说："我们走了。看来，我们的来访打扰了你。"他没有反驳，也没有挽留他们。他失去了自制力，客人一走出去，就两次哐啷关门，也许他们在楼

梯上听到了他锁门的声音。他们来到街上，妇产医生生气地说："您的厂长有点过份了。"他一生气就称妻子为"您"。他一向处处受人尊敬，认为贝尔巴的态度带有挑衅性。奥尔坦莎试图安慰他说："别计较，他遇到了不幸，心里难受。"他酸溜溜的挖苦说："你倒会体贴人！"接着又幸灾乐祸地说："我不是早对你说过了，这种婚姻长不了吗？他早该知道对付不了那种女人。"他的气消下去了一半。他认为受人尊敬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奥尔坦莎看到他那么激动，便不再多说，因为做解释只能使他气上加气。沉默是最好的办法。贝尔巴开门迎接他们时，眼睛布满血丝，胡子拉碴，几根白胡子格外显眼，看来已经好几天不修边幅了。"他老多了。"她惊讶地想。同时，因为自己不能留在他身边安慰他，减轻他的痛苦而感到忐忑不安。她想起了那次会上的情景，他扭曲的脸和本能地用手摸胸口的动作，仿佛是昨天的事。是啊，他是个坚强的男子汉，可是命运又一次同他作对。

电话铃响时，她吓了一跳。她时刻想着他，当听见电话里响起那个熟悉的男低音时，并不觉得奇怪，只不过听出他的声音中含有悲伤。"可能打扰了……"她忙反驳说，"一点也不打扰。"本想说恰恰相反之类的话，可又认为太俗气，因此就不再说什么，只细心听他讲。末了，她明确回答

说："房子的事我包了。我的丈夫认识几个房产经纪人，当然，他们经营老式房子，但是也不会放弃任何买卖。要多少房间?"他还提出在报上登换房启事，她开着玩笑把他驳了回去。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他只要两个房间。"您不愿住在市中心？好吧，对方就占了便宜，好解决，对，可以解决。"她高兴地听着贝尔巴讲话，心想又可以看见他了，即使不能常见面，至少能同他在电话上联系。她放下话筒，轻快地跳起来，过了几分钟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惊奇。她禁不住开始低声吟唱流行小曲。

午夜，贝尔巴在睡梦中突然心绞痛发作。他惊慌地醒来，在床上翻来覆去，觉得似乎有一把铁钳夹住他的心。他想："我死定了。"因为据说，第二次犯心绞痛就没救了。他遗憾的是没有看见安卡。她年纪轻轻的。当然，她的生活不至于没有着落，能领到抚恤金。她在奇雷斯库太太那儿过得再舒服——她真的舒服吗——也是一个孤儿。她还记得维奥丽卡吗？他们从来不谈她母亲。他后悔自己犯的错误。当人们认识到过去的错误时，不难发现，时间一去不复返了。他的确是有意回避对安卡提她母亲，怕引起她的痛苦回忆。对于一个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来说，失去母亲是无法医治的创伤。他为什么用刀子去捅这个伤口？并且，他也从不跟老岳母谈起前妻。他一面在床上小心地

翻身子，一面认识到应该让安卡了解真情。他必须找出最合适的词句，使女儿明白他多么爱她母亲，他们曾经是多么幸福的夫妻。他要用最恰当、朴实的语言，而不像特列塔嘲笑那些爱说大话的人是“夸夸其谈”。可是，他失去了这个机会，也许是唯一的机会。他给康斯坦萨送去的大量礼物，或者邮寄的包裹都没有起作用。

疼痛像发生时一样忽然消失了。或许度过了危机，他这样想……要是真得救了的话……据说，疾病可以加深对人生的了解……它似乎摘除了他的眼罩，帮助他认识玛拉，揭开她的假面具，看清了她的真面目。不过，从根本上看，这种认识是幼稚的，次要的。真正的认识之路没有终结，并不是到玛拉为止，还需要继续往前走，一直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恰巧是自我反思迫使他去找回女儿，他不把她看成是负担。父母亲远离孩子有什么意思呢？要是得救……无庸置疑，他们将为争夺孩子闹得不可开交，奇雷斯库太太可不会轻易让步。维奥丽卡去世后，他接受奇雷斯库太太的意见，把孩子寄养她家，他哪能照顾好一个不到6岁的女孩子呢？现在，奇雷斯库太太要了计谋，做了手脚，他必须力争，才能把安卡夺回来。或许，她不是故意的，不应当指责她。她担心失去安卡，为了稳住她，就竭力使她疏远父亲。无论她有意的还是本能的做法，关系不大，……关

键问题是她已经那样做了。他准确地回忆起原以为忘记了的情节，把它们汇总在一起，并一个个串连起来，其含义和教训是非常明确的。比如，放寒假或暑假。有时，他等着安卡来，可是落了空。他只好挂长途电话。奇雷斯库家没有电话。他记得清楚，遇到这种时候，他度日如年，终日如坐针毡，甚至连开生产会议也多次看表。下属莫明其妙，因为他平时总是聚精会神听汇报，不放过细节。有时，他等不及，会提前5分钟或10分钟拿起电话问康斯坦萨的长途来了没有，从电话局传来的总是女接线员不耐烦的声音："等着。"他等着，时间1分钟1分钟过去，脑海里出现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想像。他觉得过了那么多的时间后，电话铃才响。他忙抓起听筒，传来岳母生气的声音。他关切地问："安卡怎么了？"如果岳母装作不明白时，他会补充问："安卡为什么还不来？"似乎她需要考虑，过一会儿才能听到回音。事实表明，奇雷斯库太太向来不缺乏想像力。"她着凉了，怕在路上病倒，谁叫你住在外地的？如果给你送去个病人，你又要怪我没有照顾好她。一个病人……你哪能照看她？这种事情，即便你是厂长，也干不好。"或者说："学校里发生了传染病，她没有被传染上，不过，处于一种隔离状态……怎么说呢？不准离开城市……要走的话，可能出麻烦。"有年冬天，她通知说，从康斯坦萨到布加

勒斯特的铁路被大雪封住了。他大为吃惊，他们这儿只不过是深秋，打电话问车站。回答说："是的，多布罗加下了雪。铁路被封住了？没有的事，雪只有两三指厚。"

他只有忍耐，那时女儿才十一二岁，无法同奇雷斯库太太比高低，他只能等待，寻找时机争取安卡。当岳母不想把弦绷得太紧时，过一两天，她会放安卡来，跟父亲住上个把星期。时间飞快过去了，他终于取得了女儿的信任，但是来不及享受天伦之乐了。那天晚上，他送她去车站，为她购一张卧铺票。他们来到车厢跟前，小姑娘不了解是怎么回事，皱了一下眉头。他们登上火车。他们来得早了些，只有一位太太站在走廊里，她不太情愿地让了路，他们从她身边挤了过去。走廊里只挂着一个灯，蓝色灯泡发出了微弱的光线。列车员要验车票。他掏出票，严肃地说"×号包厢(记不得号码了)，是小姐的……"他看出安卡脸上的惊讶表情，不过，她控制住了自己。他们走进窄小的房间里，她好奇地扫视一下四周，拍手笑着说："爸爸，太好了。我们班里的女孩子还没有人坐过卧铺！我要对她们一讲……准是爆炸性的新闻。"她慢慢习惯了，像个旅游家吻别了父亲。列车在铁轨上慢慢滑行，渐渐加快速度，终于消失在夜幕中。他缓步走回家去，每次送走安卡，他都害怕回家，他对家会产生冰冷

冷的陌生感。

如果我能够活下去……他下决心要扭转这种状况。安卡还有几年中学毕业？一年，一年多一点，现在正是假期，她一个人过暑假。他一结婚，奇雷斯库太太给他写了一封内容客气，但语气坚决的信，不让他再去他们家。她做得太绝了。如今，情况将发生变化，也应该起变化。“我如果能起死回生……捡一条命……”他不敢多想。他不喜欢高谈阔论。刚才痛得他死去活来的心脏，慢慢平静了。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薄睡衣，发现心脏竟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的跳动。从表面上看，它如同一只刚擦过油的钟，随时都可能停摆，最后钟表匠也无法修复它。“我要是能够活下去……”他回避另一种设想。他恰似遇到灾难的人，脑子开始紧张运转。他不愿设想自己仅仅是任由命运之风吹动的一粒沙子。他还想象着自己痊愈后去康斯坦萨，他不愿想另一种可能，他一定要康复。

……不给他们写信，让他们吃一惊，大吃一惊。奇雷斯库太太看见他沿着花园小道走过来，一定会皱起眉头。“怎么回事？”她会闪过这个想法。她一贯是有主见的人，能很快拿定主意，走出门来拦住他，让他明白，最好止步，不要进屋去。他将不理睬她的不友好态度，对她笑笑（他有时也会笑）……对，要这样做。然后，好像刚才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以自然的口气说："我要同安卡谈谈。"奇雷斯库太太是个聪明女人，她不会不明白。于是，他带上安卡去卡西诺饭店吃饭。安卡会要求他去散步，并挎着他的胳膊走，她喜欢在众人面前挎着他的胳膊。每次去康斯坦萨，他都要带安卡先到海滨散步，然后再坐下来吃饭。最后一次同她散步时，她向他解释了挎胳膊散步的意义："得让我的同学知道，我也有个爸爸。"

他沉思了片刻。他想起了女儿的话，不管她有意无意，猛一听像是责怪他。这些年来，他尽力履行义务。安卡什么都不缺，但她还希望得到一件"东西"，也许这是最重要的：她要爸爸呆在身边。他想象着，在秋高气爽的恬静季节。9月底，最迟10月初，他们将一起去卡西诺饭店。听说，有时到深秋，海边还会有好天气。也许，在发生了那一切后，大吃一惊的安卡对他疏远了，不再提出去海滨散步。他将在饭店里告诉她退休的事……玛拉走了。他要字斟句酌，一点点地讲，不能一下子全说完，免得吓着她。他可以选用含糊的字眼儿、空话和套话，它们最便于掩盖真情："你明白，劳动，劳累过度……医生，扭不过他们……他们决定要我休息。"他还要破例喝一杯咖啡，随便补充一句："当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眼前的麻烦，即今晚的发病促使他去住院的事情都将被置之度外，甚至被忘掉，人是健忘的。

然后，对，当然要问她是否愿意来同他一起住。谈话将如何进行，以及安卡能有什么反应，他都不敢多想，仅盼望一切顺利，他们重新生活在一起。

眼前，他需要办几件小事。他得打几个电话。先给特列塔打电话，“不能吓着他”，他这样想着，轻松地笑了笑。他已经把自己同“其他人”——健康的人——区别开了。特列塔？他是个男子汉，应当正视现实。贝尔巴想，同他谈话时尽量不要感情用事，把钥匙交给他，让他代付房租，并转安卡的信。他了解自己的女儿，相信她迟早会回信的。他离开家前，给她写一封信。应该通知一下沃什蒂纳尔夫妇，他们，尤其是奥尔坦莎待他不错。就这些事了，不，还要给医院打个电话，这可能是例行公事。他们会说：“我们一直在等您。”退休之后，他没有马上去医院，拖了一阵子，人对重要的事情总是拖拖拉拉。就这些了吗？他没有住院的经验，听说只能带必不可少的用品……睡衣、晨衣。他从另一间屋提出一只手提箱，开始有条不紊地慢慢整理衣物。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黄昏情思
作者=（罗）比勒耶斯库（Biraescu，T.L.）著；次农，王敏生译
页数=389
SS号=12346413
出版日期=1990.02